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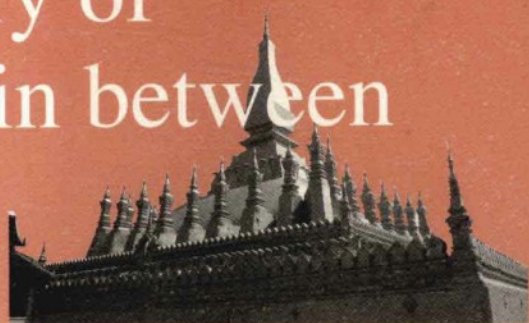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 老挝史

格兰特·埃文斯 著 郭继光 刘刚 王莹 译

A Short History of  
Laos: the land in between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A Short History of  
Laos:the land in between

ISBN 978-7-5473-0378-



9 787547 303788

定价：26.00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 老挝史

格兰特·埃文斯 著 郭继光 刘刚 王莹 译

A Short History of  
Laos: the land in between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市版权局合同登记：图字09-2010-387号

A SHORT HISTORY OF LAOS: The Land in Between  
by Grant Evans

Copyright © Grant Evans, 2002

First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2002

by Allen & Unwin Ltd, Sydney, Austral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len & Unwin Pty Ltd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year)

by Orient Publishing Centre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挝史 / (英) 埃文斯著; 郭继光等译. —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1. 8

ISBN 978-7-5473-0378-8

I. ①老… II. ①埃…②郭… III. ①老挝—历史  
IV. ①K33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3796 号

责任编辑：欧阳敏 章 悬

责任印制：尚小平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16.5

字 数：220 千

印 次：201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378-8

定 价：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 中文版前言

老挝位于东南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并且地处内陆。老挝周围环绕着中国、越南、柬埔寨、泰国和缅甸,使这个小国成为邻国之间的桥梁和缓冲地区。在其辉煌时代,老挝的国王也曾向外扩张领土。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老挝成了一个竞技场,更强大的邻国及其盟国会不时干涉老挝内务。20世纪50年代,刚刚摆脱法国而获得独立的老挝开始建设现代社会,但不久便卷入越南战争,战争带来了北越部队的进入以及高空中美国轰炸机报复性的大破坏。很少有政府能够在那些岁月里顶住巨大的压力并存活下来,因此皇家老挝政府最后的垮台并不令人惊讶。1975年君主制被废除,新政权开始执政,约十分之一的人口被迫流亡。这一切的发生只是接下来故事的一部分。一代人之后,老挝已经成为东南亚国家主流中的一员,并将在2020年前摆脱贫困。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老挝已经在旅游业、外国援助和投资方面实行开放,老挝人发现到国外旅游更为简化,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将了解老挝,老挝人也将更多地了解其他国家。

到老挝的游客们通常被这个国家人民的友好和良好心境所吸引,因此倾向于将这个国家浪漫化。老挝人也对自己作出浪漫的想象,但这个东南亚“未被触动”的田园生活的观念也有另一种解释:老挝是亚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不幸的是,这种被游客们钟爱的“未被触动”



却是失败的发展计划所带来的一个人工制品——它在 1975 年之后被隔离了 20 年。接下来的老挝政府承诺要“发展”，千百万的美元援助流入了这个国家，但往往直接流进了一些领导者的口袋里，也往往形成了一种依赖心理。在本书中，我将尽力解释老挝文化是如何处理并努力解决它所面临的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两难选择的。

这本书主要针对好奇的游客、记者、咨询者、外交人员、商人和学生。本书于 2002 年首版，2006 年出版了经修订的老挝版和泰国版，这个中文版也是以修订的英文版为基础。老挝读者对它非常感兴趣，因为它填补了官方出版物历史叙述留下的空白；泰国读者惊讶地读到老挝独立政体的历史，而不是老挝在泰国历史边缘的阴影之下的历史。我确信，中国读者对于老挝的历史知之甚少。但是正如接下来的书页所展示的，中国与老挝的关系正迅速发展，更多的中国人去老挝旅行，因此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

现在中国大陆官方所称的老挝第一次作为国名出现在史书中是在明朝，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它有两种书写方式，尤其是在老挝中国人商业经营的招牌中。实际上，还有第三种写法，虽然不是非常常见，即“寮国”，这是基于民国时期对老挝的称呼，因而它在 20 世纪在台湾地区及东南亚被译成寮国。当我学广东话的时候，发现“老挝”在粤语中被称为“Liu Kwok”。这三种形式都在中文维基词条里出现。我还不清楚为什么老挝没有加上一个“国”字，但是从历史上看，中华帝国与其南方边界相邻国家的关系摇摆不定，中华帝国在承认它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方面也摇摆不定。例如，今天被称为越南的地方在过去有时作为一个“国”而被承认，有时只被视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老挝”引起明朝的注意是在明朝探索与泰国北部的兰纳王国的联系时，它被明朝称为“八百大甸宣慰使司”<sup>①</sup>。然而，虽然它被称为宣慰司，但对“老挝”的涉

---

<sup>①</sup> 参见 *Lan Na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ino-Tai Relations as Reflected in the Yuan and Ming Sources (13th to 17th Centuries)*。Foon Ming Liew-Herres 和 Volker Grabowsky 提供了文本和评论。与 Aroonrut Wichienkeo 合作。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2008 年。

及却非常模糊和简略。17世纪的汉文文稿中出现了“南掌”，这就是万象之国老挝王国(Lan-Xang)最早的汉译名(现多作“澜沧”)。但总的说来，直到20世纪晚期，老挝仍然在中国人的视线外围。

关于民族名称“老族”的起源，在老挝有一些没有结果的争论。依我看来，它很可能起源于“獠”这个带有异族风味的称呼，当中华帝国扩张到西南时，这个术语常用来描述各种各样的族群。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术语被一些族群采纳用来描述他们自己，现在成为他们自己语言的一部分。不同民族-语言背景的人们都被称为“獠”，其中一些属于傣语语系。因此，居住在琅勃拉邦东北瓯江沿岸讲傣语的族群称他们自己为“老族”是很有可能的。正是他们征服了土著的王国或者酋邦“猛骚”，这些地方后来被称为“琅勃拉邦”。在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反馈的过程中，当中华帝国的使者们邂逅到这个老挝王国时，他们可能使用同音异义字“老”代替“獠”来命名这个族群。

这本书没有被学术争论所负累，但其使用新方法对关键事件的调查却对那些熟悉老挝历史的人提出了严肃的挑战。它为我们提供了新观点和新信息，同时还展示了很多以前从未被出版过的照片。本书意欲吸引更广泛的读者，因此注释已经被降低到最少。

## 致 谢

一些人慷慨地留出时间阅读拙著,并帮助我使书中多处表达更加明确。我的老朋友 Stuart Macintyre 是澳大利亚一流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不懂老挝史,故能够就一些专家想当然的内容提出疑问,所以我请他阅读。他的谨慎是出名的,所以能够保证书中章节即便对初学者来说也是清晰的。Soren Ivarsson 是新一代的老挝史学家,在我撰写书中前面的章节时,他的建议使我很容易找到老挝史的资料。Thongrith Phoumirath 是一名流亡到澳大利亚的老挝人,他使我消除了该文对老挝人阅读难度的疑虑,即使是一些不常用的术语对他们来说也熟悉的。Peter Koret 爽快地允许我在本书开头的章节引用他翻译的诗“Leup Pha Sun”的部分内容。还有一些人在不同方面都给我提供了帮助,尤其是在对资料的讨论与共享方面,他们是 George Dalley、Arthur Dommen、Chris Goscha、Joel Halpern、Pheuiphanh Ngaosyvathn、Phouvong Phimmasone (在本书的写作中不幸去世)和 Mangkra Souvannaphouma 亲王。波士顿肯尼迪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在我造访时

xi

给予了特别的帮助。Rosemary de Dear 魔术般地增加了本书的图片。最后,我想感谢 Milton Osborne 邀请我参与亚洲简史系列。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写一本老挝的简史,但这样做使我厘清了困扰我多年的该国的早期历史。

格兰特·埃文斯

于香港

目  
录  
*Contents*

中文版前言 / 1

致谢 / 1

---

第一章 老挝之前 / 1

第二章 法国统治下的老挝 / 38

第三章 皇家老挝政府 / 83

第四章 战争及皇家老挝政府的垮台 / 126

第五章 老挝的社会主义过渡期 / 154

第六章 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 / 181

第七章 现代世界中的老挝 / 213

结语 / 225

参考文献 / 226

进一步阅读 / 233

索引 / 238

译后记 / 249

## 第一章 老挝之前

在 19 世纪结束的时候,老挝作为一个国家实体出现。这是一个长期的、通常也很混乱的历史过程的顶峰。在这个过程中,大陆东南亚的传统王国之间相互争斗并且经常相互吞并。迥然相异的傣族和其他种族群体缓慢地受到小乘佛教影响力的塑造,逐渐地确保了该地区广泛的文化持续性。不过,地方上的差异仍然很重要。尽管老族王国——澜沧(Lan Xang)在 15 世纪是一个主要的地区行为者,但是它和随后的老族王国与现在被称为泰国的王国相比则黯然失色。由于地处内陆并且远离欧洲人扩张对政治经济的影响,老族的内陆王国在 19 世纪几乎完全消失了,而邻近国家的力量则得以巩固。也许只有法国的殖民扩张才避免了老挝被泰国和越南吞并。

### 傣族

“傣”(Tai)是一个宽泛的语言学分类,它也曾经一度被视作一种广泛共享的文化,包括老族和泰国的泰族。傣族被认为起源于中国南部的广西,由于受到不断扩张的中华帝国的压力,傣族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某个时候开始向西南方向迁移。今天,傣族分布于整个东南亚大陆。他们散布在中国的南部边陲,越南和缅甸的北部,以及印度的东北部,当然他们还构成了老挝和泰国的大部分人口。仍然在老挝和越南北部

高山河谷中的傣族一直被称作“部落”，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建立国家。不过，迁移到平原并且建立国家的傣族则经历了文化和政治的转折。

然而，在我们今天知道的老挝或者泰国等国家单位在复杂的地区历史中（傣族人在其中是关键行为者）出现之前，已经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时间。事实上，尽管国家历史常把这些称谓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在19世纪以前使用种族术语“老族”（Lao）或者“泰族”（Thai）没有任何意义。我相信这种民族主义史学歪曲了我们对现代世界形成过程的理解，因此，我将开篇第一章所包括的时期称为“老挝之前”。但是，同样可以根据目前环绕现代老挝的各个国家，而称这一时期为“泰国、柬埔寨、缅甸、越南和中国之前”。然而，避免使用这些国家名称有时候很困难，而且出于方便的考虑，我也时而使用这些称呼。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想理解东南亚的前现代时期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努力进入到一个使用与今天非常不同的术语来进行思考的世界。

3 现代老挝内陆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地理特征是贯穿南北的越南中央山脉（Central Vietnamese Cordillera）<sup>①</sup>，老挝的东部边界沿着这个山脉划定。还有其他次要的山脉，而且人们可以在首都万象的北面找到最高峰普比亚山，海拔2818米。所有主要的河流都发源于这些山脉，从西向东流入湄公河，而且沿着这些河流，人们可以发现适合种植水稻的冲积平原。没有其他值得注意的低地平原。尽管高地的土壤通常不是非常肥沃，但仍有两个重要的高地平原地区：一个是北部的川圻（Xiang Khoang）省的查尔平原，其上为绵延起伏的草原；另一个是南部占巴塞（Champasak）省的波罗芬高原，那里肥沃的土壤供养着越来越多的咖啡种植园。不过，全国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崎岖的山地，并且被包含相对丰富的野生动物的季雨林所覆盖。整个国家位于热带季风气候区。

在傣族开始迁移的时候，东南亚大陆被森林所覆盖，使用同属于南岛语系（Austronesian）和孟-高棉（Mon-Khmer）语系的各种族定居于

---

① 即长山山脉。——译者注

此。在今天的老挝,这些种族构成了该国复杂种族大家庭的一部分,而且主要居住在山区。很久以前迁移到印度支那高地山谷的那些傣族人是由武士首领领导的,这些“具有威力的男人”由于其行为而被认为拥有大量强大的“灵魂物质”。在该地区发现的这种对个体之间内在差异的感知,后来促成了对来自印度的印度教思想(详细阐述了种姓差异和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的迅速吸收。傣族武士沿着山脉河谷不断迁移,沿途征服了他们发现的多个原住民群体,这些原住民成了傣族村庄和政体的附属成员。被征服的民族被称作“卡”(kha),现代翻译为“奴隶”。不过,这种翻译法没能捕捉到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的特点。在这个社会中,被征服的民族与统治者密切联系在一起,并且通过通婚融合到傣族文化中。事实上,这种种族通婚对傣族的扩张是必不可少的。

4



两个来自华潘省(Houaphan)的傣族妇女。非佛教徒的种族散布在老挝北部、越南和中国广西的高地上。他们在文化上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在他们数百年前向南迁移的过程中,一些傣族人从山区迁移到平原,他们在平原上与佛教徒发生联系并且开始创造低地老族文化。



## 傣族社会组织

征服活动除了可以应付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生态要求之外，还是不断证实武士首领威力的一种方式。他们发展出了贵族谱系的观念，这种观念又反映在关于起源的神话中：它是老族神话“坤博隆”(Khun Bulom)的一个变异，在北部的傣族中广泛流传。在这个神话中，三个贵族在一场大洪水之后在天地之间进行调解。他们从上帝那里收到的礼物之一是一头水牛。几年以后这头水牛死了，从它的鼻孔长出了一根藤，最后结出了葫芦。贵族从葫芦里面听到声音后就刺穿了它。于是，“所有出生在葫芦里面并且通过凿开的洞出来的人就是傣族人，而那些从(用烙铁)烧开的洞出来的则是‘卡’；他们都是那三个贵族的仆人和附属”<sup>1</sup>。他们用燃烧的木炭标记比较黑的“卡”为下等人，傣族人是持有武器的平民，而贵族们的后代则是首领。

昔日从山上向高地山谷的傣族居住地眺望，人们可以看到成片的紧凑的村庄和茅草搭建的结实的高脚楼。穿越山谷的河流是傣族人的一种快捷的运输途径，也是食物的重要来源。在这些茅草屋中间有一些长屋，它们属于首领家庭。村庄的周围是种植水稻的田地，有时候是梯田，由村民共同拥有。这些田地中的小块地每年根据需要进行再分配。周围小山的斜坡上，成片的森林已经被焚烧以腾出地方来种植旱稻、棉花和玉米。如果村庄是新的，这些斜坡将是由砍伐和焚烧森林后产生的田地覆盖，而房屋更可能是灌木小屋。

5 新定居者村庄的核心是一群傣族武士，他们被派遣去征服新的土地以及拥有这些土地的任何民族。这些武士在政治上仍然属于他们最初的村庄，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几个村庄就组成了由一个最高首领来领导的“蒙”(muang，即“区”)。“蒙”是傣族文化和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核心方面是更小单位的等级构成。村庄构成了小的“蒙”，几个小的村庄能够组成一个大的“蒙”，而且后者有时候能够成为一个“蒙联合体”。这种类似的结构在战争时期能够激发统一的行动，而当新同盟成立的时候则可能迅速解散。

与这种社会政治结构同时存在的是一种区域性神灵的等级分布。家庭神灵低于村庄守护神灵,就如后者隶属于蒙的守护神(phi muang)一样,这些高一级的神灵每年为了重大事件而被召唤。蒙主(chao muang)即蒙的最高首领,拥有自己的守护神,它的实体就是蒙主房子外面的一个木桩,祭祀也在这里进行。当蒙主去世或者被杀死的时候,他的继任者将撤去木桩。因为继任者将拥有自己的神奇而强大的神灵。在某种程度上,老首领的“灵魂物质”将随着他的去世而消失。当傣族抵达东南亚大陆的平原地区的时候,他们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但此后,这些傣族社会结构的特点仍有许多得以保留。

### 与低地王国的交往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居住在中国南部和越南北部的傣族受到了这两个文明的影响。他们吸收了中国信仰的某些方面;他们的贵族作为封臣被吸收进这些王国,并且开始采用后者的服饰风格。也许是通过与越南各王国的漫长互动,高地傣族人获得了今天仍存在于老挝和越南的黑傣、白傣和红傣的分类。

向西南继续迁移的傣族人与那些与之差异较大的文明进行了交往。这些文明是墮罗钵底(Dvaravati)佛教文化的遗存,通常与孟族(Mon)以及吴哥帝国有关。在迁移的路上,傣族人可能也遇到了查尔平原上的一个孟-高棉首领。在平原上的一些地方,今天仍然能够看到用宏大的巨石建造的丧葬坛子,用来掩埋贵族,这是跨越平原前往呵叻(Khorat)高原或者云南的贸易路线周围的一种文化的典型特点。当这种贸易中断的时候(也许是由奉行扩张主义的傣族人促成的),这种文化也就瓦解了。

墮罗钵底文化也沿着贸易路线出现,该文化散布在吴哥和缅甸之间,以及更远的泰国中央平原的周边地区。考古学家已经在老挝北部的万象省和琅勃拉邦(Luang Phrabang)地区发现了与这种文化相联系的佛像。人们对墮罗钵底文化知之甚少,考古遗迹表明它属于一种分布广泛的、繁荣的佛教文明。当傣族人从山谷迁移出来的时候,他们

的一些群体首先遭遇到的就是这种文化,而且他们通过这种文化第一次接触到了佛教。

7 不过堕罗钵底文化不是被傣族人征服的,而是被9世纪时迅速扩张的吴哥帝国所征服。吴哥帝国向西和向北分别包括了现代泰国和老挝的大片土地。这个印度教化的王国是由其湿婆式的“天神”领导的,它是现在被称为“曼陀罗”国家模式的区域先锋。曼陀罗通常在佛教或者印度教艺术里面以圆圈来表示,代表了一种宇宙的观念,包括人体和国家。涉及国家时,从特定国家的观点来看,曼陀罗代表了一种地缘政治的观念,被用来表现空间结构以及友好和敌对国家的波动。后来的傣族王国从吴哥承袭了这种模式。这些曼陀罗王国都聚焦于一个由国王统治的神圣中心,这个国王能够直接接触到神圣权力,并且使用这种权力去创造世俗秩序。宏伟的吴哥庙宇建筑物是这种世界观的不朽作品,也是国王世俗权力的一种有形声明。曼陀罗国家几度兴衰,最终衰败成附属国和附庸民族。在一个曼陀罗的扩张阶段,小国被直接卷入其领域内;当其收缩的时候,它们重新获得自主性或者可能成为一个邻近曼陀罗的附庸。这些政体关注的是神圣的中心,而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和边界。它们由强调国王而不是领土范围的人格化网络组成。国王的内在精神力量吸引追随者,而这种力量必须得到展示以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就如在已知世界里的扩张必须展示威力和精神潜力一样。不过,这种精神威力不会自动传给儿子们,因此一个国王的死亡将可能破坏人们对特定曼陀罗的忠诚,动摇其结构的稳定性。

吴哥曼陀罗的中心人口主要是高棉人。尽管当时的大多数人不可能对自己的民族有明确的认知,但研究该地区的历史学家却很喜欢讨论民族划分的问题。当然,当人们越来越远离帝国中心,将会发现其统治的人口在文化上变得更加多样性,而且在其北部边缘,这些人口包括傣族人。宏观地把这些群体划归某个民族,那是以后的事,在当时,他们仍把自己看做是来自一个特定村庄或者区域的民众,只是被卷入了一个等级分明、有组织的文化和政治体系而已。赛丰(Xai Fong)正好位于万象外边,是这个帝国的一个前哨基地,就如同老挝南部占巴塞的

高棉庙宇(vat phu)遗迹一样。卷入这个体系的傣族人,他们的首领作为地方官员,其他人则作为平民,开始吸收印度化的高棉文化的许多元素。

## 佛教的传播

吴哥统治的时候,堕罗钵底支持的佛教在该地区作为本土化的文化习俗继续传播,迁移到北部低地平原的傣族群体便开始从他们的邻居那里采纳佛教的习俗。各个民族群体相互混杂在一起,尤其是孟族和傣族社区,吴哥王国对自相残杀的战争的压制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在12世纪晚期,吴哥国王阇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 1181—1201年在位)引进大乘佛教作为自己的治国术。13世纪见证了跨越整个地区的重大的变化。阇耶跋摩七世去世之后,吴哥迅速衰落。蒙古人的军队严重削弱了位于遥远北方(中国南部)的大理王朝和西部的蒲甘(缅甸)。随着这些地区性强国的衰落,武士联合体和独立小国才得以出现。不久之后,第一批傣族王国开始兴旺。其中最重要的是国王孟莱(Mangrai, 1259—1317年在位)统治下的兰纳(Lan Na)王朝,定都清迈。兰纳的范围包括了位于今天缅甸、中国南部和老挝北部的各地区的“蒙”。位于兰纳王朝南边的素可泰(Sukhothai)王国不久之后也开始兴起,其属地包括琅勃拉邦地区。到了这个时候,来自斯里兰卡的小乘佛教已经开始从南部传播并征服了吴哥、兰纳和素可泰等各国民众的心。尽管婆罗门教的仪式继续围绕着佛教徒国王们,但是他们不是天神,更像是佛陀或者菩萨的化身,其力量来自他们累积的美德(boun),他们使用美德来创造一个公正的世界秩序。尽管这些被认为是第一批傣族人的王国,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他们统治的是多种族的入口,其中包括高棉遗民。

傣族人的文化在迁移的过程中已变得多样化,他们从被其征服或者与其共存的各民族中获得了各种仪式和习俗,而且他们综合了这些群体的各种元素,创造了新的文化形式。当很久以后,傣族人之间的文化差异被记录下来时,人们,尤其是欧洲人,开始用“傣仂”(Tai

9 Lue)或者“掸族”(Shan)等宏观分类称呼他们,但是普通民众仍然以本土化的术语把自己看作是来自一个特定村庄或者地区的民众。对 20 世纪晚期傣族群体的人类学研究甚至还能表明这种乡土观念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确定,这种状况在 13 世纪和 14 世纪应该更明显。尽管佛教确实包含了早已存在的傣族的各种文化形式,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可以让傣族超越其乡土观念的概念框架。自此以后,低地傣族人身份的一种基本标志将是佛教。

### 澜沧王国\*

1351 年阿瑜陀耶(Ayudhya)王国的建立及其与素可泰的军事竞争为澜沧王国在琅勃拉邦形成提供了空间。当时琅勃拉邦是位于兰纳和素可泰曼陀罗边缘的附庸蒙(联合体)。澜沧的建立人是法昂(Fa Ngum),但是人们对于他的王国的实际面积和实力存在着争议。

直到今天,法昂获得权势的历史仍然是以《坤博隆传》(*Nithan Khun Borom*)的记载为准,但是它写于法昂统治时期的 150 年之后,而且历史学家米歇尔·罗瑞拉德(Michel Lorrillard)已经表明这个故事并不能作为准确的历史文献。与澜沧早期历史有关的手稿非常稀少,且这些手稿的可靠性总是需要考古证据来验证,而直到目前为止,老挝几乎没有这些考古证据。另一种验证方式是查看《丰沙湾》(*Phonsavadan*)里描述的事件,与邻近王国存在的手稿——例如来自兰纳的文献——进行交叉验证。罗瑞拉德指出,14 世纪和 15 世纪前 75 年的老挝文献信息没有一条可以被其他文献来源交叉验证。一块素可泰石碑确实记录了存在法昂这个人物,他是来自湄公河的一个首领;而他的儿子桑森泰(Sam Saen Thai)似乎在中文文献里面被提及。不过,没有其他来自柬埔寨、阿瑜陀耶、越南或者兰纳的文献能够加以印证。

---

\* 作者在本书英文版出版以后,对本节内容又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故本节中文版无法标注原文页码。——编者注

故事的标准版本是：法昂和他的父亲被驱逐到吴哥，然后法昂作为一个征服者从吴哥返回，并且带来了小乘佛教。但是高棉文献里没有这些事情的证据，而且罗瑞拉德认为这个故事符合老族的文学传统，而不符合历史事实。目前很多的证据表明，小乘佛教其实是从兰纳王国进入老挝的。

此外，同一个老族纪年的各种版本之间的不一致也通常被忽略。一些纪年表明，法昂的王国比《坤博隆传》里面所显示的要小得多。如同罗瑞拉德所指出的那样，一些纪年表明他的统治只是“从南山(Nam San)河口或者南耶(Nam Ngiep)开始，从万象向下几百公里，然后通过川圹直接向上到琅勃拉邦。一旦首都被攻陷，战争将涉及万象和荣坎(Vieng Kham)，这是位于中心的两个最大的蒙(联合体)。此时，《丰沙湾》里精确的地理信息却没有了。因此，这些信息表明，琅勃拉邦王国已经扩张到万象平原，并仍对独立的川圹蒙实施了一些松散的管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坤博隆传》中，征服从孔埠(Khone)陷落的时候开始……”<sup>2</sup>，这就是说，向南到占巴塞。

《坤博隆传》是在维逊(Vixun, 1501—1520年在位)国王统治期间写成的，而且与大多数纪年一样，它的写作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并使之合法化。因此，它的目的是为维逊建立一个古代的谱系并且夸大其祖先的成就。所以，事实与大量的幻想掺和在一起。

法昂在战争中的成功增强了其非凡的能力，致使其他蒙的首领作为个人追随者聚集在其周围。从这个根据地开始，他开始建立澜沧王国。虽然人们仍然不清楚佛教在这个新王国重要到何种程度，不过人们很清楚，澜沧王国的文化根源更接近于高地上的傣族，而不是兰纳和素可泰王国。这一点在祭祀澜沧蒙地域神灵的仪式所拥有的中心地位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仪式过程中，隶属蒙的神灵和首领为了宏大的祭祀将聚集在首都。此外，这个王国的相关法令——《坤博隆法典》(*kotmai thammawat khun bulom*)是不成体系的，而且看不出佛教的任何影响。而后来的法典就不是这样。

由于滥用权力，尤其是宣称对大家族的妇女拥有领主权，法昂在

1374年被罢黜，并且被流放到邻近的纳蒙。他的大儿子乌亨(Unhoen, 常被称为“桑森泰”)取代了他。很明显, 后者从北面的阿瑜陀耶、兰纳和川圹国王那里娶得了妻子。这些结盟确保他的王国拥有了一段和平巩固的时间。他还从地方家族和首领那里娶得了妻子, 这样就巩固了已经建立的结盟, 或者认可了对方的从属地位。在这些曼陀罗政体中, 个人忠诚的纽带是最重要的, 统治者把女儿嫁给附属蒙的首领作为妻子是一项重要的治国战略。不过, 这些政治结构建立在个人联系之上, 而且只能在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存在。在桑森泰的儿子(其去世使得澜沧王国陷入到一场漫长的继承危机中)的短期统治之后, 这些政治结构的脆弱性就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 继承危机\*

继承危机对当时所有的傣族政体来说都是难以避免的。国王通过其高超的本领来吸引追随者, 这主要是通过资助在其王国范围内建造庙宇和圣物盒以及发动战争展示出来。通过联姻(如娶妻和嫁女)来巩固结盟的战略使得某些家族和外戚能够获得权力, 而且围绕着这些家族的各种派系得以形成。这些家族将与王朝中的其他关键人物的家族结盟。就我们目前所知, 当时对一个儿子是否拥有继承权没有既定的规则, 因此在国王去世之后, 如果没有某个儿子的派系占据明显优势的话, 致命的争夺将在王位继承人之间爆发。一个得到强大派系支持的野心勃勃的儿子将会篡夺王位, 甚至会杀掉其父亲。忠诚行为非常罕见, 派系结盟也变动不居。它们的脆弱性被一种根深蒂固的对地位竞争和声誉的关注所加剧, 因而人们在倒戈相向时, 很少感到羞愧。

赛纳·查克帕特(Xaiyna Chakhaphat, 1442—1479年在位)国王通过任命其6个儿子和近亲担任疆域内的关键管理职位来强加自己的意志以及巩固自己的王国。此前的20多年时间里, 众多王位争夺者走马

---

\* 作者对本节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 故本节中文版所标注的原文页码仅供参考。——编者注

灯似的上台又倒台。漫长的继承危机削弱了澜沧王国的实力,不过赛纳·查克帕特对个人化的统治结构仍没有作什么改变。他的统治由于越南强大的黎王朝的崛起而衰落。黎王朝声称对查尔平原拥有宗主权,当他们遭遇到反对的时候就入侵了琅勃拉邦。国王的弟弟在属国南(Nan)的支持下,击溃了黎王朝的军队,重新夺回了澜沧的首都以及沦陷的领土。新国王梭发那·班郎(Suvanna Banlang)统治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在他死后,其弟拉森泰(La Saen Tha,1486—1496年在位)、其子松普(Somphu,1496—1501年在位)和维逊(1501—1520年在位)先后继承了王位。由于受到东部强大的中华文明的挑战,这些国王很快与阿瑜陀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阿瑜陀耶当时是该地区最强大的傣族王国,其政治、文化和商业影响力由此进入重新兴起的澜沧王国。

15

正是伴随着国王查克帕特和其儿子们的兴起,佛教也开始越来越鲜明地成为澜沧王国的一种核心特征。

## 佛教和社会\*

10

佛教的重要性在于其提供了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能够把分散的民众聚合到一个共同的文化框架内。佛教中的僧伽(sangha)类似于教会组织,国王们是其最高保护人。对曼陀罗国家的统治者来说,僧伽提供了一种相对于地域性神灵——蒙主的守护神更具竞争性的神奇力量,进而弱化了这些地方神灵的权力和地方首领的控制力。佛教把这些神灵包裹在庙宇之内,象征自身更优越的地位。例如,万象蒙主的守护神柱就完全被包裹在西孟寺(Vat Simuang)内。同样地,随着各个民族接受佛教,庙宇就取代了核心人物的宅院,或者替换了傣族人的贵族的长屋。不过在过去,大多数庙宇是用木头和茅草建造的,而且佛像也是用木头雕刻的。因此,从建筑学上来看,它们并不像今天的庙宇

11

12

---

\* 作者对本节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故本节中文版所标注的原文页码仅供参考。——编者注



这么醒目,今天的这些庙宇是乡村里面唯一的砂浆和水泥建筑物。只有在权力的核心,结构坚固的庙宇才得以建造,大的佛像或用金属铸造,或用石头雕刻。随着庙宇成为社区的主要仪式中心,神物(sing saksit)开始分布在庙的四周或包含在其中。它们可能是神奇的岩石,或者是特定形状的木头。在庙宇管辖区域之外,神奇的地点、大树或者洞穴被吸纳进来作为放置佛像的地方。它们的力量能够在这些地方神灵和庞大的宗教世界之间作出调和。历史学家,尤其是来自一神教基督教背景的历史学家,认为这种合一让人困惑,格格不入。但是除了最一板一眼的宗教派系之外,这种合一在全世界都是常见的。佛教作为一种纯粹的神学思想,并不能为日常生活的不确定(如爱、生育或者死亡)提供任何现实的指导,因此,人类通过神奇的物体、地点或者人(例如神灵中间人)来寻求将来的线索以及神奇的帮助。不论是阳具像或者佛陀像之类的护身符,都是他们信奉的对象。随着佛教的传播,它吸收了地方上的信仰和做法,这使各地的佛教产生了些微的不同。

13 尽管佛教有助于创造一个统一的王国,但是,在与其他傣族王国(尤其是一个在阿瑜陀耶出现的王国)的竞争上,澜沧王国的能力面临着严峻的物质限制。在北部的山间平原,农民继续把水稻和旱稻种植结合在一起,稀少的产量只能养育比万象平原或者再往南的地方可能养育的更稀少的人口。由于这个原因,随着王国的发展壮大,资本自然而然地被向南吸引到万象。奇怪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国家曾经资助灌溉系统,尽管它们能增加经济盈余。建造大坝和水利联合会的任务就留给了当地的社区。相对少的盈余限制了可以对农民摊派的赋税和劳役,同时也限制了能够进行的公共工程的规模,不论是建造公路或者大的庙宇附属物以及城市。

其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森林产品的贸易,比如原紫胶、豆蔻或者是蜂蜡,这些主要由居住在山区的少数民族来供应,这些群体有些仍然是狩猎-采集者。这种经济上的互相依存巩固了澜沧王国制定的与周围少数民族,即“卡”的仪式关系。由于中央国王权力的相对弱小,意味着

它不能够垄断这些产品的贸易,这一点与阿瑜陀耶的国王不同。当然另一个收入来源是战争以及掠夺和俘获奴隶,从而增加王国控制之下的人口。尽管王国每一项新的收入都增加了中央王朝的贡赋,但是与邻近的王国相比总量并不大。



晚上8点,仪式大师们和天使王的灵媒在圣人的陪同下来到宏伟神圣的圣坛前。圣坛在阿拉姆寺(Vat Aram)旁边,是一个木头镶嵌成的房子。一段楼梯通到一个有篷的游廊里,游廊上有一个门开向祭坛……在房子的里面,通过两根绳子悬挂着两个巨大的箱子,里面有仪式大师和小狮王的面具和衣服。

“您好,众神!请原谅我们,这是第12个月,新年,我们前来领取面具到国王面前表演。不要说您不知道。我们给您带来了几盘甜美的贡品。我们从来没有放弃仪式,也从来没有摒弃习俗。”

圣人们吃完盘中的贡品,然后打开箱子,从中取出面具和衣服,再取出小狮王道具的外皮,把它们带到塔前。最后他们在祭坛

坐下来。

晚上9点,所有的要人和政府官员都在祭坛就座。虔诚人士在完成环绕仪式之后,留下成千上万的小蜡烛把整个塔照得灯火通明。广场本身也被放置在竹竿上的小油灯照亮。

晚上9点15分,一个巨大的垫子被放置到祭坛前面。携带着小鼓的灵媒背靠着祭坛蹲下,面前则是仪式大师和小狮王……随着小鼓剧烈震荡的节奏,戴着面具的他们向统治者的代表们三表致意,以示欢迎。

(引自 Charles Archaimbault, “La Fete du T’at a Luong P’rabang”, in *Structures Religieuses du Lao*, Editions Vithagna, Vientiane, 1973.)

15

## 澜沧的兴起和衰落

16世纪见证了澜沧王国从崛起至其权力达到顶峰的过程。尽管当时澜沧王国正值其权力的顶峰,但仍然处于阿瑜陀耶的阴影之下。阿瑜陀耶是该地区的另一个主要的傣族王国。在前一个世纪,阿瑜陀耶已经开始了至关重要的官僚集权化过程,这个过程在16世纪加速进行。当阿瑜陀耶把马来半岛并入其曼陀罗的时候,它的重心转移到了南方,这使得它能够利用15世纪和16世纪的国际贸易迅速扩张。通过其国家的日益集权化,国王能够垄断国际贸易,从而一方面能够增强王室相对于宫内和区域统治者等竞争对手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王国相对于兰纳和澜沧等内陆国的力量,因为后者不能直接参与海洋贸易。

16

尽管维逊国王、波提萨拉腊(Phothisarath, 1520—1547年在位)国王和赛塔提腊(Sethathirath, 1548—1571年在位)国王的统治期构成了澜沧王国的辉煌时期,但是他们对王国没有发起任何根本性和结构性的变革。他们只是令与国王有关的各种佛教礼服、用品日趋精致而已。维逊被人们铭记是因为他把勃拉邦佛(Phra Bang)设置为澜沧国王们的守护神。这个来自斯里兰卡的佛像被放置在维逊寺里,而且领主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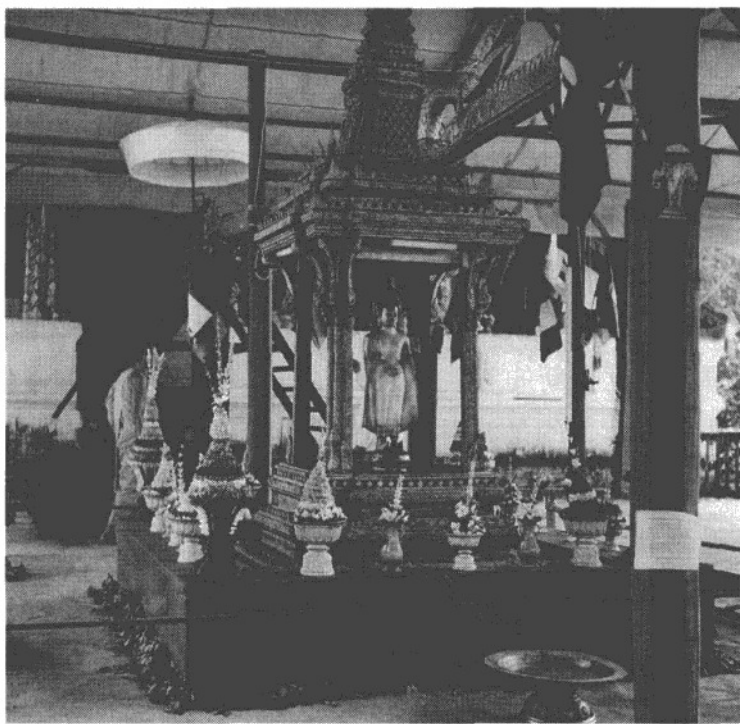
须在这个佛像向国王宣誓忠诚,后来首都被称为琅勃拉邦,即“勃拉邦佛像之地”。

建造庙宇和设置神圣的佛像使得一个曼陀罗政体的中心成为其最神圣的地方,因此也成为最有权力的地方,但是它也必须与王国内其他所有神圣的地方联系在一起。国王们在外围地区资助建造佛塔和庙宇来作为这种神圣权力的有形表达,并且通过仪式把它们与中心的仪式联系起来。例如,波提萨拉腊国王在澜沧南部边界帕依佛塔(That Phanom)周围设立了新的寺院建筑,并且提供了奴隶来维修保养。实行仪式集中化最卖力的是波提萨拉腊。他在 1527 年颁布法令,直接针对本来由地方首领控制的神柱和其他地区神灵。这条法令最后导致了大量神庙遭到破坏。尽管波提萨拉腊对政治和宗教仪式进行王权控制的尝试基本是成功的,但是贵族家庭对地方神庙(ho phi)的崇拜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从而表明这些仪式从来没有被取消。

不过,王国的政治控制仍然局限于个人路线。尽管曼陀罗政体之间的关系通过联姻继续得以巩固,但是王朝内部派系之间或者地区首领之间的紧张关系很容易爆发冲突,1532 年查尔平原上普安(Phuan)蒙的叛乱就是一个例子。波提萨拉腊的大皇后是兰纳国王的女儿。当兰纳陷入一场困扰整个傣族世界并且旷日持久的继承争议的时候,阿瑜陀耶的军队趁着混乱,一直向清迈进发。直到澜沧前来挽救兰纳,阿瑜陀耶的军队才被击退。这促成了波提萨拉腊的儿子塞塔提腊和其来自清迈的皇后在 1546 年取得兰纳的王位,使兰纳成为澜沧的附属国,这大大扩展了澜沧的疆域。但是这种状况仅仅持续了很短的时间。13 个月后波提萨拉腊驾崩,赛塔提腊不得不匆匆赶回国内,阻止自己的弟弟篡夺王位,后者也许得到了万象地区家族的支持,而波提萨拉腊大部分的统治时间都是在万象度过的。赛塔提腊与其王公贵族同盟在琅勃拉邦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他的妻子作为其统治的一种象征,则被留在了清迈,但是不久之后就成为了地方贵族势力重新抬头的牺牲品,而且赛塔提腊没有能力重新恢复澜沧对兰纳的控制。不可避免的继承危机招致了来自西面的外部干涉,因此兰纳不久就成了勃固(Pegu, 缅甸)的

17

18



根据传说,法昂携带着勃拉邦佛从吴哥的高棉王国向北旅行。现代历史学家比如米歇尔·罗瑞拉德对这个传说表示怀疑。他指出,勃拉邦佛不是一个高棉佛陀,而更像那些孟族或者清迈民众制造出来的佛陀。因此,勃拉邦佛可能来自北部的傣族地区,比如玉佛寺(Phra Keo),而不是来自南部的高棉王国。不过我们切实知道,是桑森泰国王首先于1489年把勃拉邦佛放置在香通寺(Vat Xieng Kang),然后又放置在曼拉姆寺(Vat Manorom),还把首都命名为琅勃拉邦蒙(Muang Luang Phra Bang)。1513年,维逊国王把它放置在维逊寺内。1560年,赛塔提腊国王把它迁移到他的新首都万象。1779年,暹罗士兵劫走了它,4年之后又送回。它在1827年阿努王起义之后又被劫走,直到1839年琅勃拉邦国王苏渗(Soukhaseum)把它重新放回维逊寺。1894年刚登上王位的扎卡林(Sakharine)国王把它移到迈寺(Vat Mai)。1947年皇家老挝政府宣布成立之后,它被放置在皇宫内,等待在皇宫广场上建造一个勃拉邦寺(Vat Ho Phra Bang)。随着1975年的革命以及君主制被推翻,许多人相信勃拉邦佛已经被新政权移走,现在放在那儿的是一座赝品。这些传言也许表明人们对新政权合法性的怀疑以及他们对逝去的君主制的伤感。不过,1990年代结束共产主义统治之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传统的恢复有望重提兴建勃拉邦寺的计划。(照片承蒙 EFEO 提供)

附属国,而且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兰纳统治阶层纷纷逃往澜沧,其中的许多人与赛塔提腊有姻亲关系,为琅勃拉邦和万象突然注入了兰纳文化的影响。

来自勃固王国的威胁迫使赛塔提腊把首都迁到万象,并且把他在清迈得到的守护神,即传说中的玉佛(Emerald Buddha)也带到万象。他将其放置在玉佛寺内,这是建造在湄公河岸边的一座新的雄伟庙宇。勃拉邦佛仍然放置在北部的首都,赛塔提腊在那儿也建造了一座新的皇家庙宇——香通寺(Vat Xieng Theng)来作为其王权的一种象征。这座庙宇是北部傣族建筑的一个杰作,但是他的王权最有力的象征也许应该是塔銮(That Luang)。塔銮是他下令在万象建造的一座巨大的佛塔,作为其王国的象征性的中心。在人口较多的万象平原和北部的呵叻高原能够得到建造大量佛教纪念碑所需要的劳力和钱财,这使得澜沧王国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傣族王国。

但是澜沧王国仅凭自己的力量无法与勃固王朝对抗,于是赛塔提腊寻求与阿瑜陀耶建立一种密切关系。1560年,他与查克帕特(Chakrapat)国王在湄南河和湄公河之间的分水岭丹赛(Danxai,现在位于泰国莱省),树立了一座佛塔,纪念他们的结盟。这不是后来一些作者想象的现代边界标记,而仅仅象征着两个强大君主之间的均势。联盟不久后发动了对勃固的战争,勃固的军队击溃了他们并且攻到了澜沧,掳走了皇族的成员和战利品。澜沧和阿瑜陀耶重新集合,收复了阿瑜陀耶北部边境的一些失地。勃固的国王于是聚集了大量军队,在1568年再次向阿瑜陀耶进发,并在第二年洗劫了王国。勃固的军队占领了万象,但不久之后撤出。此后,赛塔提腊短暂地控制了该地区唯一一个疆域稳固的傣族王国。1571年,他在王国南部边境作战的时候神秘死亡。一场继承争议招致勃固的再次干涉。勃固将赛塔提腊一个早年被掳走的弟弟扶植为自己的诸侯。在接下来的30年里,澜沧成为勃固的附属国,尽管在这段时间的末期,后者的力量已渐衰退。在此期间,残忍的继承斗争毁灭了万象的统治家族,直到1638年一个头脑清晰的领导人——苏里亚旺萨(Surinyavongsa,



塔銮是老挝最重要的宗教建筑之一,而且每年农历12月在万象举行的宗教庆典也是一个全国性的节日。不过,如米歇尔·罗瑞拉德(2003)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对于这座佛塔几乎没有进行考古学或者碑铭学的研究。在这座佛塔上发现的碑文中,它被称作“伟大的清迈王塔”(Phra Maha That Chao Chiang Mai)以及巴利文的“Lokaculamanithupa”。佛塔的两个古代名字表明它是由国王赛塔提腊建造的,用来向其来自清迈的祖父表示敬意。赛塔提腊的父亲波提萨拉腊也许捐赠了原始的土地,但是主体建筑却是赛塔提腊监督建造的。它在19世纪晚期遭到了部分破坏,这是华族(Haw)强盗在寻找战利品的过程中造成的。一个早期的老挝殖民官员M. 莫兰(M. Morin)曾经领导进行初步恢复。1929—1936年在法国远东东方学院的帮助下,它恢复了其最初的形式。(照片所示约为1953年,承蒙 EFEO 提供)

1638—1695年在位)国王的出现,才结束了澜沧将近70年的政治危机。

### 澜沧和更广泛的世界

有趣的是,在苏里亚旺萨的统治时期,我们可以得到欧洲人对澜沧王国发生的事件的最早描述。1641年11月,在塔銮节日正值高潮的

时候,一支由荷兰商人杰拉特·范·维斯特霍夫(Gerrit Van Wuystoff)率领的使团抵达万象,他在日记中记录了澜沧王朝引人入胜的盛况。关于他们被带到佛塔旁接受国王接见的情形,他这样写道:

在我们周围,贵族们已经搭起了帐篷,准备让他们的士兵、大象和马匹宿营。这里很喧闹,你可能以为自己和奥伦治亲王(荷兰)的军队在一起。他们让我们等待了一个小时。国王坐在一头白象上,从镇里过来,并从我们的帐篷前面经过:我们像其他人一样,跪在路上;国王23岁左右,大约300名士兵举着长矛和枪走在国王前面,在国王后面,几名护卫骑在大象上跟随在数名乐师身后。他们后面约有2000名士兵,最后是16头大象,上面坐着国王的5位妃子。<sup>3</sup>

荷兰商人的到来预示着在葡萄牙商人第一次与阿瑜陀耶发生联系大约100年之后,更广泛的海上贸易世界扩展到万象。这个时间差本身就说明了澜沧王国的相对封闭。他们通过道听途说已经知道外部世界,尤其是通过那些到过阿瑜陀耶的旅行者。本地区战场上的火枪和火炮已经使得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产品印象深刻。澜沧的产品通过暹罗的垄断贸易也已经抵达更广阔的外部世界。长期以来,阿瑜陀耶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王国,有来自亚洲和欧洲的商人,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它将发展成为亚洲主要的贸易城市之一。然而,这样的经济发展和文明教化却与澜沧无关。

21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傣族的宏观种族划分已经形成。中国航海者已经把现在称为暹罗湾的地方命名为暹(Hs'iem),而早在13世纪末期,中文文献就开始用同样的称呼提及素可泰的傣族。毫无疑问,这个词在贸易交往中进一步演化出称呼人的“Siamese”和指代地方的“Siam”。“傣”这个词最早以文字形式出现是在素可泰期间。但是它似乎保留了其早期称呼“人”的意思,这种用法在老族语言里面仍然存在,比如老族可能用“Tai ban”表示村子里的人,用“Tai



Vientiane”来表示万象城里的人,用“Tai Sam Neua”表示来自北部沼泽地区的人,或者用“Tai Lao”来表示老族人。

22 当时傣族世界里最重要的区分是佛教徒和非佛教徒。这些王国以等级社会的形式组织起来,人的划分暗含着等级。即使王国最高级的官员相对于国王来说也是“卡”,高地的非佛教徒相对于全体佛教徒来说则是“卡”。“卡”有时候也会进一步分类,比如琅勃拉邦周围的卡萨克卡(Kha-Kassak),但这只适用于被某个蒙牢牢控制,并通过仪式等方式与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某群卡。不受蒙控制的卡则被称作“Khon pa”,即“野生森林居民”,在文明的范围之外。非佛教徒的傣族部落也处于边缘位置,因此毫无疑问,这些傣族人皈依佛教的一个动机就是为避免被划分为“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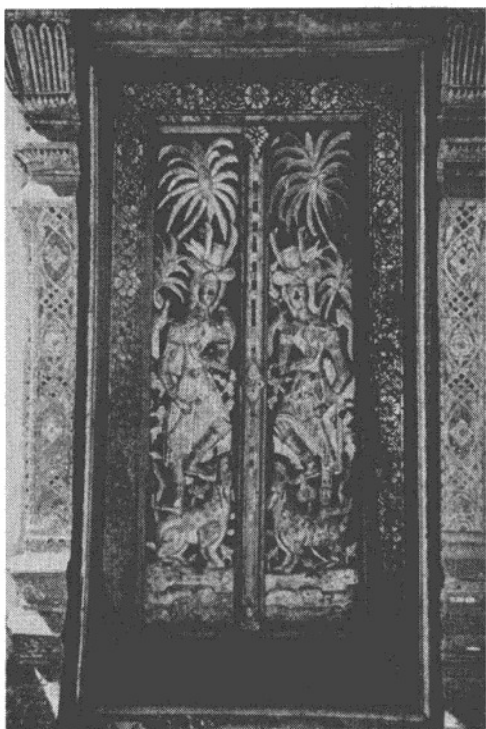
所有的傣族王国都是多种族的,由高棉族、孟族、高地民族和“海上吉普赛人”等组成。尽管佛教提供了一种众所周知的仪式语言——巴利文,但是在日常的交流中不可能有统一的语言。当然,即使在佛教徒中间,我们也能明显看到形体的差异和日常习俗的差异,但是它们绝少被归因于种族的差别。欧洲人在这个世界的出现只是单纯地为其社会的身份结构增加了一个种类罢了。

佛教政体按功德和精神权利划分的等级制度并不要求统治阶级认为他们与其臣民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不过,阿瑜陀耶等王国越来越多地开始与进行跨海交易的商人和使节打交道,这些人则常用概化的总称来称呼自己,比如“暹罗人”和“中国人”;在对比和互动中,王国里的人也开始使用群体总称,比如,称呼欧洲人为“farang”(这个称呼来自南边的马来王国,商人在那里被称为“feringgi”,这个单词来自“franks”,这是古阿拉伯语中称呼十字军的词)。这些外来人要求对居住在阿瑜陀耶之外的人有一个总的称呼,似乎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老”这个词开始得到使用。尽管其准确的来源并不十分清楚,但是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它起源自中文对南部“野蛮人”的称呼。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与傣族保持联系的越南人,把山脉对面的那些人称作“哀牢”(Ai-Lao),这个原本被用来称呼位于中国南部的一个

王国的词,被错误地运用到了老族身上。这些称呼主要是统治阶层使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大多数“老族人”或者“暹罗人”也用这些术语称呼自己。

在该地区各处建造的神圣的空间和地点开始成为傣族社会记忆的一部分,并且成为文学和歌曲的背景及主题的一部分,这其中包括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本土化。文学主要与宫廷有关系,尤其是阿瑜陀耶王朝,一种重要的宫廷文学在那里得以发展。较小且较穷的宫廷如澜沧则没有那么发达的文学,而是倾向于模仿周边教化程度更高的王朝。与宫廷文学并行发展的是民间故事,这些民间故事源自寺庙保持的文学传统。正是这些东西使民族意识得以形成,不过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王朝的纪年得以撰写,但是对现代读者来说最引人注目的是:个人动机和更一般的因果关系中充满了魔力和奇迹。因此政治的发展总是在以下因素之后:不祥的事件、电闪雷

鸣、个人身上奇异的特征等不寻常的自然事件,比如法昂在出生的时候被认为有33颗牙,这标志着他具有“Saksit”,即“魔力”。精神强大的僧侣或者武士能够击退或者制服整个部队。很明显,这种思考方式在影响人们认知其周围发生的事情上发挥了主要的作用,而且比



人们经常认为,琅勃拉邦的帕可寺(Vat Pha Khe)的窗门上的画面描述了荷兰旅游者维斯特霍夫在17世纪到达澜沧的情形。其实,后者从来没有去过琅勃拉邦,只是到达了万象。事实上,似乎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形象是18世纪60年代,一个老族雕刻者在国王占塔腊(Chantharat)的命令下,从一幅名为“外来的欧洲贵族”的中国雕塑复制过来的。它是用来纪念一个老族使团对昆明的访问的,因此,老族的雕刻者很有可能认为这些“外来贵族”是中国的官员。不管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它是一次有趣的历史教训,即不要根据表面现象仓促作出结论。(Grant Evans)

一个现代读者可能想象得到的种族优越或者种族仇恨等空想要重要得多。

## 政治停滞

24 在 17 世纪苏里亚旺萨漫长的统治期间,尽管一些外国商人抵达澜沧,但是王国的经济基础仍然与前几个世纪一样。换句话说,没有财富来建造更强大的集权化国家。在王国内部,行政职位被按照级别分配,但是每个职位拥有的相对权利随着围绕宫廷而建立或解散的同盟情况的改变而发生波动。即使在澜沧王国的鼎盛时期,它也没有发展出一种“萨迪纳”(Sakdi na, 20 世纪的写作者错误地注释为“封建制”)管理体制。在这方面澜沧没有跟随阿瑜陀耶,后者的国王和他的顾问们早在 14 世纪就已经从吴哥的管理中吸取教训,实行了一种通过官僚对人力进行控制的体制,至少在其核心省份里如此。国王任命的官员负责组织 6 个月的强迫劳役,农民被要求每年都要从事一次,可能被派遣从事公共工程或者进行军事服务。这可以打破存在于澜沧的农民与其领主之间的直接联系。阿瑜陀耶不断上升的力量甚至可以允许崔洛克(Trailok)国王在 15 世纪末期进一步集权化。这个迅速发展的国家,其功能日趋多样化,而王国颁布的法令也详细勾勒了等级制度的方方面面。他们分配给每个人不同单位的“萨迪纳”,字面的意思是“土地权利”,这是一种典型的农业国家的权利象征。例如,奴隶给予 5 个单位,自由人 25 个单位,小官员从 50 个到 400 个单位不等,往上则是贵族。尽管这种体制弱化了以地方为基础的贵族的权利,但是在曼陀罗政治中派系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动力。

苏里亚旺萨统治的稳定来自披耶森蒙(Phaya Saen Muang, 北方一个强大的贵族)和披耶占(Phaya Chan, 负责王国的南部)之间权力分配的一种微妙平衡。当苏里亚旺萨在 1695 年去世之后,集中的王权分崩离析,漫长和残忍的继承斗争接踵而来。在 20 年的时间里,澜沧变成了 3 个(有时候是 4 个)小的独立王国。他们分别以琅勃拉邦、万象,或间歇性地以查尔平原为中心。与此同时,

一个名为占巴塞(Champasak)的王国开始在南边形成,这个王国部分是由从万象冲突中逃离的贵族难民来领导的。阿瑜陀耶国王造成的琅勃拉邦和万象之间的分裂使它们成为阿瑜陀耶曼陀罗外围的小附属国。

1767年,阿瑜陀耶被来自缅甸的阿瓦国王的军队毁灭,王室成员或者被杀或者被劫走。但是暹罗地区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弹性则在阿瑜陀耶的一个将军——他信(Taksin)的行动中得以展示:他迅速集结了曼陀罗的军队,并且在几年的时间内收复了失地。他继续向北和向东扩展暹罗的势力,使许多外围的王国处于暹罗宗主权的严密控制之下。琅勃拉邦、万象和占巴塞等王国内部以及彼此之间相互争斗的派系则求助于这种政治体制常见的伎俩:寻求强大的外部支持。由于他信的成功,缅甸人被排除在同盟之外,而越南此时正陷于内讧之中,因此这些派系只有求助于他信。通过派系之间的结盟,占巴塞于1778年被纳入暹罗曼陀罗的严密控制之下。接着,他信的军队向万象进发,在其北部附属国琅勃拉邦的帮助之下,很快在第二年占领了万象。王室成员被掳走作为人质,被一起掳走的还有守护神玉佛和勃拉邦佛(1705年被运回万象),上千家庭作为王室的奴隶被重新安置在曼谷东北120公里外的北标(Saraburi,沙拉武里)。到1782年曼谷的却克里王朝建立的时候,暹罗王国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该地区的强国,而澜沧则已经灭亡。

### 最后的武士国王们

1827年万象国王阿奴(Chao Anou)反对其领主却克里(Chakri)的起义,现在已经成为现代老挝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传奇故事。这个传奇故事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并且受到一种几乎神圣得不可思议的保护,抵制任何用历史的观点来对之进行考察的行动。事实上,老挝作者们对该主题的着墨比其他历史事件都要多。然而,只有一项重要的研究符合现代史学的思考态度。这项研究是由两个老挝人培潘(Pheuphanh)和梅欧里·挠斯瓦森(Mayoury Ngaosyvathn)博士进行

的。<sup>4</sup>他们不仅努力把这些历史事件置于更广泛的地区背景之下,而且还尝试去考察阿奴王的优势和劣势。别有意味的是,这项工作完全是用英语而不是老挝语完成的,这可能是因为其不符合新政权的意识形态。

有趣的是,阿奴王的故事是法国殖民主义者推广的,因为它能够使它们保护老挝免受暹罗入侵的行为合法化;对暹罗人来说,这成为他们争取国家统一的神话的一部分;对现代老挝民族主义来说,它成为争取国家独立的一次关键事件。既然所有各方与这次起义都利益攸关,那么为什么这次起义直至今天仍然呈现在人们的想象中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阿奴王不是所谓的最初的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属于现代国家体系,而且它直到 19 世纪末期才来到老挝。事实上,阿奴王的起义是对一个濒临灭亡的前现代曼陀罗国家体系的最后一击。

26 阿奴在曼谷的朝廷服务了 16 年,在他信劫掠万象之后,他和他的家庭被挟持到曼谷。他在那里忠诚地服务于王朝,并且在与阿瓦王国的战斗中一举成名。他的哥哥南塔森(Nanthasen)在 1782 年被曼谷推上了万象的王位,并且携带着作为其守护神的勃拉邦佛返回,因为新的却克里国王拉玛一世(Rama I)认为它把坏运气带给了曼谷。1792 年,南塔森向琅勃拉邦进发,并且声称后者正在与阿瓦王朝密谋,在把琅勃拉邦的统治者送回曼谷之后,他宣布已经控制了琅勃拉邦和其附属国普安蒙和华潘。这次成功可能激起了他的雄心壮志,曼谷开始怀疑他与那空拍侬(Nakhon Phanom)的统治者密谋,因此除掉了南塔森。1795 年,南塔森的兄弟因塔雍(Inthavong)取代了他的位置,而阿奴则成为他的总督。1804 年,因塔雍去世之后,阿奴成为万象的国王。

当时的暹罗曼陀罗包括其边缘的许多小王国,这些王国都向其朝贡,但是它们也向其他国家朝贡,比如琅勃拉邦还向中国朝贡。不过,万象、清迈以及占巴塞与曼谷的联系更密切,这种联系主要是靠联姻、更多的朝贡和为战争提供人力资源,以及在继位的时候仰赖

曼谷的支援来维持。在世纪末的时候,曼谷在呵叻高原的势力得到迅速扩展,那里大约有 20 个蒙,从北面的那空拍依到南面的武里南(Buriram),其行政长官的级别为总督。这些领导中的很多人是地方贵族。由首都任命的长官直接控制的各省组成了王国的内部核心。

阿瑜陀耶率先实行的“萨迪纳”制度由却克里王朝承袭,并且得到加强。新的中央国王的主要关注点是集中权力,这意味着分割他的统治贵族的权利,使他们不能够挑战他。国家控制所有重要的国家贸易,这就确保了没有任何贵族或者位于边缘的附属国王能够获得足够的人力资源来挑战中心。为了清楚地表明王国中的哪些自由人必须为王室提供强迫劳役等各项服务,拉玛一世命令他们必须文身。与此同时,他也使这些“国王的人”(phrai luang)所承担的劳役不再那么繁重。这种对人力资源的明确控制使得一些贵族很不高兴。

27

因此,暹罗曼陀罗不稳定地综合了一个新兴专制国家体制和一个古老体制的元素,对于后者而言,其权力比较分散而且新的英勇无畏的人容易出现。很明显,这种分散的动量在阿奴那里发挥了作用。在登上万象王位之后不久,他就开始利用他控制的人力资源去建造新的佛教纪念碑,并且获得了作为一个佛教国王权力标志的衣钵。不过,他似乎仍然是一个曼谷忠诚的封臣。当地方统治者曼诺王(Chao Manoy)无法平息一个被称作“萨”(Sa,一个“具有超自然力量的人”,他在高地少数民族中有很多追随者)的人领导的起义时,阿奴在曼谷的请求之下,于 1819 年干涉了占巴塞的事务。这次反叛部分是由于通往低地的奴隶贸易造成这些社会的瓦解而引发的。有意思的是,这个“具有超自然力量的人”是 1789 年万象陷落之后重新安置到北标的一个家庭的儿子。阿奴王平息了反叛,而且反过来要求将其儿子安置在占巴塞。很明显,曼谷担心这将扩展阿奴王的影响力,但是同时也深切关注顺化皇帝的权力在邻近的柬埔寨的扩张,因此希望占巴塞能有一个比较强大的统治者。经过权衡,后面的这个关切占了上风。在切查达玻丁阁

(Chetsadabodin,即后来的拉玛三世)的要求下,阿奴王的愿望得以实现。

28 这时,阿奴开始梦想重建澜沧王国。这一切只有当他能够与琅勃拉邦拉协调一致,并且在他统治下聚集更多的人民时才能实现。然而,考虑到他的兄长南塔森以前曾进攻过琅勃拉邦,琅勃拉邦对阿奴几乎没有支持。当他于1827年开始率军横穿呵叻高原时,琅勃拉邦试图保持中立。东北部的一些贵族支持这次起义,但是其他贵族仍然效忠曼谷。阿奴王的军队通过耍花招占领了呵叻府:他们宣称他们正向南进军去帮助曼谷抵抗英国的入侵。他们直到抵达北标府才被曼谷迅速集结的大军阻断去路,从而只能后撤。阿奴王的撤退军队强迫尽可能多的人们与他们一起向北进发,并屠杀了那些反抗的人们。不管怎样,这次起义以惨败而告终。阿奴的儿子不久被抓获,他自己则逃到越南的顺化。暹罗军队开进万象并毁掉了此城。暹罗指挥官帕拉旺·博旺(Phrarajwang Bovon)向拉玛三世报告说:

大量万象的居民逃往拉考(Lakorn)、清迈、南奔、帕府、难府和琅勃拉邦。要将他们聚拢起来,我们就必须使用野蛮的武力,但这样就不得人心了。在万象及其控制司法权的城市中,适合征召的男性数量据估计合计有2万人。当和平重新降临,该地区重新安定下来,据说有超过8000名到9000名男子能够被征募到我们的军队中……我将继续聚拢大约1万名男子及其家庭,这样总共就有大约5万人……不过我们以此方式缴获的大量大炮和枪支大都是过时型号,不值得我们费力将它们运回首都……<sup>5</sup>

29 指挥官在万象留下了一支小分队,“来处理事务并预防王土之内任何可能的争端”。拉玛三世曾支持阿奴的儿子在占巴塞任职,他对没有抓获阿奴感到震怒,因此下令毁掉万象并灭绝此城的居民。1828年,阿奴被抓获并被装在笼子里送到曼谷,他在那里被游街示众并遭到羞辱,不



玉佛寺由赛塔提腊国王于16世纪60年代建造，国王将自己从清迈带来的玉佛供奉在这里。1778年，当暹罗军队将玉佛运到曼谷时，玉佛遭到部分损坏。玉佛在曼谷成为却克里国王们的最爱。玉佛寺于1828年万象圣事之后遭到进一步的破坏。此后正如照片所示，它被草本植物缠绕。玉佛寺的重建始于1936年，并一直持续到1942年。重建由梭发那·富马(Souvanna Phouma)亲王监管，并与法国远东学院合作，直到亲王子1939年被委派到琅勃拉邦。重建的装饰是在来自琅勃拉邦的提特·蒲(Thit Phou)的指导下进行的，他是当时老挝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重建玉佛寺的工匠都是老挝人，而以前，如重建西萨格寺(Vat Sisake)时，使用的是高棉艺术家和工匠，其他重建工作则使用越南人。实际的建造者都处在因塔雍(Thao Somboun Inthavong)的领导之下，他的建筑公司使他后来成为万象最富有的商人之一。1942年3月18日，人们为重建的玉佛寺举行了落成典礼。现在它成了一座博物馆。佩差拉(Phetsarath)作为西萨旺·冯(Sisavang Vong)国王的代表，新近被委任为副王，而万象的最高专员M. 罗克斯(M. Roques)则代表印度支那总督将军。(承蒙EFEO提供照片)

久就死了。

暹罗人残忍的反应是由曼谷对自身安全的忧虑所驱使的。曼谷亲眼看到它的老对手缅甸在英国人的手中被征服，曼谷自己也受到来自欧洲扩张主义不断增长的压力的。而暹罗东部，越南在柬埔寨的势力持续增长。阿奴王的死表明曼谷的中央集权将会加速，其国内任何对这种权力的挑战都是不被容忍的。





ພະເຈົ້າອະນຸຮູ່ວ່າທວກເກດເລະໃຫ້ໄດ້  
 ວິບູຮາຊ້າສັນກັນປູ່ເລື້ອຍໆ ພະອົງໄດ້  
 ຕິດວ່າຄວາມເປັນກາງ ເອກະລາດຂອງ  
 ບໍ່ເຫດລາດສະຫວ່າງໃຫ້ແລະເກດນັ້ນ  
 ອາດນໍາຄວາມສັນຕິໄດ້ ສະນັ້ນພະ  
 ອົງຈຶ່ງກັບຈາກບໍ່ເຫດເກດເລື້ອ  
 ເຈຣະຈາສັນຕິກັບໃຫ້.

上面的这幅漫画摘自一本手册——《老挝最重要的国王们》(The Most Important Kings of Laos),是皇家老挝政府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在这本手册里,阿奴王被重新解释成一个“老挝中立主义”的信徒,而这正是当时老挝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所推行的政策。这些对阿奴王政治性的解释是常见的。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时期,阿奴王被视作为老挝“国家独立”而斗争的英雄,与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路线相似。

30                    呵叻高原的“老族化”\*

阿奴王起义之后,当时由暹罗人牢牢控制的呵叻高原经历了一次决定性的转变,暹罗政府开始用武力强迫湄公河东岸的人们移民到这块殖民地来。几百年来,这片巨大的高原一直都从林密布,人口相对稀少。即使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高原东北部仍然林木丛生,只有22%的土地被耕种。19世纪茂密的森林里居住着许多如马拉比人(Mlabri)一样的狩猎者和采集者,我们可以在今天难府和沙耶武里省边界的丛林地区找到他们最后的残存者。与法国人于19世纪制作的地图以及20世纪老挝民族主义者制作的地图相反,澜沧王国最辉煌时也只统治了湄公河沿岸处于呵叻高原北部边缘的蒙。傣族在占巴塞地区决定性的优势直到18世纪初才出现。阿瑜陀耶王国对该地区也不感兴趣,只是到了17世纪中期才在两个古老高棉城镇的遗址上建立了加强的前哨呵叻府。位于呵叻府与澜沧王国北部城镇之间的地区主要为无人区。高棉移民仍然分散在高原上,但主要聚集在高原南部边缘。

\* 作者对本节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故本节中文版所标注的原文页码仅供参考。——编者注

傣族中的小族群迁入这一地区已经几百年了,有些人是为逃避澜沧王国的战争和王朝争端而迁入的,他们与该地区高棉人的交往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文化发展。其他族群穿越湄公河,与高棉人和其他原生民族混居。今天在泰国东北部分散居住的苏赛族(Suai)或者狩族(So)等少数民族表明,此地存在复杂的种族历史,其历史至今仍然没被核实,但这一地区从来不是单一的“老族”。其中的大多数人居住在这些国家最边缘的地区,他们均依照各自的民族传统进行演化、发展。高原真正“老族化”是随着阿奴王的起义而发生的。这次起义促使暹罗政府着手一项系统的政策,即将成千上万的人从湄公河东岸迁入这个由暹罗强势控制的地区。接下来,更强大的曼谷提供的政治稳定确保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到了20世纪,呵叻高原上的老族比老挝本国的老族还多。有必要简略地分析一下该地区的人口统计学数据。例如,在1859年,整个泰国的人口只有大约520万,其东北地区的人口大约有20万;而到了20世纪初,东北地区人口已超过100万,相比之下,根据法国人的估计,19世纪末老挝国内只有50万至100万人。

31

对当地首领日益严苛的监管势必会削弱他们传统的特权,而在老族地区背井离乡的人们中产生了一种深沉且广泛的文化上的不安全感,并导致偶尔的情绪爆发。这样的运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一个现代化国家将其统治延伸到内陆地区,或者资本主义开始扰乱传统经济,这些通常是对殖民主义的反应。通常这样的运动借助传统宗教和政治信仰来宣称:正如他们的预言家预言的那样,一个理想社会将要形成,会把现在邪恶的世界清除干净。这些观点能在一首很神秘的诗《扑灭太阳的光辉》(*Leup Pha Sun*)里找寻到,它是在阿奴王失败后创作于19世纪的。这首诗使用了爱和宗教的隐喻语言,描绘了一幅处于混乱状态的情景,而这一切都将被一位正直的佛教徒国王恢复到正常:

山川被毁掉了;崩塌散落四方  
陆地的边缘被摧毁,

村庄大乱，浓烟遮蔽日光；地球上一片火海  
阴影覆盖了（月亮的）光辉，月亮消失在浓云里  
天地万物被推倒，都破碎了；大地失去了平衡；  
大地在震动和发抖。

32 《扑灭太阳的光辉》也可以被解读为老挝人反对暹罗人认同的文化宣言，20 世纪的老挝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理解它的。“万象”在这首诗里被提到，但它只充当一个由佛管理的理想国家的隐喻，而不是指代真实的地方。在世纪交替的泰国东北部，“万象”也被作为由白衣普米邦（phu mi bun，拥有异常功勋人们）领导起义的理想之地。

### 19 世纪的琅勃拉邦

19 世纪晚期，老挝北部遭到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中国南方潘泰起义余波的影响。曾一度拥有大量军队的起义军残部在其黄黑或者条纹旗的指引下向南进发，穿越山区边界地区直到万象。老族人非常害怕，将他们视为可怕的云南“华族”（Haw）。

在琅勃拉邦，阿奴王起义的结果意味着暹罗对其附属国的控制更紧。在普安蒙抓获阿奴王的暹罗军队正是从琅勃拉邦出发的。暹罗士兵驻扎在琅勃拉邦，直到法国人到来为止。暹罗此时最主要的忧虑是顺化王国对高棉王国和各老挝附属国的入侵。阿奴逃往顺化加强了后者在老族事务中的作用。被认为是顺化皇帝附属国首领的普安蒙统治者被革职，并在顺化被处决，因为他们帮助将阿奴王移交给暹罗军队。不同的看法使普安蒙形成了两大派系，一派希望依靠琅勃拉邦，另一派则希望依靠顺化。曼谷对此提出了警告，这一点可从 1836 年内务部的一份告示中窥知：

33 越南人正派出审查员从普安官员和每家每户那里收取赋税。  
这些越南人已经使离安南较近的清堪（Chiang Kham）和莫（Mo）

的普安族用越南人的款式来穿着和梳头，以期由此将普安族切实收入越南人囊中。<sup>6</sup>

曼谷的反应与它对南部省份的处理一样——将人口迁入由其完全控制的领土。因此，成千上万的普安家庭被强迫迁到呵叻高原甚至更远的地方，川圹省附近平原上的小镇几乎被遗弃了十几年。与越南交界的地区由来自顺化的专员直接统治。

从早期的傣族移居开始，越南与老挝之间的北部山区就出现了更小的傣族蒙。一次重要的傣族首领联盟在 19 世纪出现，被称为“西双楚泰”(Sip Song Chu Tai)，它覆盖了现在华潘省的大部分。这些傣族仍然都不是佛教徒，他们的首领都隶属于低地越南政府，越南政府授予他们头衔，他们也模仿越南官方服装。这种统治类型采用中国边界的“土司”模式，是一种间接的统治。这些傣族偶尔被置于琅勃拉邦附属国的



曼谷任命的琅勃拉邦副王的官印。

关系之中，他们与王国的关系要比东部更为牢固。然而，查尔平原上的傣族普安人在澜沧王国兴盛期间改信了佛教，并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一个小侯国，该侯国成为低地国家的附属国。它同时也向顺化进贡，借此维护了其在普安事务中的权利。在曼陀罗时代，这种重叠、脉动而又不明确的司法权是常态，宫廷派系出于自己的利益来使用它们。然而，到了 19 世纪下半叶，欧洲殖民主义被作为一种管理国家的新形式引入该地区，它只要求拥有对领土的最高统治权而不要求拥有对民族和政治单位的统治权。曼谷、顺化甚至北京的统治者们不得不服从这个新现实。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后果皆系混乱的产物，这种混乱是在旧秩序中由新秩序引发的。



这幅描绘琅勃拉邦的图画由 19 世纪中叶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奥 (Henri Mouhot) 创作, 画中反映了琅勃拉邦当时的规模。他将它描述为“一个讨人喜欢的小镇, 占地 1 平方英里, 只有 7 000 至 8 000 名居民”。换句话说, 大小相当于一个大村或小城。

34

## 华族侵略者

中国南方这些骚乱的华族残余以劫掠为生, 他们向南一直劫掠到万象。在万象, 他们为寻找珠宝和黄金而彻底搜查了塔銮。为朱拉隆功 (chulalongkorn) 国王服务的英国勘测员詹姆士·麦卡锡 (James McCarthy) 于 1884 年旅行穿越普安地区, 他记述道: “这些寺庙都被肆意地毁掉, 一沓沓的棕榈叶资料被胡乱地堆在一起, 除非马上阅读它们, 否则将永远失去它们。”在普安首府川圹:

这一地区最好的佛塔耸立在山上, 它也没能幸免于难。从远处看, 佛塔美极了, 但靠近看却发现, 它塔身的三个侧面都有裂痕, 几乎从塔尖贯穿到塔基。60 英尺高的塔尖没有倒塌真是太好了。

据说,华族人从这个佛塔中掠走了相当于7 000卢比重量的黄金。曾内含祭品的骨灰瓮的碎片散落一地,但仍然展示出非常雅致的型制。<sup>7</sup>

有时,华族还会与来自西双楚泰的士兵们一起合作。

琅勃拉邦无力抵抗这些掠夺者。那幅琅勃拉邦的画是由19世纪中叶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奥创作的,画中反映了琅勃拉邦当时的规模。他将它描述为“一个讨人喜欢的小镇,占地1平方英里,只有7 000至8 000名居民”。他的那幅画是为了纪念“统治这个小国的亲王们,他们也有国王的称号”,他们是两个人,国王及其副王,在一个竖起的平台上兴高采烈地与就座的探险者交谈,其臣民俯伏在周围。他们并未显得高高在上,显然西双楚泰酋邦的地位那时已与该国不相上下了。华族带来的混乱无序状态削弱了琅勃拉邦对其下属,即一些酋邦的控制。于是在1875年,琅勃拉邦发生了卡人起义。其领导人尼(Nhi)是佻木族人(Khamu),他组织了一群劫掠者,但在这一年稍晚的时候被暹罗-老挝部队杀死,其武装也被解散。

35



华族首领们。坐着的是刁文池(Deo Van Tri)和坎多(Kham Doi)。



佩维使节团。从左至右：各位先生，尼科伦(Nicolon)、马西(Massie)、奥古斯特·佩维(August Pavie)、维寇(Vacle)和躺卧着的噶兰哥(Garanger)，柬埔寨语翻译们，及老挝和安南的仆人们。

19世纪70年代，暹罗人试图通过传统方法整治其周边附属国的混乱无序状态，便派遣指挥官领导匆忙聚集组建的农民士兵队伍，但这一切都不起作用。此外，在普安地区施行的人口迁移政策使传统的统治阶层们疏远了暹罗，因为这一政策削弱了他们的权利基础而不是对他们委以重任。因为越南人没有人口迁移政策，于是传统的统治阶层转向越南人寻求保护，该地区仍然不稳定。华族侵袭琅勃拉邦导致了暹罗于1882年派遣卫戍部队驻扎在那里。然而，边界上的骚乱与曼谷的政治斗争和行政变化联系日益紧密。朱拉隆功国王开始更换旧近卫军，并组建政府新部门。1883年成立了一个亲王委员会，目的是规划新边界政策来应对日益加剧的法国挑战。法国当时正对顺化的附属国提出要求，用的还是晦涩难懂的现代制图语言。所以麦卡锡被曼谷雇

用,于 1884 年在普安地区游历,绘制地图。他的报告使曼谷也对沿着分水岭的地区提出要求,包括大部分西双楚泰。为了尝试巩固自己的主张,暹罗人向华潘省的城镇首领发放王权标志,并于 1886 年在琅勃拉邦出席了一次授职仪式。但很多领导者们依然保留越南人授予的称号,以便在顺化和法国人任命高官时使用。暹罗人试图通过贿赂和胁迫来使当地的统治阶层进入其保护之下。但是,1887 年他们犯了个错误,将西双楚泰的首领刁文池的儿子们抢走并送到曼谷。刁文池为了报复,与华族联合进军琅勃拉邦并洗劫了该城。暹罗指挥官及其卫戍部队耻辱的溃退证明了暹罗势力在这一地区的相对薄弱。琅勃拉邦年迈的国王与法国副领事奥古斯特·佩维一起逃走,佩维是这种支配一切秩序和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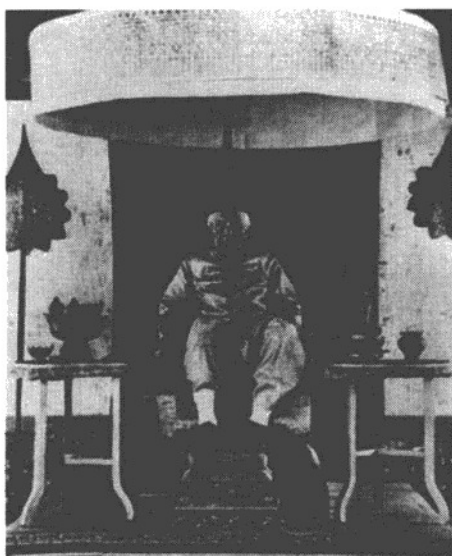
苏拉萨蒙提(Chao Praya Surasakmontri) (左)是 1885—1887 年第二次暹罗远征华族军队的领导者。照片中与他坐在一起的是琅勃拉邦的坎芬(Khamsouk)亲王,后来以其王号——扎卡林(Sakharine)闻名。正如苏拉萨蒙提在其自传里解释的那样,他的远征军的目的就是:“解决他们。因为法国已经发动与越南的战争,即将划定靠近华潘和西双楚泰的边界,法国人可能继续前进,将国王陛下的领土声称是越南的领土。由于这个原因,为了避免失去这次机会,国王陛下下令让我们调动军队,在鸡年的旱季来镇压华族。”

的新形式的持有人。对这一地区,尤其是北部山区的争夺最终在炮舰外交的介入下尘埃落定。1893 年 7 月,两艘法国战舰逆湄南河(Chao Phraya River)而上到达曼谷。法国人发出了最后通牒,迅即经谈判割让整个湄公河东岸给法国,由其实施殖民统治。

## 老挝人和暹罗人

“老族人”和“暹罗人”存在文化差异,这源于两个社会融入现代世





当琅勃拉邦于1887年被华族洗劫时,年迈的温坎(Ounkham)国王被迫逃离该地。他的性命得以保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法国领事奥古斯特·佩维的帮助,佩维由此主动提出“保护”琅勃拉邦。国王一度旅居曼谷,后于1888年返回琅勃拉邦并重新登王位。然而,国王的身体过于虚弱,所以由他的儿子坎苏代理行使权力,直到1894年法国宣布琅勃拉邦为其保护国之后,坎苏才登上王位。坎苏此后使用其王号扎卡林(Zacharine)。其父温坎死于1895年。

界体系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别。国际贸易和交流最繁盛时期也引入了宏观的民族概念,例如老族人和暹罗人。阿瑜陀耶宫廷的人们接受了这些概念。然而直到20世纪,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他们与这些名称是毫不相干的。在阿瑜陀耶出现的国际大都市文化,以及一个富足国家能够负担的各种繁复的文化和仪式活动,包括对外部文化的借鉴,都是促使老族人和暹罗人开始自觉进行民族文化创造的最初因素。老族宫廷某种程度上仿效了阿瑜陀耶宫廷及后来曼谷宫廷的风格,正如后者仿效了欧洲宫廷的风格一样。澜沧王国的垮台拉大了日益世俗和先进的暹罗宫廷与日益保守的老族宫廷之间的差距。

然而,19世纪早期,傣族世界中一个更明显的变化是通过两点反映出来的,即在寺庙里突然涌现修建图书馆的热潮,以及编撰历史书籍。

傣族世界对越南或缅甸世界的对抗情绪在这些编年史中反映得更清晰,但傣族世界仍然非常团结。曼谷的现代化计划是由孟固(Mongkut)国王发动的,朱拉隆功国王加速了中央和边缘之间的差距,或者至少是加强了中央认为自己不同于边缘的意识,这表现在越来越认为边缘地区的人是“乡下土包子”,他们蒙昧、迷信,不适合这个现代的时代。这尤其指东北部贫穷的农民——“老族人”,后又延伸到其他老族人。因此,正是现代化促生了老族人或暹罗人的族群意识。

无论是在湄南河流域还是泰国东北部的呵叻高原,农民的种族

构成都显示出特别显著的多样性。甚至曼谷周边的省份在 19 世纪也住满了来自各地的农民,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加入到他们当中。老挝也同样具有多样性。傣仂人(Tai Lue)从北方迁入琅勃拉邦,傣普安族(Tai Phuan)迁入万象,还有在所有傣族族群和高地民族之间持续不断的文化和社会的互动。人们极少感受到族群间强烈的文化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也极少影响到族群间的持续互动。

“老族特性”(Lao-ness)的一个文化标志(被老族人自己和其他人使用)是食用“糯米”,一个种植于高地的品种。今天,大量存在于该地区的糯米食用者仍被识别为老族人,虽然在这一地区很多其他种族族群也食用糯米。糯米随着傣族传入低地地区,在那里遇到了孟人和高棉人种植的长粒谷物品种,人们开始种植杂交进化品种。这只是阿瑜陀耶时代稻米出口的开始。到了 19 世纪,来自湄南河平原的稻米出口激增,这导致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即不再种植糯米品种,甚至一些习惯于吃糯米的人们也不种植了。因此,正是在 19 世纪,没有参与稻米出口潮的老族人被识别为糯米食用者,糯米成为“老族特性”的标志性象征。

暹罗人与老族人差异加大的另一个主要转折点是民族主义计划的推行。这些计划是由朱拉隆功发动的,其后所有的国王和政府也一直在推行,旨在普及统一而同质的暹罗文化的观念,包括核心泰语的标准化。后来在法国人统治时期,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老族人身上。

## 第二章 法国统治下的老挝

39 老挝的民族主义在 20 世纪上半叶发展缓慢。老挝仍然是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中一个闭塞的地方,几乎很少经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化。鸦片成为殖民地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引起高地分裂并导致中国商人和苗族揭竿而起。但总的来说,国家是平静的,许多法国人认为老挝有点“香格里拉”的味道。殖民地社会内存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但不是很严重。20 世纪 30 年代泰国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挑战以及 40 年代的战争,都促使老挝掀起一浪小规模民族主义运动,但他们没能在 1945 年驱逐法国人。法国设法保住了其印度支那殖民地,在法兰西联邦里,皇家老挝政府于 1947 年建立。但到 1954 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体系已然土崩瓦解了。

### 40 老挝地图的绘制

法国人于 19 世纪第一次绘制了老挝地图并引入了现代地理制图法,这主要是由副领事奥古斯特·佩维推动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暹罗和法国在老挝领土上的冲突也是一种不同世界对如何组建国家的观点的冲突。在曼陀罗体系中,小的公国拥有重叠的宗主权是很正常的,如两领主(songfaifa)或三领主(samfaifa)。在这些时期,暹罗依旧保持对周边的琅勃拉邦等附属国的宗主国地位。这些附属国在

它与其他强大的曼陀罗之间起到一种缓冲作用。暹罗很清楚,这些小的公国同时向几个国家进贡。

然而,法国殖民者带来的国家民族主义概念则不承认这种中间地带,他们强调清晰的领土边界。暹罗人起初对这个新观点感到很困惑,但是他们学得很快,不久就雇用欧洲人来帮助他们提出领土所有权。老族人在这场部署中扮演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只是提供证明文件给佩维,以便他能够代表法国做出声明。法国声明老挝是越南的附属国,并于1887年委托卢斯(Luce)上尉到顺化市寻找档案,以便来证实他们的声明。卢斯上尉找到的只是一些模糊的附属国声明,特别是从现代地图测绘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都令人很不满意,尤其是在对湄公河东岸所有权的主张方面,而这正是佩维所要找寻的。佩维反对使用湄公河作为天然分界线,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当正确,因为它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天然”的界线。在缓冲区,任何界线都会被随意终结,因此边界的划分最终会通过武力来解决。佩维于1893年写道:如果暹罗人敢来惹麻烦,法国应该展示一下武力,“受暹罗保护的国家将成为我们的赔偿物”。他又补充说:“如果我们现在忽视这个机会,哪里还能得到另一块土地来充实我们的印度支那帝国?”

41

法国的炮舰外交迫使暹罗于1893年在曼谷与法国签订条约,法国在湄公河西岸获得了25公里的非武装区,并将湄公河定为该区域的边界。这成为暹罗人备感焦虑的起因。这个非武装区与法国对“法籍民”(出生在法国殖民地的人,例如从老挝驱逐到暹罗的人)的治外法权声明加剧了该地区持续的不稳定,并为法国以后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提供了借口。的确如此,在一份1899年印度支那总督发给殖民地当局的电报中,总督保罗·杜美(Paul Doumer)重申了法国当局对暹罗的声明:

我们必须设法确保暹罗(尽管它已经由英国控制多年)转投法国,并且越来越多地加强它与印度支那的联系。所谓保护区、中立区等等,本身并无意义。它们只有作为政治武器才有重要性。我

们必须成功占领马德望省,进而整个呵叻。通过环境施压,最后使整个暹罗成为我们的被保护国。<sup>8</sup>

42 英国的反对和曼谷娴熟的外交手段使得法国人没有达到此目的。1903年,法国与暹罗的条约重新修订,琅勃拉邦西面的领土归还给了老挝,南部的西侧领土划归占巴塞省。然而,位于湄公河西岸的占巴塞省的首府巴塞(Bassac)与曼谷结盟,当地统治者被一位法国总督称为“占巴塞国王”。大多数占巴塞省的王族逃到了曼谷,除了努伊(Nhouy),他被委任为州长,新首府设在巴色(Paksé)(1908年之后),但是这没能恢复他的小王国。1907年,法暹最终协约将南琅勃拉邦少量的领土割让给暹罗的丹赛省。法国人宣布放弃他们在暹罗“保护”法国“亚裔”公民的权利,用来交换在柬埔寨“失落的省”(即暹粒省和马德望省)。“失落的省”这个比喻在曼谷继续存在,直到1940年被废止。老挝人也将这个词作为一种民族主义的专有词汇予以保留,他们自己的“失落的省”在暹罗的东北部。然而,所有这一类领土声明虽然都有法律效力,但同样也具有欺骗性。

## 文明使命

回想19世纪末欧洲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情况,的确令人困惑。最近的编年史已经意识到殖民主义的复杂性,既把它看作是一种文化、社会现象,也把它看作是一种经济、政治现象。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相反,像老挝这样的殖民地对法国来说是个经济负担,法国来老挝的动机还要从其他地方找寻。如果将法国的帝国主义看作是法国民族主义的自然结果,就比较好理解了。

19世纪,法国经历了一个把农民变为法国人的长期进程,直到1893年法国控制老挝时仍然没有完成。在那个时候,法国大多数人口还是农民,巴黎的城市社会和乡村之间有巨大的文化差距。对很多人而言,巴黎是法国,高雅的城市环境使得这个国家呈现出比它的真实状况更加发达和“文明”的外表。城市精英们惊讶于在农村地区遇到的农

民：他们拒绝说法语，也没有把自己看作是法国人，仍然依恋本地风俗和“迷信”。第一批到法国留学的老挝学生宋金·皮埃尔·宁(Somchine Pierre Nginn)于1906年到达法国，他在南部某个地区观察到这样的情景：

这些人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性格温和，非常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们的方言由很多语言组成，但都不是法语，人们使用当地方言互相交谈。<sup>9</sup>

43

这种多样性并没有使他惊讶，正如老挝的多样性也没有使他惊讶一样。

19世纪，很多作家把法国乡村和他们在殖民地看到的境况相比较。在比利牛斯山的森林里，农民们拿起武器反对这个地区的新来者，比如不知道当地情况的警察和行政人员。直到1900年，法国仍然要面对这些山区的反抗。几乎在同时，法国在老挝高地也正面临同样的反抗。在19世纪，随着道路、市场、学校、兵役制度等的发展，本地社区的乡土观念被慢慢打破，大多数法国人开始认识到自己是法国人，只有对此产生认同，才能融入更广阔的国内社会。在暹罗于19世纪末刚刚开始这个过程，但在老挝则还没开始。

1870年法德战争中，领土阿尔萨斯-洛林的割让是法国民族主义传播的关键事件，这对民族自豪感也是一种挫伤。“失落的省”的概念被引入印度支那，目的是提高法国人的殖民动机。法国人开始谈论柬埔寨的马德望和暹粒、老挝的呵叻高原，这些对于暹罗来说都是“失去的”。这个概念后来被老挝、高棉和泰国的民族主义者所采用。

殖民主义给国家的扩张带来了机遇。在殖民地扩张最活跃的倡导者之中，热心的民族主义者将自己的主张粉饰为法国的荣耀。许多法国人被这个愿望所激励：法国要比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更优秀。既然殖民主义一个决定性的动力就是要掠夺对手的潜在殖民地，那么就

44

成了他们的一种负担。法国人担负着额外的负担,那是 1789 年大革命遗留给他们的:在全球传播大革命所设想的普遍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这是法国人的道德责任。这种独一无二的文明使命使行政官员、冒险家、移民、投资者、士兵和水手抛弃当前的利益分歧而联合在一起。老挝的殖民地探险者,如 19 世纪 60 年代的亨利·穆奥和弗朗西斯·加尔涅(Francis Garnier),80 年代的奥古斯特·佩维,最初都怀有在内陆地区找到巨大财富的幻想,然而当这种希望破灭后,他们仍继续努力,为法兰西收获荣耀和传播文化的愿望激励他们不断前行。

享有平等和公民权的共和国理想激励着法国殖民者反对旧的封建阶级,并将推翻它的行为合理化。在殖民主义时代的早期,法国殖民主义者致力于将殖民地人民变为法国人,不过在他们能够收获共和制政体回报之前,他们不得被“开化”。然而,被征服群体的政治权利的丧失让共和制民族主义者的思想产生了矛盾,由此产生了种族歧视的想法来为权利的丧失进行辩护。20 世纪殖民主义的中心矛盾是,它将民族主义和民主观念同时传播到了殖民地。20 世纪早期,殖民地种族主义的目标从早期主张社会同化,转向建立“本国的传统”将被尊重的联合体,殖民地将以自己的方式向现代化演变。

45 法国向老挝殖民扩张最热心的拥护者是奥古斯特·佩维。巴黎的殖民党(Party Colonial)赞助他,他们的财富随着法国国内政治的起伏而盈缩。佩维及其支持者最关心英国从缅甸向暹罗的扩张,他们决定吞并暹罗,至少也要吞并湄南河,因为该河流经泰国中央平原和曼谷。

## 殖民政府

46 1893 年,老挝作为印度支那五个联合地区之一,与柬埔寨、东京(Tonkin,越南北部的一个地区)、安南、越南的交趾支那一起被合并。在老挝北部,琅勃拉邦国作为受保护国被合并。这就意味着在北部实行的是一种非直接统治的形式,而中部和南部作为殖民地被直

接统治直到 1899 年,而老挝则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

奥古斯特·佩维是老挝第一任法国总督(任期为 1893—1895 年),此间他将扎卡林国王扶上王位来接替病重的温坎国王,他还宣布:“我认可老挝现在在位的亲王们,现在老挝已经成为法国的领地。”但相对来说,佩维并没做什么。1899 年的老挝看起来是印度支那的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实际上由设在沙湾拿吉的最高专员管辖。佩维于 1895 年搬到了万象。1895 年 12 月,老挝北部专员卜洛希(Bulloche)与国王签署条约,让国王通过自己的传统结构来实现统治的稳定。他们最关心的还是以各种方式增加的税收。19 至 60 岁的老族男性必须缴纳人头税,每年固定 2 个皮阿斯特(piastre)<sup>①</sup>,外加 20 天的劳役,其中 5 天在家附近服役;卡人缴纳 1 个皮阿斯特,外加 10 天劳役。

最重要的鸦片专卖由国王理事会的一位成员来维持日常运营,“收上来的这些税款和销售鸦片的利润由法国和国王五五分账”。条约虽在实施但却很难监管,于是在 1914 年,法国取消了王国的独立预算,将其纳入整个殖民地预算。1914 年之前的一份报告抱怨道:“王室



扎卡林国王(左)和他的副王汶孔(Boun Khong),作为 20 世纪转折点的象征被印在一张法国的明信片上。扎卡林是温坎国王的儿子,原为坎苏亲王,奥古斯特·佩维于 1894 年将他扶上琅勃拉邦的王位,此后称为扎卡林王。他一直是琅勃拉邦的国王,直到 1904 年去世。在那之后,他的儿子西萨旺·冯继承王位。右边的人是副王汶孔,他于 1899 年由暹罗人任命为总督,在法国人的庇护下一直担任该职直到 1920 年去世。他是佩差拉(Phetsarath)亲王、梭发那·富马亲王、苏发努·冯(Souphanou Vong)亲王,以及老挝近代史上其他几个重要人物的父亲。

<sup>①</sup> 皮阿斯特,法属印度支那货币。——译者注



47 预算的存在,实际上充当了一块美妙的遮羞布,掩盖了其背后种种见不得人的财务运作。”报告指出,年轻国王西萨旺·冯无力控制其预算:“西萨旺·冯对其土著官员滥用财政收入的习惯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反对他们的支出……结果导致老挝其他地方的收入一直在增加,而琅勃拉邦的收入却连续几年一直在下滑。”法国允许国王有 3 万皮阿斯特的私人预算,国王的主要官员也给予一定的薪俸。为了向西萨旺·冯国王保证法方支持他实行君主制,他们在琅勃拉邦新建了一座宫殿。

王国里的多数老族人看不出在法国人统治下的生活和旧的时代有何不同。但是,时代在一步步改变,在通往君主立宪制的漫长道路上,人们看到政府财政独立的丧失。1917 年,琅勃拉邦君主国和印度支那总督签署了新的条约,条约规定:(考虑到法方已于 19 世纪 90 年代废除了奴隶制),现存所有旧的、传统的“封建”特权和政府部门都要废止,并限制国王的林业权。然而,主要贵族的地位依然维持。例如,允许拥有私人卫兵的数目为“国王 60 人,副王 15 人,军需大臣 12 人,国务秘书 12 人”。第二个重要变化是法国于 1931 年确认了琅勃拉邦受保护国的地位,1933 年华潘省被划归琅勃拉邦。

弗吉尼亚·汤普森(Virginia Thompson)在 1937 年出版的《法属印度支那》(*French Indochina*)一书里这样描述对老挝的管理:“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悬于本国原有的政府之上,使原有的政府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呈现出现代化的外表。”居于最顶端的是法国人,在其之下是殖民地政府机构,其职员大都是受过教育的越南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老挝直辖的那部分城市的人口数。对于在法国接受过教育的老挝知识阶层(如佩差拉亲王,他是万象最高专员的翻译和顾问),他们对越南人在政府中占据优势的现状是难以接受的。于是在 1928 年,他们建立了一所培训老挝政府职员的学校。直到 1937 年,越南人在殖民地政府机构高级本土职员中的比例仍占 46%(琅勃拉邦除外)。1937 年 10 月,最高专员 M. 厄特罗普(M. Eutrope)为进入殖民政府的老挝人低下的教育水平而感到悲伤,他说:“老挝的精英一定要在学校里培养,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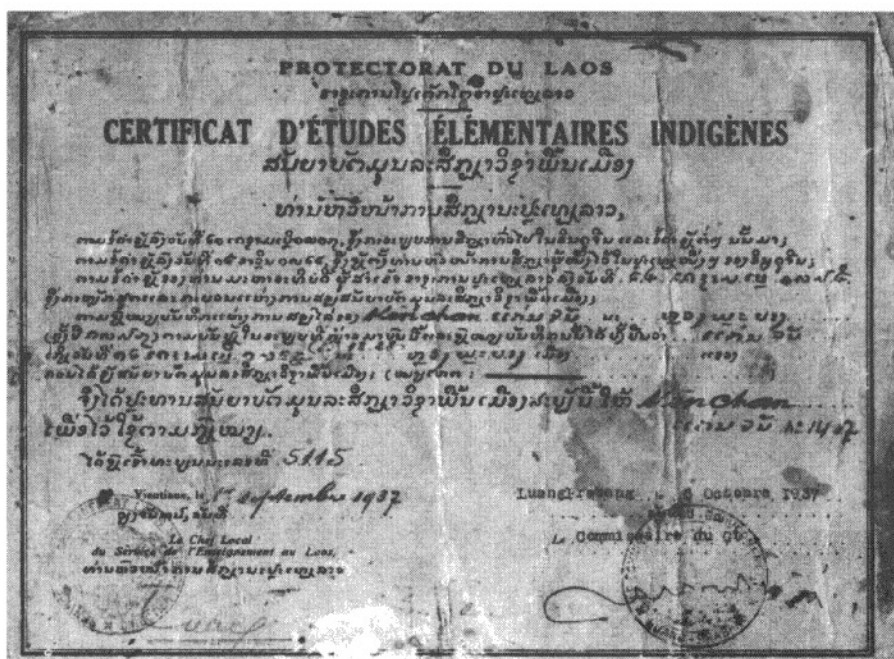
这是必需的。在我们的支持下,这些精英都会成为他们所从事的各个领域(如医疗、教育)的带头人,他们将带领年轻的国家走向进步和幸福。”



最初,法国统治下的学校教育只针对老挝统治阶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情况有所变化,开始印刷老挝语版教科书。虽然直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法国对教育从来没有投入足够多的精力,但是一些普通的老挝人(包括一些少数民族)开始接受现代教育。作为传统文化守护者的僧侣在这个过程中贡献颇多,很多国立学校都在寺庙附近修建。教育开始扩大,但还不够。因此,当1947年皇家老挝政府成立的时候,几乎在每个领域都缺乏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这个问题持续了很多年,迫使老挝不得不依靠外国顾问。(照片承蒙 EFEO 提供)

最初,法国人几乎没有注意到民族意识和公办教育对老挝人的巨大感召力。正如其他国家(如越南、法国)一样,贵族成员(尤其是来自琅勃拉邦的贵族)是第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但对于大多数老挝人来说,受过教育的职员都是越南人。殖民政府简单修缮传统寺庙学校,向人们提供佛教教育,使老挝人基本识字。20世纪20年代,老挝出版了供小学使用的老挝语版教科书,并于1921年建立了第一所初中——佩维学院(Ecole Pavie)。30年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贵族妇女已经开始在琅勃拉邦和万象的学校里任教。第一批女性教师中的著名人物是苏里占(Sourichan)公主,她对当时年轻女性的思想有巨大的影响。截至

1932年,在国立学校7 035名学生中,有976名女生。其中一些学生来自少数民族部落,包括110名泰诺族人(Thai Neua),65名卡人,43名苗族人,35名普诺族人(Phu Noi),33名普泰族人和7名红泰族人(Red Thai),但数量最多的还是越南人。厄特罗普曾在1937年的演讲中抱怨,扩大教育最主要的一个障碍是:老挝人的父母不能“理解在现代条件下给他们孩子一个坚实的教育(至少要达到小学水平)是绝对必要的。老挝家庭应该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我们的学校,并督促他们勤奋学习”。虽然这个文化障碍在当时就存在,但直到40年代老挝人民敢于抱怨教育投入时,政府才为教育投入足够的资金。1945年,佩差拉亲王在其对法国殖民记录的一份谴责中写道:“实话告诉你,老挝人从来没有停止用嫉妒的眼光看着湄公河右岸(泰国)他们自由的兄弟所取得的教育发展。”



省级的顾问委员会于1920年纷纷建立,由每个蒙的首领和两名显贵组成。在万象,顾问委员会增加了三名越南显贵。1923年,创建了土著顾问联合会,其成员主要是省级委员会成员,但也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老挝人。老挝人并不只是顾问,他们在全国凝聚老挝人方面有重要影响,因此促进了老挝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

## 初级的经济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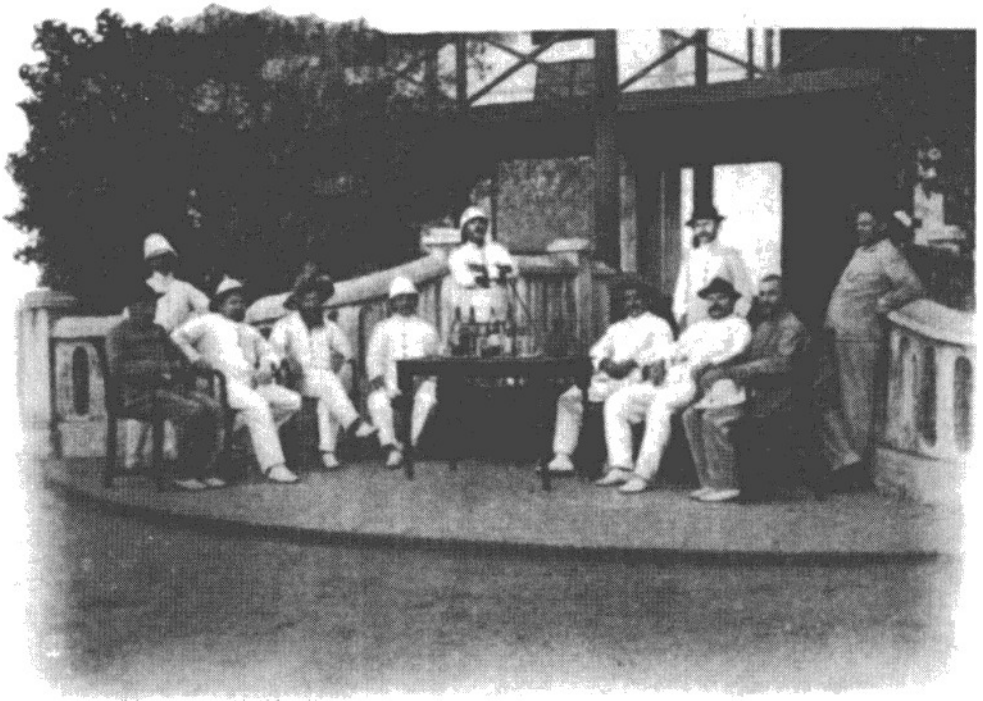
尽管早期怀有寻找巨大财富的幻想,但法属老挝的经济发展却是一个失败。在法国统治 40 年后,一份 1932 年的老挝经济形势概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治形势是好的,但经济形势不好。”除了靠近他曲(Thakhek)有两个规模相对较小(只有 3 000 名越南矿工)且由法国控制的煤矿之外,老挝仍然没有工业。在他曲、沙湾拿吉和巴塞,只有 300 公顷土地被法国种植园主用来种植经济作物——主要是咖啡和烟草。在波罗芬高原上,卡人买卖豆蔻的小农贸易仍然在继续;在北部,紫梗原虫胶(一种用来做上光剂的昆虫分泌物)和安息香(一种用来做香水和软膏剂的树脂)的贸易也在继续。林业也提供了一些收入。一般来说,农业是自给自足的,1932 年耕种的 47 万公顷土地出产了 34 万吨稻米。但是稻米产量每年都有波动,在一些年份经常发生严重的地区性粮食短缺。小的船运公司固定来往于湄公河及其支流之间,运送乘客和商人。国有运输公司试图将老挝与印度支那其他经济地区融为一体,但事实上,穿越泰国的运输路线比穿越山区糟糕的东西向道路更便宜,穿梭于泰国路线的中国商人很轻易地胜过了法国人。

50

老挝殖民政府从一开始就入不敷出——揭开了此后历届老挝现代政府经历持久的财政危机的序幕。征收到的钱只够支付政府官员的工资。没有资金可供发展、修路、建学校和医院,以及开展文明使命的其他成果。殖民地总督念念不忘提醒土著顾问联合会里的蒙主们联合的必要性,以便提高税收,正像他们总是把注意力引向每年从印度支那中央预算中获得的补助金捐助一样。这种补助金可能是虚幻的,但却是很好的财政宣传。

1895 年法国与琅勃拉邦国王签署的条约里的规定同样适用于老挝的其他地区,即老族人和卡人有义务交税和服劳役——为了组织这些,的确很需要一个高效的政府体系,但实际上它却并不存在。构建在传统政府体系上的基层结构,是一个荫庇关系的体系,而不是一个有章可循的官僚体例,后者理论上应该是公正无私的。老挝人之间的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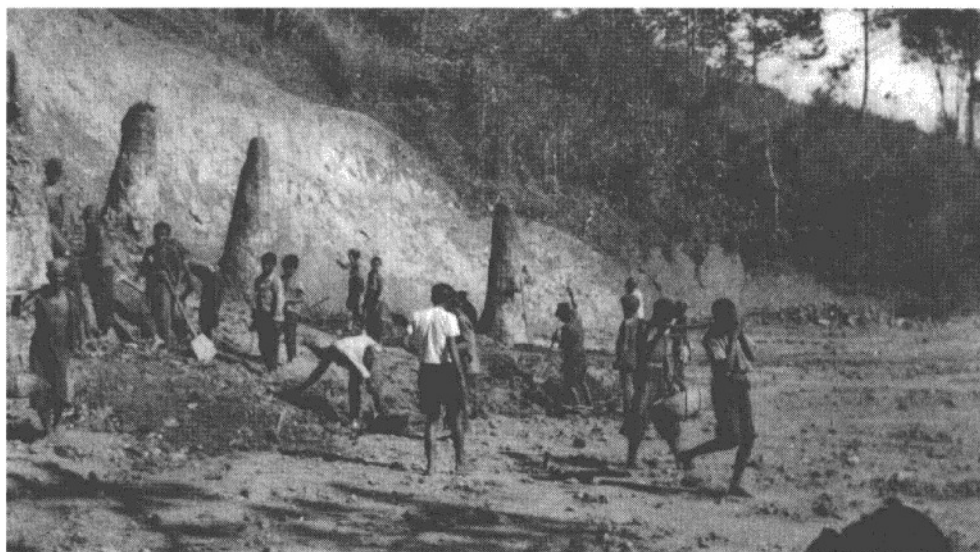
51



在法国统治下,老挝几乎没有经济发展。一些法国人在沙湾拿吉和波罗芬高原建立生产烟草和咖啡的农场,但是没有大批白种移民人口,大部分法国人被殖民政府雇佣。上面的照片展示了一些法国移民在沙湾拿吉的休闲活动。

关系在从村(ban)到乡(tasseng)再到蒙的每一级上都要小心地维持和应对。因而在实践中不能一致对待。然而,虽然法国人允许低级官员可以保留十分之一的税收,但家族蒙(字面意思为“吃蒙”)的传统观念意味着他们经常会保留更多的税收。同样,劳役义务也经常被滥用。像滥用权力和腐败一样令法国人无比惊讶的是,当地人认为那套运作良好的体系和一视同仁的法律惹人厌烦。然而,由于这些长期存在的权力滥用如今是以殖民政府的名义出现,法国人因此对不开化的老挝人深恶痛绝。殖民政府也在努力使用其权力来对人们征税,如定居在国家边界另一侧的各种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不但对强加的新税感到愤怒,而且老挝中间人对他们更容易滥用权力。必要的劳役可以用现金来代偿,政府估计这个比重很高,因为大多数人憎恨劳役。我们可以确定,只有极少数缺乏现金的农民憎恨现金支付。经济体系蹒跚前

行,1930年,最高专员波士克(Bosc)曾乐观地确信,联合起来的土著顾问联合会使“关于纳税人和逃税的错误报告局限为一些个案和特例,这个时间不会太远”,但10年之后财政依然是赤字。



和今天一样,殖民地老挝的道路修建十分重要。但它不像今天,当年没有外国捐助者建造公路或为修路付钱。因此法国人动员村民来修筑公路。除了征收一点象征性的税,老挝村民每年还要参与修路20天;其中5天在当地。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税。少数民族只需要支付更少的税和10天的劳动。尽管左派对“压迫”提出反对,但有一点要说明,法国人“压迫”的人民并不多,因为那个时候在这个国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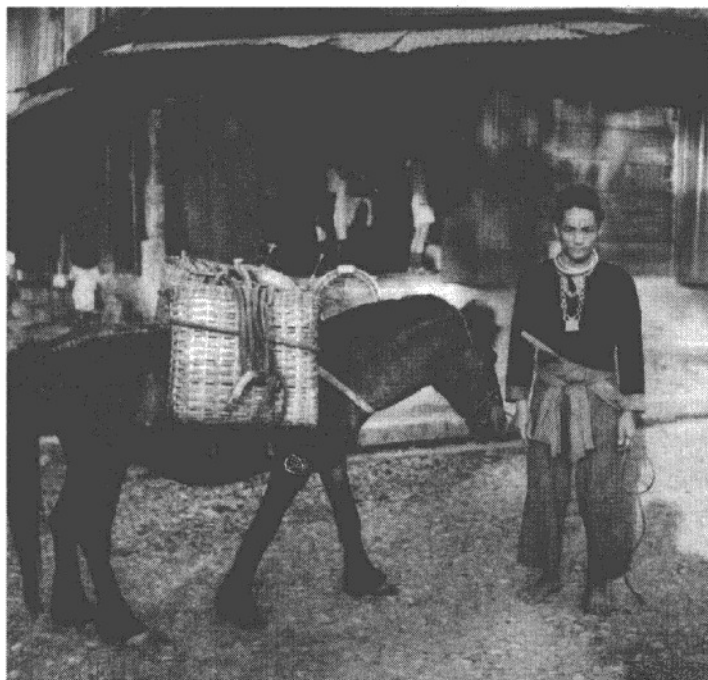
关于殖民地劳役体系的邪恶,后来写得已经够多的了。这里有一张由法国人拍摄的照片,一排劳动者正在敲击路面,这张照片被反复用来说明殖民主义的残酷。在越南的确有几个因为繁重的劳动而导致劳动者死亡的事例,但在老挝却没有。与难以修复的政府体系并存的还有劳役,大多数人认为这种强迫劳役组织混乱、态度轻率,而且那些靠近计划路线的不幸村民发现他们的负担格外重。因此,逃避劳役的比率非常高。20世纪30年代,这一效率低下的政府体系只能开始实行有偿劳动。前殖民时期的土著政权的军队一次征用农民做工数月,或为国家工程征发农民服役,与此相比,法国人实施的劳役政策就很温和了。不过与法国人不同,前殖民时期的国王们可不会宣称,他们的统治

52

是在自由和平等的名义下进行的。

## 鸦片垄断

印度支那殖民政权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鸦片。1937年弗吉尼亚·汤普森指出,法国的做法相当虚伪:在法国,私藏鸦片会被判入狱,而在远东,法国殖民地却因鸦片的销售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法国人辩解说,在殖民地禁绝鸦片需要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个他们负担不起。鸦片销售形成了一项垄断,多年来都占殖民地中央财政预算收入的一半以上。1914年,老挝鸦片的销售为中央预算提供了26.5万美元,给地方预算的补助金也来源于此,老挝所付出的代价也许比它



苗族历史上反抗过中国政府,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他们于18世纪开始迁入越南北部和老挝。苗族的主要人口还是分布在中国。他们迁入老挝高地的举动意味着老挝高地的社会和权力关系要重新调整;伴随着鸦片贸易的发展,经济关系也要调整。他们从不像克木族(Khmu)那样屈服于低地老挝人或者普安人,而是保持他们的民族自立感。所以不用惊讶,他们与低地省份直到今天仍冲突不断。

想象中的大。由法国垄断经营的鸦片大多数来自印度和缅甸,殖民地政府也鼓励在老挝和越南北部的苗族种植鸦片,并将之贩卖给来自云南的华族商人。20世纪30年代晚期,老挝北部鸦片的生产和销售迅猛发展,白银大量拥入山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老挝与国外的联系阻断,中央预算主要依靠当地生产的鸦片,老挝和越南北部的东京的鸦片产量从1940年的7.4吨激增到1944年的66.6吨。每个人都想从中分一杯羹,包括琅勃拉邦和川圹的皇家商业机构。这也使一部分苗族变得有钱有势。一份由埃里克·皮埃兰托尼(Eric Pietrantoni)于1943年写的秘密报告中反思了老挝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由于邻近的泰国日益强盛自信,鸦片对老挝经济的重要性也就此凸显:“我们估计,组织生产鸦片是让老挝得以生存的唯一方法……无论经济上还是财政上,鸦片种植的控制和扩大对老挝人来说都至关重要。”报告特别指出,虽然西萨日王冯国王强烈反对其臣民消费鸦片,但地方政府很清楚他们上缴印度支那中央预算的鸦片税收的数目。40年代末,早期的皇家老挝政府再度面临鸦片税收问题。

## 起义

一般来说,老挝被认为是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中最驯服的国家。殖民统治给老挝带来了它在近两个世纪都未享有过的和平与稳定。这不但使老挝传统统治阶层彼此联合,而且也意味着在很多地区重建稳定的乡村。虽然农民对法国强加的沉重负担(以税收或劳役形式)感到不满,虽然统治阶层抱怨他们的一些传统特权被剥夺,但法国在老挝的统治得到的支持还是大于反对。

虽然如此,还是有反对。早在19世纪末,老挝南部就爆发了一场起义。参加起义的主要是居住在高地的少数民族,如波罗芬高原上的阿黛族人(Alak)、纳和族(Nya Heun)和拉维族人(Loven)以及越南昆嵩高原上的色当族人(Sedang)。他们的预言家是一个名叫巴米(Bac My)或者昂克欧(Ong Keo)的阿黛族人。有趣的是,他利用佛教来掀起起义,这也可以解释这个运动传播到一些老挝乡村的原因。他的军



队指挥官昂銮(Ong Luang)自称是万象国王的后裔。拉维族人的首领库马森(Khommaseng)和库马丹(Khommadam)也加入进来(库马丹的儿子于50年后加入了老挝共产党)。起义的起因由来已久。占巴塞一直以来是一个以林业产品与乌汶(Ubon)、呵叻和曼谷交易的重要商贸中心,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奴隶交易中心。低地诸国对奴隶的需求导致强壮的高地各族(以色当人、达奥人[Ta Oi]、拉维人[Loven]和嘉莱人[Jarai]为首)经常抢掠、贩卖弱小的民族。他们也从东部平原掠走越南人,穿越大山进行贩卖。1874年,朱拉隆功国王颁布法令废除奴隶制,此后奴隶贸易开始衰退,当法国人试图彻底消灭奴隶制并声称政府控制了高地的时候,遭到了长达几年的反抗。1902年4月,“一大群人”聚集在沙湾拿吉法国军需部门外,他们显然相信面对法国人的子弹可以刀枪不入,结果被打得像鸡蛋花一样。法国人向他们开枪,导致150人死亡。逃走的起义者也遭到了屠杀:1905年,40个拉维人死在了依堡可欧村(Ban Nong Bok Keo)。起义的领导者最终被法国人抓获并处死。像阿奴王起义一样,这场起义给人一种旧世界渐渐来临的幻觉,而不是要形成新世界。后来的民族主义史学家认为,这些起义者并不是第一批民族主义者,他们一直在要求恢复旧的秩序,包括奴隶贸易。

1914年发生在北部的一场起义是在新兴的中国民族主义而不是老挝的民族主义的鼓舞下爆发的。1911年清朝的灭亡和共和政体的建立在中国引起了一系列反对旧秩序的起义,其中很多是无政府主义的。1914年末,一群中国华族从云南进入老挝,洗劫了在桑怒(Sam Neua)的一个法国哨所,并携带着大量现金和武器逃走;他们也成功地洗劫了越南的山萝(Son La)。起义者高举着中华民国的国旗和他们自己的旗帜。当地人的加入使他们的队伍迅速扩大,在加入者中有一些是早已经被法国人取代其地位的显贵。中国起义军很明显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如战争当时正在欧洲迅速蔓延。他们发布了一个公告:“所有的预言者都预言了法国人的灭亡。甚至巴黎也已被德军夷为平地。依靠法国是没有用的。把法国人赶出去,老挝将开始一个幸

福和繁荣的时代,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中国人之所以愿意在北部地区参加起义,是因为法国人试图对华族在老挝北部和越南走私鸦片进行控制,以实现其鸦片垄断。在法国从河内出兵镇压起义之后,为了保护法国免受中国持续动乱的影响,法国人在老挝北部组建了第五军事区,在越南西北组建了第四军事区。

1914年,法国人也面对了保守派在芒新(Muang Sing)的傣仂族人起义。该城于1904年从临近的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傣族曼陀罗中分裂出来。法国人本已经成功说服了当时执政的亲王,但1907年他的一个儿子昂坎(Phra Ong Kham)继位后,该蒙的贵族们为争夺权力展开长时间的斗争。昂坎因法国人削弱了他原本的君权而奋起起义;他逃入西双版纳,在那里与法国人进行了两年的零星战斗,但最终毫无结果。

## 苗族起义

接下来法国人面对的主要起义针对性并不强,甚至和老挝关系不大。这是一次苗族的高地人的起义,发生在1918—1921年,由于萨满巫师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所以一些法国政府官员称这场起义为“疯人战争”(guerre de fou)。18世纪,汉族对苗族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在贵州起义失败后,被迫向南和西南迁移,进入中国南部和印度支那北部。19世纪初,苗族开始占据老挝北部高山地区,他们继续种植鸦片(他们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和其他作物。各种傣族人便采用了他们中文名字的变音“Méo”来命名苗族,在苗族人的方言里常称呼自己为“Hmong”。对于傣族人来讲,苗族与卡人有同样的含义,即他们都比傣族等级低。最主要的区别是,苗族从来不把自己看作同卡人一样低于傣族。他们见识过大清帝国的威势,相比之下,泰国贵族显得微不足道。在查尔平原附近的山区,苗族与衰弱的傣族普安王族们建立了联系,后者很快认识到了鸦片的重要性。

1896年苗族的一次小起义导致法国委派了一名代理区长(kiatong)来支持这个区的摩瓦(Moua)宗族。这个管理合并的尝试突

出了苗族和傣族一个重要的社会差异。苗族不是按照蒙(或更小的单位如区或村)而是按照血缘和宗族来组织的,这也就方便了他们为寻找新土地种植罂粟而不断地搬迁。像傣族人的地区一样,这些血缘家族或宗族能够在一个强大领袖的领导下聚集而形成暂时的联盟,但同样,由相同血缘组成的村庄在决定搬迁的时候也可能分道扬镳。定居村庄只是庞大政治结构中的一部分,这在苗族人中是例外而不是习惯,直到今天,这种相对的无政府状态对于那些国家建设者而言仍然是令他们头疼的事。

1917年在越南的奠边府(Dien Bien Phu)地区,一位名叫巴柴(Pachay)的苗族人告诉他父亲:“父亲,我已经着魔而且心绪不宁,我看到了来自华泰(Houa Tai)的幻象,我们都侍奉的救世主命令我领导苗族人反抗压迫我们的腐败的傣族人。”不久,他和他的小队人马击退了第一批法国巡逻队并将几个傣族人的小村庄烧毁。法国军队到处抓他,但他及其支持者穿越崎岖的山区逃到了老挝,然后又回到越南召集苗族和瑶族,传布救世主的信息:一个“虔诚的国王”将要建立一个苗族王国。他们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来赢得支持者。追击起义军的法国部队逐步地分裂巴柴的支持者,由于法国人的地位在傣族首领之上,一些苗族首领便直接与法国人讲和。巴柴最终被亲法的卡人抓获并处死。卡人在苗族人那儿得到的待遇并不比他们在傣族人那儿得到的好多少。

巴柴起义只是一次始于云南南部并向越南北部山区延伸的时代洪流的一个缩影。那是苗族人口在这些山区迅速增长的产物,这直接挑战了西双楚泰和普安省傣族亲王们更受认可的权力。这次起义是一次在山区重新分配权力的尝试。傣族人想用以前剥削卡人的方式来剥削苗族人,他们使用法国人带来的新行政权力,不但是为法国政府严格收税,而且也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传统特权,尤其是在利润丰厚的鸦片贸易中的特权。起义表明,新来的苗族已经受够了。当一些法国人将整个起义视为“疯狂”,那些了解背景的人却清楚地理解问题是什么。H. 鲁(H. Roux)上校参与了对起义的镇压,他在不



巴柴起义的时候,一些法国评论员很同情苗族受低地老挝人欺侮的遭遇。但法国殖民政府却把苗族视为和平与稳定的破坏者,并要求迅速镇压苗族起义。此外,一些苗族氏族首领也将巴柴视为他们权势的威胁。农黑(Nong Het)地区的区长罗比瑶(Lo Bliá Yao)与法国专员关系良好,并且认为与法国人合作而不是反抗,才是光明大道。因此,他与法国人协作一起镇压了起义。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识时务的选择。

久之后的报告中写道:

那些渺小的地方首领又懒又贪,将苗族视为可任意宰割的牲畜。有时,苗族流露出来的尚武倾向的确事出有因:苛捐杂税、大量征收鸦片,以及无偿征用马匹。而且这些卑鄙的首领还总是用法国人来威胁这些不幸的苗族人。<sup>10</sup>

巴赛莱梅(Barthélemy)作为印度支那行政事务的官员,在一篇报告里就这些事件发表了见解深刻的评论:“老挝的行政组织方式弄得好像只有老挝人在此居住,实际上并非如此。法规是老挝人的,实施法规的高

59 级官员也是老挝人,那些省级政务委员会(我们未来顾问委员会的雏形)里竟然没有一个高山民族的代表。”<sup>11</sup>他又补充说,依靠寺庙学校就意味着大多数人被排除在这个教育体系之外,因此不能够理解本国的语言。天主教神父萨维纳(Savina)在他稍后写的报告(很多年都被作为秘密文件)中问道:“看到苗族憎恨傣族,傣族也憎恨苗族,我不禁要问为什么?看到傣族人拥有土地并由与他们自己同族的首领统治,而苗族却不能如此,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事实上,苗族主要是憎恶傣族人和老族人的统治,他们希望能够与法国政府直接对话。川圹省的农黑地区在罗比瑶的领导下实现了这个愿望。他已经与法国人合作了一些年,而且还抓获并杀死了巴柴的一个主要支持者。罗比瑶的长子宋投(Song Tou)被任命为区长。苗族这种突破老挝限制而诉诸武力的做法在未来成了一种模式。

### 殖民地社会

与越南不同,老挝从来没有大量的白人移民,这就形成了另一种殖民地社会。白人移民社会一如既往地建立在否认土著居民基本政治权利的基础上,白人霸占了土著居民的土地,他们是声名狼藉的种族歧视者,当土著居民反抗他们时,种族歧视便在白人移民心中熊熊燃烧,正如他们在越南一样。1907年的统计显示,在老挝只有189名法国人,其中17名为女性。这个统计数目也包括混血儿,在法国控制老挝14年之后有49名混血儿。据统计,当时老挝的总人口是585 285,虽然这个数字的准确性有待进一步探讨。在老挝的法国人不过几百,大多数都在殖民政府里供职,且大多聚居在主要的行政中心。在一些省里,从事监管工作的法国人只有几个。

60 一些法国移民梦想他们能居住在更凉爽的川圹省平原上的牧场里,但这终成泡影。一些人开始在南部波罗芬高原上从事咖啡种植,但也只是少数。定居老挝的法国人要么做些小买卖,要么索性退休,如果他们娶了老挝妻子就更是如此了。路易斯·查尔斯·罗耶(Louis-Charles Royer)在他1935年的小说《老挝女人——凯姆》(*Kham, la*

*laotienne*)中这样描绘殖民地社会的典型场景:

一些人就像普通士兵一样等着离开;他们只想着这个,对他们要离开的殖民地没有任何兴趣;而另外一些人却是真的爱上了老挝,但他们已被殖民地化了。

他们已被当地的懒散所腐蚀,就这样过他们的日子;他们所要求的只有清澈的天空、美味的水果、新鲜的饮料和容易得到的女人。

第一类人保留法国人的习惯戴着假衣领;第二类人,穿着帆布鞋到处走,在家里则赤着脚……一些人吸食鸦片是为了驱散黑夜里的忧郁,他们沉浸在一种舒适的懒散中,不愿再出来。他们在老挝就是这样的。<sup>12</sup>

老挝殖民地社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在法兰西帝国内外种族主义观念的影响,但这些观念却经常被建立共和政体的理想所缓和。法国殖民地社会被分割成不同的种族和不同的阶级。真正烦扰那些有法国教育背景的土著老挝统治阶层(大多是贵族)的是:他们要忍受底层法国人的种族优越感。老挝国家现代化领导者之一的佩差拉亲王在他的回忆录里将这帮人称为“殖民地的渣滓”。殖民地社会世俗而虚荣,特别是那些带着妻子来的人,贫穷的白种人对他们的种族优越感是一种打击,令他们备感尴尬。老挝的法国社交圈很小而且到处充斥着闲谈,诸如妻子们对丈夫们抱有野心之类,虽然老挝的职位被认为是最没有前途的殖民地职位。然而,表象不得被维持。老挝最有传奇色彩的政治家之一——卡代·敦·萨索里特(Katay Don Sasorith)后来在其《一个巴色小学生的回忆》(*Souvenirs d'un Ancien Ecolier de Paksé*)一书中给我们展示了那些浮夸的场面:

61

62

尽管他们人数少,但他们既拌嘴也争吵(不是为政治问题而为永恒的妒忌问题),而且甚至经常动起手来,给老挝人民增添了许多乐趣……然而,这一切最终和解了,至少表面如此。此后一些日

子里，所有的法国侨民又都手挽手地沿着城市街道散步，无疑是向人们展示：法国人根本不在乎生活中的这些小插曲。<sup>13</sup>

卡代在回忆录里描绘了他和一帮法国男孩的友好关系，这帮法国男孩的老挝语说得“比母语还要好”。的确，数年后卡代体会到了这个事实，他比那些被限制在省城的法国小官员的子女们更懂法语。卡代的父亲在巴色有家餐馆，卡代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看尽了法国人的人性弱点，因而不会被他们虚妄的优越感所吓倒。



法国殖民官员坐着，他的老挝和越南助手们则站着，以此来标明他们不同的身份。宋金·宁(Somchine Nginn)站在官员的左边，系着条纹领带。在老挝法国政府里，大多数的职员和政府官员都是越南人。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变化。

## 作为现代化样板的法国

与此同时，对于许多老挝人来说，法国是文明之源。的确，共和制

殖民主义的核心推动力是法国文化的传播。1906年,年轻的宋金·皮埃尔·宁一到法国就被彻底征服了,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看到马赛就感觉像是到了天国,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这么美丽的城市。”1943年,宋金·皮埃尔·宁在《奇纳瑞》(*Kinnary*, 最早的老挝语和法语并用的杂志之一)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我如何看法国?》,他在里面回忆道:

在巴黎,我只要看到新奇的东西就欣喜若狂。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和来自印度支那的其他15位同志一起住在殖民地学校,卢森堡公园就在它前面。公园里面直直的道路两旁都是雕像,透过我房间的窗户,晚上可以看到成群的优雅男女在那里散步。

63

我如何为你们描述埃菲尔铁塔、纪念碑、现代艺术博物馆、绘画博物馆和雕塑博物馆呢?……参观这些博物馆的几分钟里带给你的知识要比在学校里几个月学到的还要多。

对于装饰华丽的剧院和电影院,我能说什么呢?这个城市的兴奋和活力与我们老挝城市的宁静形成强烈的反差……<sup>14</sup>

宋金·皮埃尔·宁看到“真正的文明”的兴奋是发自内心而又真实的。帝国的巴黎就是为了打动参观者而设计的,它的确做到了。宋金·皮埃尔·宁的父亲是奥古斯特·佩维的柬埔寨向导兼翻译,与其老挝妻子定居在琅勃拉邦,他把对法国的爱表现在儿子身上,为儿子取名皮埃尔。有其父必有其子,宋金·皮埃尔·宁用赞歌来结束他的文章:“法国是一个强大而又慷慨的国度。我们爱她,因为她是我们的养母,因为她既给予我们财富支持又使我们从她的文明中受益。”在如今这个对殖民主义成见颇深的后殖民时代里,这样的观点也许看起来很奇怪,但当年很多去过法国旅行的学生都认为这是一次颠覆性的经历。

老挝的学生和在老挝的法国人之间的关系相对融洽和密切,老挝



人很欣赏所见到的法国中产阶级的礼貌。奥古斯特·佩维如今已成为传奇人物,他在殖民地神话里“征服”了老挝人的心,将他们从暹罗人手中拯救出来,他也曾在巴黎的家中接待老挝学生,其中就有宋金·皮埃尔·宁和他的弟弟。与宋金·皮埃尔·宁同时在巴黎学习的佩差拉亲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动提出要组建一支由老挝士兵组成的小分队来为“家园”战斗。由于老挝更需要他的帮助,所以这个提议被谢绝了。法国式的举止和思考方式给老挝人(甚至包括那些从没去过法国的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老挝后来的首相培·萨纳尼空(Phoui Sananikhone)在其 1967 年的回忆录里这样谈论他欣赏的事情:如法国人的守时、官员的着装规范、高官的清廉、审判过程的相对公正等。他也回忆了自独立以来各种事情的进展。

西萨旺·冯国王是第一批在殖民地学校学习的老挝人,他也认为旅居法国对他启发很多,在法国档案中,殖民地官员关于他对法国忠诚的报告屡屡出现。琅勃拉邦的王族在政治方面承受了法国的恩情,这种“蒙恩”的感觉也体现在私人交往上。1927 年,西萨旺·冯国王在收到佩维的遗孀祝贺他被授予“大十字军团荣誉勋位”的信后回复道:

我怀着深深尊敬和感激之情怀念您的丈夫,举世皆知,他是我祖父温坎国王陛下一位名副其实的密友。

他非常真诚地热爱我的王国,并通过脚踏实地的研究通晓了王国的各个方面,经过我祖父的同意,他将王国置于最伟大的法国的保护之下。<sup>15</sup>

1932 年,佩维的雕像同时树立在他的家乡布列塔尼的蒂南市和万象,第二年在琅勃拉邦也树了一座。1939 年,西萨旺·冯国王授予佩维的遗孀“万象十字骑士勋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撕毁了“老挝保护者”的外衣,佩维的神话及其在老挝的“征服人心”才终于不再有市场。

## 种族主义和性

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现实中,殖民地背景下的种族主义都无法摆脱与性的联系。随着殖民主义慢慢逝去,殖民地社会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人们不再容忍法国男人和老挝女人的私通,更别提婚姻了。倘若拓殖者中单身男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这种私通便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那些被派遣到外省工作的男人。越南称呼有这种私通关系的女人为情妇(*congāi*),这个称呼在印度支那普遍使用。1912年,当斯特巴(*Strarbach*)和波第尼(*Baudenne*)出版了他们的小说《老挝妻子特姆帕》(*Sao Tiampa, épouse laotienne*)时,在殖民地社会里大多数人普遍鄙视这种关系。小说里的主角维波德(*Vébaud*)带着他来自内地的老挝妻子去参加一个万象最高专员举办的聚会,他在那里偶然听到两个法国人在闲聊:

“看那个情妇:你认识她吗?无疑是某个欧洲男人的女人。”

“亲爱的朋友,你从哪里来?居然不认识特姆帕(*Sao Tiampa*)?她是年轻的维波德仁慈的主宰。”

“真的吗?是她,牵着他的鼻子到处走的多么可怕的妻子?她使他发疯的方法真是有趣。湄公河两岸都在流传她的事情。”

“她还不赖……只需要几美元就能得到她的爱情……”

“比我们的小仆役和秘书们便宜多了!”

“哦!对不起,别误解我;这是真爱……”<sup>16</sup>

被这样的谈话所刺痛,他又羞又怒地拽着特姆帕离开了。流言当然不能阻止人种间的私通,它只是对种族屏障的一种监督,其他法国人比维波德更加玩世不恭。在《老挝女人——凯姆》一书中,土著卫队的督察对刚到琅勃拉邦的新人传授他得到女人的方法:“我不买她们,我租借她们。我对她们的父母说:我每个月会给你们20个皮阿斯特,你的女儿每天到我的小屋来放纵自我。”<sup>①</sup>

① 此处“放纵自我”的原文为 *faire la sieste*。——译者注



“韵诗(Sao Si)——孔埠的小歌手”，另外一张明信片这样形容她。以袒胸露乳的热带地区妇女为图案的明信片说明了，通过将殖民地人民女性化，可以使之处于从属于来自宗主国的殖民地男性的地位。即便在那时的法国，妇女的裸体照片也被认为是淫秽的。在殖民地里，权力和性被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柬埔寨和越南的历史学者都对将殖民地人民女性化的问题进行评论，并探讨了殖民地文学和绘画作品是如何用妇女形象来喻指那些被法国人的男子气魄和冒险精神所征服的被女性化了的殖民地人民。大量关于老挝的文学作品也都表现出了上述特征，人们被法国作家几近偏执地提及“未婚少女”惊得目瞪口呆。的确，在《老挝女人——凯姆》一书中，作者对那些来自印度支那各地的殖民地官员如何“搜寻琅勃拉邦女孩”进行了罕见的自我指涉的不满。作者说：“宣传了老挝女人的美和气质是你的小说的过错。”也有人创作诗歌，如安德烈·埃斯科菲耶(Andre Escoffier)于1942年创作的《琅勃拉邦的女儿》(*Les Eilles de Luang Prabang*)，其中一部分这样写道：

她们的微笑绽放在每个房子里，  
这是她们温柔之乡的爱情圣殿，  
其间的少年们  
对他们的女王都有一个愿望，  
和着笙簧的节奏，  
他们唱着他们的歌。<sup>17</sup>

1907年，在殖民地已经有了不少混血儿，由于模糊了种族界限，这些人的人种界定成了难题。在《老挝妻子特姆帕》中这有点戏剧化，特姆帕

怀孕了,但这却带给男主人公维波德另一个难题:这是个混血儿。他用那个时代对于人种问题的典型思路来思索这个孩子的命运:“在我们文明的环境里,这个混血儿将会怎样?他的体内蛰伏着原始的野性本能,它将响应那持续不断的返祖召唤。”在某些环境里,混血儿能得到较高的地位,所以卡代在他的回忆录里记录了他们有多么看不起老挝人,宋金·皮埃尔·宁也观察到,至少在早期岁月里,他们在殖民地官僚体系里的地位要比老挝人高。相应地,他们经常被法国人看不起,因为他们血统不纯。在一个被种族纯正问题困扰的环境里,纯种的老挝人要比混血儿优越。这种观点在老挝民族内部引起共鸣。早期著名的私通事件发生在老挝贵族梭发那·富马(Souvanna Phouma)亲王(后来长期担任老挝首相)和一位混血女人之间,这震惊了琅勃拉邦的宫廷社会。梭发那早年娶了琅勃拉邦的公主为妻,他在法国学习归来便在琅勃拉邦政府当工程师,但这个妻子拒绝跟随他去万象。于是梭发那于1933年娶了川圻的混血儿艾琳·阿拉德(Aline Allard)。

后期法国殖民主义中的联合思想,是对种族观念的一种似是而非的让步,他们可以不再坚持殖民地,或是应该沿着与法国同样的道路发展。他们将按照自己的“种族”或文化的要求逐步发展(对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种族”和“文化”是可互换的概念)。面对白人移民对土著文化挑衅性的藐视以及中产阶级化的政府官员们对土著文化的漠不关心,1898年成立于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对土著文化的探索和复兴产生兴趣并收获甚丰。该学院的学者有时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将他们的研究对象作为彻底的“他者”进行“东方化”,不过它还是令政府的高层和法国对柬埔寨或老挝文化产生了新的尊重。这引发了对古代纪念碑(如塔銮)的整修,也增加了对土著王国的支持和依赖。再一次将柬埔寨和老挝从被邻国侵略的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的,是一群学者。这一回,他们拯救的是文化。考古学家珍妮·屈西尼耶(Jeanne Cuisinier)在其1928年的文章中哀叹道,老挝在建的新塔都是由越南工匠修造的,这导致了风格上的改变。在万象勘测那些损坏日益严重的庙宇时,屈西尼耶“为老挝的佛陀感到非常遗憾。它们正在衰亡:老挝人正在

忘记他们的传统，而法国人却不知道这些传统”。<sup>18</sup>

## 殖民地城市化

法国人处心积虑地想要利用古都的声望，于是万象成为法国人的行政首府。拉克兹(Raquez)在他引人入胜的《老挝人大事记》(*Pages Laotiennes*, 1902)一书中描述了法国人发现阿奴王王宫位置的经过，以及最高专员如何计划在那儿修建自己的公馆。然而，当时的公馆都很简陋：“4年前由万象第一任行政官员皮埃尔·莫林(Pierre Moria)修建，是一座建在木桩平台上宽敞的木头房子，以茅草覆盖屋顶。”莫林在筹划第一次整修塔銮(万象的宗教中心)的行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在阿奴修建的另一座庙宇——西萨格寺(Vat Sisakhet)里，法国人已经开始实践老挝显贵们吟诵的忠诚誓言：

我们万象的君主拉瓦萨(Paya Si Savana Lavoutsa)坐在大象上，他被八个龙头和科达崩(Paya Si Kot Ta Bong)的神灵守卫着。蒙主和万象领土的管理者亦如是。

我们的儿子，仆人，附属国，警察，保护我们及我们的城堡、官殿、分区和乡村的士兵，佛塔的守护者，都来对万象专员(皮埃尔·莫林)代表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发出忠诚的誓言……<sup>19</sup>

以前，人们在国王面前发出这样的誓言，现在其中增加了对法国忠诚的词句，并在琅勃拉邦成为延续的惯例。

70 老挝太穷以至于负担不起法式建筑物的奢侈消费，这种建筑物一度出现在西贡和河内，在金边的规模则更小一些。1914年在琅勃拉邦，法国人为西萨旺·冯国王修建的宫殿也许是现存最令人难忘的不朽的建筑杰作之一。同万象的迅速扩大一样，其他城市的行政中心(琅勃拉邦、他曲、沙湾拿吉和巴色)也在扩大，一种明确的城市范本出现了。殖民地官员住在带有大花园的两层混凝土别墅里；商业中心居住着越南人和中国人，他们的房子由砖和少量的水泥建造；老挝人的住房是用木头在支柱上建造的，四周是菜园和椰子树；贫穷的越南苦力则住

棚屋,由竹子和稻草建造。当老挝的统治阶层变得富有后,他们开始仿造更高级的法国别墅样式修建住房,并增加了老挝的装饰配件;这种房子今天在琅勃拉邦最容易见到。

城市中心相对较小,且居住人口以越南人为多(琅勃拉邦除外)。下面的表格列出了 1930 年和 1943 年城市区域的面积和人口构成。

城市、地区	老挝人	%	越南人	%	中国人	%	其他人	%	1943 年 合计	1930 年 合计
万象	9 570	41.5	12 400	53	900	4	330	1.5	23 200	15 800
琅勃拉邦	3 000	61	1 400	28	480	10	70	1	4 950	5 400
他曲	800	10	6 900	85	300	4	100	1	8 100	3 400
沙湾拿吉	850	16	4 000	72.5	450	8	200	3.5	5 500	4 500
巴色	1 000	14	4 500	62	1 700	23	100	1	7 300	3 400
川圹	240	11	1 500	72	300	15	60	3	2 100	1 400
合计	15 460	30	30 700	60	4 130	8	860	2	51 150	33 900

修订自埃里克·皮埃兰托尼(Eric Pietrantoni), *La Population du Laos en 1943 dans son milieu géographiqu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Études Indochinoises (Saigon)*, N. S., Tome XXXII, No 3, 3 trim, 1957, pp. 7-8。

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越南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导致在老挝的越南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因为从越南迁移到老挝没有任何障碍。这导致了 1930-1943 年城市的快速增长,并引起了一部分老挝统治阶层的担心。40 年代,老挝民族主义的重点就是反对越南人。

## 民族主义

法国人统治老挝的时候,位于地图上标示为老挝境内的人们还没有老挝国的意识。甚至对于法国人来说,老挝在那时也只是地图上的一块疆域,而不是一种社会性、历史性的存在。是法国人把现代国家的观念带到老挝,在随后的 50 年里,这个观念在老挝人民心中生根发芽。

国家主办的教育通常是传播国家观念的决定性传播媒介,但在老挝,法国人对这方面的努力却最小。寺庙学校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仍在很大程度上将非佛教徒的少数民族排除在教育之外,此外,佛教徒教

72 育需要宗教场所,它们沿朝圣之路分布,并不全在老挝境内,而是与暹罗版图有所重叠。在拉玛六世(Rama VI,1910—1925年在位)当政时期,一种融合了君主制度、佛教思想以及国家观念的强有力的保皇派民族主义思想在暹罗得到了完美诠释,这将对老挝产生深远影响。将老挝佛教收归国有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将西萨格寺作为老挝佛教徒礼仪中心,或者用最高专员的话来讲是“老挝佛教总教堂”。20世纪20年代末的僧伽改革试图通过制定机构制服的标准来凸显民族特征。1931年法国人蓄谋改变以往从暹罗学习佛教知识的惯例,在万象修建了一所佛教徒学院,1932年在琅勃拉邦王国又建了一所。(然而,这两所学院的建立却是殖民地国家范围继续分裂的象征。)第一所这种类型的学院于1930年在金边修建,鼓励老挝的僧侣去那里;柬埔寨的僧侣在老挝建立佛教学院的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用这种方式,法国人使这两个信仰小乘佛教的殖民地目光从暹罗移开,互相盯着对方。

20世纪20年代早期,由法国人发起,编撰和出版了第一批老挝语基础历史教科书,从中就能看出老挝正将视线从暹罗身上移开。对于现代读者,这些教科书最让人瞩目的是:这些书在开始部分就讨论了老挝南部孟-高棉的少数民族及其与占婆古代文明的联系。这些书巧妙地弱化老挝人来源于西部更广阔的傣族世界的事实,而是试图将它与印度支那的历史联系起来。第一批用老挝语编写的教材于1918年开始编写,第二年,宋金·皮埃尔·宁帮助撰写了老挝语学习的第一课。这些教科书的重要性在于,这是第一部将前现代时期的一系列国家及其国王作为20世纪老挝的自然前身予以呈现的常规民族史。这个主题思想,即使在老挝国内也很少有人接受。接下来在创造老挝民族史过程中的重要一步是保罗·伯兰哥(Le Boulanger)的《老挝的法国史》(*Histoire du Laos Français*,1931年),它成为其后所有民族主义老挝史的原型。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伯兰哥感谢了佩差拉亲王,是后者敏锐地意识到:在邻国暹罗,民族史已经成为时尚。在学校里,学生们上的第一课就是认识潜在的民族标志,如老挝地图和国旗的概念。

73 老挝的统治阶层大都是贵族,他们首先接受法语教育,再去河内、

西贡或法国接受高等教育,而这种教育却很少教他们关于老挝的事情。在那时的法国学校到处洋溢着快乐的法兰西民族主义。来自殖民地的学生学到了间接的国家概念,这不需要花太多的想象力来将这个概念转移到他们的祖国。然而在老挝,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人们仍根深蒂固地认为法国人拯救了老挝民族使之免于灭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们特殊的亲密关系。但是,考虑到当时种族主义思想的传播,上述认识正逐渐失去市场,有文化的老挝人正变得日益了解(主要是通过报纸)邻国暹罗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导致暹罗于 1939 年改国名为泰国。20 世纪 30 年代,老挝人在考虑老挝的民族主义问题时所面对的最关键的问题是老挝语言的标准化,泰国语之前同样面对这样的问题。当西拉·维拉旺于 1935 年撰写他的《老挝语语法》时,由于老挝的宗教文本都是用“外国字母表”来书写的,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将泰语语法书作为模型。

作为在老挝统治阶层中唤起民族觉醒的媒介,土著顾问联合会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然而,这个精英队伍非常弱小,政府低层的很多老挝人仍然目不识丁、消息闭塞。像佩差拉亲王一样民族主义倾向日趋强烈的政府官员、泰国民族主义和日益激进的越南民族主义的多重压力之下,法国人开始意识到老挝统治阶层的衰败。1930 年,一觉察到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萌动,最高专员波士克就警告可能已被迷惑的土著顾问联合会要反对那些“既不属于你的国家也不属于你的种族”的越南人。虽然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一些法国人要求引入“精力充沛”的越南移民来加速老挝的经济发展,但对越南骚乱的恐惧以及法国拯救老挝免于灭亡的声明,总能使这项提案胎死腹中。然而,法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需要那些愿意自救的老挝人。

法国这些年也发生了复杂而又重要的变化。在 1931 年巴黎的大殖民地展览上,老挝和柬埔寨、越南都表现良好。800 万人观看了展览,这些展览创造了有利于帝国大都会观点的潮流。但呈现的影像遵循的是那些欧洲民族文化观念,由于印度支那的旅游业日益重要,所以旅游指南中也充斥着这些观念。20 世纪 30 年代,人们看到法国人正努力重建





1931年佩差拉亲王(右三)在万象佛教学院开幕式上。佩差拉亲王对老挝文化、艺术的保护也很积极,同时努力创建学院以使老挝人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命运。

老挝的“民族遗迹”,如万象的玉佛寺。1936年5月,主张改革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政府的当选是一个转折点,不是因为它明确反对殖民,而是因为它要使殖民主义“人性化”,因此便在整个帝国内部任命了许多开明的政府官员。在这个背景之下,厄特罗普于1937年呼吁培育一批能领导青年一代的老挝统治阶层。但最后,人民阵线也只是突出了共和国与殖民主义的矛盾,因为它为殖民地描绘了一个新时代却又不能实现。在一些像越南这样的国家里,已经有了成熟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使得他们不再相信法国。1940年8月,德国打败了法国,印度支那的殖民地划归日本,这给予庄严的法兰西帝国致命的一击。

### 泰国挑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然而,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另外一个挑战开始逼近在

老挝的法国人——暹罗将国名改为泰国,进而企图统一所有讲傣语的民族。这主要是针对生活在英国人、法国人统治下的傣族人的宣传运动,没有迹象表明它将通过武力来实现。不过,在法国人和泰国人持续多年的边界谈判破裂之后,一场简短的战争于1940年12月至1941年1月爆发了。泰国在新盟友日本的支持之下,试图收回他们在世纪之初被抢夺走的湄公河西岸领土。日本仲裁了争端并声明:湄公河是“天然的”边界,因此南方的巴塞和北方的沙耶武里(Xaignabouri)重归泰国所有。这使法国在印度支那内部的威信遭受重创。

75



印度支那总督于1941年在琅勃拉邦王国扩张的时期视察琅勃拉邦。从左至右依次为:大王子诗梳风(Ratsavong Sisuphan)、总督兼海军上将德古(Decoux)、西萨旺·冯国王和老挝最高专员M.布拉赛(M. Brasey)。

这种威望的下降在琅勃拉邦王国体现得最明显。琅勃拉邦王国虽仍忠诚于法国,但多年来在法国的保护下巩固发展,对法国在老挝和印度支那的势力的变化有着敏锐的感知。西萨旺·冯国王的儿子萨旺·瓦达那(Savang Vatthana)亲王在法国学习政治和法律后,回国成为王储兼国王顾问。法国的旅居深深铭刻在他心中。他理解现代世界的政治,知道如何与法国人协商。听到失去沙耶武里省的消息,国王的痛苦

76

被琅勃拉邦王室转变为有利因素,作为补偿,他们要求整个老挝独立。1941年3月,一份秘密的法国文件承认此事是“大多数老挝人民心中潜在的志向”,但法国人不能赞同,主要是担心南方柬埔寨王室的忠诚,如果要柬埔寨附属于其他王室,它可能会选择曼谷。失去巴塞使得法国人对南方的控制更加薄弱。因此,1941年8月21日在万象,萨旺·瓦达那亲王和最高专员罗克斯(M. Roques)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川圹省和万象省隶属于琅勃拉邦王国,并将琅勃拉邦王国与柬埔寨和安南(越南北部)置于同等的受保护国地位。法国人也明示,在新协议巩固之后他们不反对王国的向南扩展。与此同时,王国政府开始着手实施意义深远的现代化,废止了国王的议会而代之以部长制。佩差拉亲王



ມອສໂມນໂຮມ ທີ່ຕ້ອງການຮ້າງຮຸນ

这是1941年法国与暹罗发生冲突之后,《伟大老挝》上的一幅插图。上面这样写道:“曼谷的猴子也想穿上衣服充当士兵。”

最初来自琅勃拉邦,由于在万象多年,已经成为法国政府里老挝人中地位最高的官员,因而被举为首相。他的表兄弟苏万纳拉(Souvannarath)亲王成为经济部长,而国王的弟弟塞拉(Setha)亲王则成为内务部长。贵族出身的培·萨纳尼空成为司法部长,平民出身的前甘蒙(Khammouan)省地方官欧统·苏万纳旺(Outhong Souvannavong)成为财政部长。一个以萨旺·瓦达那亲王为首的国王的私人顾问委员会也成立了。

77 新的协议是想停止在“正宫”(vang na)和“主宫”(vang luang)之间延续多年的对抗。自从1904年西萨旺·冯越过佩差拉的父亲被选继承王位为储君开始,这一对抗便产生了。汶孔王那时已是副王,年纪更大,在当时的体系下已经被批准继承大城府,国王一去世便可即位国王。然而,汶孔被法国人忽视,无疑是因为他已经成为暹罗忠实的封

臣,并骑马率军反抗云南的华族,而年轻的西萨旺·冯却是在法国接受培养。1921年汶孔去世后再也没有任命副王,好像这个职位慢慢被遗忘,就像19世纪后期朱拉隆功国王统治下一样。然而在1941年,佩差拉重新获得他父亲作为“第二王”(即副王)的旧职。通过他在法国政府里行使的权力,佩差拉作为“万象王”而出名,几乎成为这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老挝人。1923年,他成为老挝行政事务的首脑,并以这种身份组织了土著顾问联合会。1927年,琅勃拉邦的国王生病,他抓住时机整顿了一些王国的事务。1932年,他被派往印度支那经济与财政权益委员会供职,同时又成为老挝佛教委员会的首脑。就职期间,他忙碌于老挝各地,多方联络,分发资助,在整个老挝逐步拥有了大量的追随者,而国王却出入于一个更为有限的圈子。现在看来,佩差拉亲王当时显然知道1941年的王国重组与君主立宪制的形成极为相似,正如在泰国发生的一样,而他将成为政府首脑。然而,由于在这件事情上缺乏透明,后来导致了他和琅勃拉邦王室之间严重的误解。

佩差拉地位的上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由于他在琅勃拉邦的首相就任典礼是自从法国人到来以后,第一次真正盛况空前的壮丽庆典。来自老挝全国各地的省级地方官员(不只是琅勃拉邦的官员)被邀请参加仪式,仪式持续几天,向全老挝宣布了琅勃拉邦君主国的中心地位。来自老挝其他地方的官员无疑被隆重的庆典仪式征服了。培·萨纳尼空当时是万象的一个年轻官员,他描写了大象和官员们的游行队伍是多么壮观,官员们身着传统的节日盛装,上面挂满了奖章,身后跟着老挝传统的管弦乐队。

78

### 法国推动民族主义

1941年早期,法国人草拟了一个行动计划用来对抗泰国的挑战。舰队司令德古写信给最高专员罗克斯:“那些很少费心去看关注外部世界的老挝人必须意识到,从现在起他们属于伟大的老挝民族……”他还继续讲到了文化的“复兴”。<sup>20</sup>这种类似圣经传教的意象也被应用到对

行政学院(Ecole d'Administration)的改进上：行政学院应该是一座“老挝民族思想的殿堂”。过后不久，人们终于意识到教育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老挝在1940—1945年间创建的学校比过去40年创建的总和还要多。另外一份法国的形势报告写道：“如果受保护国的政府不能成功地培养老挝人独立自主的品格(至少在那些已经受过教育的人当中)，那么老挝人就会日益被邻国吸引，而这种形势将会带来新的困难。”

79 主管这项工作的是老挝教育机构的领导鲁锡(Charles Rochet)，他被授权组建一个宣传部门，其主要目标是“使老挝人意识到一种民族精神，然后逐渐地实现国家道德规范的统一”。这项政策最主要的工具是一份老挝语报纸——创刊于1941年1月的《伟大老挝》(Lao Nyai)。这是一份不定期的双周报纸，印刷数千份并免费发放。宋金·皮埃尔·宁、卡代·敦·萨索里特等都热心参与这项事业。鲁锡在其回忆录《老挝国》(Pays Lao)中，大致描绘了某个与报社相关的老挝社团的一次典型会议上的气氛(老挝社团在全国各地成立，主要成员是政府公务员)：

第一盘菜刚吃完，晚会主席挠特(Nhot)先生就召集与会的同志们开始工作。他站起来，用洪亮的嗓音盖过人群的喧哗：

“现在是报告的时间了……我们将从文学委员会开始。腾恩(Tieng)先生请发言。”喧哗声平息下来。每个人都从口袋里拿出一些文件准备发言。腾恩站了起来：

“在上个月，文学委员会开会三次。第一次会议主要讨论诗歌比赛；来自所有省份共有31件参赛作品。评审委员会最后议定了获胜者。”

他是谁？大家都想知道。腾恩犹豫了。他有权泄露吗？……大家最终说服他，他揭晓了获胜者的名字：侬(Nong)，来自老挝南部一个年轻的公职人员。大家都鼓掌。然后大家又问诗的名字。腾恩宣布：

“这首诗名为‘老挝民族’。”

掌声雷动。大家又要求朗诵一下这首诗。但挠特先生说：“不，现在不行。首先我们要作报告。”<sup>21</sup>

但是报纸的内容从不被允许偏离法国人的政策，也不允许展示明确的民族主义，它最重要的功能是逐步向读者灌输老挝的空间感，并在其内部创造认同感。报社开展诗歌比赛来歌颂老挝文化和历史，开设专栏来宣传现代老挝人从澜沧时代开始的“光荣的血统”。1942年修复玉佛寺的落成典礼被称为全面革新的象征。玉佛寺与万象最重要的佛塔——塔銮的形象一道成为在报头旁边的象征性图案。一首新近创作并录制的歌曲

“老挝颂歌”(Hymne Lao)也在报纸上做广告：“第一次一个重生的老挝在留声机里唱出，想到明天从孔埠(Khong)岸边到丰沙里(Phongsali)失去的山，同样的音调在我们心中奏响，我们听到的正是我们民族的声音。”

新兴的老挝民族主义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将老挝人和泰国人区分开来。泰国人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已经超过30年，在最近从曼谷传出的泛泰声明(Pan-Tai Claims)中达到了顶点。但是像所有的基于旧式曼陀罗的声明一样，其形势具有两可性。老挝人果然开始发表相反的强硬陈词，包括对呵叻高原上“失去的领土”的主张。《伟大老挝》几乎从不涉及这些事情，仅在讨论老挝语言的性质时会拐弯抹角地提到一点。在这一时期，卡代·敦·萨索里特开始崭露头角，他是为老挝民族主义说话的人中最善辩者之一。在他的文章，尤其是一本1943年出



这是1943年《伟大老挝》刊登的一幅漫画。漫画的顶端写着“健康的身体”。指示牌的左边写着“花天酒地”，右边写着“现代化”。漫画的底部写着：“为了国家的现代化。”

80

81

版的小册子《老挝字母表和写作》(*Alphabet et écriture Lao*)中,他把目标转向泰语并声明:不但素可泰的兰甘亨(Ramkhamhaeng)国王是一位老挝国王,而且当时通常被认为“优于”老挝语的泰国语言,事实上源于老挝语!卡代宣称:“我们见到过具有典型泰国特征的历史遗迹吗?没有。据说甚至泰国人自己当谈到古老的传统和他们古老的世俗文学的时候,都要提及古老的老挝传统——老挝的经典文学。”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声明不比那些曼谷制造的相反的夸张的声明更准确,然而它们却表达了一种自信和热情奔放的老挝人的民族主义。

82 考虑到琅勃拉邦王国最近的扩张,以及法国人的非正式保证(王国在未来能扩大),《伟大老挝》在早期岁月里对西萨旺·冯国王的运动起了重要作用是不令人惊讶的。为了安抚南方的忧虑,国王于1941年在前往金边的途中,首次造访他曲、沙湾拿吉和巴色,报纸上给予了报导。但是王室的行动不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人们必须记起的是,即便在1932年暹罗推翻君主专制后,反保皇派的声音仍旧会不时从曼谷传出,尤其是在披汶·宋坎(Phibun Songhram)军事政权兴起之后。此外,新兴的老挝知识阶层受到法国亲法西斯的维希政府的宣传影响很深,老挝新运动最重要的标志——一个刻着L的盾牌,与欧洲右翼的象征具有惊人的相似。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世俗的民族主义在这些老挝人中变得更加明显,除此之外他们还温和地表达主张平等和民主的观点。因此1944年2月,《巴特寮》(*Pathet Lao*)刊登了一篇名为《反思老挝的“精英”》(*Reflections sur l'“élite” laotienne*)的文章提醒精英们,正是农民的辛苦劳动支付了他们的教育费用,他们应承担起对国家的责任。“新老挝不需要那些既自我本位又忘恩负义的精英们来做代表,精英们轻蔑地将自己孤立起来并忘记了他们欠下的债。”这些都是旧世界不久就要永远改变的预兆。

### 自由老挝运动

1945年3月9日,日本武力推翻了法国维希政府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政权,许多国家宣告独立。4月8日,西萨旺·冯国王在琅勃拉邦

正式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王国脱离了法国统治，再次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在关于国家地位的谈判期间，佩差拉和王宫在各自的职责上出现分歧。按照佩差拉的说法，萨旺·瓦达那王储发表声明的愿望受到了佩差拉的反，因为这“和泰国使用的程序正相反，在泰国，日本人只同首相谈论问题，并不去打扰国王。王储并不属于政府等级……他应当把自己抽离到政治之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君主的权力和首相的权力之间的不和愈发加深。

1945年8月27日，日本军队向盟军投降，有鉴于此，佩差拉采取行动将南方省份置于单一的政府和王国的保护之下。这个行为使他与琅勃拉邦的王宫产生了冲突，因为后者已经答应法国人废止先前的独立声明，重新恢复受保护国地位。9月15日，佩差拉抢先一步公开宣布老挝王国的统一。10月10日，由于这件事，国王解除了佩差拉的首相和副王的职务。10月12日，“自由老挝”(Lao Issara)政府成立，旨在维护4月份的独立声明。自由老挝政府的一位部长卡代在其1948年出版的关于这一运动的历史书中写道：

伊姆菲尔德(Imfeld)上校向萨旺亲王强硬地指出，“老挝一直以来都在且仅在法国的保护之下”，暗示要求保持现状的单纯性。这对于萨旺亲王或许是一个既方便又简单的解决方法，因为他一生从不工作，从不关心老挝人民的需求和志向，但是对我们而言，这完全是对我们自暹罗1940年的挑衅和日本人1945年的行动以来产生的情感与观念的重大背离。我们无法允许这种情况发生。<sup>22</sup>

的确，这是一个“重大的背离”，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特别在万象，一个老挝民族主义的知识阶层已经开始形成(政府公务员、学生、军人和其他人)，佩差拉比远在琅勃拉邦的王宫更能体会和响应他们的愿望。然而，即使是在琅勃拉邦，虽然王朝政治不可避免地民族政治混在一起，但仍有大量自由老挝的支持者。10月20日，自由老挝政府要





图为自由老挝的士兵。自由老挝的武力一直非常弱小,且仅局限于这个国家的几个主要城市和乡镇。政府财力有限,这些士兵不是正在返回来的法国人的对手。

求国王辞职并等待临时联合政府对君主制度未来状况的决定。11月10日,大约30人的武装人员在西苏芒·萨鲁姆萨(Sisoumang Saleumsak)亲王和伯纳瓦(Bougnavat)亲王的率领下,向琅勃拉邦的王宫进军并将王室成员囚禁。

由于各种原因,参与这些事件的人的打算和动机非常复杂,特别是考虑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牵扯到的人数。在日本人投降之后,中国16000名贫农士兵组成的第93师被盟军从云南派往老挝去解除北部日军的武装,而北纬16度以南的日军则由英国军队负责。英国人为法国人的重返提供了便利,但中国人却妨碍了法国人。然而,最具破坏性还是越共控制的越南

独立同盟(Viet Minh)在老挝的越南人中的活动。总之,人们可以在老挝看到亲法国、亲泰国和亲越南的支持者。政治上的操控既紧张又混乱,没人能够真正对老挝国内当时各种势力的平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法国人对琅勃拉邦王国较温和,面对来自中国和越南的巨大威胁,琅勃拉邦王国感到,既然法国承诺要建立一个老挝联合王国(这个再次被戴高乐确认),一切运作最好在法国的保护之下进行。老挝无力保护自己并抵抗入侵敌军,这是显而易见的,不但第93师使琅勃拉邦想起上个世纪云南的华族入侵者,而且越南势力的增长也使他们警醒。自由老挝的支持者的一个主要动因就是担心越南人有企图,他们当中很多人相信:越南人希望吞并老挝(虽然他们经常自相矛盾地发现,他们

自己正在依靠组织更严密的越南独立同盟的力量来对抗卷土重来的法国人)。1945年10月,密切关注越南人的佩差拉向盟军投诉,老挝人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一个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以前,他和自由老挝一直依靠美国来反对法国人重返印度支那,这是罗斯福总统的政策。然而,1945年4月罗斯福的去世使这些希望破灭。

在老挝的城市里,老挝人和越南人之间的不信任愈演愈烈。厚慕潘·赛纳斯,一个年轻的自由老挝支持者在他关于那些岁月的回忆录里写道:

我仍然很清楚地记得1945年6月的一天,老挝人和万象的安南人之间的紧张气氛,安南人聚居的村庄艾垒(Ilay)村(在万象北26公里处)的村民向万象游行来反对法国势力重返老挝……万象所有的塔鼓都被敲响,人们看到老挝人从房子里面出来,手里拿着小刀、马刀、削尖的竹竿、猎枪,总之任何能被用作武器的东西,来阻止安南人作出任何危险举动。<sup>23</sup>

正如我们上文讲到的一样,除琅勃拉邦之外的老挝所有主要城镇中,越南人占绝对优势。在民族主义运动燃遍印度支那时,越南人是每个人都要谨慎对待的重要力量。

### 越南独立同盟获得首批新成员

86

法国人倾向于把所有的民族主义积极分子都视为“共产主义者”,他们这样做自有其道理,因为在老挝的越南人中的共产党员骨干非常活跃。然而,自由老挝的积极分子看起来却没意识到这一点,卡代会将下此断语的人开除出队伍。不过,他们的宣传的确影响了自由老挝。也有一些个人,如苏发努·冯(Souphanou Vong)亲王(佩差拉同父异母的弟弟)一直在越南工作,娶了一位越南妻子并受到越南独立同盟的影响。他是坚定的反殖民族主义者,并且相信只有与越南独立同盟结盟才能赶走法国人。自由老挝政府成立大约三周之后,他带着越南独

立同盟的保镖一回到老挝,随即被任命为政府的一名部长。尽管离开老挝多年,显然他还是希望自由老挝把他作为一名重要人物来对待。然而,自由老挝里的很多人都把他视为一名自大的暴富贵族。卡代这样描绘 1949 年的苏发努·冯:“他,杰出的人,年轻的偶像……不幸的是他忘记了一件事情:对大多数老挝民众来说,他是一个‘著名的无名氏’……”对抗如此激烈,以至于苏发努·冯只在万象待了很短的时间便迁到南方的他曲,那里 75% 的人口是越南人。在万象,他利用与佩差拉的关系获得了外交部长的职务,但没有如他的顾问们所希望的那样控制自由老挝的军队。在他曲,他组建了一个独立老挝委员会,后来的共产主义史学家称之为自由老挝的基金委员会。

87 那时也许确实还没有老挝共产党员。例如,老挝人民革命党后来的领导人凯山·丰威汗(Kaysone Phomvihane)的母亲是老挝人,父亲是越南人,他出生于沙湾拿吉,却在越南长大成人。大约 10 岁时,他离开老挝去越南学习。1943 年,他进入河内的一所法律学校学习,直到该学校于 1945 年因政治骚乱被关闭。20 世纪 30 年代晚期,凯山先后受到越南有关民族独立的政治动乱以及越南独立同盟的影响,于 1944 年开始积极参与后者的活动。他于 1945 年重返沙湾拿吉,并将那里的越南人和老挝人都组织了起来。1946 年他回到越南与胡志明结识,从那时起便与越南独立同盟一起在越南北部和老挝东北部工作,并于 1949 年 7 月成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一名成员。理解这个非常重要:在那时像凯山这样的人有两个身份可供选择——越南人或老挝人。越南人的身份在印度支那全境有效,而老挝人(和高棉人)的身份相比之下则有更多的空间限制,虽然自由老挝后来的领导者欧恩·萨纳尼空(Oun Sananikhone)也曾一度受到泛泰观念的影响。可以理解为何在那时,凯山越南人的身份是最重要的。他理所当然地使用他的越南名字,和其他的越南人没什么两样。只有在有政治需要时,他才表露出明确的老挝身份。

虽然共产党人并不在自由老挝运动中扮演直接的角色,但是运动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相互指责却确保了老挝共产党在未来的核心地位。一旦同盟国同意法国人重返印度支那,那么自由老挝运动必将失败,也

就意味着没有外援来支持新政府。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自由老挝政府就为维持政府正常运转用完了所有的钱,其他的事情什么也没做,例如维持一支军队。它宣称控制了鸦片贸易,但实际上不可能控制。为了控制财政支出和通货膨胀,伊沙拉政府的财政部长卡代·敦·萨索里特于1946年初发行新货币,这种货币由于纸张低劣和无价值而很快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卡代的干燥香蕉叶”。自由老挝还有缺乏能力和知识的问题,但它的根本性弱点在于,它仍然坚持小规模的城市运动。正如后来厚慕潘·赛纳斯提承认的一样:“鉴于保持沉默的大多数民众早已习惯现存的秩序,对国家独立的志向表现得几乎毫不关心,我个人认为大多数人忠诚于旧的政府,也就是法国人!”在文翁亲王和其他支持亲法政府的老挝人的支持下,法国游击队从乡村、法军主力从南方沿着湄公河慢慢向城市推进。1946年3月21日在他曲爆发了一场血战,越南独立同盟、苏发努·冯和一小部分老挝人坚守国土。法国人派4架战机参战,导致了成百上千的平民伤亡,其中大多是越南人,据说苏发努·冯自己也在撤退时受伤。

自由老挝政府为使自己合法化而进行了最后孤注一掷的尝试,他们要求西萨旺·冯国王作为立宪君主重新登基,这得到了国王的同意。是中国第93师在老挝的持续驻扎阻止了法国人最后对万象的攻击,但中国却在4月宣布撤走该军队。4月底,法国人占据了万象,5月进入琅勃拉邦,自由老挝的领导人被迫流亡泰国。

## 殖民主义的终结

法国人重新对印度支那和其他地区进行殖民控制的决定并非必然。的确,面对法国国内反对殖民的态度,以及美国(当代世界上的第一强国)明确反对殖民的立场,法国差一点就准许其殖民地独立了。可一旦法国决定重返老挝,它却只吝啬地给予老挝更大的内部自治权,而殖民地的许多法国人不愿放弃其殖民主义者的特权。

但老挝的改变超过法国人的想象,即使那些愿意与法国人一起工作的老挝人也将后者的存在看作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是在准予完全独立的折衷。1946年8月27日,双方签署了一项暂定协议(modus vivendi),



1950年老挝城市中的激进抗议分子要求脱离法国取得独立。(承蒙 French military archives 提供)



在回到万象之前,自由老挝逃亡的领导人在曼谷庆祝了1949年的老挝新年,回国后他们加入了皇家老挝政府。从左到右依次为:卡代·敦·萨索里特,自由老挝精力最充沛的宣传家之一;艾琳,梭发那·富马亲王的妻子;披耶·坎冒(Phagna Khammao),自由老挝政府的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承蒙 Khammao family 提供)

在法兰西联邦内部认可老挝为一个统一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为确保琅勃拉邦君主国的权势,达成了一项议定书(在当时是保密的),让文翁亲王声明放弃其在南方独立的侯国,并以此为条件任命其为王国的终身检查长。11月,沙耶武里“失去的领土”及占巴塞部分地区由泰国归还老挝。1946年12月选举成立了由44个席位组成的国民议会,并于1947年3月首次颁布了一部宪法。新选举在8月举行,首个皇家老挝政府的国家议会任命苏万纳拉亲王为首相。一个新政党——老挝国家联盟党(the Lao National Union)迅速成型,由彭·苏发那旺(Bong Souvannavong)和寇·佛拉旺(Kou Voravong)担任领导。他们对法国人持续插手国家管理事务提出了批评。流亡中的自由老挝成员也宣传着类似的观点。

90

自由老挝最后走上了大多数流亡政治团体共通的道路,由于屡遭失败而分裂成几派互相指责。最初,他们受到战后由比里·帕依荣(Pridi Banomyong)领导的泰国政府的欢迎,并得到泰国友人和官员的帮助。他们的活动大多是宣传,宣传任务主要落在多产而又善辩的卡代身上。他们还在泰国及越南独立同盟控制的地区发动小规模游击活动来反对法国人。1947年11月,披汶·宋坎(Phibun Songkhram)领导右翼在泰国发动政变并随后与法国人恢复友好关系,这意味着自由老挝不得不停止在泰国领土上的军事活动。这让苏发努·冯亲王能打越南独立同盟这张牌,坚决主张所有的活动都应当迁移到越南独立同盟控制的领土上进行。但大多数的自由老挝领导人即使不反对越南人,至少也怀疑越南人的意图,而且他们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苏发努·冯公开指责那些以曼谷为据点的同僚们没有骨气,从而受到卡代傲慢的反指责,他于1949年初辞去了自己在自由老挝的职务,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与越南独立同盟的合作之中。同时,自由老挝领导人返回万象的机会之门被打开了。

91

92

1949年7月,在国内外压力下,法国与皇家老挝政府签署了一项新的全面协议,给予老挝比以前更大的自治权,这被写入9月颁布的新宪法中。这满足了大多数自由老挝领导人的要求,他们在得到大赦后回到万象。虽然大部分外交政策和防御仍然掌控在法国人手中,但老



1950年4月,就在法国向老挝移交政权的时候,培·萨纳尼空首相在万象歌剧院外面发表演说。在他右边站立着的是刚回国的自由老挝领导人披耶·坎冒;站立者中左数第四位是梭发那·富马亲王。(承蒙 French military archives 提供)

挝现在能够加入联合国了。在那时,这种事情很正常,例如澳大利亚已于1901年独立,但英国直到1945年仍然控制其外交政策。但是,殖民世界旧的体系正在崩溃,这种分裂国家主权的行爲已经变得不合时宜。所以在1953年10月,皇家老挝政府获得了完全的国家主权。1954年,越南独立同盟挫败了法国军队,法国印度支那的殖民时代终结了。

## 第三章 皇家老挝政府

在一个见多识广的领导层的治理下,20世纪50年代的老挝人期盼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然而,不久他们就面对贫穷问题以及将老挝置于冷战之中的尴尬的地理位置。美国援助源源不断地拥入万象来促其发展,但是导致了腐败盛行以及军事实力无节制的增长。很多老挝人选择中立策略,而很小一部分老挝共产主义团体则反对与美国结盟。北越支持老挝共产主义团体,于是他们完全不理睬老挝人要求中立的愿望而决定小股穿越老挝渗透到越南南部去。20世纪60年代初,万象的一系列军事政变和反政变为老挝共产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机会,使他们明显削弱了皇家老挝政府对国家的控制。美国人担心老挝的形势,便开始了对老挝的空袭,从此老挝被拖入越南战争。

93

### 20世纪50年代:乐观主义岁月

自由老挝政府垮台的直接后果中最显著的一个,是国家主要城市中的老挝人问题。因为超过80%的越南人口逃回越南或者进入泰国,这就意味着现在老挝人在管理自己国家方面的作用要更大,要接管以前殖民政府中被越南人占据的职位。这在理论上是受老挝人欢迎的,但实践起来却很难,原因是尽管20世纪40年代初就开始了教育改革,

94



但法国殖民教育体系在培养大量官员方面是失败的；再加上法国人于1946年认可的有限自治权，这都意味着法国官员将继续在政府中起重要作用。直到1949年，老挝才宣称掌控了政府里所有的部。20世纪50年代初对于老挝而言是一个伟大的乐观主义时期。大多数自由老挝的领导们回国并重新融入社会；政府和老挝领导人在着手建设新国家时仍然与法国人保持大量的协作。当时还主管手工业和工业的潘·纳奥赛万(Panh Ngaosyvathn)在1998年80多岁高龄时向我解释道：“我们是如此的乐观。一切都在我们面前。国家安定，我们感到自己能够重新创造这个世界。”1951年创建了国家警察部队、国家金库，邮局发行了自己的邮票，制定了各种各样涉及佛教、国家遗迹、语言和文学的文化制度。建造了许多新的公众建筑，第一座石质的新国民议会大厦于1952年末建成。当然，建立新的国家机构是一回事（很多老挝人自豪而又兴奋地参与其中），但如何为这些机构提供经费并有效地管理它们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95 独立并没有改变老挝的基本经济现实，但政府却不能再指望自己的预算赤字由法国控制的印度支那的中央预算来弥补。创造新国家需要更多的花费，这个差额如何填补？一个收入来源就是鸦片，法国人鼓励增加鸦片的生产，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老挝人自己不消费鸦片，但他们对把鸦片销售给那些消费鸦片的人并不感到内疚，他们不受欧洲道德辩论和美国“鸦片祸害”论的影响，因此在这件事情上老挝人没有罪恶感。于是，皇家老挝政府的新任财政部长莱姆(Leum)于1948年召集各省级官员开会，公开要求他们提高鸦片产量，使之达到1944年的水平：“我们关注鸦片的征收，因为它是国家的重中之重。每个参与此事的官员和公民都应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然而，法国人的撤出不但意味着法国援助的减少，还意味着鸦片公司的关闭。美国人从道德上接受不了鸦片，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向老挝政府提供最重要的支持，于是鸦片不再是老挝官方财政收入的来源。即使这样，鸦片的种植直到1971年才在美国的压力下被列为违法行为。直到今天，鸦片贸易仍然是老挝的一个吸引人的

非法资金来源。

## 不发达

尽管战后在万象和湄公河沿岸城镇进行了各种建设活动,但 20 世纪 50 年代初,老挝 150 万人口中的大多数仍然是农民。不像泰国湄南河河谷的农民,老挝低地地区并未进行大米或其他经济作物的大规模种植生产。在泰国,大米贸易的增长吸引了众多商业农场主和地主前去收购稻米种植地区的土地,但这一切在老挝都没出现。老挝农民基本上仍然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家里生产出大多数他们所需的东西,少部分没有的东西通常用林业产品通过物物交换来获得。贸易主要依赖于不定期的市场,这种城镇市场与区和蒙的行政中心联系密切,由围绕该城镇的邻近村庄轮流承办。一些工业产品设法进入了这些销售网络,主要是通过流动的中国商人。通过这些小市场,老挝不同的族群互相联系,高地人们背着他们的农产品到市场去,在那里买到需要的东西再回到村庄。与上述情况相矛盾的是,由于在殖民地经济中鸦片具有重要性,一些最偏远的群体例如苗族便大多从事这类商业性农业,但财富(大多数以银的形式)流回到他们的社会却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苗族人的生活方式。他们雇佣一些邻近的少数民族(通常是抽鸦片上瘾者)作为他们田地里的劳工,但他们却无意转向大规模的经济作物生产。

96

除去自然条件,加大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国家严重缺乏交通基础设施。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老挝有大约 5 600 公里公路,其中只有大约 800 公里有路面从而在雨季可以使用。1945 年,老挝的注册汽车只有 19 辆,在 50 年代初增加到 100 辆左右。湄公河及其支流构成主要的交通动脉,但只有一些使用马达驱动的船只。空运几乎为零,电信仅限于主要的行政中心。省级行政中心的电话业务直到 1967 年才开通。因此,贯穿国家的通讯既缓慢又断断续续。这一切如不改善就没有农业的商业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因而也就没有收入来着手进行重要的经济发展。皇家老挝政府对农村人口很少提出经济要求,所

有的税收对农民基本上是免征的。

97 考虑到没有重要的财富来源,可以公正地说,与周边国家相比较而言,老挝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没有真正的富人,因此没有带着资金的社会精英来投资发展经济。最富有的群体是中国商人,但即便是他们也没有大笔的资金和明显的投资途径。正如在泰国和柬埔寨一样,大部分商业活动都留给了中国人,而老挝人都寻求在政府里工作。老挝的统治阶层由贵族和那些父辈已经在政府里身居高位的人(要么是蒙主要么是省长)组成,因为他们受过教育。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中国老挝混血或越南老挝混血背景,并自愿在官僚机构工作。在早期岁月,传统的等级地位差异对这些主要生活在城市中的统治阶层仍然影响很大,但财富差异尚不显著。虽然或许那些最高层已经拥有汽车,但很多副部长在那个时代还是骑自行车上下班,还有一些只能步行上下班。那时外出工作的女人只能去市场,因为官僚机构的工作仍然大多为男性把持。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是赞美越南的小说《文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的作者,他于 1954 年 1 月在万象待过很短时间,他感到:

万象与西贡相差一个世纪……一个令人不感兴趣的城镇,只有两条真正的街道、一个欧洲餐馆、一个俱乐部、肮脏的市场……万象有两条街道,琅勃拉邦只有一条街道、一些商店、一个又小又破烂的王室宫殿(国王和政府一样穷),在宫殿对面有一座陡峭的小山,山上有座塔……步行半小时即可看遍整个城镇。<sup>24</sup>

几年以后,当美国援外汇款合作组织(CARE)的奥登·米克(Oden Meeker)抵达老挝开展为期一年的工作时,万象有了少许变化:

98 万象是一个蜿蜒的村庄,有几排破败的一层木制商店,主要销售压力灯、棉布商品、罐装的法国食物,以及一些零散的小日用品。

有三条主要的平行街道(组成了城市的中心),其中之一零星分布着几座两层楼的建筑物。大多数房子是由木头、茅草屋顶和编好的竹竿建成的,建在离地面很高的支柱上,后面是一簇簇细竹和有着浅绿色船桨形状的叶子的香蕉树。到处都有塔……有很多三轮车但很少有汽车。这就是老挝的首都。<sup>25</sup>

## 美国的文明使命

美国人相信他们与欧洲“坏透了”的殖民地势力不同。的确,自由老挝最初也这样认为,并指望美国给予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迅速分化为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冷战的开始迫使美国以反共产主义的名义支持法国重返印度支那。这是美国人在这一地区的第一次重大失误。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并带给它帝国的责任,而很多美国人都没准备好。这种从孤立主义中脱离所引起的文化震动也许能解释,与其他冷战盟国相比,为何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会用既强烈又歇斯底里的措辞来反对共产主义。在学校和电影里,共产主义者被描绘成极端和可怕的绝对他者,就像来自外层空间的怪物一样,是与“美国生活方式”完全相反的人。然而20世纪50年代也是乐观的年代;美国人对他们的自由民主体系和富裕感到极度自豪,他们创建了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不像那些被他们取代的殖民势力,美国人相信他们的体系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而且很多人感到他们有使命来传播“美国生活方式”的“福音”。然而,很多美国人慢慢地开始被这样一个事实深深困扰:使用军事力量来传播或“保护”这种生活方式,看起来同“坏透了”的殖民主义时代是如此相似并且令人厌恶,在越南战争中甚至表现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99

1954年末,美国对皇家老挝政府的支持是有意识地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影响。1954年,驻老挝的美国使团总共不到20人;截至1957年也只有100人。老挝在美国的外交政策里并不具有很高的优先地位,在早期岁月到达万象的少数美国人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这只是一个他们被派往的遥远地方,一项红利和津贴都少得可怜的苦差事(即便

今天对很多外国大使馆来说也仍是这样)。1957年,人类学家乔尔·哈尔彭作为美国援助任务的一员在琅勃拉邦度过了一整年,他记录下了美国人在万象如何简单地创建了一个“小美国”。当然,所有富裕的侨民社区都有建立自成一体的社交圈的倾向,但是美国社区快速扩大,他们在居住片区里建起美国农场式的住宅、提供美国食物的杂货店,甚至还有一家美式餐厅。此时,万象只有两个法国餐馆和两个酒店,几乎没有夜生活。美国人很少说法语,而在老挝官僚机构中仍然广泛使用法语,再加上几乎没人懂老挝语,因此社交活动只能局限于说英语的小社区。从人们对1957年美国妇女俱乐部编制的名为“欢迎来万象”的导游书里详细罗列的社区内社交礼仪的强烈关注,便可看出美国社区的孤立状态。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与今日美国不同的世界,在导游书里他们建议美国妇女:“虽然在万象很少有人戴帽子,但如果方便的话,参加正式的拜访按照惯例要戴帽子和手套。”当然也有一些人全身心地工作,生活在“小美国”的范围之外或者在一些省里面,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美国人在老挝的人数增加了,特别是60年代,国际志愿服务机构(International Volunteer Service)的志愿者们在老挝全国开展工作。在这些早期岁月里,老挝的美国人很少能够意识到这片他们将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的土地的复杂性。

对于很多老挝人来说,他们积极争取美国的投入。已于1954年11月成为首相的卡代情不自禁地写出了名为《老挝:东南亚反共产主义斗争中的完美基石》(*Laos — Ideal Cornerstone in the Anti-Communist Struggle in Southeast Asia*)的小册子,显然直接迎合美国的心灵与思想。虽然已经从法国人那里获得独立,但令人忧愁的现实使很多老挝人开始明白:老挝不能维持经济上的独立。此外,中国和越南的共产主义革命也使得老挝人直截了当地认识到他们政治上的脆弱。一些像卡代一样的人已经明确而坚决地决定寻求来自“自由世界”的帮助,而其他则感到虽然他们很难表达清楚那是什么,但一定还有另外的出路。20世纪50年代末,另类的彭·苏发那旺在一本名为《老挝佛教社会主义》(*Doctrine Lao ou Socialisme Dhammique*)的小册子

中冗长又晦涩地向他的老挝国家联盟党提出了他的观点。这本书试图利用土著宗教的概念来理解老挝的形势,但却没有为国家的重要困境给出实际的解决办法。美国脱离孤立主义引起的文化冲击使它掀起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巨浪,与此类似,老挝社会对经济快速变革的要求与被吸入冷战漩涡的危险,使老挝领导人以及诸如佛教僧团这样的文化机构产生了强烈的文化焦虑。这引起对于“传统价值观”怀旧的关注,至今都没有平息。



1955年1月3日,美国全权大使查尔斯·伍德鲁夫(Charles Woodruff)先生移交给首相卡代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在接下来的5年里,美国对老挝的援助显著增加。(承蒙 French military archives 提供)

### 不负责任的美国援助\*

101

为与冷战旨在堵住“共产主义潮汐”一致,美国从1954年11月开始为当年法国筹建的12 800至15 000人的警察队伍发放薪水。在官僚体系里,法国官员的离去在指挥机构里留下了一个很难填平的缺陷,

\* 作者对本节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故本节中文版所标示的原文页码仅供参考。——编者注

因为能从中挑选官员的受教育阶层太少了。美国不可避免地被拉入更大规模的援助计划。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他们这样解释他们的行动:

102

老挝政府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士兵、警察、教师和公职人员所需的薪水。美国决定帮助,不是直接支付美元给这些人,而是向老挝政府提供美元兑换,汇率为 35 基普(kip)<sup>①</sup>兑 1 美元。<sup>26</sup>

然而,这个方案将基普的币值大大高估,在这个地区四通八达的中国贸易网络很快便将其大肆收购。1958 年,《华尔街日报》一篇文辞严厉的述评这样概括其经济后果:

一个老挝商人在自由外汇市场可以用 1 000 美元来兑换 10 万基普。然后他申请一个进口许可,比方说价值 1 000 美元的建筑水泥,只需要提供 35 000 基普就能从政府那里以官方汇率获得 1 000 美元。这就使得他在货物甚至没有移动之前就已经赚取了 65 000 基普……商品涌向万象只是为了在运出时获得更大的利润。因此,没有工业的老挝变成了汽车和舷外马达的输出国。<sup>2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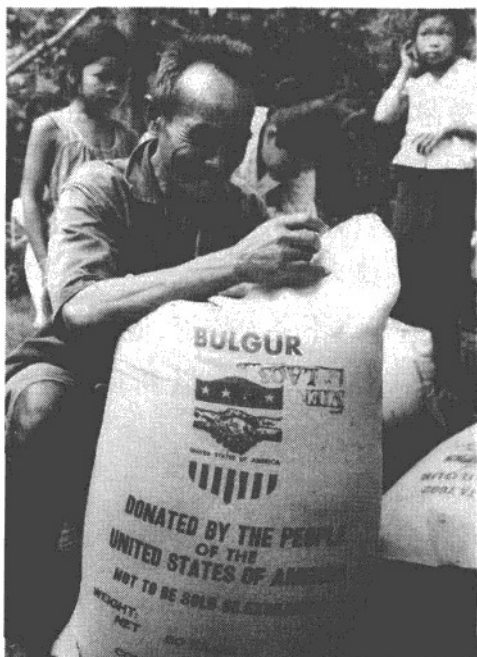
很多货物通过贸易网络就能转移到泰国,货主们都是一路大笑着去银行。老挝那些负责发放进口许可的人也是如此,那些被邀请进入他们公司董事会的中国商人都是老挝政治的资助人。接下来的几年,几百万美元像甘露一样从天上洒向老挝的城市,使一些老挝人变得富有,那些在政治上有地位的人也至少能够买得起一辆轿车或者一座新房子。然而,绝大部分利润都融入中国人的商业网络。1958 年,当美国人坚持基普的贬值时,这片愚人的乐土突然倒塌了,老挝统治阶层的很多人

---

① 基普,老挝的一种币种。——译者注

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们已因难以置信的财富注入而变得极其兴奋。美国援助的随意分配引起了腐败和财富悬殊,这导致老挝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矛盾。在美国人眼中,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援助计划,但对老挝人来说,却意味着皇家老挝政府经济的生死存亡,后者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也造成了对美国人的怨恨。

从一开始就掺有政治目的美国援助已经变成老挝政治的中心问题,大多数共产主义者对此持续不断地提出异议。



20世纪40年代末,印度支那共产党(实际上是越南共产党)已经开始招募老挝人及老挝越南人的混血儿,其中最杰出的是凯山·丰威汗。苏发努·冯亲王也在这一时期与自由老挝决裂并加入越南独立同盟的队伍。1950年8月,这些左派的民族主义者和一些新招募的共产党员(总共大约100人)组建了一个新组织——老挝自由阵线(Neo Lao Issara,即“新自由老挝”),后来成为老挝共产党

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老挝的预算都是由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援助来承担的,这个国家已经对各种形式的外国援助产生了依赖。虽然外国援助的来源已经非常多样化,但这种对援助的依赖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这张照片显示的是分发美国援助的现场。(承蒙 Joel Halpern archives 提供)

(1955年建立)的核心。苏发努·冯自己于1954年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他对老挝人民和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梭发那·富马亲王都隐瞒了这一事实,直到1975年共产党执掌政权,他们都不敢相信一个有着老挝“王室血统”的人竟然是共产党。苏发努·冯和他的运动也充分利用了人们的不敢置信,一直只表明自己是一名老挝民族主义者。1954年5月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世界大国的主要目的是调停法国人与越南人的战争,老挝共产主义运动还很弱小。但是老挝共



产主义运动得到越南独立同盟的支持,军事强大的越南独立同盟已经占领了老挝的大片地区并积极招募老挝骨干。正是北部越南人使老挝共产党人在这次会议上获得了承认,有权作为一个游击队运动在华潘省和丰沙里省的区域里集会,而这两个省都与北越接壤。皇家老挝政府被认为是老挝的合法政府。日内瓦条约规定:除了留一小队法国人来帮助训练老挝国家军队之外,所有的外国军队必须从老挝撤军,老挝不属于任何军事联盟的一部分。接下来几年要通过选举使左派的巴特寮(在这次会议上开始变得有名)融入老挝政治生活的主流。而巴特寮将如何融入也会成为接下来三年老挝政治的关键问题。北越没有撤军,这一点不令人惊讶,他们着手把巴特寮打造成为一支部队,以便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加以利用。正如老越关系的专家克里斯·高斯卡(Chris Goscha)所写:

(基于新越南人的来源现在成为可能)令人惊讶的是越南人把巴特寮变成一个真正的政治、军事和官僚部队,与1954年之前相比,简直脱胎换骨。<sup>28</sup>

1955年,一个小规模的列宁主义的老挝人民党成立,与一个受大众欢迎的先锋组织——老挝爱国阵线(Neo Lao Haksat)在选举中展开竞争。

## 大人物政治

政党对老挝而言是个新鲜事物。正如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这些政党看起来根据各自的路线进行没完没了的内部分裂和派系林立,这的确与西方民主的早期岁月一样。此时的美国人和随后的老挝历史学家经常试图通过把关键作用归因为“大家族”或“宗族”来搞清楚这种混乱。这些概念对老挝现状的理解存在缺陷,因为同一个家族里永远会存在处于不同政治立场的家庭成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梭发那·富马和苏发努·冯两兄弟。家族关系和义务的确将这两兄弟绑在一起,而且有时外人还会用家族特色来解释他们的行动(其实只是他们

俩的个人行为),但在紧要关头,血缘的联系便将受到挑战。一个关键的作用被归因于地区主义,特别是老挝南部和北部的竞争,但这也只是一种趋势,并不是硬性法则。

老挝政治文化中一个同等持久而重要的概念是关于大人物和他不稳定的追随者。在老挝文化世界,权力和正义之间有一种含糊不清的联系,人们经常坚定地认为强权就是公理。有的人之所以有权利和财富,是因为他们的佛教功德(boun)。然而,只有随着大人物不断地重新分配财富并分发恩惠给他们的追随者,功德的实质才会显露。追随者们期盼大人物遵循他们的崇高地位,这意味着开好车、吃美食、给大笔小费,从而不断地再确认他们的地位。在这个世界,追随者们也经常寻找突然衰退的迹象,准备迅速地舍弃前一位庇护人。在这个意义上,大人物体系不是“封建”的,因为追随者们并不绑定一位领主,它通常是一种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这是现代政治体系的典型形式。正如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老挝的政治被大大地局限于一个小规模的城市统治阶层内部,在其中,真正的政治分歧是极小的,为了追逐权力,追随者们在不同的人周围无止境地组合、分散、再重组。

106

在这些情况下,获得高职务和利用追随者引进美国援助的能力是20世纪50年代首要的政治目的,正因为此,一些政客开始复制美国鼓吹的反共产主义的言辞。无疑在一些政客和将军中这些观点都是诚挚的,但其他人也不失时机地表达同样观点的目的却是为了利用美国。的确,美国并非单方面地影响着老挝,老挝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变成了引导或歪曲美国言辞的高手。这证明了将老挝“新殖民主义”过分简单化的模式是行不通的。

### 中立主义\*

中立主义作为一种政治选择第一次出现在日内瓦会议上,在接下

---

\* 作者对本节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故本节中文版所标示的原文页码仅供参考。——编者注

来 20 年里,具体表现这个政策的政治家是梭发那·富马亲王。贵族气派的、温和而又久经世故的梭发那·富马从来不被认为会贪污,虽然他及其追随者很显然从官职外快中获利。但在老挝人的眼中这是适当的,因为梭发那被视为一个“功勋人士”。其他的中立主义者,如彭·苏发那旺身边的那些人在美国人眼中则被视为“左派分子”,这是因为他们不支持与美国结盟。共产主义者适时地支持中立主义,因为在老挝的政治背景下,他们不能公开要求与越南北部或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结盟。正是他们的口头支持,使得其他中立主义者很容易被视为“左派分子”。像彭·苏发那旺这样的政治家实际上折射出一些老挝人对现代世界(以美国文化为代表)冲击老挝传统价值观的一种深深的文化保留。他们暗示:如果老挝人自我封闭,老挝人将会过得富裕。

107

梭发那的观点更有见地,因为他认识到:没有任何一个老挝的邻国也没有任何世界强国愿意允许这个小国自我发展,此时老挝与“红色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都接壤。他也相信,像老挝这样的小国公开偏袒哪一方都负担不起。外部势力干涉的关键在于他们在老挝内部找到依附者的能力,因此中立的关键是把这些依附者与他们的资助者分开,特别是要把苏发努·冯及其追随者与北越分开。梭发那·富马是反共产主义者,虽然他的反对声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相对于美国风格来说没有那么尖锐。他相信(也许在当时是对的),共产主义在老挝仍然没有深深扎下根基;他受到一些将老挝未来浪漫化的观点的影响,相信因为佛教的重要作用,没有真正老挝人会是共产主义者。日内瓦会议之后,作为首相的梭发那将其主要精力放到将巴特寮支持者拉回老挝政治和社会的主流上。1954 年末,梭发那被卡代短暂地罢免了首相职务,他与苏发努·冯的谈判被迫拖延,部分是由于苏发努·冯与卡代之间有私人恩怨(源自自由老挝时代的老问题),也由于左派拒绝将华潘省和丰沙里省归还给皇家老挝政府。梭发那·富马于 1956 年初重任首相,8 月他与苏发努·冯达成协议:归还那两个省,游击队士兵整编归入皇家老挝政府,在国家联合政府成立之前举行增补选举。

108

1956 年,地区局势对推进中立进程相对有利。1955 年 4 月,亚非

国家的万隆会议提出“不结盟”的构想；泰国的披汶政权恢复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报纸开始辩论中立主义。这导致了本来支持泰国的美国人开始惊恐：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当时强烈反对一切对华友好姿态，另一方面则因为他们感到泰国的立场是在暗中破坏他们反对老挝梭发那·富马的政策。1956年8月，梭发那·富马亲王带着友好使命动身去河内和北京。1955—1958年这一时期，泰国出现了温和与民主的气氛，这有利于梭发那在老挝尝试和解。

然而，和解悬而未决。1957年3月，佩差拉亲王结束了10年的流亡生涯从泰国返回。在签署的协议中，年老的西萨旺·冯国王重新恢复了佩差拉在琅勃拉邦的副王职衔。佩差拉支持他的弟弟梭发那的政策，这个一度操控老挝政治的人物现在已没有什么影响，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密切地注视着老挝的政治舞台：

109

我们最大的共产主义颠覆的危险起因于我们对收到的外国援助的错误使用……这使少数人骇人地富起来而大多数人仍然和以前一样贫穷……老挝维持着一支3万人的军队，包括警察部队。这支部队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从农业和工业那里夺走劳力。它几乎不能保卫国家抵御外来侵略。<sup>29</sup>

佩差拉退休回到了琅勃拉邦，虽然两年后他去世了，但是他的回国暗示：老挝人最终能够忘记以前的分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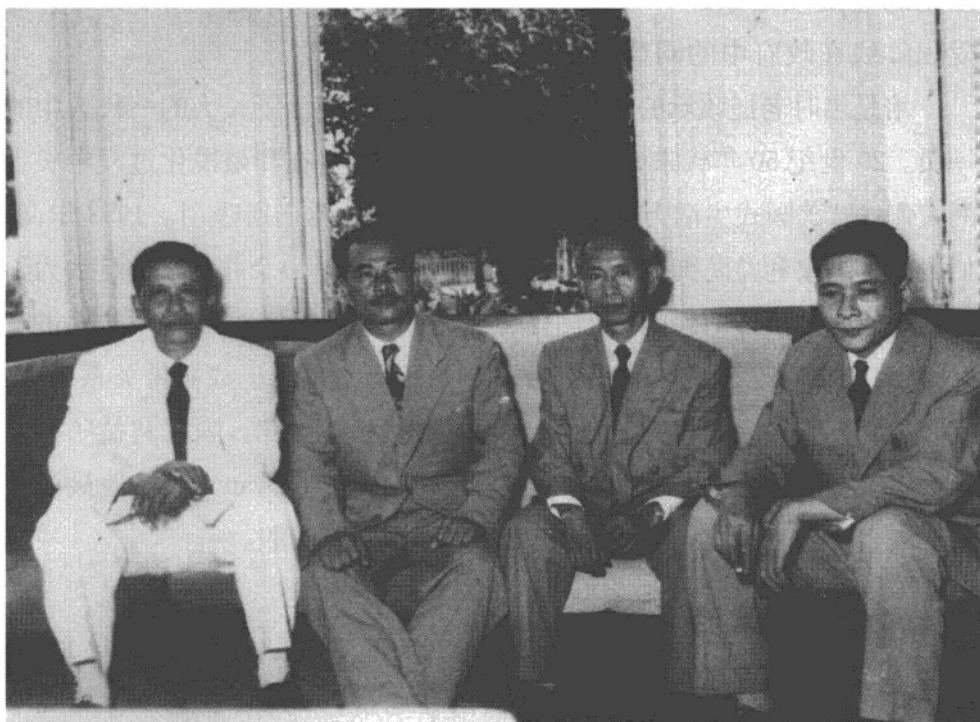
### 冷战阴影下的老挝

美国人反对梭发那对共产主义者的包容态度，因为他们感到这可能导致“通过谈判征服”，正如1949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一样，在他们想象中这是一场迫在眉睫的大溃败。区别在于捷克共产党人有大批的追随者，而老挝共产党则没有。苏发努·冯和他的伙伴富米·冯维希(Phoumi Vongvichit)于1957年11月2日的万象协议之后加入政府并分别担任计划部长和宗教与美术部长。1957年11月18日，老挝爱国阵线(NLHX)把北

部的两个省移交给皇家老挝政府,即使这样,美国也没有收回援助。美国大使格雷厄姆·帕森斯(Graham Parsons)为了在增补选举(计划于1958年5月8日举行)中支持非共产党员候选人,他以美国竞选方式发动了“强力注入行动”(Operation Booster Shot),目的是赢得“人民”的心。美国援外汇款合作组织的奥登·米克亲见了候选人是如何“迅速领会,抱着逗弄婴儿、分发阿司匹林、放映电影、举办提供免费饮料和舞蹈的晚会、到处悬挂他们的照片(包括三轮车的后面)”,“代议制的政府已经来临”。

老挝爱国阵线在增补选举中成绩不俗,得到了总共20个席位中的9个;他们的同盟和平党(Satiphab)得到了4个;他们反共产党的对手只获得了7个。然而老挝爱国阵线只得到选票中的32%。他们成功的秘密很简单:他们的对手继续大玩个人政治,最后推荐84位候选人来竞选这20个席位,因此严重分散他们的选票。这在党派政治中是一个令人警醒的教训。随后非共产党团体迅速合并进入老挝人民大会,去控制新议会总共59个席位中的36个,很容易地以票数胜过老挝爱国阵线与和平党。当时著名的苏发努·冯亲王获得的个人票数最高,而后来老挝共产党的铁腕人物凯山·丰威汗在这场他参加过的唯一一次自由和相对公平的选举中落选。

无论是在选举中还是武装斗争中,遍及发展中国家的列宁主义政党都是令人敬畏的对手,因为他们很有纪律性。对很多人而言,这些政党所展示的秩序井然的团结精神似乎正象征着民族主义者所憧憬的团结统一状态。他们现代而理性的官僚机构和主张平等的招募机制看起来也与“封建”性质的政党相距甚远,后者是在大人物和庇护者周围组织起来的,对老挝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相当典型。老挝爱国阵线在老挝之所以能有效对抗其他政党,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结构上,它提供了一个平行的“政府”,虽然也存在裙带关系,但使政党结构和政府结构极大地分开,这对于自由民主的实践这至少是一种姿态。对村庄和地区级别的“反动派”领导人实施处决也促进了对共产党的支持。这不只是一种有效的恐吓形式,而且非常常见,外来者使用武力来维持政治和社会权力,这是所有农民都知道的。他们没有自由民主的经历。老



1957年在万象,彭·苏发那旺(右二)当时是一位左派的中立主义者兼《和平党》(*Santiphap*)的编辑,会见老挝爱国阵线的代表富米·冯维希、苏发努·冯亲王,右边是诺哈·冯沙万(Nouhak Phoumsavan)。这一联盟在1958年5月的选举中短暂存续,在那之后彭·苏发那旺因老挝爱国阵线与北越的盟友关系而疏远了他们。

挝爱国阵线也能够通过煽动反对“外国人”的情绪来有效地利用对外来者的怨恨,因为据说外国人正在腐化和毁灭这个国家。美国援助工作的笨拙使得这个任务更轻松了。

即使有这么多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因素,1958年他们在老挝的影响仍然很小,并不像人们根据美国人和老挝右翼政党的反应所推测的那么大。1958年5月选举的结果使美国当局大为震动,引发了对援助(如破坏汇率花招)的再评价。在再评价的名义下,美国也发现美国承包人中的腐败,进而中止了它当时最重要的援助,目的就是要迫使梭发那·富马及其联盟政府下台。美国人成功了,1958年培·萨纳尼空成为首相,将老挝爱国阵线排除出部长级职位。培被当时敏锐的英国军事专员休·托伊(Hugh Toye)描绘为“在世界政治家里,两三个能够坚持

已见的老挝政治家之一”，他发动了一场反对腐败的运动，并反对老挝爱国阵线在政府中的同情者。右倾开始了。

培是当时老挝政坛的一名老兵，是在法国人统治下长大的一代人中的一员。20世纪50年代末，新一代领导人出现，那些在非殖民化过程中长大的人们，被“美国式生活方式”所呈现出的现代性承诺所吸引。1958年，他们聚集在国家利益防御委员会(CDNI)之下，后者是一个非常亲美且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幻想的政治组织。他们发起运动反对腐败并要求进行“公共政府部门改革，职务的升迁要基于绩优而不是家世或裙带关系”。国家利益防御委员会的权力基础主要是国防部和外交部。国家利益防御委员会里关键的军事人物是富米·诺萨万(Phoumi Nosovan)上校，他最近刚从法国接受完官员培训后回国，在培的内阁里身兼四职。

### 军队参与政治

正如很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在老挝，军队似乎是少有的几个能够做事的国家组织之一。对那些来自底层没受过教育的新兵来说，军队是现代技能和民族主义的学校。在冷战的背景下，军队自然成为美国援助的目标，巨额资金流入军中产生了“制造大人物”效应，即培养了一批在政治上有野心的军官。1958年，由美国援助支付的军队薪水已经成为老挝经济中流动现金的主要来源，并在操控商业的发展。除了这些，老挝军队仍然是一支新发展的训练差的部队，由于军官受训由美国人与法国人分别承担，而他们的互相反感导致合作难以进行。而且，军官训练主要针对常规战争而不是游击战，但游击战更适合老挝的情况。因此，皇家老挝陆军部队被分散成排和连，在老挝呈网格分布在固定的位置，只通过信使或很少的飞机与他们的后方相联系。对于那些能够集中部队发动袭击的游击队而言，他们是容易被捕食的猎物，游击队在边境地区经常散布北越士兵在行军的谣言来吓唬这些小卫戍部队。由于很难调来援军，皇家老挝陆军对求助的回复经常是：面对优势兵力时就放弃哨位。

河内一直密切注视老挝局势的演变，因此能够对老挝爱国阵线保持比较严密的掌控，远胜过美国人对他们找的代理人的控制。1958

年,越南共产党提出了一项武力统一南方的政策。为了维持和南方支持者的联系,也为了使北方的骨干渗透到南方和接待来培训的南方人,他们需要依靠一系列穿越老挝东部的小路,这些小路就是著名的“胡志明小道”。这些小路的一个关键入口靠近沙湾拿吉省的车邦(Sepone)镇,越南民主共和国在12月派遣两个营的正规军占领该地区,使其免于皇家老挝陆军的巡逻。这在万象导致了骚乱。面对来自北越军队的威胁,国民议会于1月授予培一年的特权来解决这一破坏因素,富米·诺萨万也被选入内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万象与河内、北京之间的紧张状态逐步升级。5月,培的政府坚持整合1500名老挝爱国阵线的士兵进入皇家老挝陆军,这在选举前已经得到同意,同时遣散老挝爱国阵线剩下的部队。靠近琅勃拉邦的一个营服从了再整合的命令,而在查尔平原驻扎的另一营则逃到北越保护的领土上。培说,这是“造反”行为,在万象的老挝爱国阵线成员因此被捕。如果在其他地方他们可能被枪毙,可能正是苏发努·冯的王室人际网络才使他们幸免于难。

得到北越支持的老挝爱国阵线游击队开始着手通过袭击散布在华藩省的皇家老挝陆军卫戍部队来重新控制华潘省。万象政府的右倾给了北越人渴望占领老挝内部边境省份的推动力。整个老挝糟糕的通信状态使得很难了解在省里面的真实形势,在万象疯狂流传着越南人入侵的谣言。这使得右派的决心强硬起来,他们请求美国给予更大的军事援助来严厉制裁共产党人。

在1959年这种危机气氛中,三位重要人物相继去世。第一位是佩差拉亲王,他于10月15日去世,紧接着10月29日西萨旺·冯国王去世,他在位50多年。12月29日,卡代突然去世,享年55岁。一位保守但又非常谨慎的新国王萨旺·瓦达那将在接下来的乱世岁月里起到决定性的幕后作用。他通常被认为同他父亲一样是亲法国的,实际上他有时会猛烈批评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印度支那所起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他很生气地告诉美国大使:“就是法国挑起了(越南)战争,导火线就是它在1945年愚蠢地尝试重建其殖民控制。就是法国创造了越南独立同盟。”



为了缓和危机气氛,12月15日,培宣布放弃他的反颠覆特权,而议会投票同意延长其授权直到1960年4月的预定选举。培也暗示从其内阁中去除国家利益防御委员会的成员,其成员在过去的一年里已经变得强硬而又武断。作为回应,国家利益防御委员会于12月31日采取行动,由富米指挥了一场政变并强迫培辞职。很多人感到,只有与军队密切联系的卡代能够避免此事的发生,培于1月中旬出席在巴色的卡代葬礼(有成千上万的送葬者参加)时说:“在这个关系国家未来的



1955年,富米·诺萨万是皇家老挝陆军一名年轻的陆军中校。他以前与自由老挝一起反对法国的重返,1949年他与其他大多数自由老挝领导人一起召集成立了皇家老挝政府。1958年,他成为一名上校。美国对军队的援助大大加强了军队染指老挝政治的程度。一直到1965年,他都被迫逃离老挝。富米属于军事铁腕人物,比其他人更不遗余力地站在皇家老挝政府这边破坏梭发那·富马的中立主义政见。(承蒙 French military archives 提供)

重要时刻,他的去世使我们感到非常痛心。毫无疑问,如果他还活着,事情就不会是他们今天做的这个模样了。”沙立·他那叻(Sarit Thanarat)于1958年10月在泰国实施戒严法,宣称泰国的问题需要泰国的而不是西方的解决方法。老挝国家利益防御委员会也受到鼓励。沙立的“泰国解决方法”需要美国的武力支持,因此他镇压了所有中立主义者和左派人士的辩论,以便坚决实现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目标。至关重要的是,沙立与富米有姻亲关系,这种关系进一步鼓励了富米想要成为老挝军事铁腕人物的梦想。但老挝不是泰国,政治力量的天平不同。那时的老挝国王行使的权力相对来说比泰国国王要大,泰国国王自从登上王位,他的影响就被披汶政府限制;而且,老挝国王是一位热诚的宪法条例捍卫者。在泰国,一个强大的分等级的官僚

机构政体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已经发展成型,自从1932年专制君主国被推翻,泰国军队在泰国政治中已经确立了其强有力的中心地位。相比之下,老挝的政府机构仍然脆弱且动荡,而仍然处于形成发展阶段的军队很软弱,这就凸显了大人物政治的作用。

暴动者在国王面前宣称拥护宪法、国王任命国王委员会的负责人,受尊敬的寇·阿沛(Kou Abhay)来担任过渡政府的首脑来筹备选举。富米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以前,他是一个年轻的自由老挝成员,现在他成了共产主义者的黑野兽(bête noir),被无休止地指责为一个“美国的玩偶”。但富米成了强硬大人物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理想。托伊描绘他拥有“坦率的微笑和善于说服的态度……他声音轻柔充满诱惑力,他的演讲使人消除敌意,但实际上他和他外表显示的一样无情,在他的人民当中,他有一种略显暴力的神态,从不隐藏掌控权力的愉悦,有一点禁欲的感觉”。<sup>30</sup>作为国防部长,他当时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他和他的国家利益防御委员会的同事们用这种权力通过欺骗来操纵即将到来的选举,包括抬高候选人资格的标准、买选票和恐吓。他们在5月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完全在意料之中。

梭发那·富马的表弟、时任议会首脑的宋萨宁(Somsanith)亲王被任命为首相。宋萨宁也是一名前自由老挝成员,作为前琅南塔省(Luang Nam Tha Province)的省长而受到尊敬。在他的政府里真正的实权操纵在富米手里,但富米没有获得最高职位,这个事实表明他与泰国的沙立不同,不能将其意愿强加于老挝政坛。然而,他其实想要这么做,结果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致使皇家老挝政府再也没有恢复元气。

## 贡勒政变

1960年8月9日黎明前,第二伞兵营训练有素的部队分散穿越万象,不声不响地牢牢控制了政府部门、通信部门和发电厂。这就是贡勒政变,它的领导人贡勒上尉由此成为一名现代传奇人物。在政变之后的日子里,他告诉民众:“我们只看到老挝人无缘无故地杀老挝人。依

照我的经验,很多以前的老挝政府已经告诉我们:他们希望接受中立进程,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做。我们这群人和我决定牺牲一切,甚至于我们的生命,目的就是要给这个国家带来和平与中立。”这次政变完全是突如其来的。就在政变的前一天,整个内阁包括富米都离开万象去琅勃拉邦,准备与国王讨论已故国王西萨旺·冯葬礼的最后计划,后者的遗体自从1959年10月就一直被保存在一个华丽的檀香木棺材里,等待合适的时间火葬。自认为与陆军保持有特权关系的美国人也大为惊讶。像很多中立主义者一样,贡勒不信任美国对老挝陆军和政治的影响,他出于深层的文化上的考虑,担心老挝过快陷入冷战的漩涡。作为一名士兵,他厌恶地看到万象的政客们和将军们在美国援助下日益变“胖”,而他的士兵们却要面对困苦和死亡。这横空出世的卑微个体像圣人般拯救国家于外国人手中,这使他变得非常受欢迎。亚瑟·多门(Arthur Dommen)是这些事件的目击者,他写道:“贡勒从他熟悉可信的士兵环境中脱颖而出,突然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其举动成了既谦卑又耀目的奇异混合物。他乐于取悦人们,他在万象分发了上千张自己身着上尉军服的照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富米过去想完成但由于美国的遏制没进行的行动,最终由中立主义者贡勒予以实现,这将军队推到了老挝政治舞台的中心。

贡勒的政治活动是简单甚至幼稚的,他和他的战友们对接下来要做什么毫无主张。被政变者暂时逮捕的欧栋·萨纳尼空(Oudone Sananikhone)上校评论道:“当我问他们关于国家经济和商业生活的计划时,很明显,除了去劫掠银行,他们一点也不了解经济计划。”贡勒要求恢复梭发那·富马的首相职务,的确,梭发那·富马亲王尝试引导这个行动回到合法的途径上去,8月13日国家议会通过了一项反对宋萨宁政府的谴责议案。为了支持梭发那的活动,宋萨宁引退,梭发那组建了一个不包括国家利益防御委员会的政府。危机似乎已经被避免,甚至富米看起来都已经默认。然而,大人物政治的运作方式不允许富米重返万象后由他的一名下级士兵限制他的活动。他仍然控制老挝陆军大部分的补给,5个军事地区(万象除外)中有4个地区的指挥官都拥

护他,他能够承诺支付那些支持他的部队的薪水,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至少已经承诺继续提供资金。此外,泰国的沙立正极力主张对这起在他看来是亲共产党政变实行强硬政策。因此,富米从琅勃拉邦逃到曼谷与沙立磋商,然后返回他的家乡沙湾拿吉去组织反对该政变。

美国人对于这次行动也反应不一。分歧于1958年3月贺瑞斯·史密斯(Horace Smith)被任命为大使时已经出现,他与中情局的站长因对老挝的政策有不同意见而结怨,后者偏爱他们的军事接触。就在这次行动前一个月,温思罗普·布朗(Winthrop Brown)取代了史密斯出任大使,他赞同贡勒,再次与富米在中情局和五角大楼的支持者态度相反。白纸黑字的冷战事实面临挑战。1958年《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出版发行,这部以美国援助老挝和泰国为素材的半虚构畅销著作的出现,标志着美国对这个地区态度开始趋于微妙。但此时美国对老挝的政策却出现分歧。

118

新任美国大使支持梭发那·富马,于是后者迅速地开始与左派和右派谈判。特别是他认识到富米必须被考虑,否则这个国家将会有内战的危险。因此,8月17日,富米作为副首相和内务部长进入内阁。然而,这个内阁最终夭折。右派分子已经谨慎地重返被贡勒控制的首都,贡勒本人还火上浇油,通过万象广播电台在一次广播节目中激动地公开指责新内阁,为此他被一向圆滑的梭发那·富马所痛斥。傲慢而又自尊的情绪在这个多变的环境里滋生,贡勒又一次冒犯了富米。在随从护卫下回到沙湾拿吉的富米显然确信,他没能获得国防部长的职位,就是拒不参加新政府的充分理由,尤其是当时他还得到大多数军队、沙立和中情局的支持。掌握南方大部忠诚的文翁·纳占巴塞亲王与其一起加入反政变委员会(Counter Coup d'Etat Committee)来反对贡勒和通过武力建立的新政府。无标志的飞机开始往沙湾拿吉运送战争物资,泰国的马歇尔·沙立对万象进行非官方封锁。

10月,美国暂停其给梭发那政府的现款补助金援助,并派遣前大使、现助理国务卿格雷厄姆·帕森斯,一名冷战的忠实拥护者,来与梭发那会谈。帕森斯坚持与老挝爱国阵线的谈判应该终止,但梭发那不同意。布

119 朗大使尽力以中间人的身份提出一个折衷办法,即当两个反共产党力量争论时,把双方的注意力引向巴特寮造成的危险上。通过让梭发那同意继续向沙湾拿吉运送武器,他再次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援助,前提是这些武器只用来对付巴特寮。但所有这些中间人在交战双方之间提出的交易尝试最终都失败了。泰国的封锁已经迫使梭发那·富马政府转向苏联寻求空运燃料来维持万象的运转,这个举动进一步激发了右派的猜疑,并预示苏联将在下一年起到决定性作用。即使美国在 11 月 30 日切断了对富米的供应,也已经失去了对这些事情的控制。

12 月的第一周,富米的部队向万象进军,在两周的激战中,600 人死亡,城市的大部分区域被毁坏。12 月 9 日,梭发那·富马流亡柬埔寨。12 月 10 日,他的左派内阁部长奎宁·奔舍那(Quinim Pholsena)飞往河内并签署了协议,越南向反对富米的部队空运武器和物资,这些部队也包括北越操控的炮兵部队。即使如此,中立主义者依然在武器装



1960 年 8 月贡勒上校(右)发起的政变对老挝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中立主义士兵们被迫撤退到查尔平原。1961 年,他就是在那里加入了中立主义首相梭发那·富马(左)的队伍。(承蒙 Souvanna Phouma 提供)

备上落了下风,贡勒和他的部队撤退到通往琅勃拉邦的公路上,最后在查尔平原建立了他们的司令部,在那里巴特寮部队也加入进来。12月11日,国家议会在沙湾拿吉召开,谴责梭发那的内阁,几天后,一个文翁亲王领导的政府受王宫委托组建来“临时管理”王国的事务。梭发那·富马在金边痛苦地指责帕森斯:“他对亚洲一点不了解,对老挝一点不了解。助理国务卿是这些人中最恶毒、最应该谴责的人。他使所推行的美国对老挝政策遭遇了彻底的失败。他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都要对最近老挝人的流血负责。”事实上,右派的政策完全是事与愿违,因为它导致共产主义势力在老挝的急剧扩大。

### 共产主义影响在上升\*

120

直到这次政变时,老挝巴特寮部队仍然非常弱小,可能总共只有几千人。他们的目标仍然从属于越南共产党的目标,越共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外国不能在老挝建立基地(也是日内瓦协议的一个先决条件)。例如,美国在查尔平原的空军基地处在可轻松打击河内的距离范围内,这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战略上是个噩梦。如果一个老挝的中立联合政府能够不许外国基地进入老挝,越南民主共和国将会支持该政府,至少是暂时支持。如果右派在老挝掌权并试图拒绝越南使用胡志明小道,越南民主共和国准备在巴特寮的势力之下使用常规部队来确保这条通道的畅通。然而在1958年,无论梭发那·富马政府还是后来的培政府都坚持说,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要件在老挝都已经达到;也就是说,已经举行选举使巴特寮重新融入老挝王国。这对北越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们通过范文同总理于1958年初宣布,正如日内瓦会议上概述的一样,印度支那三国家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换句话说,老挝人可以尝试,但北越不会允许他们将他们的内部问题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问题分开。正是这种无情的决定将老挝拖入越南战争的大

121

---

\* 作者对本节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故本节中文版所标示的原文页码仅供参考。——编者注

漩涡中。1959年间,在反对万象右倾的背景下,巴特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加强了他们在北部省份的军事力量。1959年6月3日,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越南的“促进老挝骨干组”在越南会谈,并考虑三个可能的方案。“第一种方案是美国人武装干涉老挝;第二种方案是美国没有干涉,局势维持现状;第三种方案是,假如中立派掌权,巴特寮将采用一种‘边打边谈’的策略。在这次决定性的会议中,越南和老挝共产党领导人决定改变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路线,即从政治(‘合法的’)斗争转变为主要依靠武装斗争。”<sup>31</sup>

贡勒的行动导致了反共产主义力量的分裂,这对他们来说是天赐良机,因为这使得与中立力量武装结盟反对右派成为可能。贡勒在查尔平原建立他的司令部后,苏联声称要实践他们对梭发那·富马政府的承诺。他们开始飞入老挝,不但带来支持贡勒军队的军需补给,而且也带来了巴特寮的部队,使后者能够将自己变成正规军。这种联盟在巴特寮控制的地区展开,并延伸到他们控制的乡村政府里。此外,很多在万象时就团结在贡勒身边的年轻学生和其他人被空运到查尔平原,他们中的大多数被巴特寮招募。北京也宣布支持“解放运动”,并于1960年提供给巴特寮部队足够装备2万人的武器和补给。

122 反共产主义力量的分裂导致皇家老挝陆军中出现混乱与士气消沉,它在富米的领导下毫无斗志地作战。皇家老挝陆军无法与北越正规军相比,北越正规军经常被用作先锋部队发动进攻,而巴特寮的部队则被用来做扫尾工作或者追捕恐慌的皇家老挝陆军士兵。富米军队死气沉沉的表现打破了右派通过军队解决老挝危机的希望。萨旺·瓦达那国王在越来越多的幕后压力下开始参加一场政治争斗,这场争斗事关是否组建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府。他拒绝组建这样的政府是因为这样做会损害君主立宪制,而这也许是灾难性的,他感到他要比过去更实际。2月19日他向国民发表演说:“老挝人民,已经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厄运一方面是老挝人不团结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外国干涉的结果。外面的国家既不关心我们的利益也不关心我们的

和平；他们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个演讲激励着梭发那·富马亲王，他从金边飞往查尔平原开始寻求另一种政治解决方法。他于3月初在金边成功地安排了与富米的会谈，但共产主义者希望将他们在战场上的胜利转变为资本，对参加会谈不很情愿。有利于新和平会谈的势头于3月22日被极大地促进，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将他的砝码放到了中立的老挝上，支持梭发那·富马。一个月之前，富马还忧郁地评论道：

美国人说我是共产党。所有这一切真让人心碎。他们怎么能认为我是个共产党？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方法使老挝没有共产党。另一方面，亲西方并不意味着亲美国。反美并不意味着亲共。当我们说我们是反美的，我们是反对美国当时的政策。我们反美因为这些美国人不理解老挝，他们只关注他们自己的利益。<sup>32</sup>

在肯尼迪的领导下，美国终于从冷战噩梦中醒来，开始更清楚地看着这个世界，包括梭发那在老挝的必不可少的作用。

苏联对于美国的转变表示欢迎，在4月与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  
123  
联席主席——英国一起向12个国家发出邀请，请它们参加一次“老挝问题国际会议”。但是在会议现场，争斗仍然在继续，因为共产主义力量试图将它们的收益最大化。富米不管美国的压力，顽强地拒绝接受再一次组建同盟政府。1962年1月，三位亲王——文翁·纳占巴塞亲王、梭发那·富马和苏发努·冯在苏黎世会面，他们同意左派和右派在联盟里面有相同的代表权。为了强迫富米同意这个建议，美国暂停了经济  
124  
和军事援助。富米已经求助于老挝财政以前的支柱——鸦片贸易来抵抗美国的压力，但这不足以支付士兵和政府。这种赤字再加上皇家老挝陆军在琅南塔(Luang Nam Tha)的军事溃败使得富米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他只得同意与梭发那会谈。同时，由沙立陪同他和文翁与泰国国王举行了会谈，泰国国王很熟悉美国对1949年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事件的表现，因此对老挝的发展感到非常焦虑。这两个老挝



人也表达了他们对看到国王遭到“美国背叛”而感到悲痛。几天之后国王照会美国驻泰大使，要让美国人明白老挝人“不同的性格和心态”。大使写道：

国王告诉我，他很理解老挝人对美国人感情上的反应，因为泰国人几年前也经历了相似的体验，当时在美国人与泰国人之间也有许多强烈而又苦涩的冲突。今天泰国与美国的关系良好……美国现在也需要对这个亚洲小国敏感的人民表现出圆通和体贴。老挝人民与泰国人民在这点上是一致的。国王说他希望老挝人与美国人最终也会建立类似的关系。<sup>3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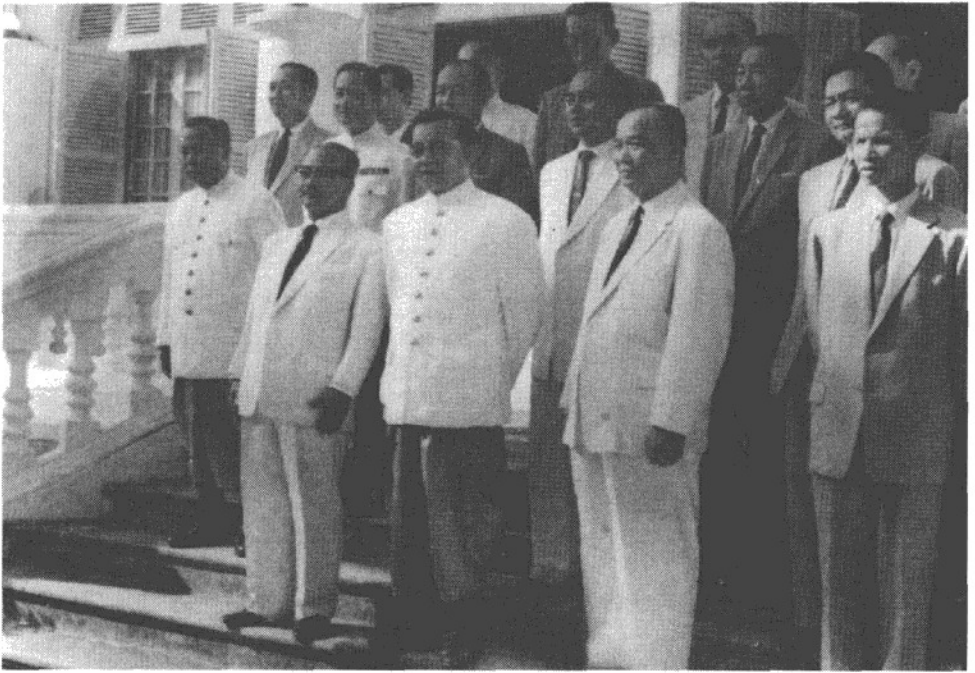
1961年在万象北部的南利(Nam lik)，三位亲王——文翁代表右派，梭发那·富马代表中立派，苏发努·冯代表左派参加会谈。这只是长达14个月间的众多会谈中的一次，在会谈中各派试图就组建同盟政府达成一致。1962年7月23日最终签署了协议，但协议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立派的力量在过去的2年里被严重地削弱了。老挝被无可挽回地拉入扩大的越南战争中。(承蒙 Souvanna Phouma 提供)

## 中立主义的消失

7月,各方就组建一个国家联盟临时政府达成一致,该政府由11位中立人士、4位右派人士和4位巴特寮人士组成。梭发那任首相兼国防部长,苏发努·冯任副首相兼经济部长,富米任另一位副首相兼财政部长。文翁亲王从政界退休。很多原来日内瓦会议的条款被重申,包括不允许保留外国基地,并发布了一个外国部队撤出的时间表。该临时政府只存在到通过选举正当地建立一个稳定政府之时。双方将继续管理各自的区域,但是这意味着永远无法证实是否已将1万人的越南部队从巴特寮地区撤出。美国和泰国的军事人员在国际监督下撤出,虽然中情局继续秘密支持在查尔平原周边迅速发展的非正规部队,该部队由苗族上校王宝指挥。而梭发那·富马希望能够组建一个强大的中间派政党,其成员部分来自叛离左派和右派的人士,当他的军事武装基地——贡勒的中立军队在接受美国军事援助上与他分裂时,这个计划开始施行。当苏联向查尔平原的空运结束时,贡勒的部队需要重新补给。梭发那同意让美国航空公司(中情局提供资金的航空公司)来运送美国补给,巴特寮表示反对。11月,一架飞机被中立派的德尼·孙纳拉(Deuane Sunnarat)上校指挥击落,他与巴特寮关系密切。贡勒最亲密的战友凯萨纳(Ketsana)上校试图逮捕相关责任人。巴特寮阻止了凯萨纳上校,两个月后上校被暗杀。为了报复,偏左派的中立人士、外交部长奎宁·奔舍那于1963年4月1日在万象被他自己的一名卫兵暗杀。报复行为愈演愈烈,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全,苏发努·冯和富米·冯维希都离开了首都。在查尔平原,巴特寮和德尼的部队对贡勒的士兵发动了一次较大的袭击,贡勒的军队被驱赶到平原的西部边缘地带,同时也被赶到了老挝政治的边缘。中立派武装力量的作用实际上已经终结,伴随它的终结,梭发那·富马所设想的中立派政府的前途也就结束了。

125

作为回应,美国增加了其对王宝指挥的苗族武装和皇家老挝陆军的补给,它们仍然是右派的主要军事基础。这时出现了一个新基础,他



1962年7月,同盟政府成立。自左至右,第一排:苏发努·冯亲王、梭发那·富马亲王、富米·诺萨万、莱姆·英锡相迈(Leum Insisiengmay);第二排:波杉·苏威莱(Bounthan Souvilay)、楠·萨纳尼空(Ngone Sannanikone)、西苏芒·西萨莱姆萨(Sisoumang Sisaleumsak)亲王、方·丰萨万(Pheng Phongsavan)、坎苏·凯拉(Khamsouk Keola)、奎宁·奔舍那;第三排:霍安·孟寇·维莱(Heuan Mongkol Vilay)、克欧·威帕考(Keo Vipakhone)(被遮挡住)、坎冯·波帕(Khampheng Bopha)、波通·佛拉旺(Bounthong Voravong)。

就是老挝国家警察的负责人西豪 兰普塔坤(Siho Lanphoutakun)将  
126 军。在20世纪50年代,文翁·纳占巴塞亲王曾轻蔑地谈到此人,说他  
试图与泰国臭名昭著的警察头子炮(Phao)一决高下。一封美国大使馆  
的急件里这样描述西豪:他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政治顾虑、没有  
127 坚定信念的政治人物”。像炮和世界上其他不受控制的政治首领一样,  
西豪参与赌博、卖淫和勒索。至少当时是西豪同盟者的富米也在万象  
开了一家赌场,但这似乎是富米为摆脱外来者以便财政独立而不断探索  
的一部分,而不像西豪是纯粹的贪赃枉法。西豪将生意上与政治上的  
对手作为亲共分子来告发,他与库蒲拉西·阿沛(Kouprasit Abhay)  
将军尝试发动一次政变。所有的政府部长都被撤职,包括富米。然而,  
这两个政变发动者没有得到国际上的支持,政变失败了。

接下来的一年,大人物政治的种种计谋首先迫使富米和西豪于1965年逃往泰国,然后迫使贡勒逃往巴黎。与国王关系密切的欧安·拉提孔(Ouan Rathikhoun)将军接任陆军总司令,但作为妥协,地区指挥官将全权管理他们的地区,中央的干涉越少越好。欧栋·萨纳尼空上校写道:“军事地区指挥官和他们控制的部队迅速地变成了各省的权力核心和来源。国内政府需要仰仗军队的支持来实行所有国内计划。”这最终抑制了大人物们的对抗,但这也牺牲了他们在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巴特寮和北越时的协作关系。这种情形只在1971年发生变化,当时西苏克·纳占巴塞(Sisouk Na Champasak)成为国防部长,并着手使军事力量重新集中于中央控制之下。

这一时期的权力分散部分是新老挝政府不能加强其官僚机构的结果,否则它可能已经足以抗衡军队机构了。就是其结构上的弱点增强了大人物政治,并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政客和将军的所作所为。这几乎变成了评论老挝的陈词滥调:这些人不能够为了国家的利益压制他们个人的利益和对抗。但实际上,他们都抱有强烈和坚定的民族主义信仰并为之



1963年,萨旺·瓦达那国王为增加日内瓦协议中的国际支持而出访世界,他认为日内瓦协议只有在国际支持下才能继续。1963年2月,他在华盛顿会见了肯尼迪总统,肯尼迪总统表示相信梭发那·富马亲王建立一个中立政府的尝试。然而,肯尼迪不久遇刺,美国在越南逐步升级的冲突中越陷越深,这也使老挝身陷其中。

而斗争。由于军队或共产主义者的专政并不彻底,短时期内不能克服这个体制固有的分歧。如果又弱又小的老挝政府没有碰到巨大的外部压力,它也许会最终克服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但在接下来的10年里,皇家老挝政府将会遭受许多即使更强大的政府也不可能承受的压力。

警察头子西豪的结局向外国观察员呈现出一个文化上更猜不透的难题。一个泰国佛教僧侣劝告西豪,说他回到老挝会更加安全,西豪佩戴着能保佑自己的护身符于1966年4月17日在巴色向当局自首。他被监禁在万象北部的普考凯(Phu Khao Kwai),9月4日他“因试图越狱”而被击毙。没有人为他的死而哀悼。在老挝人眼中,他的生命已经走完了该走的历程。

### 巴特寮统治下的生活

皇家老挝政府控制的地区是对外开放的,为外国观察员和记者所监督,巴特寮地区则是禁区,只有偶尔会为外交官、记者或志同道合者安排被小心控制和引导的观光(在革命之后极权主义施加控制的前奏)。因此宣传的重点落在皇家老挝政府政客和将军身上,夸大他们的弱点并贬低他们的优点。不过,粗略勾勒出巴特寮地区的情况还是可能的。

1964年第二届同盟政府垮台之前,巴特寮地区大体上覆盖了半个老挝,由于多为山区,因此人口不多。这一地区人口大约占老挝人口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大多数人口属于各种少数民族。巴特寮和他们的北越支持者控制该地区主要是为了能够阻碍皇家老挝政府的进入。然而,他们不能够直接控制这一地区的所有村庄,因为人口的分散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他们管理的能力。

巴特寮对华潘和丰沙里这两个省控制最严格,他们控制这两个省时间很长,此外还有南方波罗芬高原的东部。在这两个地区之间的边缘地带则控制得没那么紧,很多村庄都处于无人地带。巴特寮为了控制蒙、区、村政府,要么直接暗杀现任者,要么通过政府操控的“批斗大会”和“人民法庭”将现任者免职,然后他们可能被枪杀或者坐牢。挑选合适的人作为新的负责人或者通过口头表决选举——换句话说,在一种公开的环境下,任何持不同意见的选民很容易被识别。不同意见者要作出解释,并在宣传运动中展示他们的“错误”。在巴特寮地区对政治立场的党派人士控制意味着,为第二次政治同盟举行的自由选举永

远不会发生。

这种不民主的现实状况农民已经习以为常，他们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形式的政府那里尝过民主的滋味。然而，皇家老挝政府发起的国民选举见证了一个宣传新政治统治观点的开始，所有的国家公民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来决定国家的命运。在这点上，几次由皇家老挝政府发起的选举运动——不管它们失败与否——都是关于民族主义和公民权的问题在民众教育中的一次演习。不幸的是，这些选举至多有一半人口参加，民主和自由的新概念对他们来说非常陌生，只是一知半解。巴特寮也谈民族主义和平等，因此不管它们的来源是什么，这些观念的合法性都在逐渐地传播。自由民主政治的理想在城市里最能被接受，但在乡村最不能被接受，乡村对极度专制主义的反应只是赶走旧的专制主义而不是站起来要求自己的权利。

共产党人在村庄中建立起妇女和青年人的“群众”组织，以及各种各样的委员会。（1975年革命之后，人们抱怨没完没了的政治会议，1975年之前来自共产党地区的难民也是如此。）青年人的组织尤为重要，因为年轻人被视为“新社会”的种子，很多青年人（作为技工、护士或医生）被送到越南进修和接受政治灌输。巴特寮在教育上努力的成果有目共睹，同样有力的是对即使是非常小的腐败也严厉打击。当一切都服从于斗争的“更高目标”时，任何“多余的财富”都被投向支持巴特寮军队。因此巴特寮对一些“挥霍”的花费非常反感，如宗教仪式和供养佛教僧侣。他们建立合作社来控制农产品的销售并取代小商人。征收15%的稻米税还有施加压力让农民们“发自内心”地捐赠稻米，这在高地地区不受欢迎，因为这个地区的产量比较低。当然，也有逃税。人们开始尽可能地衣着朴素，不再佩戴首饰来避免被人指责富有（这种现象在1975年之后非常普遍）。在那些更早被巴特寮控制的地区，个人都携带“公分账册”，上面记录交税、自愿捐款、参加庆祝活动和群众大会的情况、对革命的劳动贡献，一句话，是人们作为巴特寮公民的个人资产一览表。个人的档案材料也被收集，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可信任的个人。最遭愤恨的是强征劳役，特别是为部队的运输系统。有无数长

130

达一周时间的“短期外出”劳役,几乎没人能够被豁免,体力好的人被要求至少每年有一次大约 30 天的“长期外出”劳役。除此之外,尽管一些关键路线由北越工程单位来负责,人们还被要求建筑公路和维修公路。征兵年龄是 15 岁以上,也有报道说 13 岁的孩子也被征募。(要记住,在人口稀少的老挝,劳动力对于双方来说都短缺。)

131 正如 19 世纪的欧洲,军队作为一所爱国主义和现代技能的学校在起作用。军队将人们从村庄和族群中带走,把他们介绍给陌生人,他们的相似性是“民族”,大家都被称为“老挝人”。此外,战争也帮助建立一个“我们”来反对一个外国的“他们”(在这里,“他们”是美国人及其在万象的“奴仆”)。巴特寮的宣传既简单又排外。正如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一位难民所说:

我被不断告知我是老挝的主人。老挝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有许多河流、小溪,还有很多的自然资源。由于外国的侵略和压迫,老挝人民不能利用这些资源。例如,法国统治老挝超过 60 年……他们告诉我们,老挝人民最主要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sup>34</sup>

或如另一个难民所说,他们被教育“我们是老挝人,外国的任何东西都对我们没有好处”。

外国观察员通常高估巴特寮军队的质量,因为他们几乎无法区分巴特寮及其越南同盟者。但一位英国外交官默文·布朗(Mervyn Brown)于 1962 年 6 月被巴特寮作为俘虏监禁了一个月,他得出结论:“按照世界标准,巴特寮是无能力和懒惰的士兵。但与他们的实际对手相比,他们却是坚强而又有效的游击武装力量。”在巴特寮这边,成千上万北越顾问中的叛离者或俘虏都严厉批评巴特寮。其中一位告诉记者:

132 越南人纪律严明、组织严密。老挝人则不同。有时,老挝部队坦白说他们想叛逃或者他们不愿意工作。他们的首领通常只是听后笑一笑。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越南人的部队里,那就要当心

了……但在巴特寮内部，一位军官如果惩罚这样的人，就要担心会不会被这个人或其他士兵枪击。<sup>35</sup>

他也谈到越南军官很藐视老挝军官：“他们嘲弄老挝军官，因为他们经常挎着装着手枪的枪套，枪套低垂在屁股上面，走起路来还昂首阔步。”另一方面，这位越南人说，老挝人有点被越南人的纪律和约束吓住。

至于巴特寮士兵，他们的士气很低；他们是低劣的战士和枪手。有时现场没有敌人了他们还在开火。他们的军官不能在战斗中控制自己的士兵。他们不能保守军事活动的秘密……越南人不信任老挝人，但老挝人信赖越南人，所以在战斗中不能密切协调来打败敌人。巴特寮武装力量薄弱。如果他们被派往某处，也要派一队越南人武装陪同。<sup>36</sup>

这些抱怨与美国顾问对皇家老挝陆军士兵的抱怨惊人地相似。

大人物政治的一种也在巴特寮地区起作用。少数民族认为，大人物拥有特殊的“灵魂材料”来维持他们对追随者的权威。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拉维族的领导人西通·库马丹(Sithone Khommadam)，他的父亲曾长期反抗法国人。西通在他父亲被暗杀后被法国人投入监狱，后来被苏发努·冯招募到反殖民的事业中。他被选为老挝爱国阵线南方代表之一，1958年他再次入狱但很快越狱并回到南方山区。西通结合了传统首领(通过号召亲属和部族联盟)和巴特寮现代政党组织的优点。他具有感召力；默文·布朗被他所吸引，描绘他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力姿态，一张严肃但英俊的脸，坦率的眼睛和非常有吸引力的微笑。在这里我们都感觉到他就是天生的领导者”。重要的是大人物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他们口中的话语。布朗向那些沉溺于英雄幻象的人犀利地描绘了西通在一群阿黛族人面前的一次演讲：

133

在相当困难的境况下他讲得很好。他的听众们仍然无动于



衷,在演讲中没有热情的迹象。还有不断的干扰:有人走向前,往火里添加木材,几只狗在他脚边追逐,孩子们的哭泣声等等。在他的演讲过程中,部落里水烟袋的冒泡声是持续不断且异常扫兴的背景音。这种水烟袋大约有巴松管那么大,烟通过水而被吸入,所有的人都抽这种水烟袋,男性、女性,甚至相当小的孩子……伴随着一些笨拙的手势,他的结束语谈到为实现一个团结、和平和独立的老挝而继续斗争的必要性。<sup>37</sup>

有些东西对于他的听众来说无疑太抽象了,比如他提及到了文翁·纳占巴塞和富米派系,甚至蒋介石,这对听众来说完全陌生。不要紧,他们知道这些家伙是领导人认为的“坏家伙”。苗族巴特寮领导人费当·罗比瑶(Faydang Lobliayao)也要依靠相似的个人和亲属联盟,虽然不像西通那样在南方高地是无人能比的领导,费当要与杜比·李峰氏族的影响相竞争。然而,一般说来,列宁主义政党的结构能够很好地控制这些大人物。在巴特寮地区几乎没有什么战利品可以来重新分配,但一旦共产党获得了政权,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 少数民族

也许关于现代老挝历史最持续的误解之一就是,巴特寮赢得胜利是因为他们能够动员起少数民族;皇家老挝政府失败是因为它仍然挤在沿湄公河低地的城镇和城市里。这种观点并未扎根于持续的研究,只不过由于一个又一个的时事评论员不断地重复,最后由于疏忽而变成了标准观点。由于少数民族的地理位置,他们在现代老挝历史中起到重要作用——他们沿着中央越南山脉分散分布,而中央越南山脉长期作为老挝和越南的天然边界。

老挝与越南、柬埔寨、泰国不同,其主体民族在人口中不占优势。老挝族只占总人口的40%至50%,其他的人口(通常被称为山地民族)又被分成很多不同的民族。这种总体的描述在几个方面存在误导。首先,山地民族分类下包括高地民族、非佛教徒傣族(老挝人和泰国人的

祖先),他们在文化上经过逐渐的转化,成为今天的老挝人和泰国人,这个过程今天还在持续。这些民族被组织成蒙,偶尔演变成小王国,因此不能被描述为“部族”。老挝西北的佛教徒傣仂族,有时也被称为“部族”,但与老挝族几乎难以区分。在老挝南部的甘蒙、沙湾拿吉、沙拉湾,有人发现了普泰族人,他们是非佛教徒的傣族,就像北部的黑傣和白傣一样。这些民族中的许多正处于演变为老挝族的过程中,这个整体的老挝化过程模糊了他们之间的界线。因此,广义的

傣族人口也许占总人口的60%至70%。各种民族对自己民族的感知或者区分,不但因地点和时间而不同,而且随着所处环境的不同而不同。

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皇家老挝政府根据更早的法国分类,开始正式将孟-高棉和南岛语族作为“老听族”(即“居住在高地者”)——一个地理名字来指那些倾向于住在山里的民族。这个词被用来取代“卡人”——泛指所有地位较低的人,无论其种族归属。(这种分等级的含义仍然被保留在文雅的言语中,例如当一个年轻人提到一位长者时,“kha noi”意为“我”。)以此为开端,皇家老挝政府开始一种自觉的转变,从前现代的社会关系转变到那些现代民主所要求的关系。因此,1947年宪法规定“老挝公民都是包括所有在老挝领土上长期生活的各种族的个体,并不具有其他任何国籍”,这一种族平等的声明领先于邻国,例如泰国。这也领先于一些自由民主国家,如澳大利亚,其土著居民直到1967年才拥有完全的政治权利;还有美国,其黑人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在南方获得完全公民权利。当然,这不能阻止



一张皇家老挝政府的宣传海报,展示老挝各种民族的和谐统一。

来自这些国家的时事评论员采取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态度,他们认为老挝人对于少数民族有偏见。

136 统治阶层的个别成员,如宋萨宁亲王是西北部华孔省(Hua Khong,今琅南塔省和波乔省)的省长,他对少数民族事务怀有深入而持续的兴趣。据称他几次徒步进入这个少数民族聚居省里的所有村庄。他于1959年创办了《老挝蒙》(*Muang Lao*)杂志,该杂志以刊登、连载多种少数民族的文章和照片而出名。卡代1948年出版的《自由老挝史》一书特意刊登了一幅照片,是卡代与两名来自沙拉湾的达奥族(Ta Oi)妇女的合影。卡代曾建议老挝改名为澜沧,从而去除隐藏在名字里的种族含义。在山地少数民族和老挝族之间的传统仪式联系每年都被琅勃拉邦法院重新确认,在占巴塞则由文翁·纳来重新确认,老挝国王和贵族借此承认卡人为他们的“兄长”,取消了正规的等级制度,因为卡人被认定为先拥有这片土地。很多少数民族不但不是部族,还与低地国家在更广泛的宗教仪式上有联系,而且至少是地区经济的一部分。例如,来自琅勃拉邦的佉木族(khamu)随季节在泰国清迈以伐柚木为业。只有那些崎岖高山上最偏僻的群落才接近“部族”这个概念,而且只在某些地方才有很小的群落以狩猎采集者的身份来维持他们的生活。

### 苗族高地政治与皇家老挝政府

那些最容易分清的部族是最近由中国迁入老挝,或分布在老中边界两侧的部族。他们主要包括苗族、瑶族和阿卡族(Koh 或 Akha)。这些民族有一个地理意义上的统称——“老松”(Lao sung),因为他们一般都在高山上居住,但1975年前很少有人使用这个术语。苗族在这些民族中人口最多,截至1975年,在川圹省共有超过30万苗族,在周边北部省份也有分散居住。苗族在农黑地区占据优势,20世纪20年代法国人将该地区交给当地的苗族人来进行管理。这种安排试图稳固通过婚姻形成的总是多变的跨部落联盟。即使如此,仇恨仍然会没完没了地在群落和个体之间爆发,而且其中一个例子造成了长期重大的

影响。川圻的普安族(Phuan)省长、普安侯国的后裔塞坎(Saikham)解释道：

两个苗族宗族在农黑共享权力：罗氏(Lo)宗族和李氏(Ly)宗族。罗氏宗族的首领是罗比瑶，李氏宗族的首领则是杜比的父亲。两个宗族结盟：杜比的父亲娶了罗比瑶的一个女儿。但是女儿马上返回她父亲家声称她丈夫虐待她。罗比瑶坚持让自己女儿回她丈夫家，但不久女儿得病去世。罗比瑶及其儿子们因此开始反对李氏宗族，并声称李家的女儿死于虐待。<sup>3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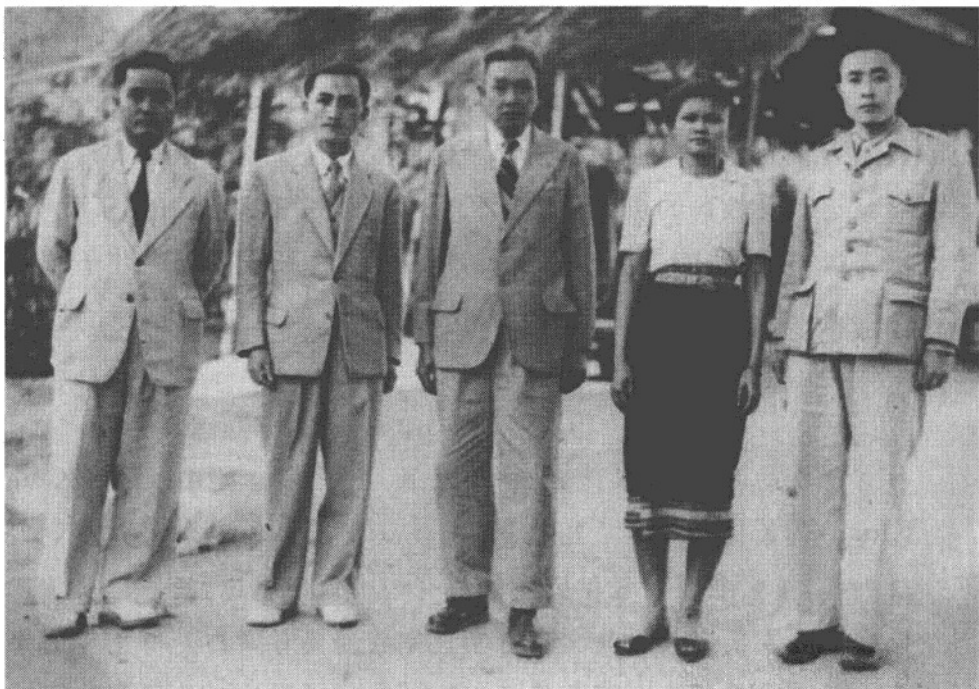
137

在接任政府官职上的争论加剧了矛盾。杜比·李峰(Thouby Lyfoung)及其兄弟们在苗族中是第一批接受法语教育的。他们的父亲从鸦片中获得财富后，出人意料地于20世纪20年代雇佣了一位老挝族教师到农黑来教育他的儿子们。他们后来与塞坎等人去川圻和万象学习。这种受教育的机会使得李氏宗族在竞争官职上占据了优势，罗比瑶去世后，杜比的哥哥接替了他的位置。后来罗比瑶的儿子罗费当(Lo Fay Dang)与杜比竞争一个区长的职位。受过教育的杜比获胜，正如其在回忆录里解释的：

苗族的显贵和长老碰过几次面但都没能提名更谷(Keng Khuai)的新区长。最后，他们同意提议我来担任这个职务。他们告诉我，虽然我很年轻但我受过教育……他们也说，我同时属于罗氏宗族和李氏宗族。我父亲是李氏宗族而我母亲则是罗比瑶的女儿。任命我担任这个职务将把[宗族]和平带到这一地区。法国政府同意苗族显贵的观点……我的舅舅罗费当仍然不高兴。此后，他开始深深地仇恨法国人……<sup>39</sup>

这场争端使得罗费当进入老挝爱国阵线并任职，而杜比继续成为皇家老挝政府的一个主要支持者。

138 宗族内部的争斗以及种族群落之间的冲突使得高地政治非常复杂。例如,富有一点的苗族不但能够雇佣老挝族教师或贫穷的越南人来给他们建造房屋,而且也能雇用其他的少数民族,如佯木族,在他们的罌粟地里充当劳动力,这些劳力通常变成了吸食鸦片上瘾者。同样,南方的民族等级制度并不是简单地在低地老挝人和高地居民之间一分为二。在那里,民族之间的猜疑可以追溯到奴隶贸易时代,而且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然很普遍。例如,拉维族人抢掠他们临近的部族如纳和族(Nya Heun),就像从前的老挝封建君主一样傲慢地对待他们。所以当库马丹带领很多拉维族人加入老挝爱国阵线时,纳和族人肯定不会追随。



从左至右依次为:杜比·李峰(川圹省的省长)、杜利·李峰(Toulia Lyfoung, 律师兼政治家,坎彭·旺克拉塔娜[Khampheng Vongkotrattana]公主的丈夫)、前宫(Vang Na)的领导人物坎曼·旺克拉塔纳(Khamman Vongkotrattana)亲王、坎菲公主(坎曼的女儿),以及杜固·李峰(Tougeu Lyfoung, 皇家老挝政府第一届国王委员会的成员)。(承蒙 Khamman family 提供)

139 川圹省及查尔平原处于北部老挝的战略中心。这确保了它的人

口,尤其是苗族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老挝历史上起到核心的作用。随着新政府的形成,这个重要的高地的全体居民的行政整合的计划进度也在加速。1946年,苗族李氏宗族的杜比成为川圹省的副省长;1947年,他的兄弟杜利成为新国家议会中川圹省的代表之一。1947年,西萨旺·冯国王授予杜比令平民垂涎的披耶(phaya)爵位,因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抗日本人并支持国王反对自由老挝。两个月后,他的兄长杜固被任命进入萨旺·瓦达那委员会。1965年,杜比自己也成为萨旺·瓦达那国王委员会的成员。在杜比眼中,1947年的宪法中对公民权利的规定意义非凡:

最后,在苗族的集体记忆里,这是苗族第一次像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真正有了一个祖国。苗族人民浮萍般的流浪生涯看来要在老挝结束了……这个使苗族人民成为老挝民族的一部分的第一步已经实现,但完成这一进程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sup>40</sup>

杜比鼓励苗族参与老挝国家和年度的节日,尤其鼓励他们学习老挝语和接受教育。20世纪50年代苗族的社会和文化加速变化,其中也受到基督教传教士的影响,这种变化并不痛苦。苗族和低地老挝人不断增加的互动要求双方都要作出调整,这也在缓慢地发生。

### 王宝的崛起

虽然苗族社会被越盟和法国人之间的战争多次扰乱,然而却是老挝中立武装力量于1961年撤退到查尔平原才不可挽回地将苗族卷入战争的漩涡。1959年初,为了对老挝爱国阵线领土和北越进行长期的侦察巡逻,美国情报机构开始招募高地居民,并在年末组建了特种部队小组。协助美国人行动的是中尉王宝(Vang Pao)。王宝既年轻又精力充沛,他在那时是皇家老挝陆军中唯一的苗族军官。他在整个川圹省、华潘省和丰沙里省帮助组建了村庄自动防御部队。那些有才能的人被派到泰国接受进一步的训练。美国在军事和基督教方面的所作所

为迅速激励了苗族埋藏千年的渴望,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流传一个故事:耶稣基督穿着美国军服乘坐吉普车来并分发武器以便他们能够击退他们的敌人。在贡勒政变之前,王宝已经在第二军事区的苗族中建立了一个可靠的基地;他与富米·诺萨万控制下的右派结盟,在右派撤退到查尔平原之后,他的军队仍然不断侵扰巴特寮和中立派。

为了给这些分散在北方山区的非正规武装力量提供补给,中情局雇佣商业性的美国航空公司,这对于成千上万逃离爆发在查尔平原及周边战争的难民是至关重要的。1960年12月底,大约7万苗族开始迁移到平原附近王宝指定的位置;由于舍弃了他们的田地,他们不得不靠空运供应食物,一次大规模的空运行动由此展开,并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这些难民的境况大多非常糟糕。唐纳德·尚克(Donald Schanche)描绘了一个5000人的族群所遭遇的困境:

141 小孩子们静静地坐在山坡上褐色的烂泥里,死气沉沉的,无力去寻求干燥或舒适,甚至虚弱得无法恳求帮助,他们茫然的眼睛上沾满了结膜炎干脓,空洞地凝视着……一个苗族男子从一个竹子披棚隐蔽处出来,并用他的燧发火枪朝天开火……好像是枪声的回音,从远处的山那边传来三声回响。又一个人死了。<sup>41</sup>

142 然而一旦迁移,这些苗族很多人很多都乐于成为王宝指挥的非正规部队的新兵。无论在日内瓦协议制定期间还是之后,横穿山脉和巴特寮地区内部为苗族供给食物、药品和武器都是引发争论的主要原因,但是考虑到不可能监督越南人遵守这些协议,因此中情局不准备终止其对苗族的秘密支持。巴特寮当时控制着更大的一片固定的地盘,因此一群群的游击队采用当年巴特寮骚扰皇家老挝政府同样的方式来骚扰巴特寮。巴特寮当然想摆脱这种局面。两边都不妥协,最终破坏了日内瓦协议。

查尔平原附近的战争截至1962年底已经产生了14.15万名难民,大多数难民完全或部分地由美国援助补给供养(88000名苗族、26500名老听族、19000名老挝族、大约6000名瑶族和2000名傣仂族)。王



战争横扫老挝北部,尤其是川圻省,不久导致了成千上万的人离开家园。一些人(如照片中的苗族)被空运至川圻省的萨慕通(Sam Thong),靠近王宝的基地。(承蒙 Joel Halpern archives 提供)

宝的武装力量从大约 9 000 人增加到 18 000 人,以万象省北部老挝最高的普比亚山侧面的龙镇(Long Cheng)为基地,成为反对巴特寮和北越部队日益有效的武装。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王宝将其领导下 9 个营的特种部队按照种族构成分类(苗族占 48%、老挝族占 27%、佤木族占 22%、瑶族占 3%),它并不像很多报道所称的那样仅仅是一支“苗族秘密军队”,而是一支多民族混合的武装。利用美国航空公司由直升机和轻型飞机组成的延伸机群,这些武装部队从一个山顶跳到另一个山顶,伸入华潘省内部并直达越南边界。美国国际开发署在美国航空公司的协助下将补给空运到丛林里开辟的简易机场。美国开始训练老挝空军部队使用 T-28 型飞机,这样既能为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也能空中打击胡志明小道和其他从越南渗入的路线。1964 年随着共产党发动进攻,战争逐渐扩大。在梭发那·富马的允许下,美国开始派出侦察飞机监视共产党的动向,其中一架飞机被击落。因此,武装飞机开



始为侦察机护航,并对地面进行火力还击,于是在老挝的美国空战开始了。这时,王宝授意引入泰国雇佣军作为飞行员和炮兵则是使战争扩大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143 20世纪60年代中期,王宝被授予将军军衔,主管至关重要的第二军事区。他及其苗族追随者非常自豪:他已经升至老挝军队的最高职位,而且他也是萨旺·瓦达那国王最忠诚的将军。据说他主管一支“秘密部队”,该部队由在龙镇的一个“秘密中情局基地”操控。当时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位内科医生查尔斯·韦尔登(Charles Weldon)写道:“为一个由众多污秽且破烂的竹子和茅草屋顶组成的房屋组合起了一个相当委婉的名称……这里是老挝最令人讨厌的地方之一。”王宝领导的武装实际上是一个正规军、非正规军和泰国雇佣军的混合物。军事行动的建议是由一小部分中情局特工发出的。一切都由美国援助买单。秘密支持非正规军士兵与秘密支持其他“秘密部队”相同,北越和中国人都在秘密支持巴特寮,所有这一切都违背日内瓦协议。直到今天,批评的焦点之所以都还落在美国的“秘密部队”上,主要是因为这方面的资料更多、更易得。中情局曾经被指控参与“毒品走私”,这涉及一个事实,即王宝和美国航空公司为苗族最重要的经济作物鸦片提供运送协助。

144 在南方,美国特种部队“白星”小队(White Star teams)开始从各种高山少数民族中招募新兵并训练他们。1962年前已经募集了12个连,他们主要被用来阻断胡志明小道和进行侦察。在这一地区,共产党的武装比其对手更早招募新兵,传奇人物库马丹的作用和威望是任何皇家老挝军队里的人物所无法匹敌的。早就越过边界来招募新兵的越南干部也在这群老挝人里招募新兵,像北方招募的少数民族那样,他们被送到位于越南北部为老挝干部建立的库马丹学校(以西通父亲的名字命名)进行训练。由于南方地区的安全对胡志明小道绝对重要,越南人的长期战略中都给予该地区特别重视。对双方而言,在南方征兵是困难的,因为相对缺乏成形的本土政治结构,而且大众一般不愿意参加“低地”政治。最后,虽然南方人在这个进程中也遭到蹂躏,但他们对于



20世纪60年代中期,王宝(用手指着前方者)在一次战役中指挥他的部队。20世纪50年代,王宝在皇家老挝军队中的军衔迅速上升,60年代之前他已经是查尔平原卫戍部队的指挥官。他在贡勒政变之后被拉入战争,到第二次同盟政府时代之前他已经在龙镇建立了基地,在那里开始招募一支非正规军,主要是从苗族中招募,资金方面主要由中情局提供。1964年12月,他被授予将军军衔并被梭发那·富马任命为第二军事区指挥官。接下来的10年,他的部队与巴特寮和北越部队进行了一系列激烈战役。他最后于1975年初被迫逃离他的国家。(承蒙 Roger Warner 提供)

战争结果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而皇家老挝政府在少数民族中得到的影响和支持并不像过去理解的那样弱,不过,老挝爱国阵线的确在某些少数民族中招募到大量士兵,虽然主要是步兵。然而,像默文·布朗这样的观察员和越南人顾问认为依靠老听族是一种软弱的行为。前面提到过的那位越南顾问曾悲伤地说:“在我们的部队只有老听族,没有老龙族加入巴特寮。我们怎么能说人民支持我们?”双方在兵源方面都有局限,这种形势在战争持续期间没有变化。

## 第四章 战争及皇家老挝政府的垮台

145 战争使老挝出现了数以万计无家可归的难民。地处高地的川圹省成了主战场，一边驻有老挝共产党与越南人，另一侧则是皇家老挝政府和美国轰炸机。苗族将军王宝带领着他的非正规军在高地上承受着每一次猛烈的进攻。南部高地沿着胡志明小道也是满目疮痍。此时，老挝社会正在变得更加成熟，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个善于思索且有判断力的知识阶层。他们后来随着革命的胜利而消失。受70年代早期的经济危机和美国打算撤出印度支那的双重影响，皇家老挝政府于1973年同意在这些不利条件下成立联合政府。共产党人很聪明地暗中跨越了协定，再加上北越军队不断出现以及美国财政和军事援助的撤出，最终导致了皇家老挝政府的垮台。

### 146 战争年代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战争逐渐升级。从某种意义上讲，老挝矛盾双方获得旗鼓相当的支持与战争的结局并无关系。由于深陷与邻国越南之间的战斗，美国战略思考的重心转移了，老挝成了主战场舞台上的“配角”——可这并不意味着老挝可以躲过这场野蛮的战争及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

老挝的战争绕过了1963年日内瓦协议的条款,其中一条就是禁止外国军队踏上老挝领土。触觉灵敏的西方记者们用“秘密战争”一词来形容美国在此阶段所扮演的角色。但这些记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人对于此场战争的“隐秘性”都有着奇特的兴趣。日内瓦协议被撕毁,老挝一步步滑向战争,梭发那·富马亲王和皇家老挝政府不断向美国寻求军事支持。梭发那·富马亲王还想将这样秘密的支持以谈判协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但由于美国正与越南开战,因此并不想在老挝问题上抛头露面,从而被拉入对东南亚更大范围的承诺。巴特寮本身一直受到北越的军事支持,也不想将其“秘密越南部队”公开。而越南人由于越战的升级,需要老挝这边的侧翼,特别是胡志明小道,保持安全。中国部队的协助也是秘密进行的。整场战争中,巴特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都一直否认老挝领土上出现过越南军队,尽管皇家老挝政府不时在万象向记者展示抓获的越南士兵,并整理出了北越违反日内瓦协议的资料。只有在1975年后,老挝国内公开歌颂老挝与越南参战队伍的“团结”时,这一事实才得到承认。当时共产党人的宣传和战争备忘录中称越南军队为“志愿军”。



1975年之前,老挝境内活跃着数以万计的北越部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确保穿越老挝的胡志明小道补给供应的畅通,但是也会联合老挝共产党的军队在老挝北部作战。这支“秘密部队”的存在实际上违反了日内瓦协议,尽管整场战争中老挝爱国阵线和北越都否认在老挝驻有越南军队(图中就是在老挝被捕的越南士兵)。1975年后,老挝人民革命党才公开赞颂这些越南“志愿军”。

很难确定战争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可以确定的是,1963年中立部队被迫撤离查尔平原,中立主义再也没有实行的可能;梭发

那·富马亲王的军事基地被逐渐削弱。王宝手下一支有能力重新占领平原的队伍在蠢蠢欲动,空战也在不断升级,战争伤亡不断扩大。

战争不断升级意味着皇家老挝政府和巴特寮在战争指挥中逐渐被边缘化。美国驻老挝大使在引导战争方向上扮演着核心角色,人们讽刺美国大使就是老挝的“第二首相”。美国控制下的皇家老挝政府一直无法应对与越南人控制下的巴特寮之间的复杂情况,不过它对战争的投入程度可以弥补此不足。1964年12月1日,梭发那·富马亲王在确认了巴特寮完全依赖越南人之后,授权美军自主地在老挝北部实行空中封锁来支援王宝的地面部队。此次行动的代号为“滚筒”(BARREL ROLL),它标志着美军的战争目标及战役策划与皇家老挝政府脱钩了。以前美军一直是和皇家老挝政府军队一起行动,可现在他们几乎是单独行动了。1965年3月,美国将军们导演了一场名为“钢铁虎”(STEEL TIGER)的军事行动,其初始目标为老挝南部胡志明小道群,后来演变成了一次大型轰炸行动。直到1968年,老挝北部的战争都是随着季节变化交互进行的。王宝的部队有空中运输的战术优势,他们逢雨季就会肆意进攻共产党部队,因为雨季影响了共产党军队的地面通讯和来自北越的补给;旱季则是共产党部队反攻的时候。然而1968年早期,随着共产党在越南南部开展的大型新年攻势,北越部队向华潘省王宝部队占领区发动了进攻。经过几场试图收回其占领区的血战之后,王宝最终放弃了这些地区。148 双方的人员伤亡都很大,大约有1万名苗族的难民逃离了华潘省。共产党人控制的前沿地区在第二年的雨季可以少受到非正规军队的骚扰了。

由于王宝的部队连续受到重创,老挝北部地区的空军力量支持得到了加强。这都得益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68年10月临时叫停了对越南北部的轰炸,使得轰炸机可以飞赴老挝。结果在1969年上半年,除了老挝南部每天遭受几百次轰炸,老挝北部承受的飞机轰炸次数也从每天20架次(由老挝皇家空军T-28飞机执行)飙升到每天200至

300架次(由美军位于泰国基地的飞机执行)。然而,共产党人于1969年雨季仍然在向前推进,试图完全占领查尔平原。他们的成功只是暂时的,飞机轰炸带来的较大伤亡以及补给线过长使得他们容易遭到王宝部队的反击,最后查尔平原于1969年9月再次被王宝占领。这个地区现在成了一个大的战场,1969—1970年间无家可归的难民数量增加到了15万人。数以万计的难民聚集在龙镇南部的山区里,还有些向西去了沙耶武里。王宝意识到,在新一轮的旱季反攻中他无法守住查尔平原,因此他在1970年2月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带着1.5万名难民(主要是傣族中的普安族)飞往位于湄公河低地的难民村。一位难民回忆说:

他们把我们带到了万象,那里安全,没有什么会伤害我们,生活也好。当时我很不想去万象,因为我非常怀念以前的村子。但是,我太害怕那从不停息的枪声了,所以我决定离开我的土地和花园,离开我养的家畜,离开我种的果树,只身去万象。可是当飞机起飞,我向下看到我的村子时,还是忍不住地伤心。那是生我养我,我度过每一天的地方啊。<sup>42</sup>

此后,查尔平原成为可以“自由开火”的区域,美军的B-52在那里进行了他们第一次毁灭性的轰炸。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军事策略是轰炸和恐吓平民(广岛和长崎就是这项策略那令人震惊的结局),与此相比,他们在越南和老挝的策略是避免平民伤亡。我们这些生于那个年代的人从电视上看到过所谓“智能炸弹”(激光制导炸弹)是怎样命中目标的,这种“智能”在今天都不可能实现。相比之下,越南战争中炸弹的技术还更粗糙,这必然使得平民伤亡更高。在老挝的山区中仍然埋有很多未爆炸的弹药,这些弹药还会继续夺走人的生命。而B-52所进行的无差别地毯式轰炸只适用于那些被假定为没有平民的地区。那里当然不会没有平民,那些未能逃亡但幸存下来的人们都生活在洞穴里或者地道里,南部山区的人则逃进了深深的丛林里,几乎成为原始的采猎

者。人人都对天空有着深深的恐惧。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则给自己挖了深深的山洞,藏在华潘省的芒咸(Vieng Xai)山里。令人讽刺的是,这些山洞现在反而成了旅游景点。



主要是由于美军的轰炸,战争用品至今仍然星星点点地散落在老挝高地地区。有时有人拿它做篱笆,就像图片里这个川圹省的苗族村子一样。可有很多炸弹并非哑弹,仍不时以活生生的例子提醒着人们那战争年代。(Grant Evans 摄)

南部的战争范围也在扩大。1970年3月,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被推翻,这也切断了北越需要经过磅逊港(Kompong Som)的供给路线:西哈努克亲王之前一直对这条供给路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为了不让柬埔寨卷入越南的麻烦之中。这使得经过老挝的一些小道对于活动在越南南部的共产党人的军事活动更重要了。因此,北越和巴特寮都开始向老挝西部扩张战线,并分别于当年4月和6月占领了长期无人问津的阿速坡省(Attapeu)和萨拉万省(Saravan)。1971年6月中旬,他们控制了波罗芬高原,从那里就可以俯视南部的首府巴色。

1970年伊始,王宝的部队就受到越南部队的猛烈进攻。越南的部队还能够承受战斗的伤亡,但王宝却不行,他的兵源在逐渐枯竭。虽然很难估算,但是在1960—1970年间,这个地区大约20%的苗族都死于战争。美国中央情报局不断依靠泰国来的雇佣兵充实王宝的作战力量,到1973年时,老挝大概有1.8万名雇佣兵,约占老挝非正式武装力量的75%。老挝的战争,已经完全“国际化”了。

美国与北越的代表在巴黎举行了谈判,并最终于1973年初达成停火协议。早已厌倦战争的老挝人民艰难地组建了他们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联合政府。

### 一个新社会?

当战争在山区肆虐的时候,低地老挝社会正在经历着重大的改变。尽管平民援助与军事援助比较起来严重不足,可是外国援助的流入已经开始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产生影响了。当然,比较直观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万象的城市景观发生的变化,新建筑不断涌现,满足了外国人和新富裕起来的老挝人的住宿需要。老挝铁腕人物富米·诺萨万在自己短短的任期内,曾想使这个城市焕发新的面貌:将澜沧大街拓宽成一条超宽的大道,并在其末端建造一个凯旋门,作为纪念碑来纪念战争中死去的人。据说,修建凯旋门的资金原本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用来资助老挝修一条飞机跑道的。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拍摄了一部电影,讲述了60年代中期一对年轻情侣骑摩托车游万象的故事,其中有一部分就以未建成的凯旋门作为背景。电影表现了一个城市正在向现代社会“迈进”的全景——新建筑、穿着崭新制服的高中生、新的广播电台等。尽管巴特寮的进攻总是不断毁坏公路交通,可是整个国家电讯行业的发展已经连通了大部分省份的中心;空中运输网络也得到扩大。这使得老挝人民对自己国家的变化有了更直观的感觉。

皇家老挝政府早期的领导层由一群眼界不同、信念相异的杰出人



士组成。受法国殖民政策的影响,他们都游历国外接受教育。但是这些人只是以农民为主的人民海洋里的小岛而已。50年代晚期,他们受到了来自国家利益防御委员会少壮派的挑战,认为他们这些人过于守旧和传统。国家利益防御委员会的追随者们早已折服于美国的现代化宣传了。这个领导层的军事核心很快背离了其创立的初衷。60年代中期,老挝的社会结构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出现了很多与中产阶级相关的职业和群体,出现了一个由留学归来的人组成的小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时刻准备着与老挝社会面临的大量复杂问题相斗争。1967年初他们开始发行一本名为《朋友》(*Mittasone*)的期刊,这本期刊用以前难得一见的坦白语言调查研究并讨论了未来几年内老挝社会将要面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早期是知识分子活动空前积极的时期(这并不属于革命的范围)。60年代,成立于1948年的老挝文学委员会加快速度,出版了涵盖范围极广的老挝传统文学



坎冒王妃和佩差拉王妃是1972年11月出现的老挝第一本女性杂志《妇女》的理事会成员。这两位女性都积极关注女性问题,这成为当时老挝政治的一种新特点。

作品。从前,普通大众根本接触不到这些作品。这个委员会在1970年变成了皇家学院,在继续推进上述项目的同时,还开始着手提高老挝语言的现代性。这意味着他们至少要为法律、经济和科学等科目编纂词典。1970年《联合公报:老挝的朋友》(*Bulletin des Amis du Royaume Laos*)开始发行,它涵盖了范围广泛的文化主题,1973年其关于老挝佛教的特刊已经成为它的经典之作。1972年,出现了一本名为《攀竹》(*Phay Nam*)的文学和历史杂志,它是由文学家、国民主义历史学家西拉·维拉旺(*Sila Viravong*)主编的。这本杂

志一直在为老挝现代文学提供舞台。1972年11月首次发行的第一本女性杂志《妇女》(*Nang*)也效仿其做法,向老挝人民介绍了风行世界的女性主义。同时,老挝的日常办刊也在尽全力将这个国家方方面面的问题呈现给读者进行讨论。1971年10月,老挝出现了第一本英文周刊——《万象新闻》(*Vientian News*)。大概也是在这个时间,老挝发行放映了其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故事片。

### 新的敏感性

这些变化主要是一种城市现象,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变化不论好坏都是发生在那些能左右这个国家政治经济方向及敏感性的城市社会群体身上。年轻的老挝作家们开始以批判的态度创作一些有关社会压力和当时的政治事件的故事。这些故事多以背叛爱情、不忠的丈夫和他们的情妇,以及城市与乡村生活的对比为主题。在1971年出版的文集《生活海洋》(*The Sea of Life*)中,短篇小说家们尽力以民族主义为主题,如法语应扮演的角色,或者海外的老挝人对家乡不负责任的批评。在1973年出版的另一本文集中,当·占巴(*Duang Champa*)写的故事《父亲仍未过世》(*Father Still Isn't Dead*)将矛头指向了战争,描述了一个军官如何从一个寡妇那里骗取她丈夫的抚恤金。松帕万·英塔冯(*Somphavan Inthavong*),《朋友》最多产的作家之一,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了他对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关注(发表于1969年3月):

#### 一个人死了

穿上你最漂亮的白色衣服  
大声地笑吧  
不过是场简单的葬礼  
庆祝某人的故去。

一个人死了

这并不是全部  
法昂也死了  
阿奴和班卡也是。

一个人死了  
这并不是全部  
憎恨已被传承  
复仇成为希望。

一个人死了  
他本希望能活百岁  
我们这 20 年的战争  
最新的牺牲者。

一个人死了  
这并不是全部。<sup>43</sup>

这些反映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变化的尝试引起了受过教育的老挝人的共鸣。

### 社会变迁与文化焦虑

城市里,特别是在万象,快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引起了一些人的焦虑。他们将这种变迁看作是对传统标准的侵蚀,一些佛教僧侣开始印制宣传品来提醒大众保护老挝文化。与此同时,已经陷入这种变迁的年轻人认为这既是从传统束缚中的解放,也是他们的困惑、愁绪的来源。年轻人只能通过流行专栏里以“修复受伤的心”等为标题的文章来寻求宣泄。文化变迁的特殊表现就是城市年轻人中出现的“牛仔主义”文化。他们彻底地与传统服饰告别了,穿紧身蓝色牛仔裤或黑色长筒裤,戴着太阳镜和牛仔帽,有的人甚至还给自己搞到了手枪皮套和左轮

手枪。他们说话饶舌,喝酒,还有些自恋,这都使得他们与传统标准显得格格不入。许多“牛仔”开始流浪,不论是频繁跳槽还是当无业游民,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在周围快速变迁的社会中为自己制造一个新的身份而已。由于那时美国对老挝的影响,年轻人被美国文化主题所吸引也不奇怪,这也将他们与亲法的精英区别开来。“牛仔”曾经是老挝文化变迁最明显的标志,但是在1975年,激进的民族主义之风席卷老挝,这些牛仔几乎都消失了。另一个很明显但是也危及传统价值观的群体就是酒吧女郎和妓女。(《生活海洋》文集集中的故事《我那失踪的女儿》就描述了一个农民的女儿和男朋友私奔后被抛弃,后来成了妓女。)战争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將一大群口袋里有钱但又是单身汉的男人们聚集在了一起。在那些贫穷的地方,女人难找工作,家里供养不起她们或者本身就是难民,她们很容易就会沦落风尘。这样的事也发生在老挝,许多从泰国东北部来的穷困女孩渡过湄公河到老挝成了酒吧女郎。万象有几个高档的卡巴莱(cabaret)<sup>①</sup>和酒吧,名字叫白玫瑰或者露露,是专门用来迎合外国人的。在那里自由工作的女孩收入还可以。可是多数女孩还是在便宜又偏僻的妓院接待老挝主顾们。据1970年两个人类学家调查估计,万象大约有1000名妓女。虽然数量不是特别多,可是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起,老挝妇女协会(由一些统治阶层的妻子们领导,有些还为老挝妇女杂志《妇女》工作)还是发起了一场取缔妓女的运动。取缔措施在佛教节日(如塔銮节)前张贴在酒吧。随后,在70年代早期,一些更加破乱不堪的地方被关闭。不久,所有这些地方在革命中都被关闭了。

20世纪60年代晚期,在知识分子中间兴起了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是并没有多少人成为亲共分子。知识分子们试着去谈判和调停,但是内部和外部的影响都是那么复杂。松帕万·英塔冯在其1968年写的文章《嬉皮士和雨》(Hippies and the Rain)中,以幽默的语言准确地抓住了知识分子们的心态。由于滥用大麻和鸦片而被抛弃的

① 有歌舞表演的夜总会。——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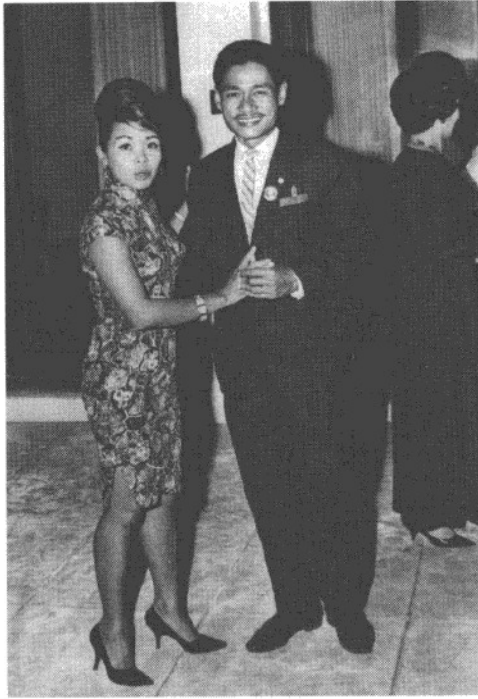


20世纪60年代万象的夜总会。(承蒙 Phouvong Phimmasone 提供)

一小撮嬉皮士在万象建立了自己的一片地盘。他们号称拒绝“西方的物质主义”，崇尚乡村里“简单”、“自然”的生活。这些口号确实打动了一些老挝人。松帕万描写了他们参加火箭节——一个淫靡的祈雨节日，那情形就好像发现了伊甸园。但是松帕万说，我们老挝要的是发展，而不是被误导的乡间田园生活：

156 那些想和我们一样，和我们老龙族、老听族和老松族一样的人，在这块土地上，实现不了他们的愿望。因为他们是嬉皮士，他们想过我们现在还在过的生活，而那正是我们梦想摆脱的。我们前进的方向和你们恰恰相反，我的嬉皮士弟兄。<sup>44</sup>

那时，老挝领导人也开始出面告知大众，这些被外国丢弃的东西会对老挝青年们的道德教育产生很坏的影响。老挝还曾出现过几次驱逐嬉皮士的运动。然而，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彻底清除诸如此类“颓废”的外国文化影响。



现代舞和 20 世纪 60 年代的女性时尚潮流可以在酒吧里看到。



20 世纪 60 年代来自万象法式预科学校的男孩第一次组成了一支摇滚乐队。

## 面对发展的困境

《朋友》所聚集的知识分子们对于老挝不发达的问题表现出了深切的关注,他们也意识到,虽然他们受到了高等教育,可那也是外国援助的结果。他们在文章中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于老挝“意识落后”的深深焦虑,就像松帕万写的那样:“我们对于社会和现实的想法与身边发生的巨大变化严重不符。”在写到“民族主义和发展”时,他评论了外国人如何将老挝人对他们的不信任看作是民族主义,而实际上,那是老挝传统社会表达出的一种不信任:

可是,我们被迫去认清老挝在经济发展上的不足,了解我们在发展国际贸易时地理位置不佳。就像那些缺乏自信的人一样,老挝人对于所有友善的帮助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我们的朋友正是把这种不信任(或者叫保守)混同于民族主义。但是老挝的民族主义,如果那确实是民族主义的话,发展得还不够成熟,还无法让人做出有意义的和积极的行动。<sup>45</sup>

157 在这些争论的背后是人们对于国家过于依赖外国援助的关注,虽然人们不会否认,在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未来,外国援助是不可避免的,而有时这又确实激起了人们的排外情绪。《朋友》所聚集的知识分子们对于外国援助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特别是坎崇·奎帕塞特(Khamchong Luangphasert),他在1973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外国援助的专著。他在书中提到一种办法,就是避免援助浪费和腐败的产生,直接将援助物资发往需要的村子而不再通过有关部门。这与当时需要援助的地方实施的自下而上的物资发放办法很相似。

《朋友》所聚集的知识分子们还试图去把老挝面临的问题概括为发展中国家常见的问题,它们无力建立廉洁且现代化的经济和管理机构。20世纪60年代晚期,腐败已经成为公众关心、讨论的话题,政府也随之成立一个公众舆论局,专门收集和发布关于腐败问题的信息。宋哈

克(B. Somhack)于1969年下半年开始为《朋友》撰写文章,对政府此举高声喝彩并号召成立一个反腐败调查团。与许多外国评论员不同,他敏锐地发现,只要低级公务员的薪水维持现在的低水平,这些人就会向公众收取回扣,腐败也就难以根除。腐败还源自“大人物”文化的复杂性,人们在此影响下希望能受到偏爱的待遇。腐败也有外国原因:“要对产生腐败的源头给予惩罚性制裁,特别是有嫌疑的商人和外国人。我们张开双臂热情地欢迎他们,可他们却收买一些高层官员,然后就觉得已经把老挝征服了一样。”外国人造成的腐败在1975年前急剧增长。宋哈克和许多跟他一样的作家发现腐败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对于标榜本国道德水平高的西方评论员,他还回击道:在诸如美国一样的高度发达国家,财务丑闻也是司空见惯的。

媒体广泛讨论这些题材,同时他们还在为这个国家出版业的自由而战。《老挝人民日报》(*Xat Lao Daily*)的编辑冯·尚塔尔(Phone Chantal)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与腐败斗争,因而无所畏惧地对政治事件进行报道。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报纸不时地遭到“野蛮的审查”,有一次甚至被关停一个月。1974年年中,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他的报社还在继续对越南部队的出现进行批评,编辑也因此收到左翼分子的恐吓信。1975年,《老挝人民日报》和其他一些独立报刊一样被新政权关闭了。

158

### 贪腐与家族主义

20世纪60年代晚期,腐败的规模已经不像50年代时那样无法控制、无法无天。其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在有了以前的经验后,开始对其所提供的援助进行监控。虽然不再那么无拘无束,可是腐败还是像在泰国发生的一样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了。泰国的国有企业是由统治阶层以及军方和华商形成的联盟所控制的,它们为腐败的领导层提供了一个安全基地。而老挝,部分由于战争的影响,没有任何工业或财政基地,统治阶层只可以在外国援助和小规模的垄断中开掘腐败的机会。一些人以老挝的标准衡量变富裕了,但他们的利润并不大。文翁亲王被称



为“老挝全国最大的小商贩”，用来形容他晚年的肥胖和他的财富。在某些方面，文翁亲王和他远在占巴塞最有影响力的家庭成员的操作手法与泰国的统治阶层非常相似。他们结合贵族合法性（整个南部的普通家庭都有这位亲王的照片，因为他被认为是手眼通天）与一小撮军方人士以及华商结成联盟。华人在巴色和沙湾拿吉开设半合法的娱乐场所，文翁亲王从中分享利润。他们还大规模投资老挝航空公司这个由南部统治者支持的企业。文翁亲王的表弟盈（Ieng）控制老挝和泰国之间沿十号干线的贸易，用暴徒保证他的垄断。占巴塞家族的成员由于有军方背景，还从事走私和非法采伐。美国在1970年的秘密报告称：“占巴塞家族也许是老挝最能聚敛和最富有的家族。可这个家族现在出现了分歧，主要是经济问题。它代表了一些财团之间的竞争。这些财团可能有的规模大有的规模小，而不是一个单一的统一的经济利益集团。”在1970年，他们每人可控制的资本达到了40万美元，如果按照泰国的标准也许不多，但是在老挝却足够了。文翁亲王当时已将大量的家产投入建造在巴色的大型豪华宫殿上。这个宫殿到1975年仍未完成，它被搁置到1995年，直到被一位中泰混血商人接管变成一个豪华酒店。文翁亲王和他的家人是左翼人士的天然目标，不仅因为他们的财富，而且还因为他们对右翼人士的一贯支持。在万象，萨纳尼空家族也遭到了同样的待遇。这个区域都很熟悉这种模式：政治权力的行使就是与华人企业一起获得经济财富的手段。因此，官僚、政客可以得到税收优惠，或将获得的企业股份或钱财作为回报。例如，555烟草公司的董事会中有萨纳尼空的家族成员，就能够确保不受税务罚款。还有其他一些交易，类似于内幕交易，这些统治者可以得到援助合同。公共工程部长侬·萨纳尼空（Ngon Sananikhone）对于徇私还有另一种表示方法，例如，他许诺在支持他的候选人所在地区修路。这种操纵或贿选并不总是能起到作用。在1972年选举时，欧恩·萨纳尼空（Oun Sananikhone）曾经花费500基普乘游艇游湄公河，并向沿途经过的村庄散发世界展望会的小食品，尽管如此他还是落选了。除了向他们的追随者分发财富外，老挝统治阶层主要把钱用于在城市里建造大房子，

买昂贵的汽车,送子女出国学习。很少有人能拿出足够的钱在瑞士银行开个账户,大多数人于 1975 年逃离老挝时口袋里一点钱都没有。1998 年我采访了依·萨纳尼空,他和他的女儿女婿住在巴黎市郊一个简单的工人公寓里。他的经济状况早已今非昔比,不过他的精神还不错。皇家老挝政府的统治者们的做法与当时东南亚的其他国家稍有不同,甚至至今依然如此。越来越多年轻的统治阶层成员为解决每况愈下的腐败问题而遍寻出路,同时异常认真地希望能找到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有效途径。皇家老挝政府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即使未必心甘情愿,它允许对社会和政治问题公开辩论,当时这在该地区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 鸦片政治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美国学者阿尔·麦克伊 (Al McCoy) 在其书《东南亚的海洛因政治》(*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 1972) 中哗众取宠地讲述了老挝的统治阶层参与毒品走私的事情。鸦片是法国及其后政权的主要经济来源。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开始向老挝提供援助后,老挝就退出了鸦片贸易,只有 60 年代早期的富米·诺萨万是个例外,他曾试图绕过美国的援助禁运,以便给他的部队和追随者一些资金。鸦片贸易直到 1971 年中期还是合法的,所以富米的举动在老挝人眼里还是可以接受的。1969 年,老挝对黄金贸易的税收由于和新加坡的竞争而大幅下降,人们的想法很快就又转移到了鸦片上。麦克伊在其书中义愤地指出,当时的财务部长西苏·克·纳占巴塞曾在 1970 年对 BBC 记者说:“我们唯一可以出口的就是鸦片,所以我们应该扩大鸦片生产并增加出口。”然而,这个做法很快就被美国否决了。欧安·拉提孔将军在 60 年代早期负责管理富米政府的鸦片业务。他曾经抱怨自己每月的收入只有 200 美元。其鸦片业务也无法进行了。虽然麦克伊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就在书中宣称欧安后来控制了鸦片业务,但其实,自从富米逃离老挝后,这项产业便崩溃了。欧安对他早期的参与倒是非常坦白,他还透露了麦克伊和其

他外国人不了解的一些鸦片问题。他告诉麦克伊,1967和1968年国际刑警组织找到他时,他们之间充满敌意与误解的谈话内容:

我告诉他们只要山里种着鸦片,就会有鸦片贸易。不让那些部落里的人种植鸦片,那就给他们钱……我告诉国际刑警去买拖拉机,然后将平原上的树弄走,然后把山里的少数民族搬到平原上来。平原上比较热,鸦片无法生长。人们在山区里每年劳作10个月,种植能值10万基普的鸦片和大米。可是如果天气不好或者闹虫灾,或者雨下的时间不对,他们就什么都挣不到。但是平原上的稻田可以得到灌溉,还可以种蔬菜,做手工,一年干5个月他们就可以挣70万基普。<sup>46</sup>

162 虽然久已被禁止,可老挝的鸦片贸易还在继续,因为在许多高地地区,鸦片还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受战争影响,苗族社会分裂了,这使得鸦片产量大幅下降。其中有些鸦片肯定是通过美国航空公司卖了出去,不过这并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阴谋,只是高地老挝人的简单贸易。1972年10月,欧安这样反驳麦克伊的说法:“这里面(鸦片贸易里)并没有什么‘大人物’,也不是什么‘国王’在贸易里使用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根本没有必要。这些能做鸦片买卖的人都是国际买家,他们自己都有飞机。”老挝人在鸦片贸易里最多也就是个小角色,和那些国际财团根本没法相提并论。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已经疲于应付,纯粹的道德反战运动也使得人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也可能通过其援助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毒品走私”。此类报道大多有些哗众取宠。虽然没有确实证据证明老挝的统治阶层是靠毒品贸易发的家,但是“毒品大亨”的帽子他们还是戴上了。毫无疑问,欧安就是一个通过鸦片收益加强自己地位的大人物。还有人宣称,欧安于1967年率部在老挝北部击败试图在那里建立据点的缅甸军阀坤沙(Khun Sa)时,缴获了16吨生鸦片,这些赃物被参与行动的第二伞兵营瓜分了,每人分得的钱足够他们给家里盖一间简单的房子。欧

安的财富也可能是通过腐败或者半合法手段聚敛的,这些钱也就以老挝的标准来衡量算得上是财富,何况他还要将其分发给自己的追随者。

## 王室

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家庭就是琅勃拉邦王室,然而他们也许是统治阶层中最不富裕的成员了。王宫的维护并不在国家预算内,可王室成员对于商业活动也未表现出太大兴趣,他们甘于过着相对简朴的生活。萨旺·瓦达那国王是在皇家老挝政府最动荡的时期登上王位的。他做事小心谨慎,在20世纪60年代的危机中也顶住压力,没有接管首相的权力并组建国民政府。他最关心的就是保护君主立宪制,并认为一旦他公开参与政治,君主立宪制就再也难以保全。很多人通过他谨慎的公开声明和活动认为,他是一个没什么用的人。而美国的文献揭露了他扮演的关键性的政治角色。连盛气凌人的美国大使威廉·H. 苏里文(William H. Sullivan)都觉得他是个高深莫测的人物。1964年下半年他上任后很快就对国王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每当我试图让他确切答应我去采取什么行动时,他就会给我一个柴郡猫式的微笑,然后以神圣的君主立宪制为借口避开。总之,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反应迅速、圆滑老练、个人魅力巨大的人。如果他是我的前任的话,我一定会无地自容。”从20世纪50年代起,君主政体也开始变得现代化,其主要表现就是让国王在更多的公开场合露面。由于西萨旺·冯国王年事已高且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这些事情就落到了王储萨旺·瓦达那的肩膀上。在萨旺·瓦达那国王即位的第一年,他倾心于维护国家政治的稳定,国家并未像当时泰国军队那样刻意推行君王崇拜。实际上,当时泰国年幼的君主只是军方大佬的傀儡,只能慢慢夺回其君主权力。相比之下,老挝军方实权人物的任何想法都需要征得国王的许可,泰国的情况在老挝不会发生。因此萨旺·瓦达那国王保证了老挝在1975年前从未陷入过军阀统治。

皇家老挝政府一直试着使君主制更为人们所熟知。他们把国王的照片印在统一发行物上,在日历上印上国王和王后的照片,还通过杂志

和收音机做宣传。那时的大众传媒还不发达,还处于“前电视时代”,对君主制的宣传进展缓慢且各地区开展程度也不一样。国王、萨维万(Savivan)公主和王储冯·萨旺(Vong Savang)积极投身于许多社会和文化活动之中,在方便的时候还会视察少数民族地区。1968年苗族新年的时候,国王和梭发那·富马亲王视察了萨姆通,第二年国王还视察了龙镇。然而,安全问题限制了国王的视察活动。在随后的几年中都是由王储视察龙镇和其他边远地区。1971年中期波罗芬高原落入北越部队控制之后,国王还坚持亲自到南部省份去鼓舞士气。国王还是低地老挝佛教仪式的重要人物,从老挝文化的意义上讲也一定要保证国王的安全。1961年3月,有人建议将王宫搬迁到万象以寻求更好的安全措施,国王陛下向美国大使温思罗普·布朗解释了他不愿将行宫搬走的原因:

164 我问他,如果琅勃拉邦遭到攻击怎么办?他说,那他当然还会留在琅勃拉邦。琅勃拉邦作为王室的所在地和宗教中心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国王留在琅勃拉邦对老挝民众来说意义极其重大……万象还被人们戏称为麻烦之都,哪个国王把首都定在万象,早晚会被暴力弄下台。虽然他不是很迷信,但是民众相信这个。此外,宗教的象征塔銮也不在万象。<sup>47</sup>

165 虽然国王以反对共产主义出名,但是他一直保持比较低的政治姿态,以备在需要的时候充当斗争各方的调解人。作为1973年成立谈判联合政府的前奏,苏发努·冯亲王在1972年11月夸赞了他处事的公平性:“老挝爱国阵线一直相信国王陛下会利用其王权和巨大的影响力促使万象方面摆脱沦为美国傀儡的命运……”就在1975年12月2日,老挝爱国阵线宣布支持王权。萨旺·瓦达那有意推迟原定于1967年的加冕仪式,就是为了等到达成国内和解的这一天,那也将是他最荣耀的一天。1975年3月,保王党人也许是出于孤注一掷的心理,他们发表声明,宣称国王的加冕礼将在1976年12月举行。然而,它根本没有举行过。



由于战斗愈发激烈，王储冯·萨旺(左)为他的父亲分担更多责任，尤其是视察少数民族地区。照片中他正在访问老挝北部会晒地区的阿卡族人。他们正在敬献鲜花以表尊敬。(承蒙 Joel Halpern archives 提供)

## 最后的联盟

皇家老挝政府不仅武装力量薄弱，还严重依赖外国援助，这就使得它不得不任由其资助者和国际经济局势摆布。1968年至1973年之间，老挝经济遭受了几次重大的打击，由此引发了群众的不满和绝望情绪。老挝政府每年只能完成45%的预算收入，余下的就要靠国外援助。1958年基普汇率改革后，老挝一项主要的财政收入就是来自黄金出口——1967年这项收入占财政收入的40%。20世纪60年代，老挝是远东地区合法的黄金出口商中比较大的一个，虽然有三分之二的黄金后来被走私到了南越。然而，1968年共产党人的新年攻势严重破坏了老挝的黄金贸易。同年，国际金融体系出现了变革的迹象。美元在这些变化中表现依然不错，不过黄金的定价不再只有官价，还出现了市场自由定价，这就使得黄金投机需求降低。1969年，新加坡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黄金中转站，这一举动彻底摧毁了老挝市场，黄金贸易再也

166

无法成为老挝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了。1971年的“美元危机”使得1948年布雷顿森林协议建立的国际体系崩溃,这也冲击着弱小的老挝经济。老挝的财政预算一直是外汇操作基金(FEOF)资助的。这个基金成立于1964年,它会将一定金额的外汇提供给政府使用。美国是这个基金最大的捐赠者(约占60%),其他还有日本、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1970年,面对税收的大幅下降,要么外汇操作基金继续资助老挝,要么就得实行基普贬值。最终,老挝政府在1971年11月决定实行基普贬值。老挝政府也曾尝试引入货币兑换控制办法,可是这个做法最后不过是弄出了一个兑换美元的黑市。金融危机不仅使皇家老挝政府进行任何发展计划都更要寻求外国援助,而且货币贬值引起的通货膨胀还使得本来就薪水不高的企业雇员生活更加拮据。而1973年的石油危机更使得物价雪上加霜。不过1971年下半年建成的楠昂(Ngam Ngum)水电站稍微缓解了物价上涨。成立第三联合政府的谈判正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开始的。

167 皇家老挝政府和老挝爱国阵线在各自背后势力的示意下,开始就停火和签订政治协议进行谈判。1972年10月,美国和北越签署了一份和平协议的草案。几天后,老挝爱国阵线放弃了要求美国先停止轰炸的条件,重新开始与皇家老挝政府进行谈判。1973年1月27日,关于越南的巴黎协议签署。同年2月早期,美国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带着一个大访问团抵达万象,其成员包括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前美国驻老挝大使威廉·苏里文等人。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迫使皇家老挝政府签订协议。皇家老挝政府当时的谈判负责人之一依·萨纳尼空对我说:“当基辛格告诉我尽快签订协议的时候,你说我能怎么办?是美国人在给我们的军队买单!”可是基辛格还是被黎德寿(Le Due Tho)给耍了。黎德寿是越南共产党中最冷酷的一个,他让基辛格觉得协议签署后北越的部队就会撤出。可是当基辛格从万象到河内去的时候,他发现越南民主共和国根本没有这种打算。

1973年2月21日,老挝签订了一份停火协议,协议号召成立一个全国联盟临时政府。接下来的7个月中,双方一直就协议中的条款激

烈争吵着。虽然在这7个月里双方仍有违反停火协议的冲突,不过都是小规模。由于北越的部队还在老挝境内而美国人决定撤出,老挝爱国阵线在谈判中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皇家老挝政府虽然处于劣势,可是在谈判中只有梭发那·富马亲王想着让步,因为他确实觉得另一方也在寻求和解。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的会面使得老挝的一些领导人觉得看到了希望,他们认为中国会出面限制越南,虽然实际上北京对河内的影响力相当有限。皇家老挝政府最大的让步建议是由梭发那·富马亲王提出的,即将临时政府命名为“万象政府”。这对双方来说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同时也使得国民大会想要代表国家的想法落空。军方的很多人士对梭发那·富马亲王的让步很不满,一时间,万象将发生政变的谣言四起。但是梭发那·富马亲王当时被当作美国方面的人物,他可以保证美军退出战争,这一点使得军事安分下来。政变反而是由一些被老挝放逐到泰国的人于8月20日发动的。与富米·诺萨万一起出逃的前空军将领马(Ma)带领着60名反叛者向瓦泰

168



亨利·基辛格(左,美国前国务卿)1973年2月在万象会晤梭发那·富马亲王、西苏克·纳占巴塞和莱姆·英锡相迈。那时他向他们保证北越会遵守《巴黎和平协议》。(承蒙 Souvanna Phouma 提供)



169 (Vattai)机场发动了愚蠢的进攻,幻想能由此引发一次全面暴动。马抢来一架 T-28 飞机并轰炸了位于万象市郊的军队指挥部,造成 2 名士兵死亡。但是他的企图很快破产了,由他驾驶的 T-28 飞机紧急迫降,他本人也被逮捕并立即处决了。这个疯狂而又出人意料的行动也使得老挝再也没有了军事政变的声音。然而这也为老挝爱国阵线做了一个政变的宣传,表明老挝爱国阵线将会对那些“右翼”和反对“和平与和解”的人予以迎头痛击。

### 从内部颠覆皇家老挝政府

170 不久之后,双方于 1973 年 9 月 14 日签订了《万象协议》。协议的中心条款就是:万象和琅勃拉邦都是中立的;关于新的国民政治协商委员会的组成,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均分内阁席位;各部部长和副部长必须分别来自双方且副部长拥有否决权。实际上,这意味着老挝爱国阵线随时可以让管理机构瘫痪。因而,就像美国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害怕的一样,曾经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过的情况同样也发生在了老挝,巴特寮开始慢慢地从内部颠覆这个政府。值得一提的是,苏发努·冯亲王并未加入内阁,他控制了处在琅勃拉邦的国民政治协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很快就凌驾于国民议会之上。更值得一提的是,巴特寮的部队可以开进琅勃拉邦和万象以组成联合警察力量,但是皇家老挝陆军(RLA)并没有相应地将其部队开入对方的地盘。在这些城市确认安全之后,巴特寮的领导人苏发努·冯亲王在 4 月 6 日一同飞赴万象,他们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远东经济观察》(*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的一位记者记述了苏发努·冯亲王抵达时的情景:

他与其他老挝政治家相比更具活力,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人们的热情和欢迎。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是那么亲切,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亲民亲王”。他与群众的融洽关系会让人联想到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但是他更矜持而具有使命感。他在帮助老挝这个国家恢复信心,他还是老挝学生运动的英雄。他有一种气度,即便不

是那么超凡入圣，也影响到了和他一起从桑怒(Sam Neua)来的人们。<sup>48</sup>



1973年9月，皇家老挝政府和巴特寮的警察共同巡逻。

一位当时还在琅勃拉邦读书的朋友这样向我描述了其后两位亲王会面时人们的反应：“人们把这看作是家庭和解。苏发努·冯亲王和梭发那·富马亲王就好像老挝家庭曾经分开的成员一样，现在他们又一起回来了。从现在开始所有事情都会变得和平、幸福。”这怀旧的家庭感言及两位主人公所带有的贵族气息使得老挝人很欣慰，他们长出了一口气，觉得战争终于过去了。以苏发努·冯亲王为先锋的巴特寮努力为自己营造一种和平党派的形象，任何反对他们的人都会被冠以好战者的名号。两派之间在内阁的争斗很快也变得司空见惯起来。与年轻的苏发努·冯亲王相比，72岁的梭发那·富马亲王确实成了一个疲惫的老政治家。实际上，这两个人似乎体现了两种不同法则：新秩序的活力和旧秩序的衰败。当年7月12日，梭发那·富马亲王心脏病发，然后于25日飞赴法国进行疗养。那时，只有西苏克·纳占巴塞可以顶替梭发那·富马亲王的位置，但是巴特寮一直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在那个关键时期，“万象派”一时间陷入无人领导的境地。

171

老挝爱国阵线抓住这个弱点扩大成果。7月和8月,他们利用被渗透控制的劳动者组织对经济不良情况下的薪金情况的不满发动多次罢工。他们还利用罢工要求将他们认为有贪污行为的官员撤职。受1973年泰国学生运动成功推翻军阀专制的影响,巴色的学生已经在1月份举行过抗议物价上涨和开办赌场的游行示威。值得一提的是,南方的示威游行还激起了一种反华情绪,学生们要求关闭在巴色开办的华人学校。

根据国家联盟临时政府的协定,外国军队应自临时政府成立之日起60天内撤出老挝。到6月4日,美国和泰国的军队已经撤离,空中打击和空中勘察也已经停止。可是,对于从未有人公开承认的“秘密部队”——越南部队,却没有人确认过他们是否已经撤出。由于美国轰炸暂停,共产党人在胡志明小道的行动更加容易,他们开始准备对南越发动最后攻势。1974年8月,巴特寮为了进一步扩大军事优势,派兵推进划界不明的停火线并进攻王宝的残部。1974年12月,会晒村(Ban Houayxai)的瑶族特种部队叛乱,他们要求和平的环境,还要求废除不许种植鸦片的法律。在这一年中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基普再次贬值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老挝爱国阵线担心这样的举动不得人心,选择了促进货币流通而不是国家限制的策略。进入新年后,皇家老挝政府变得更加腐化和散漫。当2月24日梭发那·富马亲王康复归来时,发现他不光是身体差了,政治上的影响力也不如以往了,最终,他舍弃了对国家的领导权,将之让给了苏哈努·冯亲王。

没有了美国军队的支持,老挝部队的士气也下降了,虽然有些指挥官仍在坚持战斗,比如王宝。1975年4月,他的部队为了和巴特寮争夺万象北部的重镇萨拉蒲空(Sala Phu Khoun)进行了一场大战。战斗的结果是——王宝的部队撤走,通向首都的路打开了。在柬埔寨,红色高棉于4月17日控制了金边,而西贡在4月30日落入越南人民军(NVA)的手中。面对邻国的剧变,国家政治协商委员会最终屈服于巴特寮的压力,萨旺·瓦达那国王在4月13日签署了一项法令解散国民大会,却并没有保证将进行大选。共产党人在柬埔寨和越南先后取得

了胜利,然后开始向老挝方向集中力量。当时老挝全国各地组织了很多反美游行,5月9日有许多人聚集在美国大使馆前,要求其将右翼的部长们都赶下台。前国防部长西苏克·纳占巴塞在撤职后被立即流放了,接任他的是帕特寮的坎·欧安·本帕(Kham Ouan Boupha)将军。他上任后立即着手解除皇家老挝政府控制的剩余武装力量。面对迅速恶化的政治环境,王宝也出逃了。这些事件发生时,国王正在华潘省巡察。在苏哈努·冯亲王的授意下,帕特寮佯装尊敬地用革命歌曲来招待一直以来坚定反共的国王,后者对此只能默默忍受。当国王回到琅勃拉邦的时候,万象的政变实际已经结束了。5月19日,帕特寮的部队开始进驻湄公河沿岸的城市巴色、沙湾拿吉和他曲。反美情绪的火焰已经烧遍了老挝全国。示威者们占领了美国国际开发署在万象和琅勃拉邦的分部,要求其结束在老挝境内的一切行动。此机构的美国工作人员开始迅速离开老挝。6月,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老挝分部在20年

173



1975年5月,苏哈努·冯亲王(左)陪同国王和王后视察华潘省的芒威。老挝爱国阵线的骨干对国王大肆逢迎,仍然宣称应该保留君主立宪制。但当国王在那里视察时,共产党人已经在万象对他们的对手展开了行动,迫使他们离开老挝。这次政变,使得皇家老挝政府的倒台只是时间问题。

的工作后终于关闭了。这些“群众起义”由巴特寮中一些精悍的小团体领导，他们对“反动派”、“腐败右翼分子”的每一句攻击和谴责慢慢地将竞争对手从政府中驱除，然后用自己人代替其对手的位置。挤在一起围观政府大楼被起义者洗劫的人大多数都表现得无动于衷，没有警察过问。7月底，联合警察队伍也被解散了，巴特寮的部队取而代之。8月，新的“革命管理委员会”在琅勃拉邦成立；8月23日，巴特寮在一场大游行中宣布：万象已经被“彻底解放”了。

### 逐步接管

共产党人在接管老挝的过程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他们在执行时分步开展、慢慢进行。盟友在越南的胜利并没有促使巴特寮立即对湄公河沿岸的城市展开军事行动。巴特寮在越南部队的帮助下是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不过这样可能招致泰国的过激反应。老挝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以前皇家老挝政府控制的地区，那里对巴特寮并不完全支持，巴特寮采取逐步接管的办法也有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太早夺权并废弃君主制的话会招致反巴特寮的起义，因此巴特寮利用联合政府的合法性预先声明其对于君主制的支持和对于和解的期望，然后慢慢削弱对手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苏哈努·冯亲王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他宣布支持君主制这一举动打消了很多人的疑惑，特别是军队方面的疑惑，使人们认为巴特寮真的希望和平与和解。正是这个原因让将军们和很多军官自愿到内地接受“再教育”。有人告诉他们及其妻子只要去几个月就可以回来，可实际上很多人一待就是10至15年，有的甚至根本没能回来。共产党人并不打算和解，这种态度在9月份终于显露了出来——“人民法庭”在受审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宣判已经逃离的前“右翼”部长们死刑，还有另外25位前领导人被判处25年监禁。皇家老挝政府的缓慢瓦解为巴特寮的最终接管奠定了基础。

175 11月26日发生了另一起精心策划的游行，要求解散联合政府并废除君主制。梭发那·富马亲王和苏哈努·冯亲王飞赴琅勃拉邦



图为沙湾拿吉的巴特寮坦克。标语上写着“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承蒙 Joel Halpern archives 提供)

接受了国王的退位信。12月1—2日,在万象的一座前美国学校的体育馆里秘密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会上由王储冯·萨旺宣读了国王的退位信,随后通过了建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提案。提案提名苏哈努·冯为国家主席,凯山·丰威汗为总理。其他所有当选的新政府官员都是老挝人民革命党成员。老挝终于进入了一党执政时期。

## 第五章 老挝的社会主义过渡期\*

176           1975年年末,铁血政权开始上台,致使10%的老挝人民逃离他们的祖国,其中很多人是为了不被关押在劳动集中营里。皇家老挝政府垮台后,苗族继续奋战多年,但终在1977年的一场运动中遭到镇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按部就班地施行了极权社会通用的控制手段。在此期间,越南在老挝事务中起主要作用,有些类似于美国在皇家老挝政府统治时所扮演的角色。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建立诸如农业集体制的共产主义经济系统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因此,20世纪80年代末期,市场化改革开始了。

### 177           外逃

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当权的皇家老挝政府见证了万象人的出逃和城市的老挝化,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第一年则见证了华商和多数老挝知识分子的逃离。随着许多高地傣族人和各种少数民族与革命者一起涌入城市,城市的组成成分又一次发生了改变。从某些方面来看,农村改造了城市,而城市居民通常将巴特寮还有那些无知且又土里土

---

\* 作者将原书的第五章拆分为现中文版的第五、第六两章,并重新拟定了此二章的标题。——编者注

气的乡下人称为“丛林人”(khon pa)。即使是今天,这样的词仍用来描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样或那样政策的失败。城市里的大部分生意败落了,随着经济的垮败和油价的激增,马路上汽车消失无踪而自行车则大量出现。妇女们不在脸上涂抹唇膏和化妆品了,身上也甚少佩戴珠宝,简单朴素的衣着风格成为不成文的规则。似乎一夕之间,万象倒退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沉郁的气氛笼罩着广大民众,使得他们开始认识到革命的现实。

霎时,那些在 1975 年占据政治领导地位的人物要么消失不见要么退居二线,而来自革命根据地芒咸的苏发努·冯亲王,在 12 月的任命中成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革命领袖。老挝人民革命党秘书长凯山·丰威汗,现在成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总理,他们成为该国的铁腕人物。前皇家老挝政府地区的人们对凯山·丰威汗将军几乎一无所知,因为他的权势总是被老挝爱国阵线的头面人物苏发努·冯掩盖了。早先,凯山及其党羽低调得秘不宣人,此事让他们的力量昭示于大众面前。在社会各界中开展了政治灌输,以教化他们站在党这边,而不是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的言语只能被用来要么赞扬领导人,要么谴责“帝国主义”和“叛徒”。

178

许多民众很快发现这种制度下的生活难以忍受,1975 年之后的外逃规模是空前的。或许只有 19 世纪早期阿奴领导的暹罗人起义导致的低地人口减少才可与之比拟。难民中包含了大量出逃的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彻底接管前,原先的统治阶层已经开始了缓慢的出逃,并在随后的年份里愈演愈烈。很快,农民们因不满农业政策也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加入到了出逃大军中。至 1980 年,老挝总人口的 10% 逃往国外,且人数还在上升,使得这个国家在 20 世纪末期发展缓慢。

新兴的集权主义国家的当务之急便是执政的秩序,为此,政府将旧政权的军方和政府工作人员送往劳动集中营,并取缔所有向政府主张自主权的报社、杂志和期刊等组织。吞并老挝民间社团的关键机构是老挝爱国阵线,它在 1979 年改名为老挝国家建设阵线(Neo Lao Sang

179



Xat, NLSX)。它囊括了所有潜在的自治社会组织,如佛教僧伽、商人、少数民族、工会、青少年和妇女组织等。在城市和乡村,由各种战线组织的领头人物组成的委员会取得了掌控权,并由共产党员担任村长。从1975年年末起,他们组织了大量的会议让村民们学习党的路线。那些看似无休止的会议虽然在最开始的时候受到了一些积极分子的狂热追捧,但很快便陷于乏味单调。然而,出于革命热情的“自发”游行其实是强制性的。政治干部管控了少数技术主管,将他们置于次位,而将政治放在主控地位。老挝人民革命党预期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并孕育“社会主义新人”。

作为“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任性倔强的年轻人被迫符合党宣称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完全是清教徒式的。正如记者约翰·艾弗林厄姆(John Everingham)在1976年早期描述的那样:

受西方影响的年轻人因他们的着装而备受指责;女孩们也受到了批评。青年被强行理发,妇女被告诫不得涂抹任何化妆品。收听泰国广播电台和演奏西方音乐,将有可能被贴上“反动”的标签。追求快乐和利益都被视为是不爱国的表现,人们仅剩的任务便是重建国家。因此,人们早早地便急于上床休息了。<sup>49</sup>

180 那些不遵守规定或被视为妓女的人被送去位于万象北部楠昂大坝中间的岛屿上的集中营里。

### 集中营\*

从1975年中期开始,皇家老挝政府的官员、士兵、警察和高级将领们都被打包送往农村去参加“研讨班”,即集中营。事实上,很多老挝人民已经对战争感到厌倦,而且他们信服巴特寮的宣传,认为随着和平的到来,除了“外国帝国主义”被驱除,其他方面的生活不会有太多改变。

---

\* 作者对本节内容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动,故本节中文版所标注的原文页码仅供参考。——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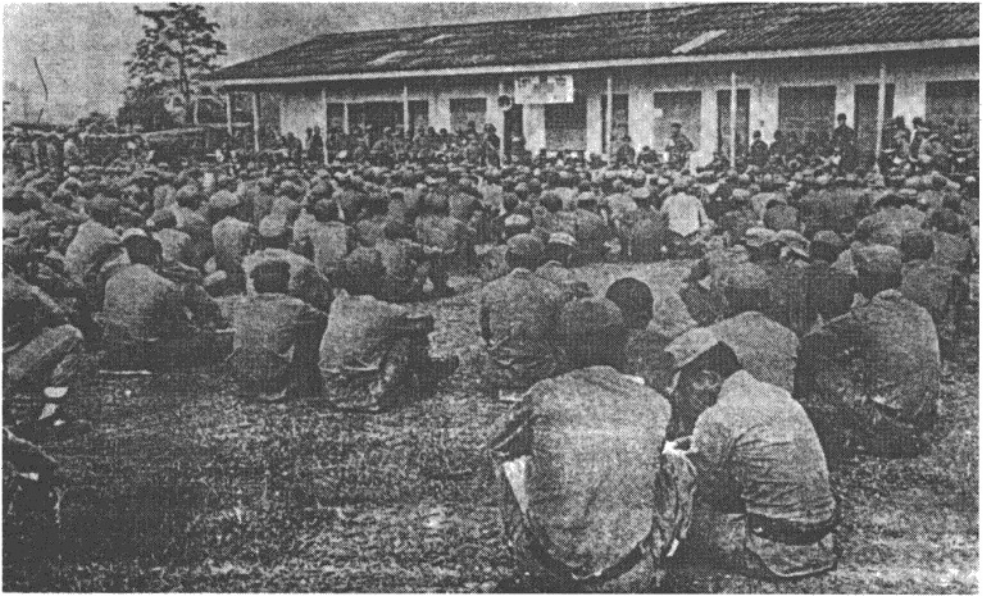
当“红色”亲王苏发努·冯——老挝爱国阵线的主席，满怀信心地告诉人民，君主制将被保留，老挝人将很快重新发现他们没有受到外国势力玷污的传统文化，人们愿意相信他。因此，很多人自愿进入集中营。其中的一名囚犯，坎潘·塔玛坎提(Khamphan Thammakhanthi)上校这样描述道：“他们相信自己能为和平和国家的整顿作贡献，并且信任梭发那·富马的智慧，他们听从尊敬的部长们的命令，自愿被卷入这送葬的过程里。他们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不幸的是已经太迟了。”<sup>50</sup>另一个囚犯写道，他6月被叫去参加一个在万象的东梯(Don Tieu)集中营，巴特寮警务部副部长德纳·苏纳拉(Deuane Sounnarath)这样对他们说：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已经万分痛苦地被打败得颜面扫地了……社会主义业已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我们和资本主义势不两立。因此，老挝局势必须改变。这一变化要求万象的官员、警察和士兵立即前往芒咸参加研讨班……为你们的旅途做好准备吧。我们已经提前为你们准备好了卡车和飞机。”<sup>51</sup>

他们当中有人问是否可以回家拿衣服，但遭到拒绝。几个小时之内，他们便被空运出了万象。

1975年12月之后，还有许多人被围捕后送往集中营。不是先前承诺的几个月，这些人在战俘集中营里一待数年，有的在老挝北部的山上，有的在川圹省、华潘省、阿速坡省(Attapeu)或老挝南部的沙拉湾省(Saravan)。老挝人民革命党并没有像柬埔寨的领导者们一样开展大规模的屠杀。然而，很多去了集中营的人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的亲人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他们父亲、儿子或爱人的官方通知。那些回来了的人也立即逃去了国外。无论前皇家老挝政府多么不完善，它也从来没有尝试发动这样大规模、报复性的政治压迫。

同越南和柬埔寨相比较，老挝对这样庞大的监狱系统的建设、效用及其社会影响的关注相对较少。长期拘留的人数早期估计约为1万至



标题上写着：“80 000 名万象右翼军官和警官被送往研讨班，他们‘以后’会被释放并成为老挝的好公民。”

4 万之间，许多普通士兵和官员经历的是为期几个月的短期“再教育”。只有在 1998 年，老挝军队历史的脚注里才出现了一些关于那些被宣判成“罪犯”的人的官方数据：

根据 1976 年 12 月 27 日的“再教育”组织的数据，各地去往牢笼集中营的人数分别是：华潘省 1 136 人（其中军队和警察将军级别的为 49 人），丰沙里省 1 452 人，乌多姆赛省（Oudomxai）1 689 人，琅勃拉邦省 1 651 人，川圹省 3 988 人，万象省 7 081 人，甘蒙省（Khammouane）896 人，沙湾拿吉省 2 790 人，南方 3 546 人，此外，还有 5 799 名妻子和 18 777 名儿童前往。<sup>52</sup>

总数为 1 万至 1.5 万之间的人忍受了长达 15 年之久的关押。当然，有些人立即被处死，还有一些一直被关押到死亡为止。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在法律上被起诉过，亦即这个庞大的监狱系统是在法律之外的，而囚犯们也无权利可言。

除了纳空坎(Nakhonkham)列举的以上数据,另一份数据来自统提·拉善维莱(Thongthip Rathanaivilai)撰写的《死亡之地的男人:穿过地狱的五步曲》(*Man in the Region of Death: Passing Through the Five Stages of Hell*),此书在老挝和美国出版。它讲述的这个故事同从任何越南囚犯那儿了解到的情况非常相似。<sup>53</sup>1975年7月,他和其他官员及皇家老挝政府将领们被运往川圹省,他们原本以为只在那逗留3个月,事实上,他在战俘集中营里度过了9年时光。他们很快被转运往巴特寮战争时期的指挥部芒咸,之后他们又从这里行进到6号集中营。那儿的守卫告诉他们,自己是来保护他们免受当地人民愤怒的攻击的,他们从任何当地人身边经过时不要看当地人的眼睛,就像当地人也被教化不要理会这些集中营的囚犯们一样。这是他们从社会视野中消失的第一个迹象。6号集中营靠近万象边界,当他们到达时,那儿还只是一片森林。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造关押自己的监狱。随着砍伐树木、建造房子等艰难工作的开始,恐惧和怀疑的氛围笼罩在这些囚犯头上。“再教育”从日常的党政政策学习开始,然后是自我批评与公开谴责。起初,这是个新鲜事物,但是日复一日学习相同的内容使得生活变得枯燥压抑。

我们必须严格重述高层人员的话,我们组的头头先说,“赞美”、“赞美”、“赞美”,说三次,然后我们再重复一遍。党和政府的智慧是透亮光辉的,赞美,赞美,赞美。我们必须警惕美帝国主义和叛徒,赞美,赞美,赞美。从此刻起他们就是我们的敌人,赞美,赞美,赞美。党将领导人民成为主人,赞美,赞美,赞美。我们要一直说到我们脑海里塞得满满的都是这些。赞美,赞美,赞美,日复一日。

182

有趣的是,统提和其他没有经历巴特寮生活的人很快便体会到了,这里的生活就是繁重的工作、粗劣的食物和无休止的批斗的综合体,简直不像是老挝,而像是越南,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正确的,因为这

样一种机制正是越南等国首创并传授给他们的老挝追随者的。1976年,中央委员会委员西通·库马丹来看望他们,告诉他们:

将你们带到这里是為了你们好。如果这是柬埔寨,你们早已经消失了。将你们带到这里是為了让你们得到治愈和洗礼并成为一个崭新的人。你们这里所有的人本应该成为领导者,但你们现在还很无知。但是,所有听从我们并改革自新的人,都能回家并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sup>54</sup>

他来视察之后,一片消极沉郁的气氛弥漫在集中营里,因为里面的囚犯们意识到他们在里面要度过的日子是遥遥无期的。有些人变得消沉起来,甚至不再吃东西,白天工作结束后便只是躺在床上。有些人试图逃跑,但是被抓捕回来,遭受严厉的拷打,并被带到其他囚犯面前游行,最后要么被枪决,要么被送到更严格的集中营里。

183 不过到1978年时,集中营的管制开始松弛起来。新政府开始认识到很多人的技能在集中营里遭到浪费,因此开始把工程师、医生或司机输往各种工程中。集中营里的囚犯同样会被派去做公路建设和维护工作,通过这样的方式,集中营转变成了劳改营。囚犯们也可以为当地农民工作,同他们进行交易,有些囚犯便和他们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因而可以获得更好的食物。显然,为了让囚犯们长期驻扎在山上,1978年起,政府允许妻子和孩子们来到他们的丈夫身边。有一些人的确这样做了,但是由于条件通常都太艰辛了,他们待上一两年便回去了。缺乏良好的医疗条件是集中营里的人致死的重要原因,也是妻子们不愿待在那儿的主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早期,小部分囚犯开始被释放出集中营。统提于1984年回到万象,对他而言,这座城市早已面目全非了。同很多其他被释放者一样,他很快便逃去了泰国。

集中营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击碎“旧政权”成员的意志,并逐步灌输他们对新政权的惧怕。对囚犯们的威胁同样盘旋在其他人的头

上。很多男人回来的时候变得神经衰弱和孤僻,而妻子们则要面对因分开许久而生疏了的丈夫。一部分人选择成为难民。另外一些人很快便坚强起来,还自我调侃他们是被送去“芒咸大学”进行“深入学习”,只是因为“太无知”而没有毕业。到1986年,政府责令关闭所有的集中营,但是直到1989年,仍有部分人被囚禁在各省交界处。那些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5号集中营的人,则从来没有被释放出来。事实上,1977年,萨旺·瓦达那国王、王后、王储以及另外一个儿子萨旺亲王被指控涉嫌卷入“反动派”而被关押在这里。他们没有一个幸存下来,据传国王大约死于1980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从来没有公布他们死亡的任何细节。彭·苏发那旺、杜比·李峰、欧安·拉提孔、彭·冯萨万以及其他许多人也同样消失在那些集中营里,再也没有回来。

### 苗族的抗争\*

184

虽然老挝没有像金边波尔布特(Pol Pot)统治下臭名昭著的堆斯陵(Tuol Sleng)监狱那样的酷刑和死亡营,但革命后有针对苗族的小规模屠杀。在难民营里收容的那些惊吓过度的幸存者看来,有时候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似乎是要灭绝他们,而类似“种族灭绝”的词则有点被记者和其他群体滥用了。

北部山地地区的战争进行得很激烈,通常都是苗族士兵对抗越南人。之前潜在的种族紧张局势虽然在1975年前得到了基本控制,但在随后针对苗族的运动中爆发了。即使在战争期间,苗族百姓也多次在交火中被抓获,因此他们被迫逃离自己的家园。有时这样的情况会衍化成大屠杀。查尔斯·韦尔登(Charles Weldon)在1965年报道过一次这样的情形:

---

\* 作者对本节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故本节中文版所标示的原文页码仅供参考。——编者注

他们停下来，在狭小、阴暗、蜿蜒的山边度过夜晚。当他们睡着的时候，巴特寮和越南人包围了他们。当出现清晨第一道曙光时，敌人向天空鸣枪，并对他们吼道，他们已经被包围了，如果他们反抗便只有死路一条……恐慌的人们开始疯狂地沿小道向东逃走，尾随的敌人用机关枪和迫击炮随意地朝他们射击。<sup>55</sup>

185

这样的屠戮故事像野火一样在苗族人之间传播，导致他们害怕共产党掌权后将面临种族灭绝。到 1975 年中，老挝爱国阵线开始夺取老挝的最终统治权时，高地经济已陷入危机，原先由美国国际开发署供养的苗族人的生活过不下去了。成千上万散布于山地至龙镇南部的苗人需要迁徙，因为他们的高地田地已经被耗尽。出于对共产党的惧怕，很多人自然选择逃往泰国，苗族将军王宝和其他领导人已经逃到了那里。王宝的离开引起了恐慌，许多苗人于 1975 年 5 月底开始沿 13 号公路蜂拥南下。梭发那·富马亲王的亲信杜比试图安抚他们。“王宝已经走了，”他说，“因为他深陷战事。但是你们没有触犯任何罪行，为什么要离开你们的祖国呢？”但是群众并不买账，继续涌去欣合(Hin Heup)。5 月 29 日那天，他们被巴特寮军队围堵在欣合的一座桥上。在那个时候他们的人数显然已增加到 2 万至 3 万之间。士兵们要他们重返村庄，但是人群还是冲过大桥，于是军队朝他们开火，致使 5 人死亡，约 30 人受伤。一个泰国摄影师阿南特·朱春(Anant Chomcheun)第二天来到现场，报道说看见巴特寮军队用枪赶着一群苗人回山里，其他人则混入高速公路旁的乡村，继续他们通往泰国的跋涉。“我想同我的父亲王宝待在一起”，一个苗人这样告诉他。到 1975 年底，泰国的苗人难民已接近 3.4 万人左右。欣合杀戮的新闻迅速散播开来，印证了苗人最糟糕的担忧。在龙镇，苗人士兵和军官被纠集起来，送去“研讨班”，如果他们没有回家，便是被处决了。

有关山区零星的持续抵抗记录始于 1976 年早期，到 7 月时便有关于根据地使用凝固汽油弹情况的报道。王宝亲随队伍只是反抗势力的一部分，另一支突出的队伍是法王(Chao Fa)军，他们或许完美



1975年,很多苗人因支持过王宝而担心报复,因而作为难民逃跑。但是也有很多人仍留在国内并继续反抗国家政策的压迫。1977—1978年间,老挝和越南军队对苗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战役,有时战况非常惨烈。但是到1978年年底,苗人的抵抗基本被镇压,更多的苗人逃去泰国的难民营。一小部分反政府群体仍在抵抗,不过,他们只活动于边远的山区。照片中的就是这样一群人,拍摄于2001年万象省的赛宋本蒙(Muang Saysomboun)。

地诠释了“神之战士”的含义。这场跨世纪的本土化运动爆发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起因就是苗族文化与社会分崩离析。其追随者相信苗王即将出现,而且他可以保护法王军士兵避开敌人的子弹。尽管王宝尽力压制法王的影响力,但王宝的队伍和法王军总是存在着交集的。王宝逃走之后,法王军在乱世的影响力急速提升,将苗人的反抗带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这些武装只有很少的军火,只能骚扰新政府。

186

万象的新领导者们不堪忍受反抗势力,1977年,他们决定同苗人的抵抗队伍决一死战。这与他们同越南签署的一份将使用越南军队抗击反抗势力的行为合法化的协议相一致。在1977年对苗人发



动的大规模行动中,出动了大概超过3万名北越正规军。据说这场战事非常残酷,炮击、从空中轰投固体汽油弹,甚至还使用了化学武器。因为苗人反抗者同他们的家人待在一起,对他们的行动导致了无辜市民的死亡,因此当幸存者逃到泰国的难民营之后,他们讲述的故事中便成为控诉新政府种族灭绝行为的证据。有些故事是如此可怕,以至于他们纷纷指责政府军使用了迄今仍不知其为何物的名为“黄色雨”的化学武器。美国的主战派大力宣扬这样的谴责,但从没有获得过支持。从公布的记录中可知,苗人的对手占有压倒性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例如1977年12月一名军官如是说道:“我们30个人的队伍在一个月之前同其他人分散了。我们每人只有50发子弹,没有食物和药品。”战争进一步破坏了苗人的经济,很多人穿越山林憔悴地逃到了泰国。

187 显然,针对苗人的行动时常演变成野蛮的“种族清洗”,但官方动机从来不是这样的。到1978年时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及其同盟越南基本击垮了最后的反抗,但是他们在战争中杀害及虐待了如此多的人,以至于今天仍有愤怒情绪显现在零星爆发的反政府的行动中。

## 国家安全

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年,地缘政治压力和国内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由于泰国与巴特寮的冲突,泰国于1975年11月关闭了泰国和老挝两国的边境,这很可能决定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12月宣言发布的确切时间。城市经济的彻底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撤出、企业家的逃离和资金的撤出,还有政府对于贸易和商品的限制以及第一次企业国有化,很自然导致了人们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不满,也提升了老挝人民对安全的关注。虽然老挝于1976年初期重新开始了与泰国的贸易往来,但是由于泰国方面的限制和老挝方面的压制,这种贸易往来仍然局限于很小的规模。1976年10月泰国和老挝关系再一次陷入了低潮,主要原因是泰国发生政变,

右翼分子掌握了政权。这不仅导致了进一步的贸易限制,也意味着泰国将支持老挝国内外的反政府活动。



新政权成立后的前5年,由于内部持续的反对、经济形势多变以及越南与中国敌对升级,老挝国家安全是不稳固的。1977年7月,老挝与越南签署了一个20年协议,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中发生冲突,尤其是不久之后的1979年,为回应越南入侵波尔布特的柬埔寨,中国攻击了越南北部。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老挝国家安全才有所改善。照片中展示的是军队在万象集结庆祝国庆节。(Grant Evans 摄)

除了城市经济低迷萧条之外,农村经济于1976年遭受了轻微的干旱并于1977年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在一些地区,只有通过外国的食物援助才能缓解饥饿状况。这时老挝的左翼分子开始批评政府依靠外国的援助,而老挝政府过去这么多年的财政赤字需要外国援助来填补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政府已经在各种不同的多边组织中取代了过去皇家老挝政府的地位,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老挝最重要的援助者早年的援助,这个国家早就已经破产。这还不算从

188 苏联和越南获得的军事援助(当然具体数字从来没有公开过)。老挝人民军对外国援助的依赖并不逊于前政府军队对美国的依赖。

因此,老挝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1976年越南重新统一后的新名称)在1977年7月签订了一份20年的《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一点也不令人奇怪。老挝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时既面对着经济上的不稳定,又面临着问题日益凸显的国际环境,这使得两国转而加固彼此长期持久的联盟关系。从地缘政治上讲,越南共产党在支持老挝这个新国家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主要原因是老挝的存在正好符合了河内的外交政策,即被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包围。随着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中国因为河内政府和柬埔寨的冲突而关系恶化,双方都意欲加固自己在老挝的地位。作为越南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盟友,老挝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场无法控制的冲突矛盾。因此,全球动态不可避免地继续影响着老挝。

### 越南作为文明引路人

从一开始,老挝就要依靠越南的建议和支持。实际上,老挝和越南的这种关系对于老挝领导人来讲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老挝的领导人已经和越南人共事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能够很流利地说他们的语言。像凯山这样的领导人更是如此,他的早期文化教育来自越南,而且他的一生都始终受到两种文化的熏陶;实际上,苏发努·冯亲王也是如此,因为他娶了一个越南人。其他的老挝领导人也是如此,他们要么是老挝越南混血儿,要么就娶了越南的妻子。还有更多的老挝领导人都接受过越南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老挝的干部学校也受越南督导的监督和视察;老挝学校里小学生的教科书也都是越南的,其中有一些被翻译成了老挝语。越南政治宣传的小册子被翻译成老挝语并做些许的修改,这种办法沿用至今。越南顾问遍布新老挝管理机构的各个层面并且与控制国家机器的老挝领导干部们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从文化方面来讲,老挝长期依靠越南的一个很充分的体现就是令人匪夷所思地每年庆祝胡志明的诞辰,以纪念其对老挝革命所作出的贡献。对于建立在皇家老

189

挝政府之后并且反越情绪日益高涨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来讲,这一切是不合时宜的,而且对于那些刚刚加入老挝爱国阵线的左翼爱国人士来讲,这更使他们急于摆脱“外国控制”。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曾经宣扬推翻皇家老挝政府以争取“真正的独立”,并宣称旧政府是“新殖民主义”的一部分,必须加以反对。然而,越南共产党在老挝国家各个阶层扮演的主要角色看起来似乎与老挝宣扬的以上政策相矛盾。对于很多老挝人来讲,新政权似乎也是“新殖民”体系的一部分,尤其是两国签订了20年条约之后。那些心怀不满、曾在共和国建立初期数次试图暗示凯山的人,大多持有这种观点。虽然1976年开始,老挝人民的日常治安维持已经由正规的警察部队接替了军队来掌管,但是1978年后期在越南的监管下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警察组织。这一秘密的警察组织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控制老挝人民革命党、军队以及公务员的不满。



老挝国家主席苏发努·冯亲王亲切地拥抱越南共产党领导人黎笋(Le Duan)。站在左边的是凯山·丰威汗。最初的老挝人民党由越南共产党支持和培养,革命之前及之后,它仍然需要依靠越南共产党的政治建议。1975年以后,老挝管理机构的各个部门都有越南顾问,任何对于越南顾问存在的批评和指责都是不能被容忍的。直到1989年,数以万计的越南军队才撤离老挝。

即使越南不知怎的被认为是可效仿的革命典范,它对老挝的文明引导作用受到以下事实的妨碍:越南自身也是不发达的、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社会,不能作为先进工业社会主义的典范。于是苏联扮演了发达工业国家的角色。直到1979年,苏联和其他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给老挝提供了60%的外援支持,当然也包括大量的军事援助。我们可以说,这与1975年以前美国在老挝扮演的角色无异,除了苏联的卢布没有美元那样的购买力之外。此外,苏联的工业产品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同类产品相比较质量相差甚远,而且苏联从来就不具有多少文化吸引力。直到1976年,大约有1500名苏联专家在老挝的各个部门担任经济顾问、教授、医生和技工。加上东欧和一部分古巴的专家,顾问的人数后来上升到了4000人。这些顾问填充了美国工作人员撤离的机构,过去的“小美利坚”成了现在的“小莫斯科”。当年的许多美国人或是自愿或是被选拔来到老挝,而相比之下,苏联和东欧人中则有很大一部分是被派往老挝的,他们勉为其难地履行他们的援助角色,他们对老挝的当地文化缺少同情和了解。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例外。这些外来社会的新人开始厌倦和讽刺社会主义的主张,与法国人和美国人相比,老挝对于苏联人来讲更是一潭死水。唯一值得欣慰的事情就是,他们可以购买他们回国后就买不到的来自泰国的廉价商品。

许多年轻的老挝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老挝人民革命党成员的子女)都整装前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接受高等教育,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选择了越南。人们寄希望于那些被派往其他国家接受培训的数以千计忠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新的官僚主义者能够替代那些旧政权遗留下来所剩无几的技术上胜任的老官僚主义者。然而,其结果却是利弊参半,这些学成归来的老挝人发现他们的技术并不适用于老挝,但各种语言却很流利。对于一些人,他们感觉自己大开眼界,他们仍然对俄罗斯人或者保加利亚人保持着美好的印象。一位归国人员通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为“列宁·内肯”(Lenin-nakone)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欣赏和赞叹。对于其他人来讲,这种经历使他们的理想破灭。

虽然中国长期以来也为巴特寮提供支持和援助,也有数以千计的

中国工人在老挝北部修建一条由南部乌多姆赛省到琅勃拉邦省的道路,但是中国和老挝两国之间却因为越南而一直没有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关系。中国欢迎老挝改革并且一直为老挝提供援助,但是1978年,由于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使中国暂停了对老挝的援助,老挝和越南结成了统一联盟,凯山宣称北京是“国际反动派”。那时,很少有老挝人在中国学习,只有一些人由于冲突的原因叛逃到中国。直到关于柬埔寨的争端解决之后,老挝和中国的关系才开始彻底向好的方面转变,而且其他地区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也迫使亚洲剩余的社会主义国家彼此团结。

### 集体化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日益恶化的安全环境下,老挝共产党开始尝试另外一个激进的改革——农业集体化。他们这样做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聚拢国内生产出的富余产品,以使用它来资助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老挝的自给农业在皇家老挝政府时期并没有被征税,农业产出也非常低。共产主义的传统理论认为,农业的产出只有通过扩大经济规模才能得以提高(工业模式也可以此类推),而且这只能通过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才能成功。他们声称,合作社能够最大程度地将现代化输入农业中。第二个主要原因是政治方面的。虽然老挝人民革命党已经在前皇家老挝政府掌管区域从村庄和区级立即着手招聘成员和支持者,并且在相应的区域建立了他们的领导权,但是控制的程度仍然是不充分的。通过把农民拖入合作社,他们势必会失去其对抗新政权的“利己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样合作社慢慢地就不仅会成为农村地区的经济组织形式,也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政治结构。而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政治经济结构,富余产品能够没有阻力地从农民手里转移到国家手中。

192

193

不仅是党和国家的官员,各式各样的外围组织也都被重新改制。这些组织早期都是老挝爱国阵线的一部分,后来也都是老挝国家建设阵线的成员。因此,农村根据地点的不同,或多或少都活跃着老挝妇女



农业集体化是传统的共产主义经济政策,老挝人民革命党于1978年试图推行集体化运动。但是由于农民的反抗和技术支持上的欠缺导致了运动的失败。20世纪80年代后期,所有有关公有制的尝试都被放弃,从那以后,农业发展完全依靠小农经济和市场机制。上图是1982年川圹省的一个集体农场里收割稻谷的场景。(Grant Evans 摄)

联合会(Lao Women's Union)、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the Lao Peoples' Revolutionary Youth)、老挝统一佛教联合会(the Lao United Buddhists' Union)和其他一些组织的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指派代表到区级机构,然后区级单位派代表到省级层面,省级层面再派代表到国家组织。这些代表和官员一起时刻监视人民的一举一动以确保没有任何对政府政策的反动言论被公开发表。

最初,老挝人民革命党就鼓励在农村建立公有制的经济组织形式,但是直到1978年国家经济和政治形势逐步恶化才最终在1978年中期决定实行公有制集体化运动。但是公有制经济推行不久,老挝南部就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洪涝灾害。随着新成立的合作社数量的缓慢增加,反对合作社的报告开始逐渐出现,但这并没有阻止这场运动的推行。合作社组织形式遭遇的问题主要归于不称职的干部,所以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要求强化培训。1978年11月,一个纷争解决委员会

在国家计划总署署长沙立·旺坎绍(Sali Vongkhamsao)的指导下建立,这一组织试图整顿当前的形势。1979年2月,凯山继续坚持:合作社是小农农业克服自然灾害并达到食物自给自足的唯一途径。1979年4月,老挝举行了第一次农业合作社全国代表大会,并在这次大会上宣布了新的目标。

然而两个半月以后,当全国的合作社数量据说达到了2500个的时候,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却停止了这场运动。7月14日的声明宣称:“值此收割季节,当人民都在为了快速并有效地增加产出而忙于生产时,任何动员农民参加农村合作社或者建立新的农村合作社的行为都应该立刻并完全地搁置。”这一暂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老挝人民革命党已经很明显地看到集体主义公有制经济正在严重地削弱生产。老挝人民革命党意识到老挝这一次不能够再浪费一年的时间重蹈覆辙,即让人为的因素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一声明中宣称,干部们在这期间只是侧重于合作社数量的增加而没有确保农业产量的增加。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合作社蜂拥涌现;农民被迫参加合作社而且被剥夺了母牛和水牛等生产工具却只得到了很少的补偿。这导致农村产生了非常紧张的气氛,不仅威胁到这场公有制运动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威胁到计划中的保障福利。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继续指出,一些“敌人”或“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公有制运动的弱点:

……居心不良的敌人逐步渗透进合作社组织,在人民当中制造混乱,并蓄意破坏老挝人民革命党和国家界线,以此来干扰国家的安全形势。正因为如此,人民,包括农民开始变得气馁和沮丧,严重地影响和耽误了生产。一些人完全放弃了他们自己的农场,转而去作其他的工作,贩卖或者屠杀他们的家禽,或者逃亡到其他国家。这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够迅速、有效和有技巧地得到解决,将会产生直接而长期的危险。这个问题不仅仅会成为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条件的经济危机,也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危机。<sup>56</sup>



老挝中央委员会强调了公有制项目的自愿性质并坚持称“那些已经自愿加入合作社的人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脱离合作社”。简而言之，这场公有制运动威胁着老挝的共产主义政府。事实上，这种危险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以至于已经不仅仅是旧政权的统治阶层或者来自城市的人民穿过湄公河到泰国的难民营避难，还有那些被称为老挝人民革命党的中流砥柱——农民也去了。

这就迫使老挝政府放弃追求传统的共产主义计划。1979年12月，凯山宣布了迈向市场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计划。对小型私人企业的一些限制被取消，人民在进行货物交易时更多地按照市场价格来交易和买卖。建立农业合作社的目标并没有彻底放弃，只是对速度进行了适当的调整，老挝人民革命党仍然坚信合作社可以确保在老挝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然而，他们也开始意识到在农业生产上现代投入的重要性；意识到在农业产品的采购和销售上采用有效的市场机制的重要性；意识到对农民进行必要的日用品和其他产品供给的重要性。为了这个目的，老挝政府开始重视组建贸易合作社，贸易合作社与国家贸易服务交易可以获得优惠条件。此后，有一段不太长的时期中，贸易合作社被认为是建立生产合作社的第一步。但这种过渡从来没出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老挝人民革命党采取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建立合作社的迫切性也开始降低。正如1988年底凯山接受笔者采访时所说：“我们先前实行的合作社政策是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过的陈旧的形式。在充分调查了老挝的实际现状之后，我们决定改变政策方向并从家庭开始。”实际上，从那时起，农业活动就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到1990年，合作社已经差不多完全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农村地区消失。

196

202

## 文化和社会\*

小中产阶级和商人阶级逃离老挝，以及1975年以后旧的统治阶层

---

\* 作者将本节位置前移，并对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故本节中文版所标示的原文页码仅供参考。——编者注

政治生涯的终结使老挝的社会结构空前简化。国家垄断非农村领域，社会地位直接与国家及其官僚机构相关联。尽管存在合作社经济，占全国人口 80% 的农民现在还是农民。这场改革的主要作用就是使农民们更加脱离了市场交易，更讽刺的说法是强化了自然经济。这场运动的限制也加强了农民的文化偏执，即尽管执政政府的政治承诺不断地改变，这个地区也不能够发生过于迅速的变化，但是这也确保了许多传统的文化习俗被保留了下来。

对佛教的改革很可能是最明显的一项对传统习俗的改变。与共产主义的世俗主义相一致，佛教不再是国家官方的宗教信仰，僧伽仅仅是国民阵线中和其他组织一样的一个组织。僧侣们也尝试着对佛教的教义进行重新解释使其与社会主义的主张相一致，并将信仰和宗教习俗称为“封建迷信”。很明显，地方上对于如何理解源于地方风俗的“迷信”存有很多疑问，因为许多负责监管这些政令的官员自己亦是身陷其中。因此对他们的镇压也是非常随心所欲的。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解决方式就是将信仰和习俗解释为“民族习惯”，这样可以保护佛教免受限制和镇压。然而，很明显那种已经超出了佛教界限的做法更容易被镇压，例如灵媒。当碰到土著神灵和佛教崇拜相互重叠交叉时，如每年的节日火箭节(Boun Bang Fai)，如何处理就很成问题，处理政策也往往并不一致。

小乘佛教依靠僧伽和俗人的互惠关系；俗人通过供奉来资助僧伽，而僧侣们则将这些外行人的供奉转化为他们的功德。在改革的早期，经济的瓦解和政治的限制都无形中削弱了这种互惠关系。经济的瓦解和衰退意味着不能提供更多的财富资助这些僧侣们，不能够重建或修缮这些庙宇。人们为了修功德而贡献给庙宇，而庙宇的这种经济来源的通道被新政权称为经济上的浪费行为，因为新政权希望能够集中所有的富余产品来支持社会主义建设。因此，这些所谓的浪费的供奉和节日是不被许可的。对于父母和年轻男人来说，一个重要的功德来源就是让后者进入庙宇修习，哪怕只待很短的时间。然而改革以后，如果一个年轻男子想要进入一个“无产出”的庙宇，必须首先获得当地官员

的允许,而这种行为经常是不被允许的。此种文化上的限制招致了低地老挝人普遍的怨恨,一些流亡者报告说老挝的佛教受到了打压。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放松管制的大趋势,老挝对于佛教习俗和佛教新的理论观点释义的限制也开始放松。农村地区没有新的社会主义政权组织能够确保凝聚力,也无法像佛教一样满足人们生老病死的宗教仪式的常年需要。所以,到90年代试图改变社会和佛教关系的尝试几乎都消失殆尽。

205 中产阶级的逃亡,以及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扼杀了60年代后期开始崭露头角的一批知识分子。对社会和文化问题的独立探索被政党理论所取代,文学受制于僵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男女主人公在战场上培养出纯洁的爱国主义的爱情。广播中的爱情歌曲也被爱国歌曲或者是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歌曲所取代。人们只能偷偷地收听泰国的广播频道。那时很少有人有电视机,阅读西方的报纸和杂志也是被禁止的。与外国人联系受到了严格的限制,那些作为佣人或者秘书为外国人工作的人也受到了严格的监控。西方人聚集的社区非常小,社区的社会中心就是位于湄公河上的澳大利亚人俱乐部,再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因为饭店和宾馆都是国有的。直到80年代这种情形才开始发生转变,转变的标志就是在万象的中心开设了南蒲(Nam Phu)大饭店。为数不多的外国人和老挝人之间的男女两性关系都是秘密的,外国人到当地人家里去拜访非常困难,因为当地的安全武装部队总是对有外国游客的当地居民进行盘问。对于外来人来讲,和当地的老挝家庭一起居住则根本不可能。

## 210 教育\*

至于教育方面,毫无疑问,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从皇家老挝政府那里继承了一个落后的教育系统,但他们一上来却使之更为薄弱。虽然

---

\* 作者将本节位置前移,并对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故本节中文版所标示的原文页码仅供参考。——编者注

法国已经将现代教育引入了老挝,但老挝依然坚持着泛印度支那化的高等教育,因此国内的教育非常不发达。皇家老挝政府是第一个承受法国殖民失败的冲击、需要做好准备独立运行的国家政府。皇家老挝政府执政时期,每年的入学率逐年稳定增长,20年间增长了10%。到20世纪70年代,年轻男子的识字率达到了75%,而妇女的识字率则达到了30%,这一数字在城市地区还更高些。当然,在农村地区就更低些,尤其是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在一些部落里,传统形式的扫盲是非常重要的,王宝就坚持他的部队都是受过教育的,因此在苗族中识字率是相当高的。实际上,军队在促进受教育程度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经常被教育专家们忽略。美国加大了援助老挝中等教育的力度,而且出资建立了法昂老挝语言中等学校。仅次于美国教育援助的是法国对老挝的教育援助,因此60年代后期法语仍然非常普及,老挝高等教育的课本用语和教学语言都是法语。直到70年代,老挝语才开始向前发展。前往美国和澳大利亚大学求学的学生数量开始和去法国的学生数量差不多,因此英语也开始流行起来。70年代早期,老挝政府将皇家老挝政府时期建立的一些学院合并成立了西萨旺·冯大学。当然,在巴特寮地区,大多数的高等教育都是越南语,因此大多数的学生都前往越南学习。

教育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重要部分,因为学校教育不仅向学生介绍国家,而且也教授学生成为一名积极的公民,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国家民主的基础。换句话说,除了单纯的教育功能,学校在政治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在其成立初期就开始大肆宣扬其教育方面的成功,及其在吸引学生接受教育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例如,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宣称要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彻底消除文盲。鉴于1975年之后教师大量流失的事实,扩大学校数量和识字率实际上只是一种宣传,仅仅是为了满足上级提出的指标要求。即使是对老挝教育最赞同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认老挝新教育系统的质量是很低的,而且其首要的作用是政治上的。直到90年代早期老挝才开始承认其教育系统的缺点,也承认15至45岁之间老挝人的文盲率大约是40%。换句话说,新政权的教育系统基本上没有任何建树。在高等教



教育自然是宣传新政权执政主张的一个主要的手段。战争主题和对集体劳作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宣传普遍存在于早期的教科书中。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这些教科书才被重新编写,社会主义主题才最终消失。关于马列主义高尚品德的政治教育却一直延续。

212 育方面,老挝仍然要像以前一样依靠外国的援助和输入,只不过现在的教师们说的是俄语,而且需要同声翻译。大学学生仍然在莫斯科、布拉格以及河内求学。西萨旺·冯大学 1975 年以后被解散。

196 **国家稳定\***

1979 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后,老挝和中国的关系一度严重恶化,与此同时,老挝与泰国的关系却因为江萨将军(Kriangsak)执政曼谷而暂时得到了改善。老挝能够取消对亲中国的泰国共产党的支持,是希

---

\* 作者将本节位置后移,故本节中文版所标示的原文页码与前文的顺序被打乱。——编者注

望泰国能够相应地不再鼓励或支持以泰国为基地的老挝反对势力。1979年初,老挝和泰国两国政府签署了一个联合公报——“开启老泰友好关系的新纪元”,泰国解除了对于老挝贸易的一些限制。然而20世纪80年代,泰老关系出现了反复的波动,有时候甚至波及面很广。老泰关系一直以来因为老挝在柬埔寨问题上力挺越南而成为牺牲品,两国关系直到90年代越南从柬埔寨和老挝彻底撤军后才得以稳定。

到20世纪80年代,老挝国内的反对力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而且虽然泰国的介入可以对当地产生巨大的破坏,但他们却并没有对老挝的军队和其越南盟军造成严重的危害。在此背景下整个社会的神经得到了一定的放松,同时经济情况也像凯山预测的那样出现了变化。随着商业活动小规模复苏,日常消费产品开始在市场上重新出现,人们手头有了余钱,并把一部分又投入庙宇庆典和家庭庆典方面。国内社会生活又开始丰富起来。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三个重大的国际事件开始严重地影响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首先就是红色阵营的兄弟越南和中国以及民主柬埔寨之间爆发了战争导致共产主义内部的危机。面对这种敌对形势,建立国际范围共产主义阵营的梦想很难得到实现。第二个就是老挝意识到在欧洲共产主义的核心地带正发生着严重的危机,其中一个征兆就是80年代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正在逐年减少,到1989年苏联解体时,那些援助便彻底中断了。第三个就是老挝的邻居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得到了令人震惊的蓬勃发展,这种发展或多或少都是在独裁政府的领导下完成的。也正是这一时期,我们开始听到人们讨论“亚洲价值观”不利于发展自由民主。努力工作和强硬的领导作风就足以让经济取得成功。老挝、越南和中国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合法并长期存在的基础就是经济增长。这一切导致了80年代后期,凯山开始越来越多地谈到“国家资本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人们希望这些经济动力能够和政党的最初目的相挂钩。

在1986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党代会上,解散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形式的方案被通过。尽管那些政治上更加保守的党派成员对于方

案的通过表现出恐慌,通过现实主义政策将注意力放在长期保持国家权力的新领导阶层得以胜出。其原因相当简单。与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政权不同,老挝国家工业部门的经济规模即使与越南相比都算是小的,而且对于党代会上宣布的“新的经济体制”的形成也不存在什么根深蒂固的强大阻力。旧的理念经事实证明是完全不起作用的,如果新的政权要生存下去就需要新的管理理念。凯山在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如此批评老路线:“我们主要的缺陷就在于主观主义和草率。我们试图迅速地消灭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下定决心实行平均主义。结果我们没有鼓励熟练工人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力。责任、权利、义务和利益之间没有任何关系。”<sup>57</sup>凯山在说明新的经济体制时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必要,当其宣布将国有企业和国家财政相分离,并使国有企业高度自治——换句话说,就是使这些企业摆脱了中央计划的外衣并向市场职能转变——的时候,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只是用来安抚那些党的忠实信徒的一种花样而已。

### 面对国际市场的重新定位

正当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对苏联的影响日益明显之时,老挝于1988年彻底转变了其经济方向。在2月和4月的一系列最高人民会议上,凯山宣布经济在面向世界市场的时候,要重新进行根本性定位。4月通过了《外商投资法》,这部法律旨在引进外国资金和专家到老挝拯救其摇摇欲坠的经济。鼓励所有的部门都建立合资企业,包括旅游业。为了促进招商引资,老挝制定了基普的统一汇率,而之前10年基普一直是多重汇率的。20世纪80年代,比较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有些人指出老挝经济改革的进程很快。除了如上提到的解除国内限制之外,其他重要的因素就是老挝的领导人准确地意识到,为了自身的生存,老挝需要依靠外界的资金支持。1986年,官方的出口总额是5500万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6%,相比之下,进口产品总额为1.86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在老挝和泰国边境还有一大批没有纳入官方统计的交易,因此上述对老挝的国际收支状况的估计是保守的。

老挝的贸易逆差是 1.307 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0.5%。所以,以经济援助形式流入的资本是填补老挝当前收支赤字的重要途径,1986 年的外国援助总额为 9 000 万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4.1%。过去社会主义国家向老挝提供了外国援助资金总额的 70%,现在社会主义阵营不稳定因素的逐渐增加,给老挝的领导层拉响了警钟。经济互助委员会的行为发生了快速的转变——其提供的援助总额从 1988 年的 5 200 万美元骤降至 1989 年的 100 万美元,到了 1990 年就没有再提供援助了。1988 年的电力行业改革(主要出口项目)正赶上旱灾,也严重地威胁了脆弱的老挝经济。新的政策承诺通过引进私人资金、增加海关关税,以及从西方国家吸引更多的经济援助来解决这些问题。

199



苏联新总统戈尔巴乔夫(左)正在介绍苏维埃制度的彻底改革。凯山·丰威汗(右)1985 年出访莫斯科,就是为了学习这些变革并与戈尔巴乔夫讨论老挝的经济改革。

很明显,一项更加外向型的策略已经酝酿了数年之久。毫无疑问,为了促进国际投资者相信老挝的“法治”,数千名来自旧政权的政治犯于 1986 年被释放。这表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受到反对派的严重威胁,社会也在逐步走向稳定。1988—1989 年间,残留在老挝的 4.5 万名越南士兵撤离老挝,这更加证明了如上信息。新的外商投资法的部分意图是鼓励那些海外的老挝流亡者能够回来投资老挝经



济,并用此法向他们提供政治上的保证。经济改革和政治犯的释放很快营造了更加开放的政治氛围,在 1975 年之前就开始宣传的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选举终于在 1988 年底和 1989 年初得以举行。选举由老挝人民革命党严格控制——79 个当选的副职中,有 65 个是该党党员,而其他 14 个也经过了老挝人民革命党的审查。无论如何,平民百姓开始找到参与政治的感觉,一些人希望这将是实现更大民主的第一步。老挝也开始感受到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风,他们又重新开始讨论宪法,因为自从 1975 年老挝人民革命党执政以来老挝就一直没有宪法。到了 1989 年,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民开始公开讨论制定宪法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宪法是规定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的基础法律框架,并能保护公民免受专制政府和政党行为的干扰。

改革之风已经在共产主义世界强劲地刮起。它们又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老挝呢?

## 第六章 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

共产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作为一种全球性力量,导致了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重新彻底思考社会主义政策,当然老挝也在其中。尽管老挝于1991年制定并通过了宪法,但是执政党仍然保持着中央集权。国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控制开始全面放松,酒吧开始出现,年轻人开始以现代人的方式穿着打扮,私人产业开始蓬勃发展。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腐败也开始普遍起来。然而,老挝国家政府仍然对大众传媒和政治活动实施严格的控制,虽然这种控制正在逐渐放松。自从2000年开始的“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逐渐深入和发展,一群新富裕起来的统治阶层开始出现。外国投资开始涌入老挝,中国开始在老挝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 一党执政

200

共产主义阶段的结束使老挝不得不向全世界呈现一个更为开放式的姿态,但由此而产生的混乱却使老挝人民革命党重申了其于亚洲地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紧密关系,尤其是与中国。像邓小平一样,凯山看到了在政党领导下进行的改革。同时,凯山也发出信号称将不容忍任何的异议。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40个老挝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民主俱乐部”展开了一场关于宪法的讨论,他们开始定期见面

并且批判老挝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老挝人民革命党党员、国家科技部副部长通苏·塞桑凯(Thongsouk Saisangkhi)向凯山递交了一封公开的辞职信,这位副部长在信中称老挝人民革命党为“共产主义君主制”,又称其为“政治局王朝”(领导人的孩子们的势力逐渐增强)。他宣称:为了给老挝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和繁荣,老挝必须改变成为多党制国家。6月4日党报《人民日报》(Pasason)首次公布了宪法的初稿,其中一篇即宣称:“老挝民主共和国是老挝人民革命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国家。”批判阵营的三位领导人,通苏、经济和计划部副部长拉萨密·坎培(Latsami Khamphoui)和司法部的彭·萨吉塔冯(Pheng Sakchittaphong)于1990年10月被逮捕关押,并于1992年的11月被判刑,罪名是诽谤并宣传反对国家罪。他们每人被判处了14年有期徒刑并被关押在位于华潘省的集中营里。1998年初,由于集中营恶劣的医疗条件,通苏死于狱中。其他两位一直被关押于狱中,直到2004年11月东盟峰会在万象召开之前才被释放。老挝此举是为了避免相关记者提及关于政治犯的尴尬问题。

1991年8月,宪法的终稿由老挝最高人民会议(SPA)通过,其间做了几次重要的修改,这也意味着反对派的行为可能并不是彻底的无用。颇具争议的宪法初稿第一章被删除。然而,在宪法第三章中老挝人民革命党的地位被重新说明:老挝人民革命党是政治体制中的“领导核心”,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是“人民民主国家”(第二章),其所有的组织“均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宪法中没有再提及社会主义的相关问题。然而,这作为党的指导原则在1991年3月的第五次党代会上就被通过了,并且在随后的一系列会议上被保持和确认。也许在这场改革的总进程中最大的进步就是建立了司法系统并且完成了法律主体的演变,至少在经济方面是这样,因为经济是这场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国民议会常务委员会(由老挝人民革命党控制)而不是法院,拥有法律的最终解释权,并有权任命法官。当然这样的规定可以确保老挝人民革命党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行动,不受宪法要求尊重个人的政治宗教权利和自由的规定的约束。然而,在经济争端

方面,法律的运用被认为是非常公平的,这至少为法治原则提供了一定的文化给养。

1992年凯山逝世后,坎代·西潘敦(Khamthai Siphandone)成为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人,使人们对老挝人民革命党继续处于统治地位深信不疑。在1995年的演讲中,他指出“老挝人民革命党仍然是老挝人民信任的唯一政党,所有试图削弱老挝人民革命党领导地位的诽谤和尝试都被视为是与历史现实和国家利益的公然对抗”。

前面的章节我们提到过,列宁主义政党总是对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充满吸引力,当然也包括老挝,因为其忠贞不二正好反映了民族团结的需要。而多党制是由多个政党组成,其中不再有那么多专用来增强大人物个人权力的追随者。但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严格的纪律通常会有利于获得权力,同时它也导致了政府缺少灵活性。极权主义要求老挝人民革命党必须控制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这就要求领导阶层必须定期对所有大事小事逐一地做出数以千计的决定,这无疑会使体制本身的运作效率降低。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效率较低的原因之一。这就导致了老挝人民革命党为了保持长期的政治生命必须放弃大多数经济领域和许多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控制。因为它没有能力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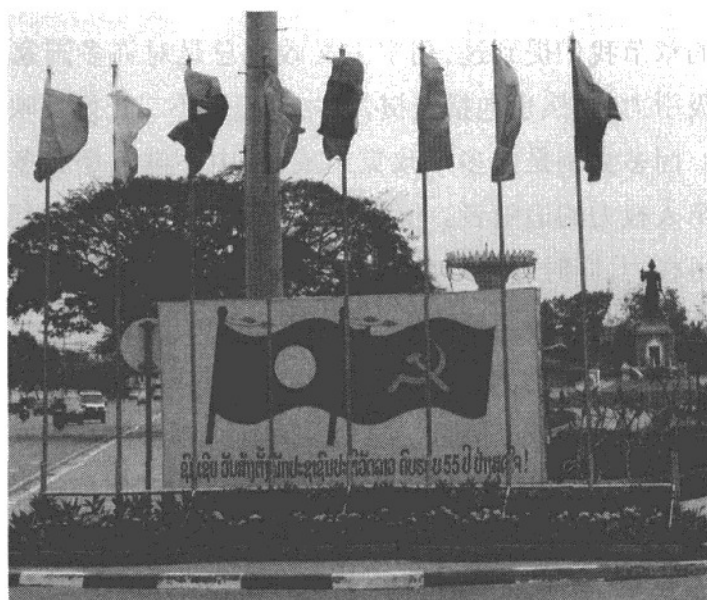
### 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

然而,老挝人民革命党仍然通过其分散在各地的基层组织来对政治活动实施严格的控制。这些党的基层组织控制着成为各级政府领导职位的通行证。一个人如果不是老挝人民革命党的党员,是不可能成为领导人的。例如,一位省级医院的专业外科医生想要得到晋升,就必须花费时间在党校学习当前的政策,成为一名党员,然后他才有资格获得相应的权力和特权,单凭其出色的外科手术技术是不可能得到晋升

---

\* 本节为作者在原书英文版出版后新增补的内容,故本节中文版无法标示原文页码。——编者注

的。这也同样适用于工程师和大学教授。所有的政府决定都必须首先经过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认可,不过考虑到高层政府和党内的相互渗透,它们几乎就是一码事。上一级的决定约束下一级的行为,这就确保了统一性和沉默。这种相互渗透在老挝被称为“党国”(Phak-lat),如图所示,国旗和党旗不仅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而且还相互连在一起。



2010年3月,老挝人民革命党成立55周年。老挝境内飘满党旗,以此来庆祝这一事件。图为悬挂在公园外国的党旗,国王法昂的雕像就在后面。

除了两位外,老挝国会中的115席都是革命党党员(2010),但是每五年仍会有一次选举,候选人名单由老挝人民革命党来确定,当选人均来自候选人名单,虽然没有研究表明女性经常为女性候选人投票,但选举中很可能存在着种族因素(例如,一个苗族人可能为苗族候选人投票而不会为老挝族人投票)。或者,与其说老挝人选举他们想要的人,不如说他们是在撇除不想要的人。不过无论怎样,可供选择的余地都非常有限。对于政府的施政行为和社会问题,国会已经变得更加地直言不讳,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有时国会对于各地区之间的分

配不公也能够坦言。但是批评之声仍然局限在党的政策许可的范围之内。

中国台湾的国民党和韩国朴正熙(Chung Park Hee)的独裁统治是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先驱者,上述两个地区的经济腾飞使它们获得了“四小龙”的美誉。对于一些人来讲,这似乎证明了独裁主义是发展经济的最好方式。当然,这完全要看谁掌权,独裁统治也可能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亚洲的“四小龙”经济为共产主义改革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模版,那就是,国家政策可以提供市场资本主义的框架,同时国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退出直接的经济行为。20世纪90年代,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迅速地通过并不是很透明的私有化项目卸下了大小国有企业,很多人能够以很低廉的价格获得国有资产。24个被认为“有战略意义”的企业仍然由国家完全控制或者国家参股且股份占绝对优势。然而,他们面对着必须商业化经营这些公司的巨大压力。实际上,老挝的国家部门只提供了1%的就业机会,这远比许多欧洲非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就业机会少很多。

虽然2009年美国的奥巴马政府已经明确指出老挝不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但是“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使那些仍然称老挝、越南为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家和记者感到困惑。事实上,它们在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采用了独一无二的转变形式,虽然它们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类似性,但是保存了一些独特的东西。很显然,政党的列宁主义组织形式是其中之一。例如,一些人喜欢将缅甸军政府和现存的列宁主义国家相对比,但所有这些相似性的对比都是不成立的。除此之外,列宁主义国家没有军人领导成为总理。和其他列宁主义国家不同,缅甸军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并不赞成一党制,他们不仅允许反对党的存在(虽然反对党的大多数活动受到了缅甸军政府的限制),他们还打算实行多党制的选举。老挝则很干脆地反对其他政党的存在。另外一个更加具有区分性的特点就是,在文化政策里面仍然存在一些旧的极权主义元素,即国家试图控制书籍、杂志和各种各样的大众传媒,当然还包括教育系统的话语权,如关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内容哪

些可以讨论而哪些不能。然而,现代的沟通媒体例如因特网,还有一些人的海外旅行和海外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使政府和政党言论的权威程度有所下降。

今天的老挝(和越南一样)比过去更加依靠所谓的“社团”机制。这意味着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来代表其成员,例如1988年成立的代表商人的老挝商会。这些组织必须向政府注册,或者处于政府部委机构,如老挝国家建设阵线的监管之下,而且每个行业只能有一个这样的组织。例如,所有老挝的新教团体必须纳入老挝福音教会之下,无论喜欢与否。这些组织有着双重的作用:他们的设立既是国家对社会上有组织的利益团体的一种控制,又维护了其团体成员的利益。毫无疑问,这两种角色之间必然会出现矛盾和紧张。但是1975年之后,这些被倡导的合作机制已经取代了过去为维持政党领导权所施行的强权、宣传和中央计划。2009年4月颁发的总理令第一次允许在老挝境内设立非政府组织(NGO)。但是11个月过去了,没有一个非政府组织注册,促进建立这样组织的一个政府官员对此感到惋惜和悲哀。外国的捐赠者敦促老挝政府迈出了这一步,因为他们希望此举将有助于推进他们的发展计划。但是很明显,老挝人民对参与这样的活动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因为老挝政府明确表示这样的组织不能参与“有碍国家稳定和国家安全的行为”。然而,一些“社会组织”(老挝这样称呼它们)正在形成。在川圹省的考恩地区和沙拉湾省的达威(Ta-Oy)地区,社区广播节目已经开始,毫无疑问这将得到推广。

在老挝的任何一个明确的目标或者计划中,社会主义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尽管偶尔会听到“老挝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言辞。一个富裕的、有产的新型统治阶层已经形成,而由政党领导层、健在的原皇家老挝政府统治阶层成员组成的家族网络,一些幸存的老挝王室精英成员,形成了老挝社会新的权力精英。一项关于皇家老挝政府领导人后代和当今执政党后代通婚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万象,这样的结

盟方式非常常见,它勾勒出了老挝当今社会复杂的结盟关系。不计其数的大家族之间的联姻,或多或少都是一种政治影响同丰厚财产或显赫声名之间的结合。”<sup>58</sup>认为新贵精英们会在不久的将来放弃自身的财富和权力而实现社会主义利益的想法完全是一种幻想。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些新贵精英们一边无节制地炫耀着自己的财富,一边开始像过去皇家老挝政府的统治者们或者泰国的上层人士一样公开参加慈善活动。例如,2003年7月15日《巴特寮》日报在其头版刊登了西纳瓦·苏潘旺(Sinawa Souphanuvong)向甘蒙省一所小学提交捐赠的照片,他在那里和中国台湾的利益集团有一个大型的合资公司。还有一个名为“领导人配偶和退伍女军人联合会”(Association of Leader's Spouses and Women Veterans)的组织为学校 and 医院提供援助。这些新财富就是以这种惯用的方式来寻求其本身的合法性。

### 建立一个新的经济体\*

219

对于老挝军队来讲,社会主义阵营援助的丧失是灾难性的打击,因为他们为老挝提供先进的武器和设备。由于缺乏海外援助者来接替先前的援助(即使中国从那时起开始对老挝进行援助),就必须找到其他能够赚钱的方式来支援军需。因此,作为新兴经济机制的一部分,将军们开始涉足商业。20世纪90年代前期,木材和森林产出品出口限制非常少,林业部门得到了快速的扩张,而这一扩张过程中受益最大的莫过于军队企业。这些军队企业拥有大部分老挝森林的开采权。这些年来这些企业的非法采伐行为及其与邻国的非法交易均不被人们所知。

220

1996年的党代会上,总理坎代确立了新时期政府短期目标的主要

215

---

\* 作者对本节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故本节中文版所标示的原文页码仅供参考。——编者注





20 世纪 90 年代,军队不得不参与商业行为,尤其是树木采伐,以弥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缺失。老挝军队权利的扩张使一些批评人士错误地认为老挝像缅甸一样是军队掌权的极权主义。(Grant Evans 摄)

216 发展方向和步骤。他们希望 1996—2000 年之间经济年增长率能够超过 8%,人均生产总值能够从 1995 年的 350 美元增加到千禧年的 500 美元。这一目标怎样才能实现呢?看看老挝的出口,税收持续地从类似的部门获得,其中木材的出口就占了 50%,其次是水电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初外国在老挝成立公司的成衣出口占了大部分的出口配额。为了扩大其出口的收益,老挝政府寄希望于扩大其水电项目的潜力。老挝经济最主要的累赘是其相对落后和萧条的农业产品。随着农村合作社计划的失败,老挝的农村经济被忽视,急需投资。因此从 1998 年开始,政府资助的灌溉工程等大型投资项目开始运作,希望农业能够多样化。

217 但是,这个庞大的农业领域是 1997 年始于泰国、波及整个亚洲的经济危机中受到影响和危害最小的领域。泰国不仅是老挝主要的进口和出口国,也是老挝主要的外国投资者,因此经济危机对老挝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1997 年末,基普的汇率已经由 1 美元兑换 900 基普下降

到1美元兑换2700基普。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基普的汇率持续下降,当政府在1998年6月初开始抱怨投机商的时候,1美元已经可以兑换3200到4200基普了。1998年5月28日,老挝中央银行官方宣布了基普贬值,规定1美元兑换3120基普。然而1999年汇率持续走低,跌破了1美元兑换10000基普,即便政府将其固定在1美元兑换8000基普也无济于事。随着基普的贬值,为了与通货膨胀相适应,中央银行推出了新的2000和5000基普的纸币,纸币上印有共产主义后期领导人凯山的头像。这些纸币的价值在他们进入市场之前就由于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而基本减半。

1998年湄公河次区域项目被搁置,亚洲发展银行转而为那些资金短缺的亚洲国家救急。老挝境内的外国投资要么被搁置要么被取消,贸易出现萎缩。换句话说,坎代用来提升老挝人民收入的资金源消失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又一次陷入了需要依靠外国慷慨援助的境地以防止破产,尤其是依靠中国。在过去的25年中,老挝社会的基础基本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国家所展现的脆弱性使老挝的领导人决定要进行巨大的改革,并且大幅提升了国家对外资的开放水平,尤其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领域,例如矿产和水电项目。

2004年区域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老挝的经济也得到了提升,外国投资开始回到老挝,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投资。亚洲发展银行资助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得到实施,政府乐观估计,到2020年老挝将迎来工业革命。到2009年,老挝的国内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农业和渔业占了42.8%,工业(包括建筑业)占了32%,服务业(包括旅游业、宾馆等)占了52.9%,木材占15.9%,成衣业占13.3%,电力占了10.8%。老挝现在已经跻身“资源富足型”国家之列。2008年的经济危机对老挝的出口和外国投资产生了轻微的影响,与1997年的经济危机相比,此次经济危机的影响很小。2010年3月,巨大的南屯2号(Nam Theun 2)水电项目开始运营,这只是众多水电项目中的一个,这些水电项目将对老挝的财富创造作出巨大的贡献,同时能够使老挝在2020年摆脱贫困国家的行列。一些人担心这种财富

会产生“资源诅咒”，即一小部分人侵占了大部分财富，使国家的其他人陷于贫困。然而，捐赠条款和老挝现行的国家政治体制使这种局面不可能会发生。

目前5个大型的赌场正在老挝的境内运营，还有更多的赌场正在规划之中。人们在回忆老挝革命分子抨击文翁亲王涉足在巴色和沙湾拿吉一些中国人经营的小赌场时带着苦涩的微笑，因为这在那时被认为是政权“腐败”的一种缩影。老挝政府未来的发展意图最具戏剧性的一种表现，就是其在2010年1月邀请全世界的百万富翁来老挝参观并投资。<sup>59</sup>

## 腐败\*

20世纪90年代，以超出人们预期的速度飞速增长的就是公务员的贪污和腐败。在“高级共产主义”时期腐败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存在。党内的高级官员都有通过外交商店和特殊的采购部门获得国外产品的特权，而一般普通民众是没有这样的权力的。换句话说就是权力使他们在一些领域直接享有特权，包括安全方面，海外留学的奖学金也只给那些党内高干的子女。因此共产党高层也抵抗不住权力的诱惑，就像皇家老挝政府的领导人一样。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共产主义时期高层们的特权更加具有排他性。然而，新的政策可能使腐败的来源多样化。由老挝人和外国人建立的产业持续快速地发展，既有私营的又有合资的，这些商业快速地在没有准备和笨拙的官僚体制中着陆。这些商业活动需要进出口许可证、交易许可证、旅行证件、木材所有权等。而许多情况下政府并没有明确的指示，因此行贿可以使这些瓶颈和障碍很快得到解决。不久，支付服务费在所有的领域都成为普遍现象。在高层中，这些费用要达到好几万。其他的佣金和回扣则要达到数十万。海外老挝人所做的调查显示，党内高层在海外银行拥有数百万美元的账户。

---

\* 作者对本节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故本节中文版所标示的原文页码仅供参考。——编者注



摘自2003年3月10日《巴特寮》日报。左边的人问：“医生，你能检查一下这盘菜中的腐败病毒吗？”医生回答：“好的，我已经检查过了，它到处都是。这种病毒正在蔓延。”

将一些增加税收的责任转移给各省无疑促进了地方层面的腐败，使那些初期的地方领导层受益。这涉及地方政府和外国公司的交易（有时候这些交易被万象取消或者取代），也包括了“内部人的交易”，例如，当地知情人了解了未来的开发方向以后，他们就会向当地的农民以低价购买土地然后再高价卖给开发者。我们还不清楚这是否导致了当地黑社会性质的大佬的出现，就像泰国各省的教父一样。如果真的如此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就是当地的党政领导人。

215

贪污受贿是老挝人民革命党和政府所特有的，而且很多党外人士已经开始意识到，加入该党意味着有机会获得金钱上的满足，其满足程度取决于工作的部门和职位。确实，这很可能是仍有人继续愿意加入老挝人民革命党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党就是一个超级大佬，它掌管着整个系统，列宁主义政党利用这个系统抑制党内众多老大们的党派之争，这不仅仅是通过严格的纪律，也通过国家财政的支持来奖励其追随者，例如，给上层人士以豪华的房子和汽车，保护他们的妻子和亲人经营的见不得人的产业。实际上，老挝这些贪污腐败的党员不受惩罚，这与中国和越南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和越南的党内高层也会因贪污而被送上法庭，然而在老挝没有一

219

个高层会被送上法庭。

在中国,“太子党”(red princes)一词被用来描述政府高层子女的财政运转状况和他们之间的交易。这种描述在老挝有其特殊的讽刺意味,因为2000年11月“红色亲王”苏发努·冯的大儿子坎塞·苏发努·冯(Khamsai Souphanou Vong)在新西兰被授予了避难权。他曾经是隶属于总理办公室管理国家企业的部长。自从1995年其父去世以后,他开始在党内失去了政治大佬的地位。除了其可观的财产、豪宅和昂贵的汽车之外,据谣传他带着数百万美元的秘密军火交易款潜逃,秘密军火交易是他奉总理之命主管的。当然,老挝国内并没有一个人能够彻底了解实情。

老挝主要的国际援助和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已经向老挝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希望其打击贪污腐败行为。2005年5月,一部新的法律递交到国会,目的是清除腐败。按照新法律的规定,国家官员必须向监管机构——国家审计机关报告其个人和家庭财产。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老挝的司法系统与党政没有分家,新法律只是被有选择地使用。2009年11月,老挝国会解雇了许多法官,但是没有给出关于他们不当行为的细节,也没有明确他们将面临的惩罚。独立的军事法庭审理民事案件和刑事轻罪的能力也受到了限制。2009年12月,老挝国家审查机构公布的第一份关于腐败的报告显示,腐败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的损失。但是这一次仍然没有相关的起诉细节。早些时候刊登于《万象时报》(*Vientiane Times*, 2009年7月1日)的一篇报道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缺少相关部门的配合,检察官仍然不能够将违反法律和滥用职权的政府官员送上法庭。”而且,如果列宁主义政权继续存在的话,那么这一情形是很难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的。

## 国内社会\*

20世纪90年代,极权控制逐步放松。80年代末期,老挝人国内旅

---

\* 本节为作者在原书英文版出版后新增补的内容,故本节中文版无法标示原文页码。——编者注

行的严格限制开始放开,他们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准许就可以在老挝国内各省旅行。90年代开始老挝的国外旅行限制也开始放松,所以人们可以仅仅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明就穿过边界线去泰国的各省旅游。护照也开始能够轻松地获得,于是老挝人开始去国外旅游和求学。数以千计的老挝人通过合法或者非法的渠道到泰国打工。然而,直到2007年老挝才取消了关于离境办理签证的令人讨厌的各种要求。

老挝人认为这种改变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破产,尤其是国家想要控制所有经济部门的尝试的失败。非常有趣的是,这一趋势首先在农村被察觉:80年代早期集体主义经济开始瓦解,到80年代末最终放弃了集体主义的模式。合作社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也被视为通过经济控制农民生活的政治掌控机制。私人贸易和私有经济形式限制的取消使老挝人的日常生活不再依靠国家,也使老挝人不再需要按照这种经济组织的要求参加政治活动。这也削弱了国家对人民的控制。

私人贸易的逻辑就是一个人应该尽量销售能够赚钱的东西,这种动态的循环可以最大程度地将商品介绍给社会,这样就能够免受国家的政治限制。例如,市场上广泛销售的来自泰国或者其他国家年轻人的衣服改变了当地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穿着传统服装的标准习惯。刚开始是录像带,然后是VCD和DVD,所有不同的娱乐方式开始在农村秘密地或者是半公开地出现,这一切就这样涌入了这个电视台和演员都很少的国家。所有经过审查公开放映的电影都能够私人租用。直到2004年,老挝才开始开放电影院,但是现在外国电影只能在万象巨大的ITEC展览馆里才可以公开放映。当然,由于背包客、游客、外国商人和老挝人的需求,互联网开始迅猛发展,至少城市里的互联网已经能够很快地赶上发展速度。

老挝国内的大众传媒仍然在老挝政府的严格监控下。电视机的拥有量越来越大,但是老挝的观众更愿意观看多样化的泰国电视节目。一些观察者对这一现状感到悲哀,因为泰国的电视节目使老挝人接触了太多的“泰国文化”和没有任何深意的肥皂剧,但是现有为数不多的

关于电视节目的调查显示：老挝人认为泰国的电视节目比老挝相同性质的电视节目更加开放。<sup>60</sup>对比起来老挝的电视节目就显得不够专业，虽然老挝电视业已经在与泰国电视业的竞争中向前迈进了，但是国家对于电视节目的限制仍然是其发展中的一个劣势。例如，1975年老挝开始自己拍摄第一部电影，最初的名字叫《生命之路》(*Road of Life*)——讲述的是一个富有的城市女学生和一个贫穷的农村男孩之间恋爱关系的浪漫故事，这部电影受到了老挝文化部的严格审查。老挝文化部部长一个人看完电影之后，这部电影就更名为《希望之路》(*Road of Hope*)，大概目的是使电影拥有一个更为“积极乐观”的名字。文化部对社会或者文化上的“正确性”的过分关注扼杀了电影的创造性。2005年一家私人的电视公司——老挝星空(Lao Star)成立，其公司的娱乐节目开始与泰国的节目竞争，同时也赢得了部分海外的观众。但是，这家公司的新闻节目被认为与国有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如出一辙。老挝的流行音乐也由于严格的审查制度而变形。一直以来，老挝民间音乐的表演者和作曲家道文·布纳考(Daovieng Boutnakho)抱怨老挝这种严格的审查制度使他只能像其他老挝的作曲家一样将其歌曲作品卖到泰国来谋生。<sup>61</sup>因此，当你听说老挝人长期收听泰国的广播节目时基本不会感到吃惊。在老挝，有线电视十分便宜，与不久的过去相比，现在人们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收看国外电视节目。虽然很难见到泰国的报纸，但是在老挝的主要城市也能够买到泰国的杂志。外国杂志，例如《时代周刊》(*Time*)、《新闻周刊》(*Newsweek*)、《曼谷邮报》(*Bangkok Post*)在老挝的城市商店里都能够买到。这与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千年开始出现了许多面向年轻人的讲述生活方式的杂志，但是这些杂志只是偶尔才会出现有深度的文章。老挝的报纸仍然是老挝官方政策的喉舌，但是与过去相比，关于外国的报道更加开放，一些有限制的批判性文章也被允许刊登。《万象时报》的英文版试图越过管制的范围来发表一些文章，诸如，“问题是谁来管治警察？”(《万象时报》，2003年7月18—21日)，或者发表一些批判腐败的文章。例如2004年5月17日的一篇文章报道，色贡省(Xekong)的

“许多地方官员侵吞国家财产”，他们非法采伐树木，非法进口汽车。但是这样的文章都非常简略，而且这些人名都没被提及，除非他们是平民百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文章符合政府对于腐败通常的批判态度。如果政府的高级官员被指出，调查才会进行。现在一些日常报纸上的卡通画会描述多年前不能公开说的事件，例如关于男子对家庭的不忠和腐败。其他现代技术的发展使现在的报道更好也更加开放，例如现在手机应用如此的普遍和广泛。因此，当交通事故或者暴力事件发生时，其新闻会很快地通过手机传输，这（和外国要求其更加开放的压力）也使这样的事件更快地见诸报端，其报道也更加开放。老挝广播可能是老挝国内最为主要的大众传媒。报纸的印刷数量很小（最多 5 000 到 1 万份），而且只被配送到主要的中心城市。收音机十分便宜而且比较容易接触到，同时广播也是人们了解政府政策和国内新闻的主要消息来源。在一些省，也有少数民族语言的广播新闻。

外国援助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外国私人企业的快速扩张自然而然地导致了老挝外来人口的增加，这就使老挝人能够更多地接触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学习英语的私人外国学校也为学生开辟了新的视野。所有的一切意味着老挝人接触了更多的不同观点，同时也有了能够表达自己关于国家发展的观点的渠道。今天，老挝人私下里敢于发表批评政府政策和



《现代更新》(Update)是自 1995 年以来在老挝销售时间最长的新杂志之一。其从 2000 年开始发行，杂志中通常是关于生活方式的小文章。这本杂志也讨论如下问题：“男人为什么不想结婚”、“东南亚运动会之后”、“为什么一些女人能够甘愿做小三”、“万象，什么时候你的交通才能够彻底瘫痪”、“蒲布(Pu Beu)：一个能够理解美的价值的女孩”。这本杂志不讨论敏感的政治话题。



执行力的言论,他们并不担忧。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和外来游客数量的增多,外文书店开始悄然兴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由纪念碑书店运营的书店,在那里可以买到关于老挝各个方面的书籍,也可以买到一些关于亚洲的书籍。从这方面来讲,老挝比越南更加开放。同时,在老挝还能看到很多二手书店。

为了使有见识的讨论在国内变得有意义,知识分子阶层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这些人非常关注各种思想观念在各个领域的运用,并逐渐认识到思想观念的重要性。很显然,这一群体包括记者、老师和学者,也包括那些工作在援助组织和对更广泛意义上的发展更为关注的那些人士,还有其他一些相关人士。当然,老挝人受教育的程度普遍非常低,只有一小部分人受过高等教育,因此知识分子阶层的人数显得非常少。

1996年老挝国立大学重新建立。教职人员的学术水平很低,而且学校的图书馆设施相当简陋。那些去国外留学获得高等教育的人回国后不想到老挝的高等教育系统工作,因为工资水平太低,工作环境太差。在许多部门的内部都有自己的研究所,这些研究所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当大学重新建立的时候,这些研究所的图书馆就归属于大学所有,这样可以将分散的知识分子和图书设施集中起来。然而,因为官僚保守主义的原因,许多部门不愿意将其转交给大学。直到今天,大学里的教员和学生都相当沉寂,并且缺乏学术上的自信心。

除了大学之外就是那些工作在政府运营的大众传媒里的记者,他们大多数都在泰国接受过相应的培训,而且和外国记者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是他们写的文章却要经过严格的控制。然而,对于形成知识分子群体最大的障碍就是没有相应的能够使知识分子形成集体意识的国内社会环境,因为政府控制了信息交流的所有平台和渠道。

到2010年为止,70%的老挝人(接近600万)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影响下成长直至成熟。他们只经历过这些。就像社会学家说的那样,他们做事情的行为方式已经完全被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社会化了。虽然,人们意识到了其他国家有不同的政治体制,但是由于缺少试验这

些新观点的空间,他们发现很难总结老挝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因此现在老挝的体制常被勉强解释为“老挝特色”。

现在,老挝人的日常生活与东南亚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区别。现代化的标志比比皆是,尤其是在湄公河流域的城市和各省会城市。个人收入的提高使人们开始买车买房以至于万象开始交通堵塞,这样的情况以前只在曼谷和河内才会发生。娱乐场所开始激增。2010年3月,国际快餐连锁品奇比萨(The Pizza Company)和双圣冰淇淋(Swensen's)的分店在万象开张。《万象时报》称其“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风景”,“是商业人士对老挝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提高充满信心的充分写照”。毫无疑问,其他的快餐连锁店将继续进驻老挝的街头,使其看起来与东南亚其他城市无异。

### 国家文化复兴\*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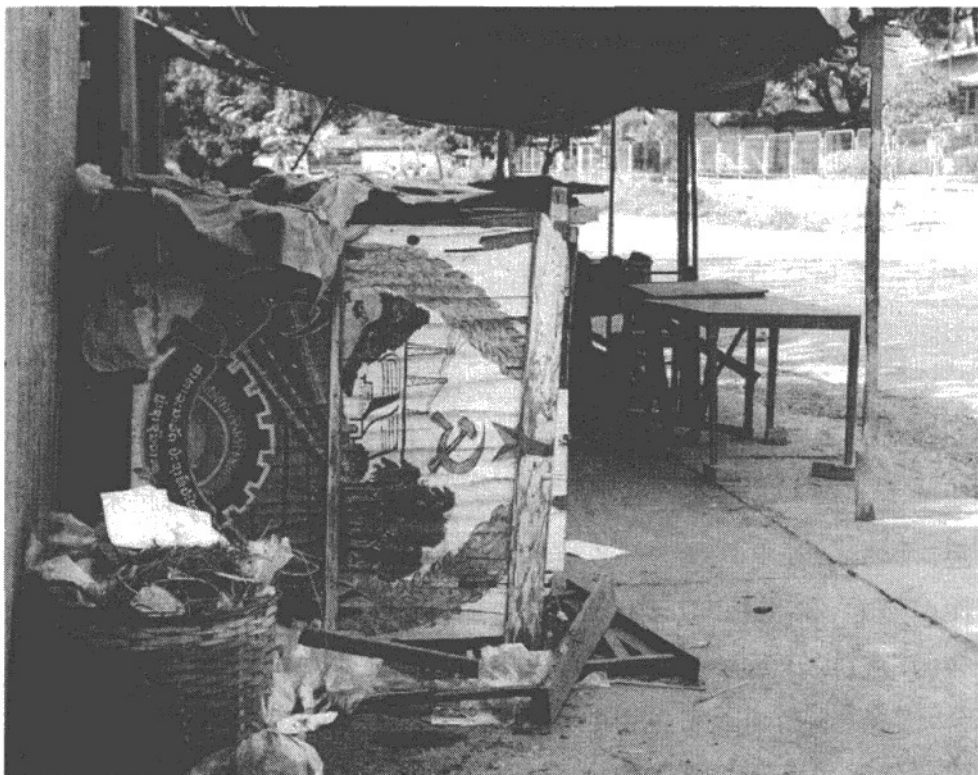
原有政治理念在其心脏地区的瓦解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破产使过去老挝人民革命党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口号看起来荒诞可笑。因此就要求其重构其政权的意识形态使其继续保持政治上的合法性。例如,20世纪90年代开始,老挝人民革命党开始倡导佛教,将佛教的地位提升到其在过去的皇家老挝政府时期一样。党的领导人开始公开频繁地参加国家主要的佛教节日,像过去的大人物一样开始赞助建造佛像和修复寺庙。然而,与过去皇家老挝政府不同的是,具有神力的国王在佛教礼仪中不再扮演中心角色,虽然他们会不经意地让人们注意到自己的出席。然而,对复兴传统的倡导首先就导致了人们开始质疑当初革命的合理性和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复兴只是旧体制的文化复兴,无关其他。这种转变最明显的表示就是1991年随着新宪法的通过,塔銮(或称大佛塔[Grand Stupa])取代了镰刀和斧头,在万象成为国家的中心标志,国家各部门、所有的正式文件,包括纸币和邮

204

---

\* 作者对本节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故本节中文版所标示的原文页码仅供参考。——编者注

票都进行了重新的装饰。自从 1975 年以后,国家就极力推行宣传其国庆日 12 月 2 日,但是相比国庆日前几周的塔銮节活动,国庆日很难吸引民众的自发热情。塔銮节是被视为文化盛宴的国家庆典,所以老挝人民革命党将其作为正式的国家标志是为了将这一强有力的标志与国家结合来促进国家推动的民族主义。



自从 1975 年革命以后,国家的标志就被共产主义的标志镰刀和斧头所代替。20 世纪 90 年代,镰刀和斧头已经被国家佛教标志塔銮代替。

在寻求新合法性的平台时,老挝人民革命党被古老的佛教礼仪形式所吸引。没有比 2003 年 1 月 5 日在万象树立国王法昂的雕像更能说明这一倾向的了。许多外国的批评家们大吃一惊,为什么一个列宁主义国家却捐助竖立国王的雕像。其实这一事件象征着政府将依靠传统的民族主义主题来寻求其本身的合法性。竖立雕像的决定是社会向旧传统再出发的一个关键点。据说国家需要国家统一的标志,而统一的澜沧王国第一位国王法昂被认为是这个统一体最合适的代表。雕像

于2002年12月20日被运送到安放地点,几位高僧站在雕像的底部为之诵经祈福。“庆典由信息和文化部副部长克凯·绍萨亚(Khekeo Soysaya)点亮蜡烛开始,向佛像敬拜并希望伟大的法昂国王的神灵能够准许竖立此雕像并保护整个国家。老挝佛教协会组织中最受人尊敬的高僧维吉·辛哈拉(Vichith Singharaj)博士带领僧侣们祈求保佑并带来好运,使法昂的雕像更加神圣。僧侣们将圣水倒进碗中供奉国王法昂的灵魂。从25名僧侣中选取了4名来祈祷,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上诵经来驱逐邪恶的灵魂并允许法昂的灵魂居于雕像中来保护这个国家。”<sup>62</sup>1月2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带着捐献的21坛供奉物(Kong Boun)游行到佛像。揭牌仪式可能是1957年以来首都举行的最让政府费尽心思的庆典,即庆祝佛陀诞生2500年的庆典。庆典当日的早晨,50名高僧聚集在雕像前接受俗人捐赠的施舍物(Tak Baat)。“下午,游行的队伍扮演国王法昂从吴哥城高棉王国返回的情形,在他的前面是大批的军队,旁边是他的妻子。法昂坐在一头少见的白象背上,他的妻子凯肯娜(Keokengnga)坐在另一头大象的背上,旁边是马匹、士兵、舞蹈演员、音乐家和仆人……队伍当中还包括一个令人敬畏的勃拉邦佛像,一座被认为是国家守护神的黄金雕像。令人激动的场景是,当国王法昂的雕像通过人群时,人们纷纷屈膝下跪以示对国王的尊敬。勃拉邦佛像后面满是佛教法令和经文的古代雕像队伍,还有法昂从高棉王国带回来的12个僧侣。然后是一群拿着菩提树的重要社会人士和老人。”<sup>63</sup>随后在下午的晚些时候,坎代·西潘敦主席为雕像揭幕,其他党内的主要人士都出席观看,例如诺哈·冯沙万(Nouhak Phoumsavan)和沙曼·维亚吉(Samane Vinyaketh)。这一盛事很明显是皇家仪式,除了缺少一位在世的国王。然而,邀请法昂和其妻子的灵魂则意味着必须用皇家的礼仪来对待他们,因而这场盛事就好像真的有国王出席。实际上,坎代·西潘敦和其他党内的领导人也向其表达了尊敬。

当然,老挝人民革命党试图控制这一事件的深层意义,并且始终坚持这纯粹是一场关于民族团结的庆典。但是考虑到这次庆典所涉及的所有实际做法,老挝人民和外国观察家们都惊讶地看到了过去王室



老挝人民革命党的元老们也出席了国王法昂雕像的揭牌仪式，他们是西沙瓦·乔本潘(Sisavat Keobounphan)、诺哈·冯沙万和坎代·西潘敦。

的影子。这次事件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以至于老挝的英文报纸《万象时报》(2003年1月14—16日)在其头版头条发表了文章：“竖立法昂雕像并不是君主制度的复兴”，老挝国家博物馆主任苏奈·波迪善(Souneth Phothisane)告诉记者：“这也就是说竖立法昂的雕像并不是崇尚君主制度，而是表达对这位将其毕生的经历和智慧都倾注于为老挝各族人民谋幸福的英雄国王的尊敬。”但是，很明显这样的复兴会影响革命的理论基础。

文化的复兴发生在所有的领域。革命之后，语言中的敬体形式都被指责为“封建”，使用“同志”这样的称呼非常普遍。20世纪80年代后期，势头开始有所转变，人们开始使用更为尊敬的称呼——先生。到90年代，“同志”这个词已经在公共领域消失，只在党内部的会议上才使用，而且基本上被过去传统的等级称呼形式所代替。例如，更加中立的词语“主席”(过去政府的主要领导职位)都被传统的称谓头衔方式

“chao”或者“nai”所代替。不同的表示尊敬的身体语言,例如致敬,将双手合十以示敬意,都曾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并被平等主义的握手所替代。现在握手又反过来被取代了,小孩子被要求向老师和成年人双手合十以示致敬。所有这些无论是正式场合还是日常生活中仪式的转变都证明了新政权在构建文化新形式上的失败。因此,90年代,整个社会都被古老的方式所吸引,而政府的文化机构则沉湎于排外的宣传:这是保护“传统和美丽的老挝文化”。这种排外宣传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对外开放以后,老挝面临外界迅速变化的挑战,但由于革命,老挝文化应对这种挑战的能力有所下降。这种能力的削弱部分是由于老挝文化界知识分子衰退造成的。

### 全新的“旧”社会

206

老挝对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一个结果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万象的外来人口开始迅速增加。刚开始这些外来人口只是聚集在首都,后来他们慢慢地向省级中心扩散。这一群体人口的增多,是由于正式的援助承诺和许多海外的非政府组织数量的增多和一些小型的商业流入。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的游客前来老挝旅游。这些都带来了社会生活的转变,尤其是在万象,娱乐场所如酒吧、迪厅充斥着这个首都,然后是各省。90年代初期,随着更多的现金在城市经济中流转,一种及时行乐主义的态度也开始扎根在万象,人民急切地追随外部的潮流,包括音乐、服装,并开始蔑视社会主义的朴素。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市民社会意识开始出现。1975年面世的第一份英文周报《万象时报》在1994年开始为了适应外国人的涌入开设了一个发表新见解的专栏。然而,这种倾向很快就受到了压制。

207

外国人的涌入对于万象的财富拥有者来讲是一种幸运,一些旧统治阶层的富人们稳坐交椅15年不动,现在一些新贵阶层开始加入并且侵占或没收前者的财产据为己有。食利资本主义悄然兴起。这些新贵阶层开始住着豪宅,带着全套的金银首饰和珠宝,开着全新的好车到处闲逛。一种新的堕落开始发生,但是当这些新贵阶层的儿女开始开着赛车驰骋于万象的街头,冲进首都的迪厅里感受泰国爵士音乐,还有些

开始吸毒时,他们开始担忧和警觉了。那些将这一切归咎于外国影响的新贵阶层和党内的坚定分子开始出现道德的恐慌。从那以后,政府开始偶尔打压这样的场所,并推行相应的道德准则,当然也包括着装和音乐的要求。所以,即使政府已经开化了,但是极权政府的许多框架仍然保留并发挥作用,而且有时打压一些事关“精神污染”的事项时,干部们的处理方式仍与他们以往处理政治事件时的方式一脉相承。实际上,指导他们的法律和规定仍然反映了老挝政府试图控制老挝人民大部分社会生活的一种愿望。老挝政府部门经常发布一些推行“老挝文化”的指南,例如,娱乐场所人们的礼节和着装的规定要求:“男人应该穿国际通用的西服套装或者国内的、民族的或其他适宜的套装。女人必须穿老挝传统的裙子(sinh),头发必须盘起成小圆面包状,或者其他合适的发型。”关于传统节日和其他庆典也有相同的规定,例如,“结婚庆典上不允许播放外国歌曲,除非是外国人的婚礼”。至于酒吧和迪厅的规定则是:“虽然外国歌曲允许演唱或者用于跳舞伴奏,但是这些歌曲必须经过特别的挑选和审查,并且到文化和信息部注册方可使用。”

208 因此 在一些 试图突破这些政府限制的普通老挝人和政府部门之间似乎



选自 2003 年 2 月 17 日的《巴特察》日报。左：“和老婆一起出门。”右：“和……一起出门。”

仍然进行着一场所谓的“内”战。当然,决定哪些规定是强制性的而哪些不是就成为街头警察和高官们贪污腐败的一个源头。卖淫行为再次在老挝出现。满足外国人需要的涉黄酒吧在皇家老挝政府时期就遭到打击,此时没有复现。但是到处都有人招揽生意以满足这些外国人的需要,当然这些女孩也为老挝男人提供服务。根据法文报纸《革新者》(*Le Renouveur*, 2003年7月10日)上的一篇报道,警察和村长们已经提醒这些经营者要“想清楚”。为了赚钱和寻求刺激,一些老挝的年轻女孩开始在泰国的酒吧里工作,而且跨境的肉体交易正在逐步增加。

### 凯山崇拜\*

自从1992年11月凯山·丰威汗去世以后,为了弥补共产主义阵营的全球瓦解和新政府政权仪礼方面的薄弱,老挝人民革命党开始宣扬对凯山的个人崇拜,这与越南人崇拜胡志明是完全相同的情形。凯山的葬礼是将佛教仪式和国家政权结合的又一有力例证。诵经的僧侣是佛教高僧,新主席诺哈·冯沙万(Nouhak Phoumsavan)竭力要求出席纪念仪式的人“记住这位同志的教诲”,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劝诫结束讲话:“凯山·丰威汗主席的理想将永远与我们同在。同志,我们希望你的灵魂可以抵达极乐境界并得到上天的护佑。”从那以后,为了继续推进对凯山的个人崇拜,老挝建立了纪念博物馆,竖立了纪念半身像和雕像,并通过新闻和讲话来加强这种影响。老挝的革命史本就相当片面——领袖是一切的中心,是所有国家和党内“具有远见”政策的来源,而个人崇拜使情况更加扭曲。任何错误和不当措施都似乎没有发生过。还有一种试图将领袖树立为“人民的父亲”般的慈父形象,就如“胡志明叔叔”一样。唤起伟大领袖“人性”的一面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而且现在人们仍然可以在国家书店里找到由俄文翻译成老挝语

---

\* 作者对本节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故本节中文版所标示的原文页码仅供参考。——编者注



209

的描写列宁儿童时期传奇故事的书籍——苏联存在的残余。毫不意外,从1995年开始,由朝鲜资助的耗资巨大的数以百计的凯山半身像和全身像竖立在老挝各个地方,因为朝鲜本身就是个人崇拜方面的专家。大的雕像和半身像坐落在主要的中心城市,小的则坐落在国内区级地区。如此种种,可以看出老挝想要用这些雕像来代表国家领土的统一。最大的凯山雕像是由中国捐赠的,就屹立在凯山纪念博物馆的外面,耗资800万美元,于2000年12月13日凯山生日当天揭牌。纪念馆是巨大的白色和黄金建筑,混合了共产主义风格和佛教装饰图案。内部陈列了一些凯山生前使用的平凡的小摆设,2005年底中国政府又向老挝政府赠送了两尊巨大的凯山黄铜半身像。

崇拜的热情是日渐趋缓的。一些人开始抱怨新的纪念馆。一位年轻的万象居民说:“我认为这样的行为是疯狂的,当我们的国家如此地需要钱来建更多的学校、医院和道路的时候,领导们却将钱浪费在建造另一尊雕像上。”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在老挝也流传着关于“伟大领袖”的讽刺性幽默,内容如下:

一天,凯山先生有机会参观一个生产拉链的工厂并与工厂的经理和工人讨论产品情况。听完报告以后,他举行了座谈会。坐在前排右边的凯当(Kidaeng)先生非常想发表意见。在他前面的讲台上就是各位领导,包括正在号召工人的工厂经理:

210

经理:亲爱的同志们,你们都是爱国的,并希望国家富强和变得更加富裕,你们一定有一些想法想要表达。好的,坐在前面的凯当,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凯当:哦,是的,好像拉……拉……拉……没拉好,先生。

经理:什么?你能大声点让大家都听见吗?我们现在几乎听不到你的声音。

凯当:嗯,那拉……拉……拉……没拉好,先生。

经理:(生气地)凯当!这是命令,大声点让每个人都能够听见。

凯当：先生，凯山先生的 YRZR 370822 没有拉好！

这个温和的讽刺短文和国际上的许多笑话一样，都影射了掌权人士自命不凡的作风及他们的追随者(像“皇帝的新装”)。通过凯当不得不用产品编号来指称拉链的做法，不仅暗讽了无处不在的官腔，也讽刺了这个制度内转弯抹角的语言。



坐落于万象郊外巨大的凯山·丰威汗纪念馆是试图建立起一种以他为中心的个人崇拜的一部分。直至今日，很多老挝人仍然可能称赞他，但个人崇拜是失败的，因为这与老挝文化的深层结构格格不入。(Grant Evans 摄)

老挝人民革命党的努力并未使这种崇拜流行，部分是因为东亚国家对于先祖崇拜的文化根源在老挝并不可行。那些被认定拥有“潜在神力”的人物如佩差拉亲王也许会被崇拜。不过，这些想法来自老挝历史上皇权和佛教的密切关系，因而任何像样的个人崇拜都有被已打倒的王室所替代的危险。正因为如此，老挝文化自发地摒弃了出现已久的世俗政治崇拜。

2002年老挝信息与文化部出版的一本宣传册里,介绍了老挝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建造的12个革命领导人的塑像或半身像。例如,苗族的领袖费当·罗比瑶的塑像将会建在川圹省的省府。这些塑像多数还未建成,不过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2003年法昂国王的塑像已经在一片庆祝声中落成。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塑像,苏发努·冯亲王的塑像于2009年7月在老挝琅勃拉邦落成。在他曲还有一个苏发努·冯亲王的大塑像。在佛教庆典时,法昂国王与苏发努·冯亲王的塑像均成为人们朝拜的对象,相比之下,几乎没有人向凯山的塑像所在处敬献鲜花。2010年在老挝首都万象的一条河边将建成一座阿努王公园,里面有著名勇士国王阿努的塑像,这也将成为一个新的朝拜对象。有人建议也应该塑像纪念保守派的民族主义者佩差拉亲王,如果建议被采纳的话,他的塑像肯定会使凯山的塑像黯然失色。

## 教育\*

1975年以后的高等教育主要指向社会主义阵营,学生们都是到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德国、匈牙利以及其他一些东欧国家,当然还有越南,去接受高等教育。有很少人去了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也给老挝的高等教育系统带来危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得不向西方国家及其高等教育系统寻求帮助。去日本、澳大利亚和泰国(还有其他国家)求学的人数不断增加。老挝以政治控制思想的后果之一是,少有外国书籍被翻译成老挝语。受此影响,漂洋过海求学的学生在继续学业时总是发现自己面对的信息过剩,而他们对此毫无准备。事实上,他们主要的准备来自在万象的外国人开办的语言学校里学的东西——批判性思考。这些学校不断试图向学生灌输对批判性思考的理解,这种理解在老挝的教育中或者说整个老挝社会都是缺乏的。尽管如此,仍有许多学生到越南留学,到中国去的留学生数量也在不断

---

\* 作者对本节内容进行了全方位的改写,故本节中文版无法标示原文页码。——编者注

增加。

在老挝的教育规划中,国际组织的援助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对于老挝教育水平的统计和评估将会变得更精确。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展的文化扫盲运动已经过去了。到2005年,老挝成年男性识字率据估计会到达82%,成年女性的识字率则能达到63%左右。城市男性女性的文化水平更高且在人数上比较平衡。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地域差别很大,城市中心人口的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是最高的。老挝的教育质量和教育覆盖人数取得了切实的进步,但是每年仍有23%的学生辍学或是留级。少数民族的受教育程度是最低的,不仅是因为他们多居住在乡村地区,还因为他们面对学习第二语言(老挝语)的困难。南亚语系的族群(如佤木族、卡多族等)整体的识字率约为40%,苗瑶民族约为26%,藏缅语系的族群(阿卡族、拉祜族等)约为17%。少数民族中,女性的识字率非常低。



1975年以来的和平时代使得老挝的教育蓬勃发展,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已经成为教授少数民族老挝低地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因此,在这幅照片里,一个年轻的苗族女孩子正在恭敬地致敬,就像标准的老挝低地女孩一样。

## 少数民族\*

相比之下,老挝对待少数民族还是比较好的。1947年皇家老挝政府第一次立宪时即承认所有少数民族均是享有平等公民权利的老挝公民,在那个时代,澳大利亚和美国都没有这样做,泰国也没有。从皇家老挝政府统治的时候开始,“天下一家”在世界范围内越发盛行之后,各个国际援助组织也开始将种族平等作为指导原则。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辞令显然符合这项“种族政治”。这也使得少数民族的期望不断增加,特别是那些成功接受中等或者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个体。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不断宣传老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可讽刺的是,这却使得少数民族同胞更注意到民族间的差异。而且,20世纪90年代传统低地老挝人国家象征的恢复,再次强调了老族文化的中心性。在皇家老挝政府时期,各式各样以王权为中心的仪式以等级的办法来包容民族差异,因此抑制了民族意识,但是现代世俗国家却在各个领域拿民族平等做交易。在这一点上,老挝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还不够令人满意。实际上,日常生活中政治正确性的放松,已经造成了古老的蔑称重新涌现,以及针对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的民族笑话的广为传播。

但是大多数少数民族居住在老挝的边远山区,政府与他们生活的联系并不紧密。然而,干部们到村子来要求他们迁往低地却确实影响了他们的生活。革命刚刚完成的时候,这种事情很多时候都是靠枪杆子来完成的。如今,由于有了外国捐助者的监督,便转而采用劝说的方法。这样的搬迁并不只是为了增强政治控制,也是为了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这样做也考虑到了高地耕作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早在60年代,宋萨宁亲王就向皇家老挝政府建议过实施此政策,欧安·拉提考认为,这样也有助于解决种植鸦片的问题。这一政策涉及许多方面,其复杂性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到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执政时期,他们靠简单的

---

\* 作者对本节内容进行了全方位的改写,故本节中文版无法标示原文页码。——编者注

政治命令来处理这些问题,因此搬迁命令在执行时往往会过于雷厉风行,使得缺少必要准备的少数民族变得比以前更加穷困。但是,少数民族穷困、社会地位低的首要原因就是他们地处偏远山区。另一方面,苗族那样进入了教育体系的少数民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这个国家的高层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而不是像某些荒唐的记者所说的那样,苗族在老挝遭到了迫害。实际上,苗族是老挝最成功的族群之一。

90年代对于出入境政策的放宽使老挝少数民族可以到美国去探望当年逃难过去的亲属,他们的亲属也可以到老挝来看望他们。对于苗族人来说,这是一个与海外苗族人讨论苗族过去与未来的渠道。这个话题在海外苗族人中颇受热议,在老挝国内则形成了与老挝国家建设阵线所倡导的讨论方式相竞争的一种话语。总之,与美国的种族政治接触让苗族人要求自治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但是这种接触对老族人的影响就不得而知了。一些很少抛头露面但却同样举足轻重的少数民族如佯木族,也在无声地表达着他们的不满。佯木族人是巴特寮军队中一个重要部分,其中一些人还成了军官,还有极少数人是军队外的高层官员。在2000年,一位比较有影响的佯木族人曾对我表达过他的不满:“革命时期说的都是党如何如何照顾群众,现在是群众必须支持党。看看万象,老族人都很富足,可看看乡下的佯木人,都很穷!他们没法上大学,除非他的爸爸是个上校,有办法走后门。不应该是这样的!”瓦塔娜·奔舍那(Vathana Pholsena)在她对于老挝南部曾经支持革命的少数民族的研究中发现,革命分子曾经具有的分享精神在后社会主义的老挝已经被侵蚀得面目全非了。她记录了一位革命支持者这样的抱怨:

孩子,我告诉你,现在那帮掌权的人根本不关心少数民族!所有的东西全是老龙族的,而且只给老龙族!不过,我们是诚实的人,不靠徇私去弄好处。这不是党和政府的错,是那些搞教条主义的人的错。

由于他们作为革命分子的身份不断在贬值,“‘少数民族的身份’也变成不受欢迎的身份了”。<sup>64</sup>对此少有人提建议改善,但这迟早会对国家产

生影响。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关于老挝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辞令,与它特别强调国家的统一产生了持续的对立。如今这个统一的国家的中心是低地老挝文化,人们可以很容易发现老挝在对少数民族施压,使其变成“老挝人”。而少数民族抗拒这种“老挝人化”的一个办法就是加入基督教组织。这是一个受人推荐的好办法,因为用这种方式,他们能够与一种世界性宗教联系起来。同样地,佛教也被认为是一种世界宗教,而且用这个办法还可以避开政府对于他们“文化习俗落后、迷信”的批评。老挝社会控制的放宽使得各式各样的基督教团体在其国内活跃起来,这也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心,时不时还会招来政府压制。国际舆论对此的批评使得老挝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弘扬佛教,以和平竞争的手段从基督教团体手中争取更多的少数民族信徒。然而这种做法更加深了人们对老挝政府以低地老挝文化为主的印象。谁也不知道这种紧张局面在未来何时能得到缓解。

就我们所知,政府对于苗族采取的军事行动使双方尝尽了苦果,零星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了新世纪。2000年初期,在川圹省就发生过一起由于安置项目引起的、在其他常年未得到处理的老族问题激化下升级的土地争端,这场争端迅速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战斗,甚至有报道称,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老挝政府第一次调回了越南的部队来协助平息此事件。2003年发生了一起苗族人在通往琅勃拉邦的13号公路上残杀无辜平民的事件。但是这只是一小撮人的疯狂举动,这些组织没几年就分裂了。2009年下半年,泰国遣返了一批在2000—2004年间进入泰国的苗族“难民”。所谓的“苗族问题”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 2009年东南亚运动会\*

2009年12月,老挝主办了有文莱、柬埔寨、东帝汶、印度尼西亚、

---

\* 本节为作者在原书英文版出版后新增补的内容,故本节中文版无法标示原文页码。——编者注

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参加的东南亚运动会。老挝国内外对于能否办好这次运动会都充满担忧。举办此运动会需要依靠区域内更大更富裕的盟友给予大量的援助。中国发展银行援助1亿美元,并由中国承包商承建位于万象市郊的主场馆及相关综合设施。越南的一家公司承担了耗资1900万美元的运动员村,泰国则赞助老挝对国家体育场的修缮。老挝还与日本和韩国等国签订了多项关于训练及提供运动服的协议。

有趣的是,借助外来经济援助举办运动会折射出了这个国家在新时期的发展办法,即依靠外国投资和大规模的外国援助。正如西蒙·克里克(Simon Creak)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老挝绝对没有因此散架,政府扮演的是掌控各方势力的全能仁慈的管理者。这也解释了为何国有报刊上总是充满了各种‘交接仪式’的照片,尤其是在这次运动会的准备阶段。从这个角度看,主办这次运动会显示的并不是老挝政府缺乏独立性,而是它在获得区域援助时的娴熟技巧。”<sup>65</sup>

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样的大型体育盛会与国家及政党的政治目标有



年轻的粉丝穿着装饰着国旗的T恤,上面还有口号,像“爱老挝,为老挝喝彩”,他们正在为他们的参赛队热情捧场。(Simon Creak 摄)



极大关系,这不是什么秘密。中国在举办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的表现非常完美。老挝在随后 2009 年末举办的规模小很多的运动会上的表现也一样。壮丽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以及运动会的日常管理之好均超出了人们的期望。事实上,此次运动会使老挝大众充满了旺盛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超过了政府的期望,这样的情绪由于老挝运动员获得了运动会最好奖牌成绩而达到了顶点。对于 1975 年以后出生的 70%的老挝人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为自己的国家感到如此自豪。从这一点上说,这次东南亚运动会是展示老挝发展的分水岭,它表明老挝已经走向成熟,或者像西蒙·克里克评价的那样,老挝展示了它步入“现代社会的证书”。此外,当年逃离老挝的人也带着孩子回来观看比赛或者在远方关注着比赛。他们对自己的国家产生了 30 多年来未有过的认同。

## 第七章 现代世界中的老挝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仅东南亚国家取得了蓬勃的发展,而且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老挝于 1997 年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从此,老挝开始参与到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合作与发展当中,随后,来自东南亚地区和中国的外国投资开始涌入老挝。数以万计曾经前往西方国家寻求美好生活的人开始回到老挝,他们成为老挝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并受到了老挝人民热烈的欢迎。然而,这些人的后代对老挝的未来信心不足。在这场令人眼花缭乱的全球化浪潮中,老挝无疑正处于巨大变革的开端。

225

### 地区\*

226

全球化正在最大程度地改变着老挝和世界各国的关系。其中最为直接和明显的影响是地区性的,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地缘政治和经济的现实状况,老挝与亚洲地区各国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紧密。

---

\* 作者对本节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故本节中文版所标示的原文页码仅供参考。——编者注

20世纪80年代,共产主义在老挝逐渐式微,亚洲小龙经济却取得了蓬勃的发展,老挝的邻国泰国便是其中之一。1975年以前,老挝首都万象曾经一度是最大、最国际化的城市,而与之毗邻的则是泰国东北部相对贫困和经济落后的地区。然而,“竹帘”后的贫穷逐渐消失。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坤敬市(Khon Kaen)、乌隆府(Udonthani)以及伊桑地区(Isaan)的其他中心城市开始逐渐转变为现代化的大都市。90年代初期,当老挝取消了对本国人民的旅游限制的时候,对商品如饥似渴的老挝人民开始穿越国界涌入泰国像罗宾逊(Robinson)一类的商场购物,并且第一次品尝了快餐。20年以后的今天,万象和其他老挝湄公河流域的城市最终赶上了其邻居伊桑地区的发展程度。

泰国是老挝开放外国投资这一经济政策受益最大的国家,这在老挝范围内很快就导致了老挝人对泰国“经济统治”的担忧。很多年以来,泰国一直是老挝最重要的外国投资者,虽然现在遭到了来自中国和越南的挑战。2009年,泰国在老挝投资207个项目,投资总额达到了15.8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是中国,投资项目285个,投资总额13.2亿美元;越南投资项目总数为169个,投资总额为8110万美元。同时,泰国也是老挝主要的贸易伙伴。虽然中国或者是越南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取代泰国成为老挝主要的投资国,但是,泰国和老挝双方的贸易伙伴地位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有所改变的。

在过去的20年里,泰国已经成为现代亚洲的一部分,同时曼谷也成为亚洲地区现代化大都市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随着泰国的经济改革,一大批中产阶级成长起来,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工人阶级,这些人开始逐渐地影响到泰国的政局。2001年1月,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被选举为泰国总理很可能永远改写了泰国的历史。他信的民粹主义诉求在乡村和城市贫民中掀起了一场参政议政的革命,这些人曾感觉他们已经被这些年蓬勃发展的经济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这将彻底改变泰国的政治。泰国的财富分配是亚洲国家当中最为不公平的一个,那些控制着财富的寡头政治家们将不得不同意更大范围内财富的重新分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老挝的传播是否会使列宁主义

国家产生更加公平的分配体系,我们仍需要拭目以待。)老挝人民始终十分关注泰国所有的政治争端,并且和他们东北部地区的兄弟一起在风雨飘摇的泰国政治进程中支持他信(于2006年在一场政变中被革职)的统治。2010年3月和4月泰国“红衫军”游行示威期间,老挝人民密切关注电视上播出的相关事件和讨论,就像他们观看东南亚运动会一样热切。这些被老挝人视为老挝自身完全没有的政治活动的替代品,而且我们不清楚到底老挝人民从中得到了多少关于政治方面的教育。但是,来自老挝政党方面的消息是十分明确的:泰国所有由于反对派政治团体造成的社会混乱充分显示了一党制的明智,因为一党制能够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过去20年,在泰国国内也出现了有关泰国文化、泰国社会和泰国历史的激烈争论。这些不仅改变着泰国人关于自己的看法,同时也改变了他们对东南亚地区以及老挝的观点。当泰国人努力解决多年前的专制统治和近年来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一系列后果,以及与此造成的所有社会、文化和其他问题的脱臼和错位作斗争时,泰国人总是倾向于心怀依恋地看待老挝,因为老挝似乎拥有一个泰国人已经丢失的文化世界。泰国游客来这个他们“迷失的世界”朝圣,以期寻求安慰,而且泰国市场上出现的书籍充满渴望和羡慕地描述古老的王家首都——琅勃拉邦。另外一部分泰国人则沉浸在现代化的热潮中,视老挝人民为伊桑地区人民的延伸,是经济落后国家的乡巴佬,并且将老挝人作为玩笑的笑柄(对此,老挝人自然是相当敏感的)。

老挝人民同样对泰国怀着复杂而矛盾的感情。一方面,老挝人崇拜且羡慕泰国的现代化和文明程度,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老挝人就通过泰国的电视节目热忱地关注着这一切。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这样一种传媒,老挝人每天也都能够了解到泰国由于经济快速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最令人生厌和恐惧的结果(老挝人认为这是泰国人的典型特质),无论是吸毒、犯罪、卖淫、腐败或者是婚姻破裂。老挝的领导人似乎认为专政是保护老挝人民避免这些可怕后果的有效方式,但是老

挝的专制统治不可能像过去的泰国那么成功。

228 泰国和老挝在历史、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将使双方关系上在未来许多年复杂而矛盾。老挝的民族主义总是首先将自己和泰国区分开来,皇家老挝政府时期存在的独特的君主立宪制也提供了一个文化上的对比。20世纪40年代,那些创建老挝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对待处理与泰国的关系十分自信,而且60年代,老挝的知识分子可以平等地与泰国同行交往。当革命破坏了这些紧密联系后,最初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老挝民族主义开始与社会主义项目紧密联系,泰国和老挝的边界线则因为政治分歧而被明确地标示出来。一旦老挝国家重新开始传统化,两国的边界线就又变得模糊了,这种变化也使老挝境内出现了大量关于老挝传统、礼节、礼仪和历史的书籍以期再次划定两国的文化界限。

在没有君主的时代,许许多多老挝人对于泰国王室的一举一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994年4月泰国国王访问老挝,以及他的女儿诗琳通(Sirindhorn)公主的定期访问,都成了老挝人民快乐的源泉。这并不是说老挝人将泰国国王误认为是自己的国王,而是由于两国文化的结构非常类似而使老挝人喜欢关注泰国王室,将泰国王室视为老挝王室的一种代用品。

随着年轻的老挝人开始去西方接受高等教育,一小部分能够与泰国竞争的知识分子开始出现。由于老挝的知识分子的自由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无法就泰国和老挝两国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无疑在不知不觉中削弱了老挝对外处理关系的实力。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总是求助于大国沙文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论断作为老挝民族主义的基础,竭尽全力地鼓励将老挝文化与泰国文化区分开。只有老挝国内知识分子自信心的不断增强才能消除这种教条主义。

还有其他两个国家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是越南和日益强大的中国。自从1989年越南从老挝撤军,越南在老挝的顾问也随之撤出,老挝从此不再是越南的傀儡政权。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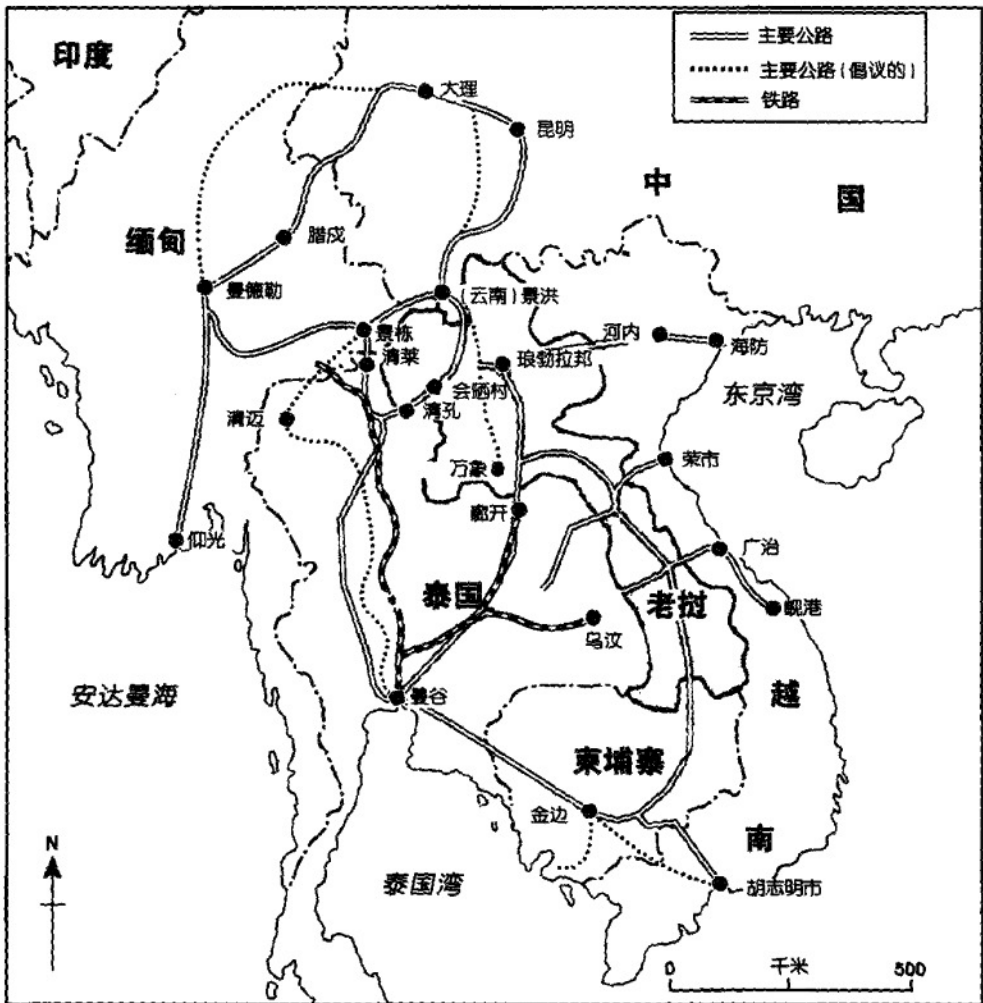
1994年泰国国王向塔銮寺僧侣赠送法袍,其后是王后和公主诗琳通。(承蒙 K. P. L. 提供)

是老挝和越南仍然保持了紧密的关系,因为越南共产党一直都是老挝人民革命党主要的理论支持者,也因为老挝人民革命党从来就没有自己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虽然凯山十分努力地尝试过),所以仍然要依靠越南的理论指引。这对两国的政党和政府本身都是适宜的,因为双方对于实质性的问题并没有大的冲突。然而,新一代老挝领导人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他们都是“纯正的”老挝人,许多具有越南血统的人或者与越南人通婚的人在过去的过去能够成为领导人,今天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了。而且据显示,越南人的后代(而且我认为华人也是如此)的身份已经成为升任新政府要员的一大障碍。从这方面来看,老挝人民革命党已经开始逐渐疏远了河内当局。重新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并不会妨碍到老挝和越南的关系,因为这三个国家处于同一阵营。中国和老挝两国关系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刚刚开始得到修复。双方于1988年5月互派了大使,在双边贸易有所发展之后双边关系开始慢慢巩固。1991年,双方成立了边境委员会并于一年之后签订了有关边境事宜的协议。1997年,来自老挝不同种族的3000名曾经在争端时期逃往中

国的老挝人被遣返回老挝,这有效地消除了老挝当局对中国的怀疑。也正是同一年,经济危机席卷亚洲。经济危机为中国进一步扩大自己在老挝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北京为万象提供了一揽子金融援助,其中包括十分慷慨的出口补贴和优惠贷款,从而有效地稳定了基普的价值,并阻止了新一轮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无疑加深了中国和老挝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于2000年11月访问老挝,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老挝。(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6年11月再次对老挝进行了国事访问。)两国政府共同发表了一份双边合作声明,旨在加强高层合作,促进政党、政府以及议会机构之间的交流并加强经济联系。北京对于后者实际上是更关心的,因为老挝拥有丰富的矿产,农业和水电发展潜力大,同时,老挝还处于中国西南内陆省份和泰国的中间,地理位置优越。截至2010年,中国已经在采矿、水电、橡胶种植,以及其他行业进行了大量投资。据官方数据显示,到2009年,中国在老挝的侨民共有3万人,而非官方的统计数字是这个的10倍。大量中国人移民到老挝的北部省份,成为这些城市中的小商贩和小饭店老板。有些老挝人对于中国移民(包括越南移民)表示焦虑,也有迹象表明老挝政府正在加紧对此方面的控制。相应的,老挝人也开始到中国学习,而利用双边关系的发展从中求得机会成为他们到中国的目的之一。中国并不急于挑战越南在老挝的地位。在这些关系中,都没有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只有在基础利益产生冲突时,这些关系才会改变。中国知道,它是这个新游戏的主导者,并且它很确定,自己对老挝的影响会随着时间逐渐扩大。

229 1947年,卡代在宣布成立新国家的同时,认识到老挝经济薄弱的现状,但仍憧憬着一个美好的未来,“向瑞典和美国学习(也许现在还可以加上欧盟),在日后形成一个东南亚国家联盟(包括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越南等)”。这个有预见性的想法终于在1997年老挝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后实现了。这是一个分水岭式的事件,它使得老挝融入了更广阔的区域,帮助老挝改变与其他国家间明显的不平等

关系。同时,老挝也发现其在应对知识上的不足,此时东盟开始了对老挝的培训来帮助其应付新任务。老挝加入东盟的时候,该地区机构的政治观点已经开始多样化,并且正面对着复杂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但是,十几年后,老挝在这个区域组织中已经稳占一席之地。与东盟政治结构并行的,是建立贯通东南亚主大陆的公路与铁路系统的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而实际上,已经有了一条从中国昆明到新加坡的公路。如今,老挝政府更愿意称自己为“连通”其他地方的国家,而非“被围住的内陆国”。凭借此优势,老挝还可以从此区域的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



未来东南亚大陆公路铁路规划。在未来几十年的规划中,将要构建贯通东南亚大陆的公路铁路系统,这似乎对老挝内外部均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现代老挝的经济实力一直较弱,需要依靠外界支持。双边和多边援助对老挝的生存有很大影响。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影响仍将存在。虽然一直保持谨慎,可外国组织在老挝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上有很大发言权。从这个角度来说,老挝想要成为民族主义者乌托邦式的“纯”主权国家,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老挝的脆弱性,使得它在面对“外国干涉”的压力时总会时不时地做出“膝跳反应”。与皇家老挝政府时期不同的是,如今老挝周边的国家以维护老挝的稳定和生存为己任。在国外援助的帮助下,稳定使得老挝政府能够专注于大量的公路建设项目,这对于整个老挝的整合都有巨大的好处。通过这些援助项目,老挝逐渐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而自1990年以来的繁荣稳定局面又加强了老挝政府的合法性。

## 231 大流散\*

老挝人口的大规模流失是随着其革命开始的,只有阿努王起义期间(1827—1828)的流放程度可与之相提并论,尽管那时被流放得最远的才到泰国南部地峡。相比之下,在1975年及以后离开老挝的难民们目的地都是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瑞典、新西兰等。有一个例外就是:在圭亚那建立了苗族侨居地。以往,国际迁移多限于统治阶层,而现在,老挝的各行各业都有人在他们一点都不了解的大洋彼岸生活。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并且创造了“老挝式”的全球意识。

简陋的难民营到处都是,不过大多数人还是感觉比留在老挝要好多了,而且很少有人自愿被遣返。许多老挝人在难民营住了很多年以等待重新安置,可只有在海外有亲戚的人才能得到迅速处理。在难民营里,他们第一次开始尝试围绕老挝来的佛教僧侣和苗族巫医建立新的社区。对于那些不再迁移的人,社区会帮助你订婚、接生小孩、举办葬

---

\* 作者对本节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故本节中文版所标示的原文页码仅供参考。——编者注

礼。外国的义工会教他们学英语以应对到目的地后的生活；期间还有人改变了信仰。总的来说，前统治阶层主要是去了法国，而许多军队里的军官、士兵则选择了美国。美国也是苗族人的主要目的地，因为那里是王宝定居的地方。最终，近 5 万人去了法国，22.5 万人去了美国。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小部分难民来自老挝各个普通阶层。迁移的人中，大概三分之二属于低地老挝人，余下的则属于高地各族群。

232

在海外，有大批老挝人聚集的地方更容易建立一个新的社区，因为人多，容易集齐足够的钱来建寺庙，办的各种仪式也容易让人有家的感觉和稳定感。在苗族人中，部落和家族网络是他们的海外社会生活稳定的基础。一些人在 1975 年前出国，他们受过教育或者能够利用以前的军方关系，他们的亲戚大多能找到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工作。然而大多数难民，甚至包括那些有教育背景的，都在做仆役的工作，很多人甚至靠当地政府的救济过了很多年。相比国内的同胞他们的生活水平不错，因此钱和药品开始向老挝回流。在老挝的经济自由化开始后，这样的资金回流对房屋建设和小规模贸易的繁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定居在哪个国家，在日常生活中从事各个行业的老挝同胞都是该国平等的公民。但是，在一些为了增强文化凝聚力而开始成立的组织中，他们重新划分了他们熟悉的等级结构，无论这是一个女性组织、文化组织，抑或是以重新统治他们的祖国为目的的组织。拥有日常工作的男男女女在晚上组织聚会、仪式，或以剧目的形式重现他们那失去的世界的时候也可以再次成为大人物。苗族人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但是在迁移中他们发现自己往往在各个方面被和老族人扯在一起，而且他们还被迫承认老挝是他们的祖国，因为每个难民都要有祖国。因而，这两个社区被糅合在一起，但这种平等状态多少会令某些老族人感到难受。

那些十几岁或者成年后从老挝逃离的人已经完全适应了老挝的语言环境和社会，他们喜爱家乡并有着淡淡的乡愁。而对那些在法国、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双语言、双文化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们来说就不是这样了。许多老挝人认为他们的逃亡是暂时的。可当他们的孩子在所在国

233

长大并渐渐融入当地社会后,他们发现自己的逃亡成了永久性的。年轻人身上被同化的压力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在苗族人中,这种维持其身份的内部压力比老族人要强。但是这并不影响年轻的苗族人在所在国社会中取得成功,特别是在教育上,这使他们与一些老族人的关系比较紧张,因为老族人总体上在教育方面并不是太好。法国的共和传统强烈鼓励难民们成为法国人,这种期望由于大量定居于法国的老挝早期统治阶层而变得相对容易。然而在美国,种族政治的盛行使得年轻的老挝人为其民族传统感到自豪,也有很多人为此产生了心理困惑。大的文化背景强迫他们承认自己是美裔老挝人,这使得一些年轻人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老挝——这个传说中的祖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回国探望亲属或参观父母当年所在的村子,只发现那里的文化是如此陌生,语言是那么不同。对他们来讲,做一个美裔老挝人要更容易,特别是在网络上。网络的繁荣使得迁移在外的老挝人受益匪浅,有关这些人的个人和团体网站数量激增。这使得分隔在老挝内外的亲戚和朋友联系更加方便,在老挝国内亦是如此,因此创造出了一种全球性的老挝文化,虽然大多数网站的内容很少涉及旅游信息和流行文化以外的内容。

234

同时,连接老挝国内外的交通的重要性正逐渐增大,并不只是体现在经济上,即便与政治关系不大,至少还体现在社会与文化上。它涵盖了思想和人的沟通,而且是双向的。老族和苗族男人回到国内娶妻,而流散散居的女性则可以与难民社会内外的人结婚。老挝可以提供制作服装的原料使在其他地方的老挝人延续其传统,特别是结婚礼服,以及常用的女性纺织品。一些流散的老挝人的后代决定回老挝发展,闯出自己的路来。但是他们的装扮太前卫,同时对于传统文化和社会的适应仍然存在问题。

最初,很多流亡的老挝人将自己视为传统老挝文化的承载者和保护者,特别是在共产主义盛行的年代,当时传统思想受到挑战,对他们来说,老挝似乎将成为越南殖民地。老挝王室成员在流亡中形成了一种仪式中心,而围绕此中心又成立了皇家老挝政府并有了此后每年庆

祝的节日。1979年老挝王储的大儿子,即苏立冯·萨旺(Soulivong Savang)王子出逃到法国,给了流亡中的人们一个合法的伪君王。但是王权基本没有机会再回到老挝了。随着老挝政府的“再传统化”的政策,原有的保护老挝文化的理由逐渐失去了效力,主要是由于老挝政府控制了关键的地方,例如塔銮和琅勃拉邦的宫殿这样神圣的地方,这都是在海外的老挝人举行典礼需要涉及的地方。然而,流亡的人仍然是了解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宣扬的历史所不同的东西的重要来源。理所当然,流散的人总会提到老挝,从这个方面讲,它也成为这个国家内部长期变革的重要部分。

1973年联合政府成立之时,很多人希望能够和解。但是这个愿望随着联合政府解体、老挝人民革命党彻底掌权而落空。老挝人又苦等了35年才终于得到了和解的机会。2009年9月老挝政府宣布:流亡在外的老挝同胞可以获得“荣誉公民”的称号,他们可以重返老挝,并取得老挝护照。“但是‘荣誉公民’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不能参加国民大会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sup>66</sup>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人愿意失去投票的权利。然而,此举也确实结束了老挝现代历史上惨痛的一章。不过这个收场有些荒诞。2009年12月22日,王宝将军发表讲话称他计划返回老挝:“我们现在需要作出改变。”他说:“老挝政府试着敞开大门。我们应将事情摆在台面上,平心静气地谈谈。”此后老挝的一位外交发言人提醒王宝将军,他在1975年末已经被宣判了死刑,而他想进行的任何谈话都应在行刑之后再说。这位发言人在讲话时并未有一丝嘲讽的语气。王宝将军随后取消了他的计划。

## 历史和国家\*

俗话说,历史是胜利者描绘的。这句话对于老挝革命尤其适用,因

---

\* 作者对本节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故本节中文版所标示的原文页码仅供参考。——编者注

235

为当代史被展示为“党”的不可替代的崛起,掩盖了其他的一切。皇家老挝政府时期成了巨大的空白,就好像它不曾存在过一样,只被缩减为一句话:“新殖民”时期。到 20 世纪 90 年代老挝的政治局势缓和下来后,人民可以私下地谈论过去,可他们讲的多是只言片语,因为没有有一个共享的叙事框架来讨论过去的历史。学校的教科书应该是传播国家历史的主要载体,可是从这里面几乎找不到关于皇家老挝政府时期的细节,只是记载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难以抗拒的崛起和胜利。许多年轻的老挝人都了解,老挝曾经还有个国王,但是他们对他及他的兴亡知之甚少。许多国家的教科书都是声名狼藉的,它扭曲事实,宣扬历史民族主义。在老挝,必须把党置于其历史的中心造成了进一步的歪曲,对凯山的崇拜使这种扭曲更加严重。这些对历史的扭曲堆叠在一起,使得人们在老挝现在的各种文献、论文中发现了一种奇异的省略和沉默。在某种程度上,老挝内部也有对历史的讨论,但几乎全是关于前现代时期的,例如阿努王或者老挝人的起源,可是,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释都是很业余、简单的民族主义式的。

236

当然,所有历史,包括近代历史,都受制于对它的解释。不同的历史学家对过去也有不同的看法,有时是由于不同的政治主张,有时又源于不同的理论方法。在自由民主国家,历史学家需要的规则是:我们知道的一切有关过去的东西都可以拿出来公开讨论,不应该掩盖任何事实。历史学家可以对相关的事实有不同的观点,或者重视不同的事实,但是他们必须同意自由和公开的辩论。没有了行政命令的阻碍,人民可以有不同意见(例如对于国家历史),而不会感到自己因此受到排斥,这样可以促进知识文化的发展,这也许也是成熟的民族主义的象征。松帕万·英塔冯曾有一句关于老挝人缺乏应对外面世界的信心的话:“这种不信任和过于内敛常被我们的朋友误认为是民族主义。但是如果这真是民族主义的话,老挝的民族主义仍缺乏那种能使人做出意义重大的积极行动的成熟性。”也许有人会说,只有当老挝人能全面地回顾过去,并能不受限制地讨论其意义时,老挝的民族主义者和历史学家才能达到松帕万·英塔冯所追求的成熟了吧。

## 结 语

10年前本书的第一版写就之时,20世纪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仍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但是对于剩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老挝是如何渡过难关的印象却不深。2010年我看到它们成功地渡过了难关,而且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内会继续与我们共存。也许有人很快会说,它们已经不是当初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一党执政已经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具。我们这些经历过冷战的巅峰期并在社会主义革命与自由民主主义近一个世纪的斗争行将结束之时思想成型的人,对于马列主义国家出现体制上的变化毫无思想准备,但不管怎样,这只不过是世界各地的国家参与到现代世界中的许多道路中的一种而已。像老挝这样的国家仍然因为曾经历社会主义阶段而有些负担,但这种压力会越来越小。世界上多数国家以及老挝出生于1990年后的人并未感受到全球意识形态的斗争,而只是受到不完美日常生活现实的冲击。“发展”是当今全球最具霸权的咒语,虽然它总是很模糊,却许给人更美好的未来。几乎所有事情只要诉诸它,就都是合理的。它是现代的一种魔法,胜过台面上任何其他牌,包括老挝文化与信息部一本正经的所谓保留“美丽古老的老挝文化”。老挝人也有美好的愿望并想将其实现,即快速全面地发展同时又保留其文化的完整。然而,这是不可能的。老挝文化与社会的变化比任何人预计的都快,但是,在剩余的传统文化中有多少是既让老挝人欣慰又让外国人觉得有魅力的,仍需拭目以待。

## 参 考 文 献

1 Charles Archaimbault, 'La naissance du monde selon les traditions Lao: Le mythe de Khun Bulom', in Charles Archaimbault, *Structures Religieuses Lao*, Editions Vithagna, Vientiane, 1973, p. 100.

2 Michel Lorrillard, "D'Angkor au Lan Xang: une revision des jugements", *Aseanie* 7, juin 2003, p. 24.

3 'Two Accounts of Travels in Laos in the 17th Century', prefaced and annotated by Paul Lévy, in *Kingdom of Laos*, edited by René de Berval, France-Asie, Saigon, 1959, p. 55.

4 Mayoury and Pheuiphanh Ngaosyvathn, *Paths to Conflagration: Fifty Years of Diplomacy and Warfare in Laos, Thailand, and Vietnam, 1778 - 1828*, Southeast Asia Program Publica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1998.

5 Sila Viravong, *History of Laos*, Paragon Press, New York, 1964, pp. 125 - 126.

6 Snit Smuckarn and Kennon Breazeale, *A Culture in Search of Survival: The Phuan of Thailand and Laos*, onograph Series 31/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ew Haven, 1988, p. 25.

7 James McCarthy, *Surveying and exploring in Siam: With descriptions of Lao Dependencies and of battles against the Chinese Haws*, introduction by Walter E. J. Tips, White Lotus, Bangkok, 1994, (c1900), p. 51.

8 Patrick Tuck, *The French Wolf and the Siamese Lamb: The French Threat to Siamese Independence 1858 – 1907*, White Lotus, Bangkok, 1995, p. 195.

9 引自 S. P. Nginn, *Nostalgie du Passé: Les mémoires du Professeur Somchine P. Nginn*, Fondation Somchine Nginn (Vientiane), 1971, p. 20. 这个文本的最初题目是老挝文, 为 *Aditanuson (kithortbeunglang)*。

10 Yang Dao, *Les Difficultés du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et Social des Populations Hmong du Laos*, Thèse de Doctorat de 3 e Cycle, Université de Paris, Avril 1972, p. 73.

11 Jean Lartéguy avec le collaboration de Yang Dao, *La Fabuleuse Aventure du Peuple de l'Opium*, Presses de la Cité, 1979, p. 94.

12 Louis-Charles Royer, *Kham: la Laotienne*, Editions Kailash, Paris, 1997 (最初的出版社是 éditions de Paris, 1935), p. 261.

13 Katay D. Sasorith, *Souvenirs d'un Ancien écolier de Paksé*, éditions Lao Sédone, 1958, pp. 22 – 3.

14 S. P. Nginn, 'Comment j'ai vu la France', *Kinnary: revue de culture franco-lao*, No. 3, Octobre 1943.

15 Letter: 'Sa Majesté Sisavang-Vong, Roi de Luang-Phrabang a Madame Auguste Pavie à Paris, le 18 Octobre, 1927', held in the Centre des Archives d'Outre-Mer, Aix en Provence, France.

16 Gaston Strarbach and Antonin Baudenne, *Sao Tiampa, épouse laotienne*, éditions Kailash, Paris, France, 1997 (最初的出版



社是 éditions Grasset, Paris, 1912), pp. 106 – 107.

17 André Escoffier, *Dans le Laos au Chant des Khènes*, Imprimerie d'Extrême Orient, Hanoi, 1942, p. 192.

18 Jeanne Cuisinier, 'La grande pitié des Buddhas au Laos', *Revue Indochinoise Illustrée*, nouvelle série, Numéro 25, Juillet 1925, p. 6.

19 A. Raquez, *Pages Laotiennes*, F. H. Schneider, Imprimeur-éditeur, Hanoi, 1902, pp. 102 – 103.

20 Eric Pietrantoni, 'Le Problème Politique du Laos', unpublished report, Vientiane, 1943, p. 101.

21 Charles Rochet, *Pays Lao: Le Laos dans le Tourmente 1939 – 1945*, Jean Vigneau, éditeur, Paris, 1946, pp. 74 – 75.

22 Thao Katay,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u Mouvement d'Indépendance Nationale Lao*, éditions Lao-Issara, Bangkok, 1948, p. 77.

23 Houmpanh Saignasith, 'Essai de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Politique Contemporaine du Laos. Souvernirs personnels pendant la 2è Guerre Mondiale (période de 1941 à 1945) et Le Mouvement Lao Issara (de 1945 à Mai 1946)', Paris, 1991. (roneo)

24 Graham Greene, *Ways of Escape*, The Bodley Head, London, 1980, pp. 170 – 173.

25 Oden Meeker, *The Little World of Laos*,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59, p. 32.

26 Joel Halp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merican Aid in Laos', *Practical Anthropology*, Vol. 6, No. 4, 1959, p. 158.

27 同上书, pp. 159 – 160。

28 Chris Goscha, 'The Revolutionary Laos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 The making of a Transnational "Pathet Lao" Solution', in *The Failure of Peace in Indochina (1954 – 1962)*, Les

Indes savants, Paris, 2010, P. 74.

29 Haynes Miller, 'A Bulwark Built on Sand', *The Reporter*, November 13, 1958, p. 11.

30 Hugh Toye, *Laos: Buffer State or Battlegrou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8, p. 147.

31 Christopher E. Goscha, *Vietnam and the World Outside: The Case of Vietnamese Communist Advisers in Laos (1948 - 1962)*,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24, May 2004.

32 Arthur J. Dommen, *Conflict in Laos: The Politics of Neutralization*, Revised edition, Praeger Publishers, New York, 1971, p. 182.

33 1962年5月5日美国驻曼谷大使馆递交给美国国务院的大使 Young 的报告。(National Archives, Maryland, Washington DC.)

34 Georges Chapelier and Josyane Van Malderghem, 'Plain of Jars: Social Changes Under Five Years of Pathet Lao Administration', *Asia Quarterly*, Vol. 1, 1971, p. 74.

35 Paul F. Langer and Joseph J. Zasloff, *North Vietnam and the Pathet Lao: Partners in the Struggle for Lao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0, p. 127.

36 同上书, pp. 144 - 145.

37 Mervyn Brown, 'An Involuntary Tour of Southern Laos', July 2, 1962. 1962年7月14日国务院反馈给美国驻万象大使馆的收件确认函之一。(National Archives, Maryland, Washington DC.)

38 'Biographie de Càu Sai K'âm, chef de province de S'ieng Khwang', Appendice, Charles Archaimbault, 'Les Annales de l'Ancien Royaume de S'ieng Khwang',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Vol. 53, 1966 - 67, p. 660.

39 *Touby Lyfoung: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life of a Hmong man in the troubled land of Laos*, an autobiography by

Touby Lyfoung, edited by Dr Touxa Lyfoung, Burgess Publishing, United States, 1996, p. 138.

40 同上书, pp. 143 — 144.

41 Don A. Schanche, *Mister Pop: The adventures of a peaceful man in a small war*, David McKay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0, pp. 88 — 89.

42 *Voices From the Plain of Jars: Life under an Air War*, compil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 by Fred Branfman, Harper Colophon Books, New York, 1972, pp. 112 — 113.

43 Somphavan Inthavong, 'Un homme est mort', *Lao Comme Liberté, Impressions 1965 — 1970*, Vientiane, 1972, p. 10.

44 Somphavan Inthavong, 'Les Hippies et la pluie', *Lao Comme Liberté, Impressions 1965 — 1970*, Vientiane, 1972, p. 36.

45 Somphavan Inthavong, 'Nationalisme et developpment', *Lao Comme Liberté, Impressions 1965 — 1970*, Vientiane, 1972, p. 27.

46 Alfred W. McCoy with Cathleen B. Reed and Leonard P. Adams II, *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 Harper Colophon Books, New York, 1972, p. 344.

47 Ambassador's Audience with King Savang, March 24, 1961. Dispatch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March 30, 1961. (National Archives, Maryland, Washington DC.)

48 'Lao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sia 1975 Yearbook*, p. 208.

49 John Everingham, 'A Struggle in Microcos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9 April 1976, p. 26.

50 Khamphan Thammakhanthi, *La vérité sur le camp-prison No. 1*, n. d. Unpublished manuscript.

51 Nakhonkham Bouphanouvong, *Sixteen Years in the Land*

*of Death*, Bangkok: White Lotus, 2003, pp. 140 – 141.

52 Research Department of History, *A History of the Lao People's Army, 1945 – 1995*, The Army Printing House, [c. 1998], p. 497. 老挝文名称为 Kom Khonkhua Pavatsat, *Pavatsat Kong Thap Pasason*, 1945 – 1995.

53 Thongthip Rathanavilai, *Man in the Region of Death: Passing Through the Five Stages of Hell*, Lao Press, Fresno, California(n. d.), P13. 原始标题为老挝文, *Manut Phak Tai Paan 5 Khum Nalok*。

54 同上书, P13。

55 Charles Weldon, *Tragedy in Paradise: A country doctor at war in Laos*, Asia Books, Bangkok, 1999, p. 128.

56 Grant Evans, *Lao Peasants Under Social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90, p. 54.

57 同上书, p. 61。

58 Léo Mariani, 'Les personnalités politiques, lao politique et les mariages au Laos', *Aseanie* 17, juin 2006. p. 38.

59 Ekaphone Phouthonesy, 'Govt encourages millionaires to invest in Laos', *Vientiane Times*, 18 January 2010.

60 Laos,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ulture, Institute for Cultural Research, *Vientiane Social Survey Project*, Vientiane, 1998, p. 66.

61 Somsack Pongkhao, 'If not in Laos, sell it somewhere else', *Vientiane Times*, May 14, 2004.

62 Somsack Pongkhao, 'A new national symbol is born', *Vientiane Times*, December 24 – 26, 2002.

63 Vientiane Times reporters, 'A great day in national history', *Vientiane Times*, January 7 – 9, 2003.

64 Vatthana Pholsena, *Post-War Laos: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History and Identity*, Silkworm Books, Chiang Mai, 2006, pp. 208 – 209.

65 Simon Creak, ‘Little Laos Awaits It’s Big Moment’, *Asia Times Online*, November 5, 2009.

66 Ekaphone Phouthonesy, ‘Lao expatriates to be welcomed home’, *Vientiane Times*, September 11, 2009.

## 进一步阅读

老挝可以利用的二次文献比亚洲其他国家少。关于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战争虽然有大量的书籍,但这些书籍通常视角狭窄。这就意味着我不得不参考老挝的原始文本、法国档案和美国档案,比一般的简史要使用更多的一手资料。一般来说,如果文本里的原始资料很清晰,我就没有在下文重复。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我向大家推荐阅读 Martin Stuart-Fox 所著的 *History of Lao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下面我只涉及英语著作。

### 第一章：老挝之前

想要了解傣族,可以参阅 Georges Condominas 所著的 *From Lawa to Mon, from Saa' to Thai*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0)。Martin Stuart-Fox 所著 *The Lao Kingdom of Lan Xang: Rise and Decline* (White Lotus, Bangkok, 1998) 一书对这个早期时代作了最新最全面的描述。David K. Wyatt 所著的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Silkworm Books, Chiang Mai, 1984) 对理解更广的历史背景是必不可少的一本书。也可参阅他的文章“Southeast Asia ‘Inside out’, 1300 – 1800: a perspective from the interior”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31, No. 3, 1997)和“Relics, oaths and politics in thirteenth-century Siam”(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32, No. 1, 2001)。还可以在 *Breaking New Ground in Lao History* (Edited by Mayoury Ngaosrivathana and Kennon Breazeale,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2002)一书中看到有深刻见解的历史学文章。要从老挝视角看阿奴王起义,需要阅读 Mayoury 和 Pheuiphanh Ngaosrivathana 所著的 *Paths to Conflagration: Fifty Years of Diplomacy and Warfare in Laos, Thailand, and Vietnam, 1778 – 1828* (Southeast Asia Program Publica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1998)。Snit Smuckarn 和 Kennon Breazeale 所著的 *A Culture in Search of Survival: The Phuan of Thailand and Laos*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ew Haven, 1988)通过分析一个族群的命运,让我们了解了 19 世纪晚期老挝和泰国的发展。

## 第二章：法国统治下的老挝

虽然没有专门研究在老挝的法国人的著作,但是可以参阅 Virginia Thompson 所著的 *French Indochina*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ondon, 1937)。Thongchai Winichakul 所著的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Silkworm Books, Chiang Mai, 1994)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泰国如何与老挝划界。Eugen Weber 所著的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 – 1914* (Chatto and Windus, London, 1977)与殖民地时代的老挝形成有意义的对比。Alice L. Conklin 所著的 *A Mission to Civilize: The Republican Idea of Empire in France and West Africa, 1895 – 193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1997)也给出了一些对比研究。论述早期老挝民族主义的书籍有 Soren Ivarsson 所著的 *Creating Laos: The Making of a Lao Space between Indochina and Siam, 1944 – 47*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08)。Martin Shipway 所著的 *The Road To War: France and*

*Vietnam, 1944 - 47* (Berghahn Books, Oxford, 1996)描述了在法国重返印度支那之前的复杂争议。

### 第三章：皇家老挝政府 第四章：战争及皇家老挝政府的垮台

有关美国外交政策和援助,可以参阅 Charles A. Stevenson 成书很早但却相当出色的研究——*The End of Nowher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Laos Since 1954* (Beacon Press, Boston, 1972), 还有 Timothy N. Castle 所著的 *At War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 U. S. Military Aid to the Royal Lao Government, 1955 - 197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3)。由于大多数人对战争着迷,对于美国民间援助的研究就少得可怜了,除了 Viliam Phraxayavong 所著的 *History of aid to Laos: motivations and impacts* (Chiang Mai, Thailand, Mekong Press, 2009), 这是第一部严肃研究这个问题的专著。有两本成书很早但却非常出色的论述老挝政治的专著: Arthur J. Dommen 所著的 *Conflict in Laos: The Politics of Neutralization* (Praeger Publishers, New York, 1971) 和 Hugh Toye 所著的 *Laos: Buffer State or Battlegrou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8)。要了解老挝早期事件的概况,可以参阅 Sisouk Na Champasak 所著的 *Storm Over Laos: A Contemporary History* (Praeger Publisher, New York, 1961)。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专著可以参阅 Paul F. Langer 和 Joseph J. Zasloff 合著的 *North Vietnam and the Pathet Lao: Partners for the Struggle in Lao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ss., 1970), 还有 MacAlister Brown 和 Joseph J. Zasloff 合著的 *Apprentice Revolutionaries: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Laos, 1930 - 1985*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1986)。关于苗族的专著可以参阅 Yang Dao 所著的 *Hmong at the Turning Point* (World Bridge Associates, Minn., 1993) 和 Roger Warner 所著的 *Shooting at the Moon: The Story of America's Clandestine War in Laos* (Steer Forth Press, Vermont, 1996)。Donald A. Schanche 所著



的 *Mister Pop: The Adventures of a Peaceful Man in a Small War* (David McKay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0) 对于美国国际发展援助和苗族给出了深刻的见解。Joel M. Halpern 所著的 *Government,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Laos: A Study of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Southeast Asia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1964) 是对老挝统治阶层的早期研究), 不过,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对于统治者、社会以及文化变迁则没有英文的研究论著。

#### 第五章：老挝的社会主义过渡期 第六章：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

关于 1975—1985 年老挝最好的概述是 Martin Stuart-Fox 所著的 *Laos: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Frances Pinter, London, 1986)。另外一个重要的文本是 Stuart-Fox 的论文集 *Buddhist Kingdom, Marxist State: The Making of Modern Laos* (White Lotus, Bangkok, 1996)。另一本对老挝 1975—1985 年的政策进行综合论述的专著是 MacAlister Brown 和 Joseph J. Zasloff 合著的 *Apprentice Revolutionaries: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Laos, 1930—1985*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1986), 这本书也对老挝国内越南人的作用做出了最好的论述。1971 年由美国陆军部出版的 *Area Handbook for Laos* 一书, 于 1995 年由 Andrea Matlas Savada 重新主编改版发行, 并改名为 *Laos: A Country Stud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Washington, 1995)。Grant Evans 所著的 *Lao Peasants Under Social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90) 则更有针对性, 主要综合论述了老挝农业集体化的失败尝试。Grant Evans 所著的 *The Politics of Ritual and Remembrance: Laos Since 1975* (Silkworm Book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 是一部关于政治制度的政治人类学著作, 其中还分析了文化变迁。Grant Evans 主编出版了 *Laos: Culture and Society* (Silkworm Book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该书包含了一系列论文, 内容涉及从语言到少数民族等许多方面。Yves Bourdet 所著的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in Lao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UK, 2000) 提供了最具综合性的经济调查。这方面内容也可参阅 *Laos' Dilemmas and Options: The Challenge of Economic Transition in the 1990s* (ISEAS, Singapore, 1007), 该书由 Mya Than 和 Joseph L. H. Tan 主编出版。涉及“官僚政体”要参阅 J. L. S. Girling 所著的 *The Bureaucratic Polity in Modernizing Societies* (ISEAS, Singapore, 1981)。

## 第七章：现代世界中的老挝

要了解概况,可参阅 Martin Stuart-Fox 收录于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995* (ISEAS, Singapore, 1985) 一书中的文章“Lao: towards subregional integration”, 以及 Vatthana Pholsena 和 Ruth Banomyong 合著的 *Laos: From Buffer State to Crossroads?* (Chiang Mai: Mekong Press, 2006)、Boike Rehbein 所著的 *Globalization, Culture and Society in Laos*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7)。Andrew Walker 在其著作 *The Legend of the Golden Boat: Regulation, Trade and Traders in the Borderlands of Laos, Thailand, China and Burma* (Curzon, London, 1999) 里具有启发性地从民族志的角度考察了区域关系。要了解难民,可以参阅 Penny Van Esterik 所著的 *Taking Refuge: Lao Buddhist in North America* (Monographs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1992) 以及 Grant Evans 主编的 *Laos: Culture and Society* (Silkworm Books, Chiang Mai, 1999) 一书中 Lili Sisombat Souvannavong 所撰写的“Elites in exile: transnational Lao culture”。关于苗族难民,可以参阅 Lynellyn D. Long 所著的 *Ban Vinai: The Refugee Camp*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3)。

# 索引

(索引条目后数字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 A

administration: traditional 管理: 传统的, 4-5, 51, 56; colonial *se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殖民的, 参见殖民管理  
agriculture 农业, 50, 95-96, 216-217; *see also* collectivisation 还可见集体化  
aid *see* foreign aid 援助, 参见外国援助  
Air America 美国空军 125, 140, 142, 161  
air strikes *see* bombing raids 空袭, 参见空袭  
Allies (WW2) 同盟国(二战) 84, 87  
American ambassadors 美国大使 117, 124, 147, 162-163, 164; policy on Laos 老挝政策, 117-118  
American influence 美国影响 on society 社会方面 98-100, 124; on economy 经济方面 101-104  
on Lao politics 老挝政治方面 *see also* anti-Americanism 参见反美主义 111

Angkor empire 吴哥帝国 6-7,  
anti-Americanism 反美主义 172, 173  
ASEAN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 229  
Asian Development Bank 亚洲开发银行 217  
Auto Defence Forces 自动防御部队 140  
Ava Kingdom of 阿瓦王国 24, 26  
Ayudhya, Kingdom of 阿瑜陀耶王国 9, 15, 18, 19, 21, 23-25, 30, 37

## B

Bandung Conference of Asian and African nations 亚非国家万隆会议 107-108  
Battambang 马德望 42, 43  
Boloven Plateau 波罗芬高原 2, 60, 163  
bombing raids 空袭 147, 148, 149, 167  
Bong Souvannavong 彭·苏发那旺 90,

- 100, 106, 183
- Bougnavat, Prince 伯纳瓦亲王 84
- Boun Oum Na Champasak, Prince 文翁·  
纳占巴塞亲王 88, 89, 118, 119, 123,  
124, 158, 159
- Brown, Mervyn 默文·布朗 131, 133
- Brown, Winthrop 温思罗普·布朗  
117, 118-119,
- buddhas 佛像 16, 18, 25, 26
- Buddhism 佛教 5-6, 7-9, 10-13,  
71-72, 151, 202-205, 208
- Buddhist Council of Laos 老挝佛教委员  
会 77
- Bureau of Public Opinion 公众意见  
局 157
- Burma *see* Pegu 缅甸, 参见勃固
- C
- capitalism, state 资本主义国家 197
- cartography 制图 36, 40-42
- CDNI (Committee for the Defe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国家利益防御委员  
会 111-114, 117, 151; *see also*  
Phoumi Nosovan 还可见富米·诺萨万
- ceasefire agreement 停火协议 167, 169
- Chakrapat, King 查克帕特国王 18
- Chakri dynasty 却克里王朝 25-30
- Champasak 占巴塞 24, 25, 30, 41,  
54, 76
- Chao Anou: uprising 阿努王起义 25-  
29, 32, 69
- Chao Fa 法王 185-186
- Chao Boun Khong 汶孔王 77
- Chinese 中国人 37, 50, 52, 84, 88,  
158; Haw *see also* Haw Chinese 还可  
见华族
- Chulalongkorn, King 朱拉隆功国王  
36, 54
- CI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中央  
情报局 117, 118, 125, 140, 141, 144,  
150
- coffee 咖啡 50, 60
- cold War 冷战 98, 100, 101, 109-112
- collectivisation 集体化 191-196
-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殖民管理 36,  
40-42, 45-52, 88-90; and education  
教育 48-49, 71, 78, 94; French  
nationalism 法国民族主义 42-45;  
and Lao Issara 自由老挝 82-86; and  
Lao nationalism 老挝民族主义 70-  
74; and opium 鸦片 52-53, 95;  
opposition to 反对 53-59; Thai  
challenge 泰国的挑战, 74-78
- Colonial Exhibition, Paris 殖民展览, 法  
国 74
- colonial society 殖民社会 59-70
-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42-45
- Committee for an Independent Laos 独立  
老挝委员会 86
- 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e* CDNI 国家利益防卫委员  
会, 参见 CDNI
- Committee of Princes 亲王委员会 36
- communications 交通 96, 150
- communism 共产主义 86-88, 104,  
109-112, 177-180, 196-198; *see also*  
Pathet Lao 还可见巴特寮; Viet Minh  
越盟

communist; influence 共产主义影响  
120 - 124  
takeover 接管 174 - 175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104, 179  
Congress of People's Represent 人民代表  
大会 175  
conscription 征收 130  
Constituent Assembly 国民议会 90  
Constitution 宪法 90, 92, 135, 139,  
199, 200, 201  
corruption 腐败 103, 111, 157 - 160,  
208, 215, 218 - 219  
corvee 劳役 13, 24, 27, 46, 51 -  
52, 130  
Council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Interests  
经济与财政权益委员会 77  
Counter Coup d'Etat Committee 反政变  
委员会 118  
coups 政变 116 - 120, 127, 168; *see also*  
revolts; uprisings 还可见反叛、起义  
cowboyism 牛仔主义 153 - 154  
Cuisinier, Jeanne 珍妮·屈西尼耶  
68 - 69  
cultural revival 文化复兴 203 - 206  
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革命 179 - 180  
culture 文化 74, 80, 153 - 156; and  
society 社会 202 - 208; French 法  
国的 62 - 64; loss of 失去 68  
currency 货币 102, 198, 217

#### D

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 *see* DRV  
越南民主共和国, 参见 DRV  
diaspora 流散者 231 - 234

DRV (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 越  
南民主共和国 113, 120 - 121, 146  
Duang Champa 当·占巴 152  
Dvaravati culture 堕罗钵底文化 5 - 6

#### E

economy: collapse of 经济崩溃 187,  
203, 217; contradictions in 矛盾 215 -  
218; opium 鸦片 52 - 53, 95, 160 -  
162; reform of 改革 196 - 199, 201;  
rural 农村 184 - 185, 216 - 217;  
subsistence 生存, 生活 95 - 96;  
under French 在法国统治下 49 - 52,  
53; during War 战争期间 165 - 166;  
*see also* collectivisation 还可见集体化  
education 教育 48 - 49, 71 - 73, 78,  
94, 130, 191, 210 - 211; *see also* re-  
education 还可见再教育  
elections 选举 90, 107 - 115, 129, 199  
Emerald Buddha 玉佛, 18  
ethnic diversity 种族多样性, 2 - 3, 7,  
21, 22, 37 - 38, 43, 96, 134 - 144  
Eutrope, M. M. 厄特罗普, 47, 49, 74  
exodus after 1975 1975 年之后的大规模  
外逃 177 - 178  
expatriate communities 外来人口社区,  
206, 207  
explorers 探险者, 34, 44

#### F

Fa Ngum, King 法昂国王 9, 13  
farming *see* agriculture 种植, 参见农业  
Faydang Lobliayao 费当·罗比瑶 133  
feminism 女性主义 152

films 电影 152

foreign aid 外国援助 150; American 美国的 101 - 104, 109 - 110, 112, 118 - 119, 123; Chinese 中国的 191; dependence on 依赖 156 - 158, 165, 166, 187 - 188, 229 French; Soviet 苏联的 189 - 191, 197, 199; *see also* military aid 还可见军事援助

Foreign Exchange Operations Fund 外汇操作基金 166

foreign influx 外国人的涌入 206 - 208

foreign investment 外国投资 198, 199, 217

forestry 林业 47, 50, 136, 215, 220

Franco-Siamese agreement 法暹协议 42

French colonialism *see* colonialism 法国殖民主义, 参见殖民主义

French-Lao General Convention 法国-老挝协议 92

## G

Garnier, Francis 弗朗西斯·加尔涅 44

Geneva Conference (1963) 日内瓦会议 (1963) 124 - 125, 146

Geneva Conference on Indochina (1954)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54) 104, 106, 121, 124 - 125, 142

globalisation 全球化 226

gold 黄金 166

Grand Stupa *see* That Luang 大佛塔, 参见塔銮

Greene, Graham 格雷厄姆·格林 97

## H

Halpern, Joel 乔尔·哈尔彭 99

Haw Chinese 华族 32, 34 - 36, 54 - 55

history 历史 72, 234 - 236

Hmong 苗族 96, 136 - 139; refugees 难民 140, 184 - 185, 231, 232, 233; resistance 抵制 184 - 187; uprising 起义 55 - 59

Ho Chi Minh Trail 胡志明小道 113, 121, 142 - 144, 145 - 147, 171

Ho Chi Minh 胡志明 87

Houmphanh Saignasith 厚慕潘·赛纳斯 85, 88

hydro-electricity 水电, 216

## I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87

independence 独立 88 - 95

Indigenous Consultative Assembly 土著顾问联合会 48, 50, 73, 77

Indochina 印度支那 41, 43, 45 - 46, 72, 82, 85, 92

Indo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印度支那共产党 87, 10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aotian Question 老挝问题国际会议 123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Service 国际志愿服务机构 100

## J

Japanese 日本的 75, 82 - 84

joint ventures 合资企业 198  
judiciary 司法 201

K

Katay Don Sasorith 卡代·敦·萨索里特  
61 - 62, 79, 81, 228 - 229; and Lao  
Issara 自由老挝 83, 87, 92, 135;  
and RLG 皇家老挝政府, 100,  
107, 114  
Kaysone cult 凯山崇拜 208 - 210  
Kaysone Phomvihan 凯山·丰威汗  
86 - 87, 104, 110, 188, 193, 195; and  
LPDR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75,  
177, 189, 198 - 201; *see also* LPRP  
还可见老挝人民革命党  
Kennedy, President 肯尼迪总统 122  
Ketsana, Colonel 凯萨纳上校 125  
Kha uprising 卡人起义 35  
Kham Ouan Boupna, General 坎·欧安·  
本帕将军 172  
Khamtai Souphanou Vong 坎塞·苏发  
努·冯 219  
Khamthai Siphandone 坎代·西潘  
敦 201  
Khmer Rouge 红色高棉 172  
Khmer 高棉人 7, 30, 32  
Khommadam *see* Sithone Khommadam  
库马丹, 参见西通·库马丹  
Khorat Plateau 呵叻高原 26, 30 - 32,  
33, 43  
Kong Le 贡勒 116 - 119, 121,  
125, 127  
Kou Abhay 寇·阿沛 115  
Kou Voravong 寇·佛拉旺 90

Kouprasit Abhay, General 库蒲拉西·阿  
沛将军 127

L

labour camp *see* prison camps 劳工集中  
营, 参见集中营  
Lan Na, Kingdom of 兰纳王国 16 - 17  
Lan Xang, Kingdom of 澜沧王国 9 -  
25, 30, 37  
language 语言 3, 22; English 英语  
211; French 法语 211; Lao 老挝语  
72, 73, 81, 151, 211; Thai 泰语 38,  
81  
Lao air force 老挝空军 142, 148  
Lao Airlines 老挝航空 158  
Lao Buddhist Socialism 老挝佛教社会主  
义 100  
Lao Civil Service 老挝公共机构 77  
Lao Communist Party 老挝共产党 104  
Lao elite 老挝统治阶层 47, 48, 70,  
97, 151, 159 - 160, 205, 228  
Lao Freedom Front 老挝自由阵  
线, 104  
Lao Front for National Construction 老  
挝国家建设阵线 179  
Lao Issara 自由老挝 82 - 85, 86 - 92,  
98, 135  
Lao language 老挝语言 72, 73, 81,  
151, 211  
Lao Literature Committee 老挝文学委员  
会 151  
Lao National Police 老挝国家警察 125  
Lao National Union party 老挝国家联盟  
党 90, 100

- Lao Patriotic Front *see* NLHX 老挝爱国阵线, 参见 NLHX
- Lao People's Army 老挝人民军 187 - 188, 219 - 221
-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see* LPDR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参见 LPDR
- Lao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 *see* LPRP 老挝人民革命党, 参见 LPRP
- Lao People's Revolutionary Youth 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 193
- Lao United Buddhists' Union 老挝统一佛教联合会 193
- Lao War casualties 老挝战争伤亡 149 - 150
- Lao Women's Association 老挝妇女协会 155
- Lao Women's Union 老挝妇女联合会 193
- Lao-language publications *see* publishing 老挝语出版物, 参见出版业
- Lao-Siamese diversity 老-暹差异性 36 - 38; *see also* ethnic diversity 还可见种族多样性
- law, rule of 法治 201
- Le Boulanger 保罗·伯兰哥 72
- Le Duc Tho 黎德寿 167
- Leninism 列宁主义 110
- Leup Pha Sun 扑灭太阳的光辉 31 - 32
- literacy 识字率 49, 210 - 211
- literature 文学 23, 67; *see also* publishing 还可见出版业
- Loven 拉维族 54, 132, 138
- LPDR (Lao People's Democrati Republic)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234 - 236; collectivization 集体化 191 - 196; corruption 腐败 218 - 219; economy 经济 215 - 220; exodus from 外逃, 177 - 180, 231 - 234; foreign aid 外来援助 187 - 188; Hmong resistance 苗族抵抗 184 - 187; and LPRP 老挝人民革命党 200 - 201; prison camps 集中营 180 - 183 stabilisation 稳定 196 - 199; and Vietnam 越南 188 - 191
- LPRP (Lao People's Revolutionar Party) 老挝人民革命党, 177, 180, 189, 192 - 196
- Luang Phrabang 琅勃拉邦 10, 18, 27 - 28, 32 - 33, 170; French accord 法国和约 75 - 78, 89; Kingdom of 王国 34 - 36, 45, 47, 64, 70; Lao Issara 自由老挝 82 - 85; royal family 王族, 162 - 165
- Ly clan, 李氏家族 136 - 137; *see also* Touby Lyfoung 还可见杜比·李峰

## M

- magazines 杂志 62, 152; *see also* publishing 还可见出版业
- mandala state model 曼陀罗国家模式, 6 - 7, 16, 25, 26 - 27, 33, 40
- map: of Laos 老挝地图; road and rail 公路和铁路 230
- McCarthy, James 詹姆士·麦卡锡 34, 36
- McCoy, Al 阿尔·麦克伊 160, 161
- Meeker, Oden 奥登·米克 97, 110



Mekong River 湄公河 3, 30, 40, 41, 96  
Meo *see* Hmong 苗, 参见苗族  
mercenaries 雇佣兵 142, 143, 150  
military aid: American 军事援助: 美国的, 123, 125, 142, 143, 146; Chinese 中国的 121; Soviet 苏联的 119, 121, 187, 189; Vietnamese 越南的 187  
military enterprises 军工企业 219  
Military Region 军事区 2, 140, 142  
military *see* Royal Lao Army 军事, 参见皇家老挝军队  
minorities *see* ethnic diversity 少数民族, 参见种族多样性  
Mittasone, 151, 152, 156, 157  
mixed race relationships 混合的种族关系 65 - 68  
monarchy 君主政体 89, 234; abolition of 废除 175; Thai 泰国人 228  
Morin, Pierre 皮埃尔·莫林 69  
Mouhot, Henri 亨利·穆奥 34, 44

N

Na Champasak family 纳占巴塞家族 158 - 159; *see also* Boun Oum Na Champasak, Prince 还可见文翁·纳占巴塞亲王  
National Assembly 国民议会 94, 113 - 119, 172  
National Assembly Standing Committee 国民议会常务委员会 201  
National Congress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农业合作社全国代表大会 193  
National Day 国庆日 204  
national history 国家历史 72, 234 - 236  
National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uncil 国民政治协商委员会 169, 170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Chinese 中国的 54 - 55; French 法国的 42 - 45; French-sponsored 法国发起的 78 - 82; Lao 老挝的 70 - 74, 84, 129, 131, 154, 155, 228, 236; Thai 泰国的, 73  
Neo Lao Hak Xat *see* NLHX 老挝爱国阵线, 参见 NLHX  
Neo Lao Issara 老挝自由阵线 104, 107  
Neo Lao Sang Xat 老挝国家建设阵线 179  
neutralism 中立主义 106 - 109, 116, 124 - 128, 146  
newspapers 报纸 78 - 79; *see also* publishing 还可见出版业  
Ngon Sananikhone 依·萨纳尼空 159, 160  
NLHX (Lao Patriotic Front) 老挝爱国阵线 107 - 113, 118, 137, 138, 144; the War 战争 165, 166 - 167, 169 - 174; the LPDR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75, 179, 184, 193  
NLSX 老挝国家建设阵线 179  
North Vietnamese Army *see* NVA 北越军队, 参见 NVA  
Nouhak Phoumsavan 诺哈·冯沙万 208  
NVA (North Vietnamese Army) 北越军队 130 - 132, 144, 146, 172, 186

## O

- one-party doctrine 一党专政的学说 200 - 201
- opium; economy 鸦片; 经济 56, 95, 96, 123 - 124, 144, 172; monopoly 垄断 52 - 53, 55 politics 政治 160 - 162; taxes 税收 46, 58
- Ouan Rathikhoun, General 欧安·拉提孔将军 127, 160 - 162, 183
- Oudone Sananikhone, Colonel 欧栋·萨纳尼空上校, 117, 127, 159
- Oun Sananikhone 欧恩·萨纳尼空 159
- Ounkham, King 温坎国王 46
- Outhong Souvannavong, 欧统·苏万纳旺 76
- overseas communities 海外社区 231 - 234

## P

- Pachay rebellion 巴柴起义 56 - 58
- pagoda schools *see* schools 寺庙学校, 参见学校
- palladium 守护神 16, 18, 25, 26
- Paris Agreement on Vietnam 关于越南的巴黎协议 167
- Parsons, J. Graham J. 格雷厄姆·帕森斯 118, 119
- Pathet Lao *see* PL 巴特寮, 参见 PL
- Pavie, August 奥古斯特·佩维 36, 40 - 41, 44, 46
- peasantry 农民 95 - 96; *see also* collectivisation 还可见集体化
- Pegu, Kingdom of 勃固王国 18, 19, 20
- Phetsarath, Prince 佩差拉亲王 47, 49, 60, 63 - 64, 72 - 78; Lao Issara 自由老挝 82 - 85; and RLG 皇家老挝政府, 109, 113
- Phibun Songhram 披汶·宋坎 82
- Phothisarath, King 波提萨拉腊国王 15, 16, 18
- Phoui Sananikhone 培·萨纳尼空 64, 78, 111, 113, 114
- Phoumi Nosovan, Colonel 富米·诺萨万上校 112, 127, 140, 150
- Phoumi Vongvichit 富米·冯维希 109, 125
- Phra Bang buddha 勃拉邦佛 16, 18, 25, 26
- Phra Keo buddha 玉佛 18, 25
- PL (Pathet Lao) 巴特寮 118, 120 - 121; end to neutralism 中立主义的终结 124, 125, 128 - 133, 141 - 142, 143; and War 战争 146, 147, 170 - 174
- Plain of Jars 查尔平原 3, 15, 121 - 125, 139 - 142, 148, 149
- poetry 诗歌 67, 79, 80
- police force 警察 94, 101, 125 - 127, 170, 174, 189
- politics 政治 105 - 106, 109 - 116, 136 - 139, 160, 192 - 196, 200 - 201
- population 人口 59
- post office 邮局 94
- press, freedom of 出版自由 157 - 158, 179
- prison camps 集中营 179, 180 - 183, 201
-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218, 219

prostitution 卖淫 154 - 155, 208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on,  
国家联盟临时政府 124 - 125, 171  
publishing 出版业 31 - 32, 62, 78 -  
82, 151 - 153, 156, 157, 205 - 206,  
235; *see also* press, freedom of 还可见  
出版自由

Q

Qing Dynasty 清王朝 54, 56  
Quinim Pholsena 奎宁·奔舍那 125

R

racism 种族主义 44, 59, 60, 65 - 69  
radio 电台 206  
railways 铁路 230  
Rally of the Lao People 老挝人民大会 110  
Rama I, King 国王拉玛一世 26, 27  
Rama III, King 国王拉玛三世 27, 28 - 29  
Rama VI, King 国王拉玛六世 71  
re-education 再教育 174, 181 - 182  
refugees 难民 140 - 141, 142, 147,  
148, 155, 177 - 180, 183, 231 - 234  
relocation 安置 30 - 35  
reunification, North-South Vietnam 南越  
和北越重新统一 112 - 113  
revenue *see* taxation 收入, 参见税收  
revolts 反叛, 25 - 29, 35, 53 - 59 *see*  
*also* coups uprisings 还可见政变、起义  
rice 大米 50, 95, 130  
RLA (Royal Lao Army) 皇家老挝军队  
112 - 115; against communists 反对共  
产主义 121 - 122, 124 - 127, 140,  
142 - 144; coup 政变 116 - 119; and

War 战争 146 - 150, 171  
RLG (Royal Lao Government) 皇家老挝  
政府 90, 151, 160; 1950s 20世纪50  
年代 94 - 98; America presence 美国  
的存在 98 - 105, 124; final coalition  
最后的联盟 165 - 175; and minorities  
少数民族 134 - 139; and Pathet Lao  
巴特寮 128 - 133; power plays 权力游  
戏 105 - 128; and RLA 皇家老挝军队  
139 - 144; and War 战争 146 - 150  
roads 公路 229  
Rochet, Charles 查理斯·鲁锡 78, 79  
Rocket Festival 火箭节 155  
Roux, Colonel H., H. 鲁上校 58  
Royal Academy 皇家学院 151  
royal family 王室 162 - 165; *see also*  
monarchy 还可见君主制  
Royal Lao Airforce 皇家老挝空军 142, 148  
Royal Lao Army *see* RLA 皇家老挝军  
队, 参见 RLA  
Royal Lao Government *see* RLG 皇家老  
挝政府, 参见 RLG  
Royer, Louis-Charles 路易斯·查尔斯·  
罗耶 60

S

Sananikhone family 萨纳尼空家族 159  
Sangha, reform of 僧伽改革 71 - 72  
Santiphab 和平党 110  
Sao Tiampa 特姆帕 65 - 67  
Savang Vatthana *see* Sisavang Vatthana  
萨旺·瓦达那, 参见西萨旺·瓦达那  
school textbooks 学校教科书 72  
schools 学校 47, 49, 58, 71, 235; *see*

- also education 还可见教育
- secret police 秘密警察 189
- Setha, Prince 塞拉亲王 76
- Sethathirat, King 赛塔提腊国王 15, 17, 18, 19
- sexuality and racism 性和种族主义 65-69
- Siam 暹罗 21, 25-36, 40-42, 43, 44-45, 74
- Siamese-Lao diversity 暹-老差异性 36-38, *see also* ethnic diversity 还可见种族多样性
- Siem Reap 暹粒 42, 43
- Siho Lanphoutakun, General 西豪·兰普塔坤将军 125-127, 128
- Sila Viravong 西拉·维拉旺 151
- Sip Song Chu Tai 西双楚泰 33, 34, 36
- Sisavang Vatthana: as Crown Prince 西萨旺·瓦达那: 作为储君 75-76, 83; becomes King 成为国王 114; King 国王 115, 122, 162-165, 172-173, 183
- Sisavang Vong, King 西萨旺·冯国王 46, 47, 53, 64, 70, 82, 88, 109, 114, 116
- Sisouk Na Champasak 西苏克·纳占巴塞 127, 171, 172
- Sisoumang Saleumsak, Prince 西苏芒·萨鲁姆萨亲王 84
- Sithone Khommadam 西通·库马丹 132-133, 138, 144, 182
- slavery 奴隶制 3, 13, 24, 27, 47, 54
- Smith, Horace 贺瑞斯·史密斯 117
- social structure: Tai 社会结构: 傣族 4-5; Lao 老族 150-152, 153-156, 206-208
- Somchine Pierre Nginn 宋金·皮埃尔·宁 42, 62-63, 72, 79
- Somphavan Inthavong 松帕万·英塔冯 152, 155
- Somsanith, Prince 宋萨宁亲王 115, 117
- Soulivong Savang, Prince 苏立冯·萨旺亲王 234
- Souphanou Vong, Prince 苏发努·冯亲王 104, 105-110, 123, 124, 125; Lao Issara 自由老挝 86, 88, 92; NLHX 老挝爱国阵线 165, 170-175, 180
- Souvanna Phouma, Prince 梭发那·富马亲王 68, 104-111, 115-125; and War 战争 146, 147, 163, 167-175
- Souvannarath, Prince 苏万纳拉亲王 76, 90
- stabilisation 稳定 196-199
- Sullivan, William H. 威廉·H. 苏里文 162-163
- Supreme People's Assembly 最高人民会议 198, 201
- Surinyavongsa, King 苏里亚旺萨国王 20, 24

## T

- Tai: 傣族 2-9; Lan Xang 澜沧 9-25; world of 傣族世界 37, 74
- Taiping rebellion 太平天国运动 33
- Taksin, General 他信将军 25
- taxation 税收 46, 50-51, 58, 130, 165-166, 217-218
- telecommunications 电信 96, 150-151
- television 电视 206
- temple schools *see* schools 寺庙学校, 参

见学校  
Tet Offensive 新年攻势 147, 166  
textbooks 教科书 72  
Thai blockade 泰国封锁 118—119  
Thai challenge 泰国挑战 74—78  
Thailand, relations with 泰国的关系  
226—228  
That Luang 塔銮 18, 34, 69, 81, 204,  
205, 234  
Theravada Buddhism 小乘佛教 8, 72,  
202—203; *see also* Buddhism 还可见佛教  
Thongthip Rathanavilai 统提·拉善维莱,  
181, 182, 183  
timber *see* forestry 木材业, 参见林业  
tobacco 烟草业 50  
Touby Lyfoung 杜比·李峰 136, 137,  
139, 183, 185  
tourism 旅游业 74  
trade: domestic 贸易: 自给自足的 13,  
96, 195; international 国际的 22,  
26, 37, 187, 198  
transport 交通 50, 96  
treasury 国库 94  
tribes *see* ethnic diversity 部落, 参见种族  
多样性

## U

underdevelopment 不发达 95—98  
unification 统一 83, 89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92  
universities 大学 211  
uprisings: Chao Anou 阿奴王起义  
25—29; *see also* revolts; coups 还可  
见反叛、政变

US Special Forces 美国特种部队 140, 144  
USAID 美国国际开发署 142, 143,  
148, 150, 173, 187

## V

Vang Pao 王宝 125, 139—144, 147—  
150, 172, 185, 186  
Vientiane Agreement 万象协议 167, 169  
Vientiane, King of 万象国王 25—29  
Vientiane, Kingdom of 万象王国 18,  
24, 25, 26  
Viet Minh 越盟 84, 85, 86—88, 92, 104  
Vietnam 越南 85, 188—189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121, 142,  
146—150, 166, 167; Lao casualties  
老挝伤亡 149—150  
Vietnamese Communist Party 越南共产  
党 104, 112—113, 120  
Vixun, King 维逊国王 15, 16  
Vong Savang, Crown Prince 王储冯·萨  
旺 175  
vote buying 购买选票 159

## W

warriors 武士 3, 4—5, 25—29  
Weldon, Charles 查尔斯·韦尔登 184  
White Star teams “白星”小队 144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74—78

## X

Xaiyna Chakhaphat, King 赛纳·查克帕  
特国王 15

## Z

Zacharine, King 扎卡林国王 46

## 译 后 记

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家,老挝对许多国人来说也许还很陌生。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国人前往老挝旅游、经商和学习,因此,全面认识和了解老挝也越来越有必要。要想全面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仅仅了解它的政治经济等现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了解其历史和文化。人类学家格兰特·埃文斯教授撰写的《老挝史》,用生动的文笔描绘了老挝从古代到今天的历史发展。书里既包括了历史上该地区各个国家跌宕起伏、潮起潮落的兴衰史,还包括了20世纪老挝从法国殖民统治中争取独立的过程、越南战争及其对老挝的后续影响以及目前老挝正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更为重要的是,格兰特·埃文斯教授对老挝历史的一些重要事件进行了重新阐释,对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因此,对有兴趣了解老挝的读者来说,此书非常值得一读。

本书的前期翻译主要由我负责,但是由于在此期间赴柬埔寨调研三个月,随后又先后赴老挝、泰国和越南调研,整天处于奔波之中无法专心翻译,最后由刘刚和王莹两位老师接手。翻译的具体分工如下:前言,第一、二、三章:郭继光;第四、五章和进一步阅读:刘刚;第六、七章:王莹。郭继光最后对全书进行了统校并整理了索引内容。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东方出版中心的王卫东老师在前期给予了悉

心指导,责任编辑章悬老师认真细致的工作发现了我们翻译中许多不够准确或者错误的地方,使本书增色不少。原作者格兰特·埃文斯教授非常及时并且认真回答了我们老挝一些专业术语的疑问。在此一一致谢。

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不当或者错误仍在所难免,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郭继光

2011年5月20日